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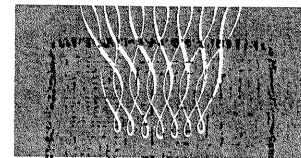
# 权力主义人格<sub>(下卷)</sub>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

[美] 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 第四部分

### 思想的质的研究

迄今为止,本书所提供的研究结果,其范围从被试的思想到他们的无意识心理特征。研究的方向和呈现的顺序是由思想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们不只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而产生(例如经济地位、团体成员或宗教等),而且,确切地说,人格中的动机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我们的研究并不机械地从思想走向心理,而是始终意识到两者的统一。因此,我们可以用颠倒这一过程的方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反犹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所涉及的领域中,尤其是考虑从法西斯主义量表和访谈的临床部分产生的那些研究结果时,被试的意见和态度具有哪些含义?通过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更加接近一项研究,该研究主要探讨思想和人格之间的关系。

显然,上述任务的材料主要取自访谈的非临床部分。这些数据不仅产生了迄今为止讨论过的重要问题的补充证据,而且我们的被试以他们自己的方式阐述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众多的心理线索。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访谈的非临床部分可以借助其固有的结构而在思想和人格之间建立联系。当然,我们的注意力并不限于这种关系上,我们还想获得各种思想的描述。只要我们按照标准的调查行事,我们就能实现这种想法。

####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Theodor W. Adorno

Copyright©1950 by Theodor W. Adorno

Translation Copyright©1998 by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 Inc.(USA)

Copyright Licenced by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 Reserved

---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1-1998-20 号

由于来自问卷、主题统觉测验和访谈的临床部分的数据都已经过统计处理,因此,就没有必要再对目前的材料进行量化。确切地说,我们的目的是为正在考虑的问题构建一种现象学说,它以理论阐述为基础,并由访谈记录予以说明。我们期望这一过程不仅会产生更多的关于思想结构的信息和人格得以显现的方式,而且也会导致指导性理论概念本身的进一步分化。这种补充的做法具有许多优点。它允许我们利用“现场”访谈的丰富性和具体性来获得我们在其他地方难以获得的材料;它使我们在其他研究中因疏忽而未被顾及的东西,通过灵活的交谈而重新获得;被试的一些罕见的或独特的陈述,可以通过访谈过程的讨论得到解释。尤其是被试的一些陈述,虽然具有极端的性质,但它可以使那些存在于“正常”领域内的潜在因素清楚地显示出来,恰如疾病帮助我们理解健康一样。

据此方式,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一种主观的或者称之为推测性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地位,而我们的许多项目便是从中派生出来的。如果想从分析中得出结论的话,那么解释应当被认为是研究的假设,而研究之所以能以各种方式相互作用,正是因为假设使然。鉴于第三、四章的讨论,我们并不认为在处理访谈材料时必须把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区分开来。已有的研究表明,反犹太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所以第四部分的第一章(即第十六章)将主要描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部分的另外一章(即第十九章)将讨论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症状。尽管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看,它们不属于这部分的内容,但是由于它们是以访谈材料为基础的,而且重点放在思想和人格之间的关系上面,因此把它们包括进去也无伤大雅。当然,对第十九章揭示的一组表现,需要予以适当的量化。<sup>[1]</sup>

## 第十六章 访谈材料所揭示的偏见<sup>[2]</sup>

我们的研究起始于专题调查,借此进入反犹太主义问题。可是,随着我们研究的进展,我们的重点也逐渐开始转移。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要任务不是去分析反犹太主义或其他反少数民族的偏见,而是考察反少数民族的偏见与各种思想和人格的关系。正因如此,在我们的访谈计划中,反犹太主义不再作为我们调查的一个主题,而是仅仅作为必须包括的一个题目了。

与我们研究相平行的还有另外一项调查,称做“劳工反犹太主义研究”。该调查是由社会研究所的其他研究人员进行的,他们既关注反犹太主义问题,又关注社会心理学问题,而这些问题与本书提及的问题密切相关。由于本章讨论的材料主要取自“伯克利访谈”中的偏见一节,因此我们试图运用“劳工反犹太主义研究”的某些观点作为我们的假设(至少以一种补充的形式运用这些观点)。在洛杉矶进行的“伯克利访谈”已经完成。我们与布朗和波洛克合作,起草了访谈计划的一个补充内容,专门讨论犹太人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取自“劳工反犹太主义研究”中收集的材料。我们之所以在访谈计划中起草一个补充内容,目的是想探讨一下在偏见结构中能否建构某些区分的模式。

补充内容如下。当然,并不是把所有这些问题逐一向被试提出,况且问题的措辞也不一样。但是,每个被试都涉足了由问题划分的范围。

### 涉及犹太人的一组问题

你是否认为存在犹太人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存在犹太人的问题，那么它们是些什么问题？你关心这些问题吗？

你有没有与犹太人相处的体验？哪些体验？

你是否还记得你所交往的犹太人的姓名，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材料？

如果没有这种体验，那么你对犹太人的看法是建立在何种基础上的？

有否与你的体验相反的信息（包括你所听到的关于犹太人的评论）？

如果有的话，那么它们会不会改变你的看法？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为什么？

你能从人群中认出犹太人吗？是怎样认出的？

关于犹太人的宗教，你了解些什么？

你身边有没有基督教徒像犹太人一样坏？他们的比例是否与不好的犹太人的比例一样高，甚至更高？

犹太人的工作态度如何？人们说犹太人勤劳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犹太人在电影、广播、文学和大学里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真的吗？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有什么不好？对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有人说犹太人在商业、政治和劳工等领域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真的吗？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具有何种影响？是否应该予以制止？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干了些什么？你对此有何想法？如果今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你将做些什么？

你谴责犹太人吗？他们属于下列哪种人：攻击的、没有礼貌的；控制银行；黑市销售商；欺诈的、杀人的；帮派的；共产党人；腐败的；肮脏的；逃避兵役的；剥削者；隐瞒身份者；太过聪明了；国际主义者；争夺许多工作岗位；懒惰；控制电影；金钱挂帅；吵闹不休；过分同化；繁殖过度；性欲过度；追求特权；爱吵架；意欲管理国家；耍小聪明；拥有太多的店铺；目无纪律；不道德地反对非犹太人；暴发户；逃避艰苦的体力劳动；制造阴谋。

你是否赞成社会偏见或特殊立法？

对犹太人应该作为个体来对待还是作为团体来对待？

你的建议是否与宪法保持一致？

你是否反对与个别犹太人进行个人接触？

你认为犹太人只是令人讨厌的还是具有威胁的？

你能想像自己娶一个犹太人为妻吗？

你喜欢讨论犹太人问题吗？

如果你是一个犹太人，你该怎么办？

一个犹太人能否成为一个真正的美国人？

补充的访谈材料告诉我们的是反犹太主义的模式而非反犹太主义的内部动力。我们在第五章就“伪民主主义”的特征而提出过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对我们理解偏见的心理冲突现象是有帮助的。另一个有意义的观察涉及到被试的反应，也就是说，向被试出示一张有关“不好的犹太人的特征”的表格，借此观察他们的反应。对此表格，许多被试的反应是一致的，很少分化。例如，持偏见的被试倾向于对犹太人进行谴责，这些谴责并非出自他们边看表格边产生的想法，确切地说，这些想法好像事先已经确立，或者说早已被普遍接受一样。对此观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予以解释：它既可以表示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内部一致性”，也可以证明高分者的心理定势。尽管我们的调查为反犹太主义思想的内部一致性提供了证据，但是尚不能说明反犹太主义的心理定势。要知道，有些高分被试的思维已经达到“自动化”的程度。究竟这种“自动化”的程度是高分者的心理定势使然，还是由于我们的调查程序有问题，目前还不得而知。如果是前者的话，则我们就可以提出极端的反犹太主义陈述。这种极端的反犹太主义陈述对超我起着一种麻痹的作用，甚至可以在一个人的反应不太强烈的情况下刺激模仿。这样的考虑使整个德国民族容忍极端的反

犹太主义举措的现象清晰地显示出来,尽管我们不知道那些德国人是否比我们的高分被试更加反犹。由此假设得出的一种实用主义的推论是,我们应当避免对反犹主义进行伪理性的讨论。人们可以驳斥反犹主义的论调,或者解释与反犹主义有关的动力,但是他不该进入“犹太人问题”的领域。正如现实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在欧洲大屠杀以后再承认“犹太人问题”,那么它实际上暗示纳粹的所作所为是有其正确性的。

关于思想方面的材料,除了在伯克利收集到的有关内容之外(参见第九章),还取自在洛杉矶进行过的63次访谈。

应当强调的是,主观因素再次处于突显地位。我们在选择样本时,排除了对“客体”(即犹太人)所起作用的调查,也就是在研究被试形成偏见的过程中排除了对犹太人进行调查。我们并不否认“客体”所起的作用,但是,我们的注意力是指向被试对犹太人的反应形式,而不是指向构成这些反应的“客体”。我们从一开始就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参见第三章):反犹主义偏见与它所指向的那些人的品质极少有关。我们的兴趣集中在高分被试方面。

在组织本章内容时,我们以下述假设为开端:产生自挫折和压抑的无意识敌意,在社会上的转向需要一个替代的对象,通过该对象,它可以避免被试对现实的激烈表现(例如,精神病的表现)。这种无意识敌意所指向的“客体”,并不是“替罪羊”一词所能解释的。它一定具有某些特点,以体现其作用;它是存在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传统成分;它可以用刻板的和定型的思想方法予以限定。最后,客体必须拥有特色,或者至少能够被感知和解释,以便持偏见的被试发泄其破坏倾向。有些特点,例如“宗派”和理性;其他一些特点,例如虚弱和受虐的表示,都为破坏性提供了心理上适宜的刺激。所有这些要求都由犹太人的现

象实现了,这似乎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犹太人的特征为他们自己招来了仇恨,或者说存在一种历史的必然性,使犹太人(而非别人)成为社会攻击的理想目标。我们只须这样说就够了:犹太人可以使许多人的心理发挥这种作用。犹太人现象的“独特性”,以及反犹主义的“独特性”,只有求助于本研究之外的一种理论才能予以探讨。这种理论既不列举各种“因素”,也不把某种因素作为原因,相反,它试图发展一种统一的框架,其中所有的“因素”都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以整体观为背景的现代社会理论。

我们首先提供一些关于反犹主义“功能”特征的证据,也就是说,它的客体具有相对的独立性。然后,我们将提出“谁得到好处”的问题:在一个冷漠的、疏远的、不可理解的世界里,反犹主义是一种最为经济的“取向”。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人们的政治经济思想,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取向”受制于陈规旧俗。以陈规旧俗为一方,以民主标准为另一方,两者之间的鸿沟导致一种冲突情境,它在我们的访谈中被清楚地提了出来。接着,我们将讨论如何解决这种冲突:我们文化中潜在的反犹主义,为持偏见者的有意识的或前意识的期待奠定了基调(在极端的例子中,它要比良知或官方的民主价值更强)。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寻求反犹主义反应的破坏性特征。除了冲突之外,持偏见者还会对某些犹太人特征表示同情,或者确切地说是“欣赏”。不过,当我们进一步观察时,我们发现它们也具有一些消极的含义。

关于反犹偏见的结构,我们还将补充专门的观察。其中,主要是根据被试的社会身份而对反犹主义进行区分。关于反犹主义特征和动力的调查,通过对低分被试的态度的一些评论来予以补充。最后,我们将就反犹主义对社会的影响提供某种证据:它对美国民主原则的否认。

## 一、反犹太主义的“功能”特征

心理动力说(dynamisms)“提倡”反犹太主义的发泄。这种心理动力说在本书的其他部分已经进行过分析。这里,我们只是提供某些极端的、具体的事实:反犹太主义并不像被试依赖自己心理需要那样依赖客体的性质。

我们有许多例子可以说明偏见的“功能”特征。我们发现,有些被试虽持偏见,但是他们的偏见所指向的群体却是偶然的。我们用下面两个例子来予以说明。编号为 5051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亦是某个童子军的领袖之一。他具有强烈的甚至是无意识的法西斯倾向。尽管他持反犹太主义的态度,但是他仍然设法用某些半理性的限制条件来修正他的偏见。于是,出现了下列陈述:“有时,我们听说犹太人在商业上比白人更加聪明。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而且,我也不喜欢这种说法。犹太人需要学习的是,教育他们中间的坏分子采取更加合作和更为一致的态度。实际上,在亚美尼亚人中间,欺诈分子要比犹太人多,但是亚美尼亚人不那么惹人注目,也不那么吵吵嚷嚷。我想提醒你的是,我认识一些犹太人,我认为他们在各方面都和我相同,因此我很喜欢他们。”

这使我们想起玻(Poe)在其著名小说《后悔傲慢》(*Rue Morgue*)中提到的双重谋杀者。小说中猩猩的叫声被听者误认为是外国人的语言,他们以为外国人就是说这种奇特的语言的。这里,主要的敌意反应指向外国人,他们被认为是“神秘莫测的”。对陌生人的这种幼稚的恐惧,后来成为对特定群体的一种意象,而采取定型的方法是最为方便的。犹太人是孩子心中“坏人”的替身。不过,将无意识的恐惧转向特殊的客体(后者只具

次要性质),这种转移始终保持一种偶然的性质。正因如此,只要其他因素予以干扰,攻击就有可能从犹太人转向另一个群体(至少部分地转向另一个群体)。在童子军领袖 5051 身上,伪民主的思想体现得十分明显,他认为自己并不保守,而是“自由主义的”。他通过将敌意转向第三个群体,缓和了他的反犹太主义。他之所以提及亚美尼亚人,目的是为了证明他不持偏见。但是,与此同时,他的阐述表明他的反犹太主义框架仍然保持着。即便是因为犹太人“聪明”而为他们开脱,实际上也是美化内团体的一种手段:他的潜意识里不喜欢“我们没有他们聪明”。反犹太主义具有在表面水平上选择客体的功能,但是这种选择受制于深层的意识的或前意识的决定。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编号为 M1225a 的男性被试,他属于海事学校那个被试组。他的偏见可以称为“转向的”偏见。尽管他在问卷方面的得分仅为中等,但是他在访谈时却显示了强烈的反犹太迹象。他对少数民族的评价,其开头部分如下:

(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你是怎样想的?)“我明确地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也许持有偏见。他们像黑人一样,他们应该更加人性一点……那样就不成为一个问题了。”

他的攻击性是从黑人的“特质”开始的(我们在其他一些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中间也能观察到),而且所有的攻击都针对犹太人。

“如果我必须和一个黑人一起航海的话,那我就不去了。在我看来,他们散发出一股冒犯的气味。当然,中国人说我们散发出一股绵羊般的气味。”

我们在劳工研究时也遇到过一个黑人女性被试,她抱怨犹太人的气味。现在的 M1225a 被试把注意力集中在黑人身上,虽然放过了犹太人,但其方式却是模棱两可的:

(犹太人问题是怎么回事?)“我不认为他们有许多问题。他们太聪明了,以至于没有问题。哦,他们都是些好商人。(他们的影响太大吗?)我认为他们有许多影响。(在哪些领域?)例如,在电影业。(他们滥用这些影响吗?)你听到的许多呼声都是要求帮助犹太人,但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帮助其他种族或国籍的人。(他们在影片中滥用其影响吗?)如果他们这样干,他们也会以不冒犯他人的方式去干。”

这里,反犹的定型再度得到体现,只不过被试将其憎恨转移到了黑人身上。对此,我们不能用访谈的程序来说明其原因,因为这种憎恨的转移确实影响了附加的价值判断。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被试关于“问题”的曲解。他通过否认“犹太人问题”的存在,有意识地给人一种不偏不倚的形象。不过,由于被试把“问题”解释为“有麻烦”,并且强调犹太人“太过聪明而没有问题”,这使他并不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拒绝态度。根据他的“聪明”理论,他的亲犹太的陈述既具有一种理性的光环,也揭示了他的矛盾心理:所有的民族仇恨都发源于“妒忌”,他的这种妒忌有其原因,例如,他接受这样的神话,即犹太人控制了德国工业。

这种访谈使得我们可以分化关于民族中心主义的描述。尽管反犹太主义和反黑人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而且我们可以在先前的问卷中(比较第四章)看到这种相关,但是这并不是说偏见是泛指。问卷中,对少数民族群体怀有敌意的陈述可以被认为是指泛指的,但是在访谈中,当被试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他们更多地把一个少数民族而不是其他少数民族作为特别憎恨的目标,至少在 M1225a 身上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根据迫害狂来予以解释。正如我们经常指出的那样,这种迫害狂具有许多与反犹太主义一样的结构特征。当偏执狂为憎恨所困时,他会挑选他的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些敌人身上。对潜在

的法西斯人格来说,也有类似的表现。一旦被试形成了具体的反移情行为(这对他捏造一种社会的伪现实是必不可少的),他便可以调集他的所有攻击,从而不去过问其他一些潜在的迫害对象。显然,这种情况只有在访谈中看得到,而在问卷中是看不到的,因为后者不允许被试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需要补充的是,我们的被试找到了许多犹太人的替代物,例如墨西哥人和希腊人。后者像亚美尼亚人一样,被随意地赋予想像的犹太人的特征。

就反犹太主义的“功能”特征而言,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提一下。我们发现,不少被试具有强烈的“遵奉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表明他们是毫无保留的反犹太主义者。他们不赞成外团体,几乎不能与之和睦相处。该行为的背后是一种“转移责任”心态,也即诽谤其他团体,以便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5023 的被试,他原籍墨西哥,是一个“具有焦虑状态的神经症患者”。

作为一个墨西哥裔的美国人,他认同白种民族,自以为“我们是优秀民族”。他不喜欢犹太人,特别是不喜欢黑人。他感到这两个民族是一样的,从而尽可能与他们少联系。问题是,他像其他被试一样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如果我们发现他娶了一个犹太女人为妻(或者说他爱上了她的话),那么我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另一方面,他认为既应控制黑人,又应控制犹太人,“使他们安分守己”。

编号为 5068 的被试认为,像他那样的人代表了“第二代美国人”。这些“第二代美国人”把自己描绘成“意大利—美国人”。该被试的偏见属于政治法西斯主义的偏见,而且明显带有偏执狂幻想的性质。

他有着纯粹的意大利血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美

国籍。他为自己具有意大利血统而感到自豪,从而在墨索里尼时代的早期就积极从事意大利—美国组织的活动。他一直认为反意大利的战争是一种不幸。他对其他少数民族持有相当的偏见。在他看来墨西哥人和意大利人十分相似,如果他们充分地接受教育,他们是很不错的民族。不过,当前他们需要接受更多的教育。他认为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受到了正确的对待,但是,对美国来说,不应该继续接纳他们。他把黑人描绘成是一个棘手的社会问题,认为对他们应该施以明确的法律,尤其不能允许他们与其他种族通婚,而且肤色的界限也应该是“生活区域的界限”,根据不同的肤色来划分不同的生活领地。“无论怎么说,南部黑人实际上是最幸福的黑人。”他认为他与犹太人一直相处得很好。不过,在他的商务关系领域,他认为犹太人是“骗子”,而且“他们结帮营私”。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他说“犹太人实际上应该教育他们自己,他们结帮营私的方式表明,他们对非犹太人的偏见超过了非犹太人对他们的偏见”。他用一则故事来说明这个观点,故事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虽与犹太人通婚,却不吃犹太人的东西。

我们还可以举一个例子。编号为 5052 的男性被试是一个反犹太人的西班牙—黑人后裔。他具有强烈的同性恋倾向,是夜总会的招待员。访谈者在陈述中这样归纳对他的印象:“这个人想说‘我不是黑人,我是一个招待员’。”这里,对社会身份的强调成了他偏见的原因。

最后,我们还想提及一件奇怪的事,它涉及对一个土耳其人的访谈。由于该被试的智力有点问题,所以我们不对他的其他方面进行评价。他疯狂地谩骂反犹者,可是访谈结束时,他却说他本人就是犹太人。在少数民族群体中,以及在犹太人中间,反犹太主义的复杂性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研究的严肃问题。即便

我们的样本所提供的观察也足以证实下列的假设:那些忍受社会压力的人可能会把这种压力转移到别人身上,而不是和他们的受难同胞携起手来。

## 二、想像的敌人

我们关于反犹主义“功能”特征的描述,以及所谓偏见能够从一个客体转移到另一个客体的例子,都试图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偏见的内容与其客体的性质只存在表面的联系。现在,我们将为这一假设提供直接的证据。这些证据取自诸如定型反应、投射和权力幻想等临床项目,它们表明被试的陈述或者自相矛盾,或者与事实不符,而且具有明显的想像性质。由于反犹主义者的“自我矛盾”可以根据下列的理论予以解释,即他们虽然涉及不同层次的现实性质和不同形态的心理冲动,但是这些性质和冲动在他们的世界观里仍然是可以调解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主要关注被试的想像结构。我们意欲探讨的幻想在日常生活中是十分熟悉的,它们对反犹主义结构的影响可以说是必然的。随着我们研究的深入,这些幻想才逐渐得以凸现。我们认为,每当定型的思想“发疯”时,这些幻想便会发生。也就是说,这些幻想本身不受个体与现实相互作用的支配。当这些“发泄”的定型思想被强行带入现实关系中来时,明显的歪曲就出现了。我们收集到的定型幻想,就其内容而言,与过分的权力主义思想有关,而这种过分的权力主义思想促使被试去挑选敌意的对象。客体的社会弱点与被试所假设的邪恶之间并不相称,这种不相称本身证明了投射机制正在运作。

我们首先提供一些万能幻想的例子,它们抽象地投射于整个外团体。接着,我们表明这些思想如何用于实际经验,从而导



致偏执狂妄想。

编号为 5054 的被试是一个中年妇女,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她十分关注自己,而且具有“飞扬跋扈”的特征。她常声称自己能够辩证地看问题,甚至“在各个方面与偏见作斗争”。她以她的丈夫为对照,说她的丈夫是极端反犹的,例如他憎恨一切犹太人,而她则是有所例外的。关于她的态度描述如下:

她既不赞同“种族理论”,也不认为犹太人会有所改变。确切地说,她认为犹太人不仅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而且还会“更具攻击性”。她指出:“不管我们喜欢与否,犹太人最终会管理这个国家。”

我们认为,被试关于犹太人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不适当影响的那种定型,会逐渐膨胀到武断地认为犹太人对国家管理的威胁。不难推测,这些被试心目中的反犹措施像他们的迫害想法一样具有极权的性质,尽管他们没有用这些言词来表达。

类似的例子还有编号为 5061a 的被试。表面看来她是一个综合案例(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一中分,但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却得了低分),但是,正如访谈材料所证明的那样,她实际上是一个明显的民族中心主义者。在她的陈述中,关于犹太人的幻想强度与其复仇的强度相等。

“我与犹太人的关系谈不上愉快。”当我们要求她说得具体一些时,她却举不出具体的事例,而只是说“他们推推搡搡、好攻击、搞小团体、重金钱等。犹太人实际上接管了国家。他们正在涉足每个领域。这并不是说他们聪明,而是因为他们努力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实施控制。他们是一丘之貉”。当问她是否认为犹太人有所变化时,她说道:“不,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有某种东西使他们结成帮派,以至于在每个领域都有他们的身影。我有犹太朋友,但我设法不与他们对抗。问题是,他们迟

早会证明自己是具有攻击性的,是令人不悦的……我认为坏的比例远远高于坏的非犹太人的比例……我的丈夫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同感。事实上,我还比他保守一些。他虽不喜欢希特勒做的事情,但是他认为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是为犹太人好。他感到我们这个国家也应该为犹太人做些事情。”

有时,关于犹太人统治这个国家的想法用投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被试的反犹意识借助谴责体现出来,譬如谴责那些消除民族的想法,甚至谴责那些强者统治国家的想法。他们把这些想法称做是反民主的,他们希望维护民主权利。编号为 5018 的被试是一个 32 岁的前海军陆战队军官,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访谈者怀疑他具有“偏执狂”。他认为“犹太人不能称之为一个民族,他们只是一丘之貉。他们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权力,问题出在我们身上”。接着,他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们应该用不让犹太人控制商业的办法来对付他们。凡是有此想法的人可以进入商界,与他们竞争,也许会战胜他们。但是,需要补充的是,最好用船把他们送回巴勒斯坦,让他们在那儿彼此欺骗。我具有与他们打交道的经验,他们中有些人是好士兵,但这样的人不多。现行的民主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他们不会在民主的基础上合作。”

该被试的反民主意识在“现行的民主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议论中得到佐证:他责备犹太人缺乏民主的合作精神,而这种责备不过是一种文饰作用。

对犹太人的不现实的想像,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也就是所谓犹太人“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有时取代了无所不能。由于实际上犹太人并未统治这个国家,没有什么现实依据可寻,因此充满想像的被试不得不为他们的权力幻想寻找出路,于是“无处不在”也就成了危险的和神秘的了。这种推测与一种心理要素

有关:对高度偏见的被试来说,内团体的权利概念和它不能容忍的东西之间是可以相互渗透的。由于高分者把犹太人看做是“闯入者”,看做是对他们的权利概念构成威胁的群体,因此他们就将犹太人作为投射的对象,不仅不能容忍这些“闯入者”,而且憎恨这些“闯入者”,甚至感到消灭他们是正确的。以下的例子表明,当犹太人无处不在的思想用于个人经验时,被试反映出近乎妄想的行为。

编号为 6070 的被试是一个 40 岁的妇女,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一中分。她对犹太人的评价相当激烈:“我不喜欢犹太人。犹太人经常哭泣。他们从我们手里接管了国家。他们具有攻击性。他们被不洁的欲望所包围。去年夏季,我遇见一位著名的音乐家,他在我了解他以前就要我在一份宣誓上签字,希望我帮他把他的全家移居美国。我不得不干脆回绝,告诉他说,这里已经不需要更多的犹太人了。罗斯福把犹太人引入政府,那便是今天我们困难的主要原因所在。正是因为犹太人被如此安排,致使他们在征兵中受到歧视。我赞成沿着美国的路线而不是希特勒路线对犹太人施以合法的控制。这个著名的音乐家差不多令我发疯。我邀请他来我的海滩俱乐部作客,看来是个错误。他与其他 10 个未经邀请的犹太人一起到达,给我制造了许多麻烦。对犹太人来说,只要有一个人来到美国,他就会带来两个人,而那两个人还会再带来两个人,问题就在这里。”

上述引文比“犹太人无处不在”更加引人注目。它构想了犹太人的弱点,包括他们“总是哭泣”,他们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向全球扩张等。如果认为这种想法来自被试受到威胁的事实,这似乎有点牵强附会,因为被试并未真正受到威胁。其实,这段引文证明了极端的反犹主义者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这位女性被试邀请著名的音乐家来她的俱乐部作客,毫无疑问是为他的名声

所吸引;另一方面,一旦这种接触得以确立,被试的攻击对也就有了。

把这种准精神病的特质与疯狂的反犹想像结合起来的另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5004 的 26 岁女性。她在法西斯量表上得高分,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一中分。当问她关于犹太人的宗教时,她的回答具有“神秘莫测”的味道:“对此,我所知不多,但是我不愿去犹太教堂。”这样的回答应该与她关于纳粹罪行的陈述联系起来进行评价:“我对德国人施之于犹太人的行为并不特别感到遗憾,因为我认为犹太人会对我们干出同样的事情。”

被试以犹太人可能对她进行迫害的幻想,也即以一种有根有据的偏执狂方式,作为纳粹进行灭绝种族大屠杀有道理的证据。

我们再举两个有关歪曲的例子。当经验借助定型的棱镜进行观察时,这种歪曲便发生了。在退伍军人组,有一个编号为 M732C 的被试,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对黑人和犹太人都有上述形式的歪曲体验。例如,他对黑人是这样描述的:“你无法想像一个黑人驾驶着一辆凯迪拉克轿车。他们穿着华丽,但却十分俗气。他们有一种好炫耀倾向,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感觉:虽然没有水准,但是需要炫耀自己。即使没有钱,他也要买一辆昂贵的轿车来炫耀一下。在我的班级里,最聪明的一个女孩是黑人。她之所以聪明,是因为她的过度补偿的结果。她的目的是用学业上的杰出性来掩饰她的固有的劣等性。”

关于黑人驾驶凯迪拉克轿车的陈述已经说明了问题。至于学生的故事,则是以个人化的案例来表明敌意态度方面那种不可避免的挑衅性质。对于持有偏见的被试来说,黑人理应是“愚笨的”。如果确有杰出成就者,那也不过是过度补偿的结果,以

此证明规律的例外。不论黑人是什么或者干什么,他们都应该被谴责。

至于“犹太人问题”,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想说的是,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如果他们是白人,那就另当别论。犹太人有着犹太人固有的本能,不管那些本能是什么……我听说他们具有天生的商业嗅觉……我推测犹太人是会很会吸引人的……例如,无论你遇到哪类犹太理发师,他总会怂恿你坐到他的椅子上。犹太人具有某种神秘的影响力……他们是无所不能的精明商人,对你来说,与犹太人竞争,你是必败无疑的。”

关于理发师的故事,似乎回到了婴儿时期的心理,也即一种神奇的、万能的思想。

编号为 F359 的被试是一位供职于政府部门的 48 岁的会计。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却得低分。按照访谈者的说法,她是一个有文化的、受过教育的女性。不过,一旦她涉足种族领域,上述的条件并未阻止她进行偏执狂故事的描述。她的曲解既指向黑人也指向犹太人。

被试认为黑人的问题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黑人越来越坏,他们的存在使得情况越来越糟。被试在华盛顿亲身经历过一场动乱,当时发生了枪击,电车的窗子被打破。起因是一个白人想进入黑人的车厢,黑人便拔枪射击。白人被击中,躺在地板上。晚上,她不敢外出。一天,黑人在马路上列队前进,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她推离人行道。当她提出抗议时,他们看上去十分傲慢,以至于她害怕因此而出现暴乱。她的同伴说:“赶快离开这里,否则我们会成为暴乱的受害者。”她的一个朋友对她说,她曾要求她的女仆星期四来家工作,但是遭到女仆的拒绝,理由是“星期四不太平”,或者说星期四那天黑人会把白人从人行道上

轰走。她在洛杉矶的另一个朋友告诉她,不要让黑人女仆使用吸尘器,因为她们会用它来撕破地毯。一天,她看见女仆正在用锉刀撬她的吸尘器,于是问她干什么。女仆答道:“噢,我正在设法装配这玩意儿。”看来,黑人千方百计想对白人进行报复。我们不能给他们平等的权利,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权利。我们不得不首先对他们进行教育。被试在剧场里或餐厅里拒绝坐在黑人旁边。她举了药房里的一个例子。当时,她发现有个男人称呼一个黑人看门人和一个清洁工为“先生”。于是认为,不能如此对待他们,否则他们就会说:“啊,我和白人一样了。”“我认为这样称呼他们是会有麻烦的。”看来,她担心暴乱和流血。

(犹太人呢?)“我想他们也要受到责备。他们就是不能老老实实地做生意,他们总是欺诈别人。做生意的诚实性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你能不能举个例子?)她举了一个朋友的例子。她的朋友喜好摄影,于是便想从当铺买一架二手相机。一天,当他走进一家当铺时,有一个戴着假牙的老妇也在那儿。犹太店主告诉老妇,她的假牙不值钱(其实,有几颗假牙是镶金的)。结果,犹太店主给了她几块钱买下了假牙。等老妇离开后,犹太店主便转向被试的那个朋友说道:“她不识货,你没看到有几颗假牙是镶金的吗?”言外之意是,这副假牙的价值远远超出他给老妇的钱。被试的朋友没有上当,因为他熟悉相机的性能。他把犹太店主买老妇假牙的行为称之为骗局。

不同团体之间的接触,常常被认为是改善文化之间交流的最佳措施。由于反犹主义者对这种接触有着他们自己的价值判断,因此这里呈现的材料主要是为了揭示这种价值判断,至少对极端的偏见类型来说是如此。他们在经验和定型之间没有界限。定型成了他们观察事物的方便手段。不过,由于这种定型

以深刻的无意识为其根源,所以由此产生的曲解不是容易纠正的。确切地说,他们的经验是由定型决定的。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上面提及的那些被试有着一些共同的特征:少数民族的团体成员彼此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人们对不同的成员持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即便这些差异与偏见者的定型有所不同,但是他们仍然会通过定型的眼光来进行感知。而且,不管这些成员是什么和干什么,他们都会予以反对。看来,这种倾向不只限于本研究所涉及的被试,它们也有可能出现在那些看似温和的个体身上。正因如此,我们应当充分规划防卫的措施。首先,我们必须抛弃对团体之间接触所持的乐观主义倾向。其次,我们必须明白,对偏见者来说,我们不能用其经验来纠正其定型,相反,我们必须重组他们的经验,以防这种邪恶思想蔓延。

### 三、反犹太主义的反犹原因

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只要心理内部所体现的症状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功能,那么这些症状的集合表现便具有临床意义了。这里,所谓心理内部的症状是指被压抑的冲动的替代愿望,或者说是对压抑冲动的抵抗。我们已经讨论过反犹太主义态度的非理性方面。由于它们的内容与现实不符,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它们是症状。问题是,这些症状是无法用神经症的机制来解释的。况且,反犹太主义者或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人格,肯定不属于精神错乱。要想对这种非理性的症状作出理论解释,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不过,我们有理由提出这样一些问题:在被试的生活中,有哪些东西是为他们的反犹太主义思想方式服务的?看来,答案在于被试是如何建立和巩固定型的。对此回答的研究已在前面几章提到过。这里,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自

我层面上。也就是说,在被试的经验结构中,反犹太主义究竟给了他们什么东西?

有些偏见无疑是理性的。如果一个农民想占有邻居的土地,那么对此动机我们是不能凭幻想来推断的。同样,如果一个被试对法西斯主义的独裁抱有偏见,并且将其作为自己的施政纲领,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他的态度称之为是理性的。然而,由于这种独裁的目标本身就是非理性的,而且盲目地接受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也不能称之为是理性的,因此上述例子中的理性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了。此时此刻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被试之所以赞同毫无现实基础的思想,或者说被试之所以表达被我们称之为顺应不良的思想,是因为这样做“有利可图”,那么是哪些利益使得他们如此作为的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访谈的政治经济部分(参见第十七章)获得一个结论。被试在开始接触他们没有直接体验过的社会问题时,会表现出无知和混乱。社会过程的客观化(它们服从于超个人的定律)导致了他们对社会理性的异化。这种异化被他们体验成缺乏方向,同时伴随着恐惧和失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政治定型可以被看做是克服这些不适的一种手段,而政客和官僚的形象可以被理解为重新定向的一个指示路牌,或者说是对那些因缺乏方向而导致的恐惧的一种投射。在被试身上,类似的功能是由犹太人的“非理性”意象来实施的。对偏见者来说,他们更多地受到“坏人”的心理作用的制约,而不是受到官僚或政客的心理作用的制约(后者不过是作为犹太人的方便的替代物而已)。用邪恶去指责犹太人,似乎使被试重新找到了方向。可以这样说,这种意象越是保持“纯洁”,它就越不会受到现实的“污染”,经验也就越难以改变它。正是这种意象为被试提供了恢复平衡的一种策略。

反犹主义者,从张伯伦到希特勒,都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问题的关键。我们只需与那些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谈一谈,便可以发现这个所谓的“关键”所具有的心理含义了。他们的暗示反映出一种邪恶的自豪;他们讲起话来好像他们非常熟悉内情,而且解决了他人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会形象化地举起食指,一边比划着一边露出优越感的微笑;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好像知道每件事情的答案。这些妄想般的安全感对那些感觉不安全的人极具吸引力。正是这种无知,使反犹主义者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恐惧,一种又一种失衡。他们的严格的公式化,随着定型而变得越发原始。与此同时,由于他们把复杂的问题还原为简单的问题(不论这种还原的逻辑是如何运作的),因此越是原始就越具有吸引力。然而,由此获得的优越感并非处于理智水平。正是由于定型的思想把外团体丑化,把内团体美化,因此反犹主义的取向为他们提供了情感的 and 自恋的满足,致使他们理性的自我批判荡然无存。

法西斯主义者不断运用这些心理工具。如果他们的听众和读者对这种虚假的意象没有共鸣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这样做了。这里,我们关注的是人们(他们不是公然的法西斯主义追随者)共鸣的证据。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反犹主义的伪认知诱惑的三个重要论点上:认为犹太人的存在是一个“问题”,断言他们乃是一丘之貉,以及声称犹太人之间没有差异、无一例外。

在我们对持有偏见的被试所进行的访谈中,可以听到所谓犹太人或黑人是一个“问题”的陈述。我们可以引用一个例子,然后简要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的理论含义。

编号为 105 的被试是一个曾经学过法律的学生。当我们问他“犹太人是不是一个‘问题’”时,他声称:

“哦,犹太人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当然,不是整个民族都坏。

既有好人也有坏人,但是坏的比好的多。”

“问题”这个词来自科学领域,主要用来提供思考。当一个人提到一个问题时,他实际上含蓄地表明自己遇到了阻碍。这时,偏见具有极好的文饰作用。文饰作用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他之所以认为存在“问题”,是深刻的思考和成熟的经验之结果。利用这一手段的被试,在访谈期间保持一种推论的态度:他准实证地对他所说的东西予以限定,然后也允许例外。不过,所有这些限定和例外都只是触及表面而已。一旦“犹太人问题”的存在得到认可,反犹主义便赢得了它的首场胜利。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术语本身进行模棱两可的定性:它既可以是一个中性问题,也可以是一个消极问题。无疑,该术语客观上提出了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然而,由于它涉及到“犹太人问题”,所以重点被微妙地转移了。客观性的外表仍然保持着,其含意却成了讨论犹太人的问题。所谓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主要是指对社会来说的一个问题。从这一立场到下述含蓄的概念仅一步之遥,含蓄的概念认为,这个“问题”必须按照它自身的特殊性来予以处理。而“自身的特殊性”就是犹太人的可疑本质,正因如此,对它的讨论已经超越民主的范围。此外,“问题”要求一个解决方法。一旦犹太人作为“问题”而被标志时,他们就转化为客体,而不只是被试的问题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法可以像解一个数学方程式那样进行推导。

应当补充的是,“问题”的概念通过纳粹宣传和纳粹榜样严重地干扰了舆论。这种所谓的“问题”也可在低分被试的访谈中找到。不过,没有偏见的被试试图恢复该术语的客观的社会意义,他们坚持这样的事实: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实际上是非犹太人问题。不过,也应注意,这个术语的使用可能暗示着被试的某种矛盾心理,甚或无所谓的态度。正如编号为 5047 的被试所表

明的那样,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却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对啊,我认为存在所谓的犹太人问题和黑人问题。在我看来,虽说不是所有犹太人和黑人都有问题,但实际上他们中大多数人有问题。”他感到需要对无知的群众进行更多的教育,并且改善他们的经济条件,以便他们没有必要再去寻找替罪羊。一般说来,他对问题的理解似乎是理智的,他表示他既不赞成反犹太主义,也不赞成歧视黑人。可是,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方式,以及他把它作为纯学术问题而进行处理的倾向,却似乎表明他言不由衷,而只是运用一些陈词滥调而已。

“问题”这个术语还提示了所谓“公正”的想法。谈论“问题”的人很容易说每个问题都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意义。由此,得出下述的结论便显得合理了:如果要消灭犹太人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做了某种错事。这种遵奉主义的模式给人一种理性推导的感觉。

声称犹太人乃是一丘之貉,不仅省却了所有的烦恼,而且也给人造成这样一种气势,即他从整体入手,而非从细微末节入手,好像他是一个有理智的人。与此同时,“一丘之貉”的概念强化了个案的样本具有某种普遍性的看法,这种普遍性的看法是,“一丘之貉”意味着没有例外。我们下面提供的一个例子,其中“对犹太人十分了解”的痕迹依然存在,而“一丘之貉”的想法却导致了疯狂的想像。编号为 F116 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当犹太人的问题提出来时,他的反应是:

“你是说犹太人吗?实际上,这是一个令我产生强烈情绪的问题。我对犹太人没有好感。虽然我认为这样的偏见有害无益,但是我禁不住会这样做。”(你不喜欢犹太人什么?)“没有一样喜欢。我讲不出他们好在哪儿。”(有没有例外?)“不,我从来

没有遇到过例外,尽管我很想遇到例外。我的这种做法肯定令人不悦。我想尽可能公正一些、文明一些,但却做不到。他们欺诈、谋利。”(在你喜欢的人中有没有犹太人?)“噢,不,我认为犹太人隐瞒不了自己的身份。我能识破他们。”(他们看起来怎样?)“很有吸引力。穿着体面。他们好像知道自己所需的东西。”(你对犹太人的熟悉程度如何?)“哦,在童年时期,我不认识任何犹太人。实际上,10年前当我移居旧金山时,我才开始认识犹太人。他是我们的房东。真可怕。我在丹佛有个可爱的家,我不愿离开那儿。可是,生活在这儿,我被‘钉死’在一个丑陋的套间里,犹太房东使我的居住环境越来越糟。如果房租规定在星期天交,那么他便会早早地等在那里。自那以后,我认识了许多犹太人,有犹太老板,也有在银行里工作的。他们无处不在,而且总是与钱有关。我的隔壁邻居就是一个犹太人。我希望自己变得文明些。毕竟,我暂时还搬不了家。他们向我借割草机,理由是战时他们无法买这类东西。问题是,割草机很贵。上星期我们有个聚会,热闹了一些,结果那个邻居就给警察打电话。第二天我打电话给她,因为我怀疑是她所为。她承认了,我问她为什么不先打电话给我。她说有人在院子里唱歌,吵醒了她的孩子,她十分恼火,于是就给警察打了电话。我对她说,当她的孩子从医院回家后哭闹了三个月,我都没吭声。自那以后,她对我客气多了,而我却耿耿于怀。”

被试似乎对犹太人十分“了解”。他们经常提到,虽然他们意识到自己不该那样想,但却坚持他们的偏见,这种强制作用显然超越了他们的道德和理性。在本章讨论的反犹特征中,几乎到处可见反犹太主义者的这种话语。被试没有省略任何东西,她的陈述表明她已受困于犹太情结。表现她的反犹太主义如同完成一项工作那样,既涉及攻击性,又涉及优越性。她的态度带有那

种对邪恶的蔑视,好像她对各种内情了如指掌一般。

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悲观。她对许多问题不屑一顾,总是耸肩、叹气。

由于在劳工研究中引进了犹太人的概念,从而使这一研究多了一个颇具分辨性的项目。不过,我们只是以补充的方式使用这一项目,譬如在洛杉矶的样本中使用这一项目。犹太人的概念有助于揭示被试的定向机制,我们把这种定向机制看做是偏见的一个基本特征。与此同时,人们也可以经常看到,犹太人的多样性导致了评判标准的模糊性。问题是,这种模糊性并不干扰定位者的观点的明确性。让我们举一个把幻想和观察混合起来的例子。

编号为 5039 的被试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个 27 岁的学生。他曾服过兵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对啊,我想我不能那样想。但是,他们确实与众不同:大鼻子,与我们不同的脸形,以及说话举止独特……主要是讲得太多。此外,他们的态度也与我们不同。他们差不多总会用一个问题来反对另一个问题(被试提供了来自学校的例子)。我注意到,他们有点随意地批评别人,而且容易说大话,说话时还带有攻击性。”

#### 四、两种犹太人

上面讨论的定型被认为是一种伪公正的表现,被试试图通过掩饰他们的消极心态来达到排斥犹太人的目的。“问题化”的态度使那些心怀不满的人披上了理性区分的外衣,而关于犹太人都是一丘之貉的断言,则将“问题”转移到了系统的和完整的知识领域。可以这样说,他们似乎没有“漏洞”。他们假装自己

能够识别犹太人,假装自己是是非曲直的裁判,假装自己敢于宣布公正的观点。此外,他们还有另外一种值得注意的“取向”,这种“取向”借“地形学”的概念表现出来,而且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访谈材料之中。更有甚者,被试不是以谈论“犹太人问题”的方式来表明他们的反犹偏见的“伪理性”成分。他们把犹太人划分为两类:好人和坏人。这种划分常以“白种犹太人”和“犹太鬼”来表示。在他们看来,这种划分不只是主观态度的一种标志,它还具有客观的基础,也就是说,犹太人的同化程度不同。

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指出,持有偏见的被试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是根据严格对照的内团体和外团体来进行思维的。这里所考虑的二分法,常投射于外团体,或者至少投射于一个特定的外团体。毫无疑问,这种定型倾向对无论什么东西都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为了营造一种客观的气氛(尤其在一个人表达自己的敌意时),被试不得不在对立的倾向之间实行一种妥协,于是二分法也就应运而生。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下列假设:作出这种划分的被试极少得高分。这一假设已由我们的数据予以证实。根据我们的定向理论,我们可以期望这两种思想起着—座桥梁的作用,架在定型和经验之间。这样一来,“好的”外团体成员将是被试圈内的一些人,而“坏的”外团体成员将是被试圈外的一些人。这种划分显然与外团体的同化和非同化之间的差异有关。看来,尽管两种思想在许多方面十分含糊和抽象,但它是被试表明其克服定型的一种手段。问题是,两种概念都是虚假的,其本身就是一种定型。

编号为 5007 的被试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作了如下评论:

“我所认识的大多数犹太人都是白种犹太人,他们都很有魅力。犹太人是好攻击的,搞小团体的,而且看重金钱。至少在

‘非白种犹太人’身上是如此。我有两个体验。有些犹太人属于我所认识的最具魅力和受过教育的人,有些犹太人则属于不友好的一类。总的说来,我认为职业犹太人是受人欢迎的,而商业犹太人则是令人反感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被试的定型由一组“令人反感的犹太人特征”所提示,而且它们与一种代表人道主义倾向的二分法思想发生冲突。被试根据熟悉程度对犹太人进行构想,更为复杂的是,他把犹太人分为“职业犹太人”(受过教育、具有道德标准)和“商业犹太人”(冷酷的赚钱者和骗子)。

上面提到过的童子军领袖 5051 对“两种类型”进行了经典的描述:

“现在,让我以犹太人为例。无论在哪个民族中,都有好人和坏人。我们知道,犹太人虽称不上是一个民族,但却有两种类型的犹太人:白种犹太人和犹太鬼。我的观点是,白种犹太人像我们一样憎恨犹太鬼。我认识一位犹太朋友,他开了一家商店,他称有些犹太人为犹太鬼,不想做他们的生意,并把他们都赶走了。”

关于犹太人的反犹主义研究证实了上述假设。在德国,犹太人习惯于对来自东方的难民或移民进行区分,而且用此方法来安慰自己,也即认为纳粹的政策只是针对“东方犹太人”而已。这种看似理性化的区分,加速了对犹太人的迫害,而受迫害的犹太人大多是那些被犹太同胞视做圈外的人。这是反犹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表现为犹太人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区分。这种二分法的定型还具有另一个邪恶的含义:把犹太人分成“白种犹太人”和“犹太鬼”还只是武断和不公正的开始,那些反对“犹太鬼”的“白种犹太人”明天就会变成“犹太鬼”。

编号为 M1129m 的被试是海事学校的学员,他区分犹太人

的方式如同美国南方人对待黑人的方式。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被试在种族偏见和个人经验之间存在某种断裂现象。

“你是说犹太人吗?那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南方犹太人与北方犹太人不同。北方犹太人不像南方犹太人那般贪婪。”(如果你的女儿嫁了个犹太人呢?)“我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在高尔夫斯顿有许多这样的犹太家庭。在得克萨斯州,人们对犹太人不抱偏见。”

这种例外在其他被试身上也可找到。编号为 5003 的被试是一个温和的反犹主义作家,他作了如下表述:

“在你刚才所举的例子中,那个人并不了解犹太人。譬如,在我的好朋友中间有些人就是犹太人。”这里,“我的好朋友”虽然成了一种陈词滥调,但它却顽强地幸存了下来。显然,它利用了“人性”的特点,也就是说,被试的个人经验既屈服于他的超我,又不阻碍他的潜在敌意。

女性被试也有这种情况。一方面,她们会对自己熟悉的犹太人偶尔作出让步;另一方面,她们又表现出一种温和的偏执狂。以编号为 F109 的被试为例。她的父亲是苏格兰—爱尔兰人,母亲是美国—爱尔兰人。“我对犹太人抱有一种传统的反感,我也反对黑人。犹太人常常抱成一团,外出挣钱,而且欺骗你。犹太人善于从事大商业。看来,不久以后他们就会统治这个国家。在我认识的一些犹太人后裔中,有些人不错,当然,他们不是正宗血统的犹太人。犹太人的鼻子都很大,他们身材瘦小,但却狡猾。犹太女人长着黑发、黑眼,喜欢嚷嚷。”

被试知道自己持有偏见,认为自己需要教育,但是,她把这种偏见归因于她和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工作而造成的。

其实,“好朋友”的概念也很脆弱。在以下的引文中,朋友和“犹太鬼”的界线是模糊的,致使“朋友”没有得到充分的承认。



“你是说犹太人吗？我有个很要好的女友就是犹太人。她加入了犹太女生联谊会，但却没有加入我们的女生联谊会。”（你希望她加入你们的女生联谊会吗？）“嗯……（停顿）……我认为我不会反对。”（你是否赞同所有的犹太女生都加入你们的女生联谊会？）“不，一个犹太人已经足够了，你还想搞上一群人？”（为什么？）“一旦她们参与某些事情，她们就会试图控制它们。她们常常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结帮成派。那些犹太鬼不像他们开始时那般老实。你可以在旧金山的费尔莫尔街找到他们。我没有与犹太鬼相处的经验，我想，这是由于家庭教育的结果。父亲激烈地反对他们，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你对纳粹的行为有何看法？）“纳粹的行为是毫无必要的，犹太人有生存的权利。只要他们不侵犯别人的权利，便没有理由排斥他们。我在中学里认识许多犹太人，他们不常与人来往。别以为我在老生常谈。只要他们不反映犹太人的典型品质，我就会喜欢他们。典型的犹太鼻子、嘴巴和声音，给人一种紧张感。我无法列举这个国家反犹团体的名称，但我认为它们是存在的。”

应当特别重视这个女性被试的陈述。访谈者把她描述成是“棘手的人”。她认为犹太人给人一种紧张感，也许，这是所有高分被试的共同体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紧张感归因于受到压抑的内疚感，或者归因于某种“奇异想法”（当然，被试中不乏奇异想法者，对此需要进一步予以解释）。我们的假设是，二分法的思想不受客观的制约，它是一种心理表现。让我们以编号为5013的被试为例来举两个例子。她是护士班的学生，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

她对犹太人的感觉如同对日本人、墨西哥人和黑人的感觉一样。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她都坚持分化理论。譬如，她认为好的日本人应该允许他们住在加利福尼亚州，而坏的日本人则应

该让他们回去。像黑人一样，墨西哥人也被分为两类。当访谈者问她，像她那样的人是否也能分成好人和坏人时，她表示赞同，但却认为好坏之间的界线并不像她所列举的例子那般明显。在她看来，黑人的问题要比其他少数民族的问题更多。不过，她也承认自己在医院实习时与黑人护士和医生讲话。她举过一个例子，说她曾经照料过一个黑人女病人，该女病人告诉她，黑人渴望与白人平等相处。她感到这是一个十分聪明的黑人女性，并且赞同她的观点。

在南方佬的例子中，二分法的概念常用于黑人。那些生活在南方的黑人受到赞扬，那些离开南方并且一味要求获得平等待遇的黑人则受到谴责。在被试的眼里，南方的“黑鬼”更具屈从性，而且是更易剥削的对象。这种态度与家长式的和封建主义的理性化相结合，可以认为是准现实主义的。但是，“两种黑人”的心理结构常常导致不同的内涵。正如在编号为F340a的个案中看到的那样（她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则得中间分）。

“现在的黑人太骄傲了，他们来到职业介绍所，说他们不喜欢这种工作或那种工作。不过，也有一些人受雇于职业介绍所，他们为人不错，而且很聪明。在我们中间，有好人也有坏人。住在奥克兰的那些黑人不错。我不知道那些从南方来的黑人干些什么，他们带着刀，如果你干了他们不喜欢干的事情，他们就会跟你算账，把你切成碎片。”

这里，“两种类型”的概念导致了清晰的迫害幻想。

## 五、反犹太主义者的困境

如果反犹太主义是一种“症状”的话，如果这种症状在被试的

心理中起着一种“经济”作用的话,那么我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假设,即这种症状既不是简单地生成的,也不是被试无意的表示,而是一种冲突的结果。它的非理性归因于被试的心理动力,迫使被试在某些领域放弃现实的原则。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解释过,偏见作为一种症状来自冲突。这里,我们对导致冲突的因素的临床关注,并没有像关注反犹太主义者的内部冲突那么全面。有关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将在最后几节介绍。把二分法应用于外团体,代表着被试心理的一种妥协,即在潜在的冲动和敌意与良心的要求和经验之间达到一种妥协。也就是说,即便被试的理性考虑是虚假的,即便他所假设的洞察力受到本能冲动的歪曲,但是他们在讨论犹太人问题时通常持有一种比例的意识,至少在形式上是如此。

在高分被试的陈述中,冲突的标准形式如同上面所示:“我不该,但是……”等。这种公式代表着一种心理的置换。我们曾经指出,反犹太主义者在消极的定型和与这种定型发生抵触的个人经验之间出现了分裂。<sup>[3]</sup>不过,当被试对自己的态度进行反省时,定型和经验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颠倒。正如被试的陈述所显示的那样,他一方面赞成容忍,另一方面却又抱着敌意。究其原因,既可以归因于民主的思潮,即认为偏见是错误的,也可以归因于超我,即个体内部的社会心理作用。当然,这还不是全部原因。被试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定型的内容是想像的,而他自己的经验才代表了真实的情况。不过,为了更加深层的心理原因,他坚持这种定型,并且将后者转化成人格的表现。这种置换随着他的信念而加强,他知道他的容忍并不是很强大的,也就是说,他意识到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态度(反民主和平等的态度),不仅有着个人的原因,而且有着强大的社会倾向作为后盾。只不过他在陈述时声称自己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行动的,不

在乎其他人想些什么。他依靠这种想法,跟着自己的感觉走,结果偏见也就无法改变了。这似乎是高分被试的共同模式,借助这种模式,反犹太主义者的冲突情境以一种有利于偏见的方式被理性化了。

这种模式以一种颇具特征的矛盾心理表现出来:一方面,被试自称为偏见所困,另一方面,对具体的问题又持有偏见的陈述。例如,编号为 5056 的被试是一个 29 岁的家庭妇女,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她声称她和丈夫对任何团体都持欢迎的态度(当我们把她的民族中心主义高分与下面的陈述相对照时,我们发现这种表白特别有趣)。“可是,黑人应该与黑人呆在一起。我不想我的侄女嫁给一个黑人,而且我也不想与黑人做邻居。”对被试来说,黑人的存在是一个问题,“也许是最重要的少数民族问题”。她喜欢“南方的黑人,那里的黑人很幸福。实际上,黑人应该有自己的一个独立领地。这并不是说我们要制止他们什么。彼此独立,相安无事,对白人和黑人都是好事。这是因为,尽管我们统治他们,但是他们也能自行治理”。从上面的陈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被试的矛盾反映了她的潜在的冲突。在犹太人问题上,她也试图表现不偏不倚的态度。

譬如,她强烈反对像讨论黑人那样讨论犹太人。当访谈中黑人和犹太人的问题被同时提出时,她就提出了抗议:“我周围就有许多犹太人,事实上,我有几个犹太朋友。尽管他们中有些人很傲慢,但是有些非犹太人也很有傲慢。”

问题是,一旦涉及到她的个人态度时,她又迷上了定型,并且用逃避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这种逃避达到了赞同反犹太主义的目的。当她被问到犹太人的特点时,她首先提到“犹太人的鼻子”。此外,她还认为犹太人具有一组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特征是永存不变的。“他们一直想进行抗争。有

些人十分贪婪,而有些人则并不如此,相反他们倒是很慷慨的。他们用以交谈的言语颇具戏剧性。”她认为自己讨厌犹太人的情绪有增无减,对此倾向,她是反对的:“我们不妨想一想,当我们表现出那样的情绪时,我们不觉得很自私吗?”她不喜欢听到对犹太人的抨击,但是她又不想采用辩论的方法为他们辩护。这也许是由于她不喜欢争论的缘故,也许是由于她的某种不介入的态度(以表明自己并未为反犹太主义所左右)。

定型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导致了陈述的刻板性。编号为M1230a的被试是海事学校的一个学员,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中间分。我们可以从其陈述中获得清晰的例证。

(你是怎样看待少数民族问题的?)“哦,对于那些正在进入美国的外国人来说,这确实是个问题。尽管美国是个大熔炉,但是也不该让太多的人进入。至于黑人问题,我不持偏激态度。但是,鉴于我的生活情境,我并不赞成在各个方面都给黑人以平等。不过,对外国人来说,你好像对他们抱有一种天然的厌恶,然而,我们大家都曾当过外国人……”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编号为5005的女性被试的陈述,我们可以发现反犹太主义者的困境所在。该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均得高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

“我不认为存在犹太人问题。人们不应该受到歧视,相反,我们应该根据他们的长处和短处进行判断。我不喜欢把犹太人称做问题,而且我也是反对偏见的。确实,犹太人好攻击,没有礼貌,喜欢搞小团体,而且常常过度拥挤地居住在一起,吵吵嚷嚷,性欲过度,但是他们是理智的、清洁的。需要指出的是,我的这些陈述并非以我的接触为基础的,而是我听说的。在我的学校里,犹太学生很少,我只与一个犹太女孩有过良好的接触。”

这里,判断和经验之间的矛盾是引人注目的,偏见的存在只

能用心理冲动来予以说明。

## 六、既是法官又是原告

反犹太主义者的矛盾是当前文化所认可的偏见与官方所主张的民主和平等之间的冲突。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冲突存在于某种受到压抑的本我倾向和超我之间,前者以无意识为标志,后者以外化的习俗为标志。我们的数据表明,我们还难以解释被试的这种冲突是以何种方式被决定的,尽管我们可以假设,一旦偏见被允许进入一个人的思想方法中时,他就会对量表产生影响,也即在量表上展示他的偏见。此外,我们还可以期望,当潜在的法西斯人格的综合特征一旦得以确立,被试就会在各种量表上产生这种冲突。如果个体内部的冲突决定了被试的反犹态度,那么这种决定就会毫无例外地从道德角度予以文饰。好像内部的偏见遭到否认以后,它们就会以相反的能量为自己服务,或者说,从激烈的反犹转化成妥协。也可以这样说,超我成了本我的发言人。精神分析学说早就对此进行过描述。我们可以把那些在反犹太主义的表白中体现出来的冲动称做人格内部的原告,把良心称做法官,而犹太人则在偏见的人格中成了审判的被告。对那些具有矛盾心理的反犹太主义者来说,原告和法官这两者是融为一体的。为什么犹太人很难成功地抵御偏见的人格,原因就在于此。在纳粹德国,审判的实践也遵循同样的模式,不论在私人的法律诉讼中还是在集体的法律诉讼中,第三帝国从来不给犹太人替自己说话的机会。我们也看到,由于法西斯主义的本我不断冲击超我,个体会产生潜在的无意识的罪过情感,但是这些情感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被压抑,以便把原先的“文化歧视”转变成以破坏性冲动为能源的敌意态度。

反犹思想征服超我的一个标志是：断言犹太人必须对受到的抨击负责。于是，纳粹进行的大屠杀应该归因于受害者而不是执行者。反犹主义者随时为自己提供一种陈词滥调，以便使下述想法一劳永逸地被接受：“犹太人自作自受。”例如，编号为 M107 的被试是一个青年，他在问卷的每个问题上都标上 +3 或者 -3 的记号，但在三个量表上均得高分。他成为上述模式的最好例证，其中包含着“有烟必有火”的逻辑：

“我不理解希特勒为什么会对他们如此残忍。其中必有某种原因，一定有某种东西促成此事。有人说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他的权威。但是，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怀疑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与此有关。”

至于犹太人应负的责任，或者说受害者和凶手之间关系的颠倒，已由编号为 5064 的被试予以表明。这个被试也是洛杉矶的一个童子军领袖，其职业是屠夫。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均得高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却得低分。他在公开谴责德国人的暴行的同时，也作了如下惊人的建议：

“美国人对待犹太人不可能像德国人对待犹太人那样。我希望在我们采取任何一种措施之前，犹太人将有所作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是教育，尤其是对少数民族的教育。”

这种心态似乎源自传统的自由主义智慧：上帝只帮助那些能够自我帮助的人。犹太人处在患难之中，犹太人的问题该由犹太人自己来解决。鉴于这样一种文化氛围，成功成了测量任何一种价值的标准。然而，犹太人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问题，这种不确定性成了偏见者反对他们的一个依据。对此问题，我们将在讨论政治态度的一章中予以阐述。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另一个童子军领袖身上。编号为 5044 的被试是一

个出生于奥地利但已经美国化的 55 岁男性，他在所有量表上都得高分。

“犹太人应该成为领导。尽管犹太人遇到了不少麻烦，但是他们不该仰人鼻息，他们应该走自己的路。”

由于犹太人自作自受或咎由自取，因此，被试可以全然不顾一切相反的证据，把纳粹的灭种政策看做是正确的，或者说成是犹太人的夸张。编号为 M359 的被试是一位皮革公司的部门经理。他说，他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也拥有不少犹太朋友。尽管如此，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

（纳粹的做法吗？）“我不相信纳粹的做法仅仅针对犹太人。在我看来，这是犹太人的一种宣传策略，他们通过夸大他们的苦难来博取同情和帮助，尽管我对纳粹的处理方式不予支持。”

冷酷的态度，加上对纳粹的辩解，可以在这位被试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伪理性声明中看出：一方面，他为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机会；另一方面，他又根据推测不断提及犹太人的恶劣本质，以此排除获得机会的可能。

（解决犹太人的办法吗？）“如果把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去，则这样的做法无疑是愚蠢的，因为那里的地方不够大。有一个好主意，那就是让他们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要很大，以便他们能以正常的方式从事日常生活的追求。不过，即便如此，犹太人也不会快活的。只有别人在为他们效劳时，他们才会快活。”

一种解释性的观点认为，“犹太人咎由自取”的说法被用来作为对灭种性行为的文饰。这是因为，如果直接认可纳粹的所作所为，是社会不允许的。所以，它需要寻找一种理由，而“犹太人咎由自取”便是一种最好的理由。例如，编号为 5012 的被试

是一个 21 岁的退役海军军官,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的声明如下:

“我想,并非所有的事情都与犹太人有关。他们虽讨厌,但不构成威胁。然而,正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报应。”

编号为 F103 的被试曾是社会福利系学生,现已改学装潢艺术。她泄露了一个秘密:

“在我看来不应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乍一听,这样的说法令人可怕,但是,只要犹太人仍像现在那样行事的话,我就不会谴责纳粹。我与犹太人没有恩怨,他们的报应完全是他们自找的。‘别帮助你的同胞’,这就是他们的信条。”

这里,真正令人可怕的是死的愿望和道德的文饰作用之间的关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试反复强调她的非理性的一面,而不顾对犹太人的“邪恶”予以文饰。她承认她与犹太人从未有过什么过节,正因如此,这样的表述突出了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的一个重要特征:他们对犹太人的谴责甚至用不着想像一些犹太人的“罪过”。在前面的描述中,我们已经讨论过偏见者在内部进行交流的主题,以及这些主题所起的作用。高分被试经常抱怨说他们从未获得他们希冀获得的东西,相反,他们正在被人利用。这种受迫害感是与十分强烈的潜在的占有欲望携手前进的。当被试提到应该“公正”地对待犹太人时,他们实际上表达了他们的一种不公正的欲望,其中对等交换已被非理性的力量所取代。表现在对待犹太人的态度上,就成了“犹太人理应得到比他们已经得到的更多的惩罚”。通常,即使是一个具有过分攻击性的人,也不会对某个没有礼貌甚或行骗的人生出应该处死的想法。不过,对反犹太主义者而言,从谴责过渡到严厉的处置,似乎是顺理成章的。看来,这是潜在的法西斯人格的最为有害

的一个特征。

定型的逻辑特征不仅满足某些偏见的要求,而且其本身表现为一种心理特质。这种心理特质只有在其与偏执狂理论和偏执狂体系相联系时,才能为人充分理解(这里所谓的偏执狂理论和偏执狂体系是指,被试的公式包容一切,不能容忍任何一种不能为其公式所认同的东西)。极端的偏见者倾向于“心理的极权主义”,这种“心理的极权主义”是他客观上追求极权主义的主观状态。可以这样说,凡是能够触及的东西都触及了,而所有这些被触及的东西都必须与一个严格构思的和假设的内团体的自我理想等同起来。至于外团体(被选择的敌人),则代表着一种外在的挑战。只要还有一些与其公式不同的东西得以幸存,不论它们何等弱小,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就会感受到威胁。惟有当整个世界都转化成相同的偏执狂体系时,反犹太主义者才能安稳地睡觉,因为他们是为这种体系而奋斗的。这种机制有助于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失衡状态。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就是通过这种逻辑(属于古风性质的逻辑)来接近联想而非推论的。他们从温和的谴责过渡到疯狂的结论,直至最终宣布对那些他们所“无法容忍”的人处以极刑。上述机制可在劳工研究的访谈中找到。该研究发现,被试经常“自觉地谈到反犹太主义”。我们的访谈计划是一个标准化了的计划,它虽然防止被试“自觉地谈到反犹太主义”,但是,被试在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失衡现象是确实存在的。这里,被反犹太主义者的惩罚性道德所“剥夺”的超我获得了充分的意义,而心理的极权主义也应运而生。被试似乎没有什么抑制,涉及破坏性思想的联想也未被压制,憎恨差不多以一种自动的强迫方式得到复制和增强(这种方式既脱离客观现实,又完全不同于自我)。从社会学角度看,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失衡状态表明,对极端的反犹太主义者来说,理性定律的概念已经变得虚假。

只要被试能为自己争得权力,他便准备牺牲自己的思想。从心理学角度看,关于犹太人罪过的概念可被看做是偏见者遭受压抑的内疚感的一种投射。从思想意识形态的角度看,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失衡只是一种附带现象,严格地说,是一种文饰作用。在一些极端的个案中,被试首先关注的是杀死他所憎恨的对象,只是到了后来,他才会去寻找为什么犹太人必须被杀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无法证明他的灭绝人种之幻想的正确性。需要指出的是,一旦这种想法成功地占据被试的良心,则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失衡状态便会诱使他去追求仇恨,借此向自己和别人证明他是正确的。这就是诸如“犹太人咎由自取”或者“其中必有原因”等公式所起的作用了。极端的反犹主义者通过其极端的态度使他的良心的残存部分保持沉默。看来,他们在恐吓他人时也同时恐吓了自己。

由偏见者所演绎的虚假的审判,有时也会成为对犹太人的一种防御。不过,这种心理防御容易使人想起纳粹法庭的技巧。它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法庭需要满足其形式的和虚假的合法性,而良心只是空壳而已。正因如此,这种防御必然是无力的。不论如何标榜犹太人,听上去总像一种标准的谴责或一种伪善的变式。譬如,被试常常提到犹太人喜好拥挤的家庭生活,问题是,在这种评论的背后,往往遮掩了对犹太人结帮拉派的谴责,并且伴随着对这些犹太人品质的妒忌和抗议。此外,还包含这样的隐喻:被试在生活中得到很差的待遇,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他们坚持崇高的品质。在我们的访谈中还可以观察到另外一种虚假的辩护,那就是断言犹太人非常聪明。由于犹太人比非犹太人聪明,因此人们必须钦佩他们。这里,运作的机制包括两种贯穿于当代文化的价值观念:一种价值涉及宽宏大量、无私、公正和爱等理想,对此价值,任何一个人都必须身体力行;另

一种价值涉及成就、成功和地位等标准,对此价值,任何一个人都必须在生活中予以追求。可以这样说,这两种价值观念是被颠倒地用在犹太人身上的。如果犹太人符合这些假想的或现实的标准,则他们会受到赞扬,因为这些标准是反犹主义者所遵循的;与此同时,如果他们违背了这些标准,就会受到谴责,而反犹主义者却可以随心所欲地抛弃这些标准。被试虽然也运用良心的措辞,但其目的是为了拾回曾经用来选择敌人的道德信用,以便抚慰自己的良心。甚至对犹太人的赞扬也被用做他们确认犹太人罪过的证据。

上述的论点以及偏见心理的其他特征,都在编号为 5039 的被试的描述中得到说明。该被试是一个 27 岁的退伍军人,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在其他量表上得中间分。访谈者把他描绘成是一个“相当自我中心的人物”。

被试违背父亲的意愿,父亲希望他加入教会,而他却离开了教会。不过,他一再强调自己是一个非犹太人,借此与犹太人相比较。他的依据是,他在一个犹太人社区内长大,在那里他是唯一的非犹太人,因而他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在他看来,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所以不能相容,主要是因为宗教教义在犹太人问题上存在矛盾。他声称,基督教强调“如果一个人打你左脸的话,那么你便转过右脸去让他再打一下”的和平主义观念,从而使人变得“顺应不良或屈从”。相比之下,犹太教则促使一个人追求成就和进取,其根据是“你的父辈吃足了苦头,现在轮到你来证明自己了”。正因如此,被试认为基督徒将被雄心勃勃的和富有进取心的犹太人所战胜。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他的概括依据的是他自己的特定经验和特定环境。

需要对犹太人进行教育的假设,为被试提供了寻找敌意的借口。它在被试回答有关希特勒暴行的问题时充分显现出来:

“嗯,如果我住在德国,我想我也会干出这些事情的……也许,我也可能成为纳粹分子……因为我认为严肃纪律是件好事……”

由于这个被试关于犹太人聪明的陈述是抱有敌意的,而且自以为非犹太人在与犹太人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因此这种“聪明”的说法有时是用一种虚假的、贬抑的口气表示出来的。编号为 M104 的被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他原先学习工程,后来改学法律。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

“你是否听说,我国已被犹太资本家所统治,他们控制了这里的一切权力。如果情况属实的话,那么说明我们的人民不够聪明。如果我们的人民知道犹太人的行事方式,而不能去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犹太人就会谋得更多的权力。既然我们的人民知道犹太人的行事方式,他们就应该做得像犹太人一样好。”被试不愿承认非犹太人不如犹太人聪明,而是提出如果这个国家被犹太资本家所统治将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如果他们比我们聪明,那么就让他们管理吧。”

乍一看,上述引文充满了宽宏大量,但其背后却隐含邪恶的意思。只要我们将其隐含的意思稍加揭示,我们就可以发现被试的真正用意:犹太人因其邪恶的智慧而谋得了治理国家的权力,为此,我们必须消灭他们。由于犹太人的聪明使得宪法程序不再生效,因此消灭犹太人便只有通过暴力了。编号为 F105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女性,因儿时患有小儿麻痹症而留有残疾。她所谓的犹太人的聪明,其实是一种投射。她关于犹太人聪明的说法(犹太人“接管了全国的商务”),在预期犹太人的起义方面达到了顶峰。然而,这种预期只不过是她反犹纲领的一种投射而已。

“白人给我们的只是这些东西:白对黑和黄。我认为,战争

结束后会发生犹太人的起义。我并不反对犹太人。我接触过一些犹太人,他们都很不错。当然,我也看到过一些令我讨厌的犹太人。”(你觉得他们怎样?)“他们大声嚷嚷,而且喜欢引人注目。他们总是设法控制某事。我曾听说有关他们在朋友背后戳上一刀的故事,但是我相信眼见为实。”(你说的起义是什么意思?)“我认为这个国家将因它的所作所为而流血。”(理由呢?)“毫无疑问,犹太人正在接管这个国家的商业。我不认为难民该像他们那样受到照顾,在我看来,他们应该管好自己的事情。”

值得注意的是,当提出“流血”的主张时,被试并未明确表示究竟谁将流血。一方面,她把动乱归罪于原本并不存在的犹太暴徒;另一方面,她却把“消灭犹太人”的问题搁置起来。对极端的反犹主义者来说,流血的主张只是一种结局,而在其深层水平上,它在主观和客观之间并未严格地进行区分。潜在的破坏性冲动既属于敌人又属于自己,破坏性才是真正的“极权主义”。

这里,我们想列举一个被试对犹太人的评论,以此作为本节关于极端的反犹主义的一个概述。编号为 5006 的被试是一个牙科学生,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患有色盲和心因性阳痿,在访谈者看来,这是由于严重的恋母情结造成的。他公然赞同大屠杀的主张,其灭绝犹太人的强烈愿望也许与严重的童年创伤有关,或者说是其严重恐惧的一种投射。他对内团体的夸大伴随着一种潜在的虚弱感:他不愿认同与己不同的东西,因为他认为它们是危险的。

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祖父 4 岁时就来到这个国家。他从未离开过美国,而且也不想外出。他说曾到过梯乔娜,“那已经足够了”。他为自己是一个美国人而深感自豪。

对他来说,少数民族具有他们潜在的力量:“犹太人的麻烦是他们太强大了。”外团体的力量表现在富裕和金钱上。

“当然,这是一个问题。黑人繁殖得如此迅速,不久他们将遍布整个世界,而犹太人则谋得所有的钱财。”

至于他的反犹主义依据,可从下列谈话中得悉:

“我与他们相处从未有过感觉良好的体验(注意,这是第二次访谈。在第一次访谈时,他说他曾与几个犹太人一起乘坐私人游艇到卡塔林去玩,并且称这些犹太朋友是‘好人’)。他们试图欺骗我和我的家庭,而且他们不懂得体谅人。”被试讲了一则故事(对此,我不能逐字逐句地摘录于此),内容是关于买一件皮衣作为送给母亲的圣诞礼物。当时,犹太售货员错读了价格标签,把实际价格降低了100美元。在他们结束交易时,他指出了售货员的错误所在,付足钱以后才拿走皮衣。这给了他相当大的满足,他说:“那是一个例证,说明我比犹太人更加犹太人。”

他所谓感觉不良的经历是相当含糊的,除了“比犹太人更加犹太人”的例子之外(这是从另一侧面标志“聪明”主题的投射特性)。至于富裕的犹太游艇拥有者的描述,表明了他关于阶层意识的反犹主义,尤其是强烈地爬向上层社会的意识。甚至纳粹分子也要花些时间来使富裕的犹太团体认识到,他们应当分担贫民和东欧移民的命运。

个人主义的原则被这个被试改变如下:

“我想,他们应当像人那样被对待。但是,他们毕竟是一丘之貉。”

“人人都能识别犹太人。”这里,内团体和外团体之间的区分达到了一种形而上学的程度,甚至二分法也被排除了:

“我不能成为一个犹太人。”

至于罪过和惩罚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有一个公式是必须遵循的:

“我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当我与一

个竞争的承包商发生冲突时,我常想,但愿希特勒到这里来。我不赞成通过立法来推行歧视政策,因为在我看来,我们杀死坏蛋的时候快要到了。”

## 七、不相称的资产阶级

我们的分析导致我们研究极端的反犹主义,也就是灭绝犹太人的愿望。极端主义者的超我已经变成不再约束攻击的外惩罚力量。我们看到,极端主义的结果是通过在罪过与惩罚之间建立失衡而把反犹主义的非理性推向顶峰。在反犹主义的公式中,由于犹太人的本质是坏的,或者说是生来堕落的,因此任何改变和调适都是无济于事的。只要假定犹太人的消极品质不会改变,反犹主义者就会寻找解决的办法:消灭那些无法改变的人。对反犹主义来说,这种准自然(quasi-natural)的不可改造性要比单纯的谴责更加重要(后者是容易看出破绽的,因为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推论是与事实不符的)。随着这些定性的广泛传播,用来证明它们出现的频率和强度的证据也就没有必要了。然而,我们认为其中有些问题值得研究,它们在我们的访谈中清晰地得以显现,而且补充了业已凸现的有关现象。

从社会学角度来考察这些谴责,可能是有益无害的。我们的样本与劳工研究的样本相比,被试对象主要是中产阶级。圣·昆丁被试组则是惟一的例外,它的“流浪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性质,加上监狱的限制条件,致使我们无法将这个被试组与其他样本进行比较。我们样本的中产阶级性质,使得反犹主义者对犹太人的谴责带有某种特定的色彩。如果我们关于反犹主义的投射特征的假设可以成立的话,那么犹太人就会由于下列特征而遭受谴责,这些特征尽管从社会学角度上讲是模



棱两可的,但是它们却成了偏见者证明自己社会身份的靶子。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犹太人是资产阶级。许多工人被试很可能把犹太人看做是代表中产阶级的一种力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倾向的具体代表:犹太人乃是“提供钞票”的人。

在中产阶级反犹主义成员的意象中,犹太人具有不同的结构。中产阶级面临的是他们的经济基础受到了威胁,这种威胁来自犹太人。他们居于守势,为了维持他们的地位而苦苦挣扎。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的抱怨与工人阶级的抱怨不同,也就是说,犹太人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他们实际不属于资产阶级。根据犹太特征而建构的犹太人形象,表明他们不具备中产阶级的身份,因为中产阶级成员关注他们的内团体的社会地位。在中产阶级的反犹主义者看来,犹太人是“不相称的资产阶级”。可以这样说,犹太人并不符合今日美国文明之标准,他们只是过时的旧时代的残余。“不相称”一词常被持有偏见的被试用于犹太人身上。犹太人越是不具备中产阶级合法成员资格,他们就越是容易被反犹主义者从中产阶级的圈子里剔除出去。于是,这个圈子就更加垄断化。如果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政治和经济的篡夺者情结确实存在的话,那么犹太人就成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心目中的篡夺者:犹太人原本是个小贩,现在却伪装成受人尊敬的公民和商人。

在我们的访谈中,尽管无产阶级的反犹主题(例如,犹太剥削者或者犹太人躲避体力劳动等)并不缺乏,但是最具特色的反犹评论却是基于上述的思维框架。当然,我们不该夸大无产阶级反犹和中产阶级反犹之间的区别。工人被试所概括的犹太人特征也常常具有“不相称的资产阶级”性质。在工人被试看来可以标志资本主义特征的东西,则被中产阶级转化成了对不诚实的谴责,或者说对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的公然违背(资产阶级伦理

道德的主要准则之一是赞美诚实)。这里,关于定型的讨论已经超越了阶级的界线。

“不相称的资产阶级”可以根据三个主题来表达:第一个主题涉及犹太人的弱点及其心理特征;第二个主题涉及犹太人的中产阶级身份,以及在丧失这种身份后的一种过度补偿;第三个主题涉及犹太人对试图认同他们的那个阶级的不忠。

我们可以从编号为 F114 的被试身上看到所谓犹太人的弱点。这个女性被试是一个具有部分犹太血统的外科护士,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

“我有个表兄爱上了我,他想娶我为妻。我爱他,但是不会嫁给他。我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现在,他娶了一个非犹太人为妻,并且有了两个孩子。其实,他比我更加反犹。许多犹太人都是这样,他们恨犹太人,或者对犹太人不满意,好像犹太人是跛脚或驼背似的。”

关于犹太人的弱点的这类声明,经常由那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被试或者低分被试作出。对持有偏见的被试来说,他们的憎恨是被弱点所激发的,而且他们倾向于从表面上强调犹太人的力量,譬如犹太人“运用其不适当的影响”,“拥有每样东西”等。低分者对犹太人之弱点的态度可从编号为 5055 的被试陈述中看到。该被试 73 岁,是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在他看来,“犹太人的保护哲学导致了人们对他们的对抗”。

在极端的低分者的个案中,由于被试意识到犹太人的弱点,导致了他们对犹太人身份的认可:他们知道犹太人生活在羞辱之下,于是就有意识地假设犹太人的作用,以便对抗反犹的舆论。让我们以编号为 5028 的被试为例。他是一个 20 岁的青年,有点神经质,从事室内装潢。他公然违抗父亲但却强烈地依

恋母亲。

被试与其妹妹有点相似,都钦佩犹太人。他讲了一个笑话,说他们曾对父辈的亲戚开了个玩笑,因为后者是极端的反犹主义者。他们假装了解到曾祖父的母系是犹太人。被试说,母亲家系有许多人“看上去像犹太人,因为都有长鼻子”。听到这番话,父辈的亲戚“差不多要自杀”。被试提供了下列评论:他喜欢犹太人的一个原因是他“从不认识任何一个值得反对的人”。

对偏见者来说,犹太人的弱点之意象,与犹太人的力量假设相结合,有时会使被试特别敏感。美国法西斯主义的鼓动家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他们一方面把犹太难民的形象描绘成是强大的(“他们从我们美国小伙子的手中夺走了工作”),另一方面又把犹太难民的形象描绘成是虚弱的(“他们都是一些肮脏的流浪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后者才是他们真正的动机。例如,编号为 M105 的高分被试作了如下的陈述:

“许多犹太移民正在涌入这个国家。他们轻松地获得了工作,而且日益强大起来。但是,尽管他们有钱,他们中许多人仍是极度肮脏的。”这里,出现了对难民的攻击。不过,正如访谈者指出的那样,有些被试具有温和的反犹倾向。编号为 5036 的被试是一位爵士音乐家,目前靠领取失业保险金生活。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

尽管他否认外团体,但是许多抨击是含蓄的,而且是处于表面水平的。他认为难民无权享受公民资格,只要时间和条件成熟,就应该把他们遣送回家。

该被试对难民竞争者抱有憎恨的心理。他认为“犹太人在音乐方面有天赋,但是,他们喜欢结帮成派,而且具有攻击性。有时,我简直无法忍受他们”。他声称,犹太人的进取心态和自

私心态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些犹太人永远不会满足。一旦他们从你身上得到了好处,他们就会离你而去。我在与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破产了两次。”另一方面,他说有些犹太人无疑是杰出的。

由于难民从客观上说是弱者,因此他们很容易被谴责为具有飞扬跋扈的态度和谋取权力的驱力。这种定型化的思维有助于缓和反犹主义者在违背民主庇护原则时所产生的不适感:不是反犹主义者而是难民才真正违背了民主原则。例如,编号为 5043 的被试是一个中年家庭妇女,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她说犹太人总是大声嚷嚷,带有攻击性(她提供了一个例子,一个犹太妇女在拥挤的市场上推了她一把)。她在难民和其他犹太人之间作了区分,并说“我们那里正迁入一批难民犹太人,他们好搞宗派,缺乏理智,不受欢迎”。

关于犹太人具有攻击性的定型说法,表明了反犹思想的特征。这种特征理应受到密切的关注。被试在指责犹太人时,常把原始的身体攻击与心理假设相混合。例如,谈到“犹太人输血”时(这里,“输血”是被象征性地使用的),被试害怕“种族感染”,害怕犹太人的血会使他们身体“中毒”。歇斯底里的攻击性意象还涉及犹太人排队时的行为,他们挤入人群的那种样子被说成是残酷的商业实践的反映。所有这些象征性推断揭示了反犹主义的虚构特征。原先的心理意象被物化,目的是为了缓解对不可捉摸的“异己心理”的恐惧,以便为虚设的投射提供现实依据。这种转化使得反犹主义者抓住犹太人的特征不放。

据访谈者称,编号为 5067 的被试“是一个外表看来十分母性化的女人,约 48 岁左右”。她既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又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在描述犹太人的“攻击性”时,对身体攻击和心理假设是不作区分的。

“我不喜欢犹太人在商界的那种攻击行为。我注意到,差不多每次排队买东西时,他们总是推推搡搡,把人挤到一边,而我们必须等待。尤其是在战争期间。我对犹太人抱有真正的反感。”

在其他例子中,攻击性的概念被赋予“入侵”的社会意义。我们可以一眼瞥见这种谴责后面的机制。它也许与全面渗透的社会孤立感有关,并在中产阶级的社会生活中得到过度补偿。基于这种情感背景,犹太人成为一种经典的力量,因为他们的不孤立而遭妒忌。这种想法与犹太人结帮成派的想法密切相关,暗示着某种互动的意象:随着犹太人结帮成派,内团体成员遭到排除。前面提到的 F105 被试发明了下列公式:

“他们好像认识每个人。他们搞宗派,而且比其他民族更加团结。他们的朋友遍天下,他们能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最后,我们从访谈材料中发现了这样的证据,也即“攻击性”的定型思想基于受到压抑的性欲。犹太人被说成是不受清教徒道德观约束的人,犹太人的性习惯被描绘成是令人作呕的。甚至犹太人的“丰富食物”也在假设的不受制约的享乐中变得不可容忍。编号为 F118 的被试提供了这方面的看法。被试是一个公共卫生护士,42 岁。有时,她对外团体的憎恨集中在有组织的劳工身上,而不是少数民族身上。她在反犹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而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她无法想像自己会嫁给一个犹太人。她说,她曾有机会嫁给一个犹太人。一次,当她在纽约呆了一段时间准备回家度假时,她遇到了一个十分机智的律师(他与她的兄弟在同一个办公室工作)。他受过良好教育,懂得几种语言。她和他约会,而且三周内相约多次。直到有一天他对她说:“我想对你说件事,那是关于我自己的事情。你从未与我的家庭成员见过面,我也无

意让你见他们。不过,我想问你的是,你是否反对嫁给犹太人?”她说,当时,她仿佛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他看上去不像犹太人,他的名字也不是犹太人名字,甚至他在她去的教堂唱诗班里唱歌。正因如此,她从不怀疑他是犹太人。听了他的话后,她坐在那里一言不发,那便是她的回答。她继续补充道,这对他来说有害无益,因为当时她所住的宿舍里的所有女孩都发现他是犹太人,而且,在他的工作场所,也人人皆知。结果,事情变得越来越糟。被试在 10 年后又见到了他,感到他看上去更加犹太化了。不过,被试也补充道,那也许是因为她现在知道他是犹太人了。在嫁给犹太人的想法中,她之所以认为无此可能,是因为她联想到今后的孩子是犹太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女性被试的态度取决于她对男朋友的犹太血统的了解,而不是男朋友自身的特征造成的。我们几乎用不着进行深刻的推论,就可以假设那种定型重演了儿时对性欲的戒律,只不过现在被转化成对犹太人的反对。童年的经历成了后来厌恶的基础。

我们在前面的例子中已经揭示了被试对攻击的谴责与宗派概念的关系。我们认为,指责犹太人搞宗派,是被试主张消除“入侵者”的证据。在他们看来,犹太人总想欺骗那些试图接受他们的人。而搞宗派的概念进一步丰富了被试关于犹太人的意象,也就是说,犹太人具有温暖的、家庭般的、古风的和内团体性质的外团体特征,而他们却没有。尽管他们是在美国文明的熏陶下长大的,而且服从美国的理性规则,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犹太人的待遇。单凭这一点,他们就会对犹太人表示否定。

编号为 M102 的被试陈述了犹太“宗派”的潜在吸引力。该被试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

“我在中学里认识的犹太孩子都是一些犹太商人的子女,他

们喜好宗派主义。很难说我们对此该做些什么。看来,要想把他们从商界撵出去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们中有些人是十分聪明的商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离开德国,但是我想他们是要回去的。有些人很狡猾,他们结成帮派,在商界处于领先地位,并且由此积累资本。其实,德国人需要犹太商人,因为犹太人会将资金投入那里。”(犹太妇女怎么样?)“有些人十分有魅力,而有些人则喜好宗派。她们的信念是受男人支配。”

犹太家庭更加家长式的断言(不论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也是作为一种性吸引的要素来运作的。犹太妇女应该为男人服务,而这恰恰是非犹太美国女孩不被期望的事情。与此同时,完成性任务的概念贬抑了美国妇女的社会价值,这也是她们所不允许的。这里,犹太人的品质再次朝它的对立方向倾斜。

编号为 F113 的被试对宗派概念抱有强烈不满的情绪。这位青年女性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她是一个有点神经质的女孩,26岁,来自在职人员心理学班。她既对犹太名字不满,又对那些敢于改名的人不满。当谈到是否了解犹太人时,她谈了个观点,说犹太人拥有“滑稽可笑的房子”,虽富裕但却声名狼藉。她关于犹太家庭的陈述是与偏执狂思想交织在一起的,认为自私决定了犹太人的行为,并且把它评价为是一种“罪过”。

“两年前,当我还是夏威夷的一名海外接线员时,我与犹太人有过糟糕的交往。由于我必须监视所有发往纽约的电话,所以我也同时监听了犹太人谈话。他们中约有 90% 是富裕的。他们给家里打电话,说的尽是些自私的话。他们把金钱和时间花在讲自私话的电话上面了。”(有没有商务电话?)“嗯,我主要上夜班。但是,我的同事说,白天打商务电话的也是那些人。”(你怎么知道他们是犹太人呢?)“听他们的声音和他们说的事

情。除了自私,再也没有什么了。”(你能辨别犹太人吗?)“听声音就知道他是一个犹太人。”

## 八、低分被试的反应

本章主要描述反犹主义现象与其结构的关系。我们对非反犹主义者和反反犹主义者的少数民族态度不予讨论。显然,处理反犹主义者的材料比较容易,而分析非反犹主义者和反反犹主义者的材料相对来说较为困难一些。不过,我们具有低分者的材料,范围从表面思想到颇具特征的决定因素。尽管低分者对所谓的种族问题不感兴趣,但是,鉴于我们的实用主义目的,我们除了关注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因素外,我们还关注其他一些敏感的问题,譬如低分被试的反应。

观察低分者的表现,不仅有助于丰富我们的描述,而且也使我们看到低分者对少数民族问题的回答是如何超越偏见人士的意见和态度的,其非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也由此得以显示。

低分者对犹太人的态度显然是理性的。这种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内感受作用是低分者的特征,它们在种族领域通过反省而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低分被试揭示的是反犹主义者的问题而非犹太人的问题;另一方面,低分者根据历史的和社会的观点来观察民族问题和少数民族特征,因而理性的洞察力取代了非理性的判断方式。

在民族问题上表现出反省的例子,可以参见编号为 M910 的被试。他是一位学生部长,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他有着明显的理智倾向,而且,像许多其他低分者一样,具有犹豫、怀疑和限定自己观点的特征。他以坦率的、有点原始的方式把偏见与憎恨少数民族的人联系起来,而不是与被憎恨的对象联系

起来。

(你觉得这种偏见的原因是什么?)“也许,最大的原因在于一个人感到不安全,并对这种不安全产生恐惧。在我的社区中,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那些接收了日本人留下的财产的人。他们害怕日本人会卷土重来,害怕日本人重新作为竞争者,因为日本人比他们卖力。”(你认为这主要是一种经济冲突吗?)“不,它不是经济的。而且,我也不认为它能在经济基础上得到解决。他们具有某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是隐蔽的,他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可能与日本人没有关系,但它总是悬在他们的心头上。他们很滑稽(自己笑了起来),而且有点残酷。”(怎样与偏见作斗争?)“我认为有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公布事实就是一例。尽管它不会最终解决问题,但它是有帮助的。例如,血库中没有必要将黑人的血和白人的血分开放置。”

编号为 M203 的被试也提供了一个实例。他是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任大学英语系主任。他在所有量表上也均得低分。他的哲学是实证主义,并对语义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他对少数民族的观点可以从其关于日本人的陈述中看到。

“如果说德国人被纳粹一代改变了的话,那么日本人也可以被民主一代所改变。只要条件具备,任何人都是可以改变的。”

在讨论反犹主义问题时,他选择了一种与犹太人称呼相关的解释。这种选择可能与被试的语义学癖好有关。

“反犹主义者不知道,犹太人不是那么容易鉴别的。我想,他们的名字也许是人们用来鉴别的主要依据。譬如,如果你不报出自己的名字,我又怎么知道你是犹太人。”被试在访谈过程中曾试图回避使用“犹太人”这个字眼。他开始时偏爱使用“闪米特人”(Semite)的称呼,不过后来也用了“犹太人”这个词。

对该被试来说,“犹太人”这个词并无禁忌,成为犹太人也没

有什么不光彩,所以他在与访谈者交谈时,甚至并不忌讳以访谈者为例,说出了“如果你不报出自己的名字,我又怎么知道你是犹太人”等话。我们知道,高分者在遭遇威胁并想伤害对方时会说:“你是犹太人,对吗?”

不持偏见的被试用其理性拒绝那些反少数民族的定型。这种拒绝具有既自觉又清晰表达的性质:他们严格地接受个性化的概念。让我们再次以上面提及的 M910 被试为例。他虽不否认民族的身体特征,但是却把它们看做是非本质的。

“哦,我不会上当受骗,也不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像你们所说的团体。我认识一些日本人,我很喜欢他们。我知道有些日本人并不好。我曾与一个日本女孩和一个中国女孩参观圣坛。那还是 1942 年的事,当时我有些紧张。”(你认为这些种族团体有哪些突出的特征?)“没有,一点也没有。当然,有生物方面的特征,例如鼻子、身高或肤色等。”

类似的陈述也可在编号为 5030 的被试身上看到。他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33 岁。他曾在海军服役 4 年,成为一个上尉军官。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访谈者认为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

“黑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团体的日子并不好过。我认为,许多人之所以不喜欢他们,是因为他们的身体特点。他们实际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我既赞成州和国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法律。许多人不愿意承认黑人是聪明的、优越的和能干的。黑人的处境阻碍了这个民族的前进。我对这些团体成员既有好的印象又有坏的印象,但是从未认为这些人属于某个种族或宗教。我认为他们不是怪物。我的班级有一个女孩是黑人,但她十分优秀和能干。我认为她是班上最聪明的人。我常想邀她一起外出,但是没有机会。昨天,我经过犹豫和试探之后,终于邀请她

和我一起外出喝咖啡。她的接受要比我的邀请更有礼貌,因此我们便有机会彼此询问。当时,我之所以犹豫,是因为我怕别人会胡思乱想。我也曾有过一位犹太同学,他是最要好的伙伴。”

编号为 5046 的被试是一个有意识地反对定型的被试。她是电影业的一个行政秘书,今年 40 岁不到,积极参与过劳工运动。她在所有量表上都得低分。她的某些阐述表明,她的低分是表面的。<sup>[4]</sup>她用亲犹太人的定型来拒绝反犹太人的定型。她说她是把犹太人作为个体来评价的。事实上,她刚刚中断了与一个犹太男人的关系。

当访谈者开始询问她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时,她陈述道:“对啊,有一个问题……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个犹太人问题,相反,它是一个基督教问题,也就是教育那些反犹太主义者的问题。”当访谈者希望她对犹太人进行概括时,她笑道:“当然,任何人都可以概括……反犹太主义者太熟悉这种概括了。他们攻击犹太人所犯的某些过失……我不认为应当给任何团体扣上这种帽子……那是危险的,尤其在犹太人问题上,因为人们必须根据个体的表现来对个人进行评价。”被试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也没有显露任何一种反犹太主义的痕迹。纵观她的回答,表明她始终如一地反对反犹太主义。她认为反犹太主义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一种倾向,同时感到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对反犹太主义者进行教育,以及赞成种族之间的通婚。她对少数民族的同化过程感到乐观,尽管她对近年来日益高涨的反犹倾向颇感惊讶。关于希特勒的种族理论,以及对犹太人的迫害,应该在每条战线上与之斗争,不管它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她说:“我认识一些犹太人,我并不喜欢他们,其中有些人具有相当的攻击性,但是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所有的犹太人都具有攻击性……我们应该让人了解到,某些人

由于某些原因而具有攻击性,譬如由于不安全感而产生攻击性。犹太人就是犹太人,他们不会无缘无故攻击别人的。”

正如我们在论述人格方面的几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低分者的理性使得他们拒绝投射意象和自动化判断。由于他们的判断很少受制于压抑的无意识因素,而且他们在积极的移情方面较少受到阻碍,因此他们要比高分者更加理性。这种理性不仅涉及他们的心理结构,而且还涉及他们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偏见者是把犹太人作为“客体”来讨论的,借此表达他们的憎恨;不持偏见的人在客观地作出判断的同时,还表现出同情。同情和理性都属于“公正”的概念,它在低分者身上是自发地运作的,好似本能一样。对低分者来说,种族歧视违背了基本的平等原则。他们以人权的名义把自己与那些遭到歧视的人等同起来,以团结的名义对待那些求助于他们的人。

下面是一些关于这种心理结构的例子。编号为 M113 的被试是一个教徒,他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上均得低分。

(你怎样看待少数民族问题?)“前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我说民主就是要尊重少数民族团体。”

与此相似,编号为 M320 的被试是一个建筑系学生,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他抗议任何一种不公正的举措。

“我本人十分接受黑人。我支持任何一个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少数民族。”(对犹太人呢?)“我不了解为什么把它称为问题。我认为,欧洲的犹太人应该像其他民族一样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拥有他们自己的生意,等等。”

编号为 F129 的被试是一位青年女性,她也在所有量表上得低分。据访谈者称,她有点紧张。一旦她遇到令人烦恼的问题(包括民族偏见在内)时,她就会激动起来,甚至会流泪和脸红。

(你认为犹太人怎样?)“怎么啦,我除了对他们遭受的待遇感到不安之外,对他们没有什么感觉。所有的民族都有好的一面和坏的一面,对于那些经常受到迫害和批评的民族的缺点,我们应该采取容忍的态度。”(你会嫁给一个犹太人吗?)“有此可能。如果我爱上了他的话。”(你根据什么认为犹太人是受迫害的?)“除了有些人确实令人讨厌之外,我不知道。”也有迹象表明,低分者那种充满情感的公正感既非一种表面思想,也非一种自我陶醉,它具有其人格的基础。对受迫害者的同情会使他们引发具体的纠正试图。上面提到过的编号为 5030 的被试,就有这方面的表现。另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F126 的被试。她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上均得低分,而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是一个漂亮的青年女子,“具有魅力和幽默感”。她研究新闻学,但其真正的愿望是搞创作。

“记得我读初中时,班上只有一个犹太男孩。我们经常举行聚会,但他总被排除在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男孩,既聪明又英俊,就因为他是犹太人而遭排斥。于是,我和他交上了朋友。我不仅邀请他到我家来聚会,而且还对他特别重视。不久,别人也开始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从那时起,他就成了群体的一员。我无法忍受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鄙视,即便在造船厂工作时也一样。我一直设法去熟悉黑人和犹太人。他们也和我坦率地进行交谈,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我就会把我的所见所闻编成一则则故事。它们不是关于种族偏见的,而是关于黑人积极一面的故事。如果人们之间相互歧视,那么我认为彼此都是没有希望的。”

低分者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对所谓的犹太特征的评估。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高分者对犹太人的感知与低分者对犹太人的感知完全不同。高分者的心理结构起着

一种参照框架的作用,甚至对他们假设的日常经验亦如此。可是,在不持偏见的被试身上,该现象被颠倒了过来。不过,鉴于客观的“犹太特征”十分复杂,尽管低分者普遍表示同情,但其陈述并不一致。有时他们设法解释犹太人的特征,有时他们干脆否认犹太人的存在,有时他们又采取一种强调的方式对这些特征表示积极的羡慕。

编号为 M202 的被试用解释的方法阐述了犹太特征中广为传播的概念,也即所谓的宗派集团概念。该被试是一位建筑工程师,35岁。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量表上,得分与其他低分者不同。据访谈者称,他是保守的但非法西斯主义者。

在回答他如何概括犹太人特点的问题时,他说:“他们的家庭具有严密的结构和某些天然的特点,像任何其他民族群体一样。例如,德国人‘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而美国人……(这时,访谈者打断了他的话,指出他们想了解他对犹太人的看法)”。他回答说:“犹太人在某些社会尚未被人接受,结果导致他们组成结构严密的家庭。他们之所以未被接受,是因为他们具有某些特点。”当访谈者要求他讲得具体一点时,他回答说他们擅长精明的买卖。对此,他不仅没有流露出责备的口气,甚至认为,只要有会,加上自己足够聪明的话,他也会这样做。

在这个案例中,“解释”成了一种理性化的工具,用以调解宽宏大量和反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事实上,被试在阐述他的亲犹太人观点之后,随之举了一则相当不友好的故事。该故事涉及一宗废铁交易,3个犹太报价人彼此耍了阴谋。被试的解释态度有时会掩盖模棱两可的表述。编号为 M310 的被试证实了这种推测。他是广告社的一位副经理,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不过,他的理论依据预先设定犹太人的金钱挂帅倾向。

(犹太人的特征吗?)“哦,犹太人很关心金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也许,由于受迫害的时间太长……在金钱经济中,在金钱文化中,金钱能给人带来安全感。某种安全感可以用金钱来捍卫。我认为,犹太人在赚钱方面比非犹太人聪明,因为在中世纪他们被迫成为篡夺者,等等。”

有些低分被试干脆否认犹太特征的存在。这种否认大多受到他们良心的影响,而非受到对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客观评价的影响。这里,我们可在极端的无偏见者身上找到“神经症”的特征。他们寻找各种理由来为所谓的“犹太特征”开脱,采取的方法是洞察投射的和定型的机制,也就是洞察那些有利于反犹太主义的主观因素。

编号为 M112 的被试是一个“安静的、沉默寡言的、彬彬有礼的 18 岁大学生”。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他赞同“妒忌说”。

(犹太人吗?)“这不是一个教育问题。有人就是持有偏见,目的是贬抑他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编造许多疯狂的故事,诸如犹太人的钱太多,他们有可能控制国家,等等。”(你接触过犹太人吗?)“我的学校没有黑人。犹太人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如果他们不告诉我的话,我就不知道他们是犹太人。”

编号为 5041 的被试是一个 59 岁的家庭妇女,曾试图成为一个职业钢琴家。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她否认犹太人有何特征。

“我认为确有犹太人问题,但是他们与我们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中并不存在任何固有的东西,因此他们不应该受到不同的对待。对他们的迫害是有历史原因的,这不是他们的错。你不能把所谓的特征强加到作为一个团体的犹太人身上。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用于犹太人的一些术语也可以用于其他人,譬如

用于基督徒……你会遇到一些具有攻击性的人,但是他们不会攻击,因为他们是犹太人……通常,犹太人身上的有些东西是别人不喜欢的……譬如他们更加理智,而且成功者不少。当一些人超过了另一些人时,后者就会产生不满,从而称前者是具有攻击性的……”

在低分者身上还可以见到极端否认的例子。编号为 M1206a 的被试是海事学校的学员,他高度内省,不会轻易表示对人的否认。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

(黑人的特征吗?)“哦,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征。他们有着和白人一样的一些特征……我不认为少数民族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征……”

有时,被试在否认犹太特征时,用非理性的方式来表示其紧张的情绪。编号为 F125 的被试是一个女生,她想成为戏剧教师,并指责现在的电影太老派。她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的愤怒因我们的问题而引起。

“在你们的问卷中,有些问题令我发疯,尤其是关于犹太人的问题。爱尔兰人和其他民族可以营造他们自己的生活氛围,而只有犹太人的氛围被打上坏的烙印。事实上,我并没有发现犹太人的生活方式与我们有什么不同。”

高分被试为了获得“社会的认可”,常常强调指出每个人都是反犹的。与此相反,有些低分者不仅否认犹太特征的存在,甚至否认反犹太主义的存在。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自编号为 M115 的被试。他是一个传统的和保守的兄弟会成员,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你怎样看待犹太人的问题?)“现在,犹太人在美国不受迫



害了。事实上也不该有迫害。就我所知,迫害犹太人的惟一原因是他们比别人聪明。”

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被试对犹太人特质和其他少数民族特质的欣赏。编号为 F128 的被试是一个 17 岁的女孩,她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正在研究社会工作,并对儿童福利有兴趣。

“我想,我要比许多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们在家里接待过黑人。我们认识音乐和艺术团体中的许多人,其中有些人的行为很古怪。我的第一批好朋友是犹太男孩和女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会憎恨犹太人和黑人。他们害怕与犹太人在一起,因为犹太人比他们聪明。”

上述的有趣成分包含在“古怪”这个字眼之中。它指的是“不同的”东西,或者说用遵奉标准来看稍有反常的东西。但是,它却表现出个性。对这个被试来说,与社会的刻板模式相异的少数民族的特殊性,也正是人类的特殊性。在她看来,犹太人未能完全被美国文化所同化,其本身就是一种美德,意味着自主性的胜利和对“熔炉”影响的抵制。

编号为 5050 的被试是一位具有进步倾向的无线电新闻评论员,他在所有三个量表上均得低分。他虽然否认犹太特征的存在,却强调了极少得到承认的一个观点:面对迫害,少数民族的忍耐。他对这种态度的赞扬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批评成分,它借助怯懦的暗示表明某种隐藏的敌意。他从政治角度批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并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来反对美国的反应。他设法表示不存在所谓的“犹太特征”。“我既羡慕黑人又羡慕犹太人,因为他们在忍受歧视方面表现出巨大的耐心……如果我处于他们的地位,我会奋起斗争。”他认为犹太人和黑人有点

无动于衷,不知道起来斗争。在他看来,如果犹太人警觉一点的话,则希特勒的阴谋就有可能被制止,或者至少阻止暴行的发生。他一再强调,无论何种形式的歧视都必然被政治行动消灭。

对不持偏见的被试来说,他们在对待少数民族问题上的另一个特点是缺乏宿命论。这些被试不仅在其有意识的信念领域反对诸如人类劣根性的不可避免论,而且在其深层的水平上(正如第十四章和第十五章所提示的那样)不受破坏性冲动和惩罚性幻想的支配。他们用历史的和社会的方式观察事物,看到事物的发展,不作武断的结论。这一观点在他们陈述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时表现出来。编号为 5008 的被试是一个中年妇女,其工作是受雇为他人写作,访谈时的身份是文学代理人,同时在一家广播电台当秘书。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与低分者拒绝定型的观点保持一致,同时还探究解决反犹主义问题的方法。

她对最近来到这里的移民和难民表示良好的祝愿。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但是,她也感到其中有些人令人讨厌。关于黑人问题,她说,作为一个共和党人,她认为应当改善黑人的地位,但是,她接着又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关于犹太人问题,她说,“在我工作之前,我多少有点反犹情绪”,不过,随着与犹太人一起工作,她发现他们很有魅力,既机智又有趣。她认为,在种族问题上,最需解决的是反犹主义问题。她指出:“如果反犹主义者能够像我那样与犹太人混在一起的话,那么问题就可以避免。”她认为社会经济的歧视应当被宣布为非法。当访谈者提出一些新的改善策略时,她说“不妨试试”。

上述态度强调了人类的自发性和行动的自由性,而非刻板的权力主义定律。但是,它们并没有使被试感到乐观。低分被

试对人类苦难的敏感,加之他们的同情,使他们敏锐地意识到种族迫害的危险性。高分者常会这样说,“不可能发生在这里”,显然,他们把自己与历史分隔开来了;而低分者则知道这种情况会发生,并且想为此做点什么。

编号为 5058 的被试是一个具有中产阶级背景的 29 岁退伍军人,其主要身份介于“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之间,并在三个量表上都得低分。

他十分关注这个国家里的少数民族问题:“我对这个问题谈得很多,希望能减少偏见,鼓励容忍。事实上,我感到我差不多愿意将自己献身于潘兴广场(Pershing Square)了。我想方设法在海军搞些改革运动,以此探究这个问题。”被试对于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抱有悲观的态度,原因在于他未能改变他曾经与之辩论的那些人的观点。他觉得对犹太人的厌恶情绪正在增长,而且他最近也听到许多反对他的言论。“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最近我更多地接触了这个问题,不仅在海军中接触这个问题,而且在我现在的工作领域接触这个问题。”他并不认为犹太人在美国有太多的影响,也不相信犹太人在美国是一股政治力量。他相信犹太人在战争中也尽了一份力。当访谈者问他如何看待“犹太特征”时,他实在无法回答,因为对他来说这个术语没有什么意思。“犹太人彼此之间如此不同,以致我们不能说他们有什么基本的犹太特征。”

## 九、小 结

人们常说反犹主义起着反民主的作用。这种说法乍一听有点陈腐。少数民族因为受到威胁而谋求他人的支持,殊不知正是后者的利益冲突使得少数民族处于今日的危险之中。根据本

章和其他几章提供的材料,我们不得不承认,反犹主义和反民主之间存在一种联系。确实,那些想消灭犹太人的人并不像人们所声称的那样,以后还会消灭爱尔兰人或新教徒。他们的最大威胁是对犹太人施以人权限制,这种人权限制不仅在逻辑上意味着最终废除政府的民主形式,从而最终废除对个人的法律保护,而且还有意识地把它与反民主思想联系起来。

我们用两个例子来对本章作一总结。它们能使我们看到什么是无法摆脱的反犹主义的反民主结果。编号为 M106 的被试是一个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均得高分的男子。他装做具有民主思想,但是他的言论却使我们发现了隐藏在民主后面的东西。

“希特勒的计划把事情搞得稍稍过头了一点。不过,有些事情能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事情则被证明是不好的。当然,不是什么都不好。希特勒发展了这样一个概念,即‘一只老鼠坏了一锅汤’。”被试并不赞同残酷的迫害:“如果希特勒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团体来处理,将他们隔离开来,为他们制定生活的准则,那么现在对希特勒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现在这个国家有同样的问题吗?)“确实存在同样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是民主国家,因此问题处理得比较好。”

由于被试提出的建议(即将少数民族隔离开来)是与“民主国家”的基本信念不相容的,因此他在为“民主国家”深感自豪的同时,还提示了“一只老鼠坏一锅汤”的隐喻,以便告诫“民主国家”提防想像出来的“邪恶”。

编号为 5019 的被试是一个所谓的“民主派人士”,也是一个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的被试。他是一个 20 岁的劳工,其最为显著的特点是对他的卑贱地位赋予盲目的权力主义。与此同时,他“厌恶胆怯的人”,并对“真正的领袖人物怀有巨大的爱慕

之情”：“民主的法律应当对白人和非犹太人有利。当然，我也不会用希特勒的方式去迫害犹太人。”

### 注 释

- [1] 我们并不认为必须在第四部分提出的被访谈者的陈述与第二部分提出的被访谈者的陈述(参见第十章)之间建立交叉的参照。有些引语虽在那儿已经提及,但也可能在这儿再次出现。然而,鉴于圣·昆丁监狱的12名囚犯将在第二十一章作为特殊被试组进行处理,因此这里使用的访谈数目与那里安排给它们的一个符号也都插入表21-1的底部。
- [2] 本章为阿道诺(T. W. Adorno)所撰。
- [3] 当然,该假设的显著证据在于下列两种犹太人之间的区分:一种是被试熟悉的犹太人,他们是“好的”,而其余的犹太人就是所谓的“犹太鬼”了。我们在这里提一下编号为5057的被试(第十九章将予以详细讨论),他的偏见实际上已由他本人作了解释,也即小时候他与一个犹太商人的交往经历使他对犹太人产生了偏见。
- [4] 参见第十九章“刻板的低分者”。

## 第十七章 访谈材料所揭示的 政治和经济保守主义<sup>[1]</sup>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分析过关于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方面的问卷结果。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运用访谈材料来研究同一个问题,目的在于使我们对这些思想的洞察更加具体化。如果说我们在第五章里探讨了被试对一些标准化的、日常遇到的政治和经济思想所作回答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就将设法形成“他们实际上在想些什么”的描述。也就是说,我们试图找出他们的大多数人所期望的意见。显然,比起对问卷的回答所作的量化分析,被试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以并不十分严格的方式提供的,而且其结果也属于试验的性质。我们之所以运用访谈材料,目的不在于“证明”什么,而是对前面已经确立的事实予以特定的解释,以期说明这样或那样的思想在许多被试身上或某些团体中间是颇为盛行的。

我们对思想的解释使我们的研究深入到心理活动的层面,正因如此,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给我们的数字添加一些铺张的词藻。正如这一部分的引言所阐述的那样,我们希冀确定思想和心理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系。我们并不武断地认为心理学是原因而思想是结果。但是,我们设法尽可能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基于下述的假设:思想的非理性像人类行为的非理性一样伴随着无意识的心理冲突。我们对访谈材料进行了梳理,

特别关注这类非理性,以及那些反映某种人格动力的陈述。对我们来说,若要达到前后研究的一致性,则必须构建这样一种结构,它既涉及动力的动机又涉及思想的理性化。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证据大多依靠这种一致性。迄今为止讨论的数据至少可以使我们得出这样一种假设:人格能被视做思想的一种决定因素。

不过,我们现在所关注的领域是强烈禁止任何一种还原为人格的做法的。我们关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人格”的构成,主要是依据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区分。然而,尽管这种区分对许多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价值,而且它能够在深层的水平上把我们所需研究的问题具体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所有涉及思想问题的研究领域,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在起作用,它在许多问题上混淆了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区分,而且不容许我们按照人格参数来进行陈述。这种因素可以称之为“一般的文化氛围”,尤其是许多媒体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公众舆论。如果我们的文化氛围已在人们不知不觉中以社会控制的形式被标准化了,那么我们便可期望个人的思维习惯既反映了这种标准化,又反映了他们自身人格的动力。这些人格正是这种标准化的产物。换言之,我们期望在我们的被试中存在一种思想的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对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二分法是举足轻重的,而且还有可能超越了它们的界限。我们的数据提供了大量的证明,证明这种思想模式是确实存在的。

这种思想模式(它也许超过了高分者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特殊敏感性),是否与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反民主运动有关,则是本章意欲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

如果用我们的数据来予以充分证明的话,那么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十分重要的。它的直接含意在于,反对这样一种潜力的

斗争,不可能单凭心理水平上的教育来完成,它还取决于文化氛围的改造,因为正是这种文化氛围促成了上述的思想模式。从方法论角度上讲,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于下列事实:它把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的区分视做一种相对的分。如果把这种区分看做是绝对的话,则有可能导致一种“心理学化”的偏见,也即忽视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客观的、超个人的社会力量。

乍一看,在这个思想领域引进模式的概念可能有点似是而非。由于许多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在进步与反动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分,因此我们可以期望两者的差异也是特别明显的。不过,这样的假设尚未得到事实的证明。我们难以摆脱这样的印象,也即在涉及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访谈中,高分者与低分者之间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可以肯定地说,如同前面一章讨论过的极端的反犹主义思想那样,有些差异是一目了然的。例如,我们几乎用不着开展研究就可以知道高分者是反对罗斯福总统的,而低分者则是倾向于拥护罗斯福总统的。因为高分者需要“坚强的”外交政策,而低分者则赞成妥协;高分者拒绝共产主义,而低分者则倾向于在推论的基础上讨论这个问题。可是,仍有许多所谓正统的政治思想渗透到了模式中去,而它们却助长了反动的和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说教。正如我们将要详细讨论的那样,这些所谓正统的政治思想大多属于无知,表现为对工会的不满,对政府干预商业的不满,对收入限制的不满,以及其他一些倾向。

当我们考虑本研究的整个背景时,在政治思想中存在这样一种模式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我们的量化结果表明,在我们实施了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以后,我们就不能期待在政治和反犹主义之间会存在什么密切关系了。第五章已经提供了这样的证据,即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不论与反犹主义的相关还是与民

族中心主义的相关都不是很高的。有些被试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却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有些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却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或低分。这意味着在该领域我们不能用类目术语来讨论高分者和低分者。

如果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能对高分者和低分者作出统计学意义的区分(也即“高分者”在这个量表上得分更高),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它是文化使然。在本章中,我们将尤为关注这些显著的特点。至于我们说它们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证据,我们依据的是这样的事实:它们在统计上、心理上和其他方面都是得高分的。如果它们在低分者的访谈中也以相当的频率发生的话,那么我们只能这样说,我们生活在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时代。

如果一个被试在所有量表上都得低分,但仍表现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的话,那么我们会说,量表和技术出了问题。就区分高分者和低分者而言,很清楚,这里所说的模式应比前面运用的模式更具分化的特性。这种情况可在本章中看到,也就是说,尽管高分者和低分者在运用政治经济术语方面颇为相似,但是两者在一些细微方面还是有差异的,正如他们有时表面上显得不同,但在潜在的倾向方面却是相似的。

政治和经济的事实是在迅速变化的,尤其在我们从事研究的前几年。当我们还处于材料搜集的阶段时(也即1945年左右),苏联属于同盟国。可是,今天,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却给我们的研究投上了阴影。这些变化有效地解释了政治思想的易变性和不稳定性。如果说1945年的反苏意识只是一般的反动主义模式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它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性质,而且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较难区分。此外,典

型的高分者在谈论苏联问题时已不像1945年那样,他们的表达不再是含糊其词的了。难以想像当初麦克会说“斯大林没有问题”。当然,我们的解释必须基于1945年的背景,以便对思想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提供一种确切的描述。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问题进行访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据外部事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不期望政治经济保守主义与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会出现显著的相关。我们所期望的是,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很可能会随着新的政治环境的形成而发生变化。由于思想对政治的动因十分敏感,所以有些解释出现得相对较晚(其中有些解释是在我们写完本章后又补充进去的)。不过,我们可以声明,事件的一般倾向是与接下来所讨论的一般关系相吻合的。

至于本章的结构,我们将首先处理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的组成部分,然后处理若干特定的政治问题。文化模式对心理分化的问题放在第二节论述,尽管该模式的推测主要属于第一节的内容。

## 一、政治思想的组成部分

### (一) 无知和困惑<sup>[2]</sup>

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有关政治陈述的评价,必须与被试在政治问题上的无知和困惑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如果人们不知道他们正在谈论什么,那么所谓的“意思”(它对任何一种思想的研究都是基本的)便失去了其含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访谈材料没有意义,确切地说,它不能用事实的类目来予以解释,而是必须与正在接受调查的被试的社会心理结构相联系。换言之,材

料本身要求我们对人格进行分析,它是我们研究的一种策略。正是这种分析,被试的思想才能得到评价。

由于无知和困惑成了区分高分者和低分者政治声明的一个标志,因此,关于被试对法西斯主义宣传的敏感性问题的就不是“中立”的了。我们的印象是,无知和困惑在高分者中间要比在低分者中间更为明显。这种情况与我们前面关于高分者的“反理智”态度的观察是一致的。此外,高分者的乐观主义倾向使得他们排除了对现实的分析,而真正理性的政治判断却是有赖于这种现实分析的。被试之所以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大多数人的看法,原因在于他们很少从理智角度对问题进行分析,或者说很少从理智角度区分本质和现象。高分者的偏见(在他们对政治知识不感兴趣和缺乏政治知识方面)是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不管这种偏见是什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无知本身的运作助长了这种一般的反动倾向。我们在一些落后的农村地区观察到的信念,可由古老的德国社会言论来体现,这种言论说反犹主义是“愚蠢的社会主义”。现代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包括当前美国煽动者的实践,都瞄准了这些无知者。他们有意识地借助各种方式来操纵事实,蒙蔽那些不熟悉事实的人们。当社会的一些复杂问题与无知结合起来时,它引发了人们的不确定性和焦虑状态,从而导致了群众运动。这种运动本质上是民粹的、邪恶的和反理智的。正如我们在被试的访谈中所发现的那样,不论他们在量表上的得分是高还是低,这种无知和困惑的存在(尤其是当他们作为一个团体受到过较高教育的情况下),应该被看做是一种预兆。法西斯主义得以滋生的气候在于,一方面人们抱着保护自己的“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却又顽固地拒绝现实。凡是这种观点得以盛行的地方,人们会轻易地接受一种公式,一种在今天看来颇具“疯子”特征的公式。

有时,被试也会评论无知。不论这些陈述是否背离了引人注目的事实,也不论被试是否承认他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认为自己缺乏知识(后一种态度在女性中较为常见,而且通常伴随着自我责备的陈述),有关访谈材料的证据表明,他们的印象是缺乏充分的依据的。

我们很难区分无知和困惑,也就是说,那些不知道事实和没有经过此类知识培训的人们,会因各种传媒和宣传的冲击而变得糊涂起来,从而不明白他们拥有的事实是由什么东西构成的。看来,思想困惑是无知的结果:那些人除了感到自己有责任表达政治意见外,对其他是一无所知的。

下面引用的一些话是随机抽取的。我们借此来说明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那就是有些人虽然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但却对政治抱有特别的兴趣。

一个无知的例子是,被试用浮夸的措词来掩盖他的困惑。编号为 M117 的被试是在职人员心理学班的低分男子。他是一个受过教育的水手,虽然喜欢阅读,但是头脑糊涂。

(你认为美国的政治形势怎样?)“我们的政治制度有着良好的基础。大多数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也没有丰富的政治知识,所以美国的政治是由政府决定的,而不是由人民决定的。”

对这个被试来说,这个国家里存在或不存在资本主义纯属“教育”的问题。

编号为 M732C 的被试是一个退伍军人,受过中等教育,在各种量表上得高分。他常以听起来很时髦的句子开始讲话:

(你觉得现今的政治倾向如何?)“我要说,我们现在处于十分悲惨的境地,而且比两年前更糟。伊朗的形势,苏联的形势,还有正在进行的罢工,所有这些都需要训练有素的政治家的参与……”被试的陈述充满了限制条件和规避:

“我觉得他们(指工会)在有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另一些方面却没有取得进展。我认为事情会朝好的方向发展。不过,我认为他们(指工会)不该参与政治。”当问到对当前政府最具威胁的危险时,被试答道:

“让我想一想……嗯,美国可能会有另一场战争。由于美国是一只大熔炉,其中什么人都有……我猜想,许多美国人不愿看到希特勒死去,他们是亲德国的。而且,这些小团体也许会……”

编号为 M621A 的被试是一个圣·昆丁囚犯,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他认为苏联是最具威胁的危险。当问他对此该做些什么时,他回答道:

“哦,我们应当限制政党的数量,最好只有两个政党,不要所谓的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等等。”(那么这些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怎么办?)“哦,他们可以继续信奉他们的理想……让他们在选举中拥有发言权,但是不应当允许他们有任何权力。”(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应当被提名为候选人吗?)“不,除非他们得到大多数选票。”

最为极端的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F121 的高分女性。她说她“不善于学校学习”,所受教育水平较低。

她对政治不感兴趣,消息不灵。她认为罗斯福曾经是一个好人,使美国赢得了这场战争。她在问卷上有关政党的问题旁写道:“不了解这些党派。”

编号为 5016 的被试是一个家庭妇女,中学毕业,在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访谈者称她为“具有适度智慧的人”。她说:“我听说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都不好。”与此相对照,编号为 5052

的被试是一个西班牙裔黑人招待员,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他对共产主义有着自己的看法,而且显然同情共产党人。但是,他的意见同样惊人:

“在现实的世界里,所有的共产党人都是好人。”随着询问的深入,可以发现他的观点是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一种社会俱乐部,它举行会议,并且为那些颇有价值的事业筹措资金。

编号为 5035 的被试是一个例外。她是一个得低分的应召女郎。在她选择妓女职业之前,曾是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毕业生。她对工会活动抱有强烈的兴趣,并且为此而失去了舞蹈教师的工作。她拒绝在问卷上做记号(关于政治团体的标记)。对此,她的解释如下:

“我不懂政治。我和我的委托人谈了许多问题,我发现他们意见不一。对我来说,在大学里读经济学犹如一场战争。”不过,在回答一些实际问题时,她的观点是十分自由的,甚至有点激进。

女性被试在政治问题上的自我谴责态度,可在中间分和低分者中看到。这可能与她们的内省和自我批判态度相一致。

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F128 的被试。她是一个 17 岁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说:

“我不喜欢一问三不知。但是,坦率地说,我对政治确实一无所知。当然,我拥护罗斯福总统,不过,这不等于我已经发展了自己的思想。我与母亲和杰姆谈到过一些事情,主要是社会工作方面的事情。我希望自己多读些东西,对一些问题加深思考,因为我认为所有理智的人都应当有思想。”

编号为 F517 的被试也是一个颇为有趣的低分者。她是大

学一年级学生,主修音乐,20岁。她因无知和依赖而自责,尽管她的态度,尤其是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表明她是相当明确和直率的,并且与其父母有所不同。

“我对政治知之不多。我相当依赖我的父亲,我的观点大多来自我的父亲。不过,他是一个顽固的共和党人。他不喜欢罗斯福,而我却认为罗斯福做了一些好事。”

若要充分解释政治上的无知,也许已经超出本研究的范围。这种政治上的无知既与被试回答其他问题的水平形成鲜明的对照,也与他们决定自己生活的手段和目标的理性方式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无知的最终原因可能在于被试难以理解经济的和政治的形势,把握不了业已储存的知识,不具备理论思维能力。要知道,我们的社会制度很善于制造“幕布”,它使天真的人们看不到事情的真相和原因。这种“幕布”被有意的或无意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所强化,致使人们保持无知状态。可以这样说,我们的社会制度处于守势,这一事实使得资本主义不得不维持自己的某种不稳定状态,从而阻碍了一百年前被认为是“进步的”而今天则被认为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洞察力。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它有利于事实的片面呈现,有利于操纵信息,有利于转移视线。正如社会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时所出现过的事件一样,可以这样说,知道得太多被认为是一种颠覆的先兆。我们的社会制度从某种驱动的行为转变成某种保守的行为,目的是为它的永存而奋斗。这种转变已在上述被试的陈述中得以反映,所有这些被试为了既得利益或心理原因,把自己与现存的体制等同起来。为了不去损害自己认同的模式,他们无意识地不想知道得太多,而且愿意接受表面的或歪曲的信息,只要这些信息认可他们生活的世界便行。如果将政治上的无知和困惑归因于被试的愚蠢或神话般的“不成熟”,这是错误的。愚蠢可能是由

于心理压抑而不是由于缺乏思维能力。看来,只有运用这种方法,我们样本中的低水平理智才能得到解释。他们之所以难以思考和难以学习,原因在于他们害怕自己会产生错误的思想,或者习得一些错误的东西。需要补充的是,这种恐惧与儿时经验有关:父母拒绝告诉孩子他们应该能够懂得的东西,相反,他们常常通过一种教育的手段来强化这种恐惧(这种教育的手段会使儿童不敢进行任何“猜测”,或者说这种教育的手段促使儿童只会用表面的现象来证明事物,而且只会用“事实和数字”来进行陈述)。

由于缺乏政治训练,加上各种政治新闻在人们口中泛滥成灾,因此人们所获得的政治知识实际上是以虚假为前提的。就我们的研究重点而言,有两种政治无知可以强调:一种政治无知是,今天的“理智”意味着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的利益。用凡勃伦(Veblen)的话来说,“多余的好奇心”是得不到鼓励的。由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对个人生活的重要性并非为人们所清晰理解,因此他们很容易把注意力转向那些与命运关系不大的事物上去,并且模糊地意识到那些东西对他们没有多大影响。

这里,必须强调的是另一种政治无知。它具有心理的性质。政治新闻和政治评论像其他信息一样由广播、报告和影视广泛传播,而且常在休息时间为人们所吸收。所以,它们以某种方式被归入“娱乐”的框架之中。人们像看待体育或电影那样看待政治,而不是把它作为涉及命运的东西。如果在这个参照框架内观察政治的话,那么它无疑是“令人沮丧的”。在人们看来,它受制于工业和文化,而且其“娱乐价值”是单调的、冷漠的、干巴巴的、令人厌烦的。这种心态还受到美国传统的强化,即认为政治是一种肮脏的行当,对此行当,凡受人尊敬的人应当少与其发生关系。把政治视做一种闲暇时间的活动,这种政治中的失意不



像体育或电影那样能够迅速得到回报,从而也助长了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盛行的无知并非由于不熟悉事实,而是一种对所谓闲暇活动的反抗,因为这种闲暇活动不受欢迎。也许,在女性中间经常可以观察到的一种模式是,她们读报时常跳过报道中的政治部分,并直接转向聊家常的栏目、犯罪报道、妇女专页等。这也许是“漠不关心”的一个真实写照。

总之,政治上的无知取决于下列事实:一方面,政治知识无助于促进一个人的现实定位;另一方面,它也不会帮助一个人逃避现实。

## (二) “标签思维”和政治表现

与无知和困惑这一心理框架有关的一个原因可以称做“缺乏政治经验”,也即被试“远离”政治和经济范畴,不仅不用具体的刺激、洞察和反应来接触它,相反却以一种间接的、疏远的方式与之斗争。不过,尽管有些人远离政治和经济,并且将其排斥在个人生活、个人决定和个人行动的领域之外,但是政治和经济仍然决定性地影响着他们的命运。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在战争时期,即使是最为天真的人,也意识到政治经济对他们的影响。也许,人们会说,由于战时情境,个人的生死显然取决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可是,即便不在战争时期,有些问题(诸如美国经济领域的工会主义、罢工、自由企业向垄断企业的发展,以及国家控制等问题)也会使一个人感到政治和经济对自己的影响。

由于无知和困惑,一个人会产生自我水平上的焦虑(这种焦虑与儿时的焦虑有关)。一个人必须处理一些他实际上不了解的问题,而且他还必须发展某种定向和技能,以帮助他在黑暗中找到自己的道路。<sup>[3]</sup>这些措施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为个体提供一种知识,或者替代知识的东西,使他有可能采取一种人

们所期盼的立场,尽管他实际上并没有这种立场。另一方面,它们从心理角度减轻了个体的焦虑感和不确定感,为个体提供了某种安全的幻想。即使他感到自己的观点站不住脚,他仍然会坚持这种幻想。那么,被试如何去理解原本并不理解的东西呢?由于对被试来说这些不理解的东西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它们会导致一种似是而非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被试会利用两种彼此矛盾的手段来解决他们自己所处的困境。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手段就是“定型”和“人格化”。它们都属于“标签思维”。我们不难看到这两种手段乃是童年模式的重复。定型和偏见的相互作用在前面一章中已有详细论述。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思想的定型,以及它的对立面“人格化”。我们准备在更为宽泛的背景下讨论这两种彼此矛盾的手段,并且把它们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联系起来。关于严格的二分法(诸如“好和坏”、“我们和他们”、“我和世界”等二分法)可以追溯到个体早期的发展阶段。即便是儿童的定型,也具有不成熟和焦虑的特征。个体运用这种二分法来应付面临的困惑,以及它们与童年时期那种万能的幻想的冲突。被试的定型既是一种工具,又是一种创伤。同样,在运用定型时,心理的模棱两可性会产生作用。它们既是一种必要的手段,又是一种压抑的力量,而且通常会刺激一种相反的倾向。我们往往会借一种理由来掩饰我们的定型,以便给人一种错觉,似乎这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大家的观点。正是这种异己性,使它颇具威胁性。害怕坏人的孩子会因此而把每个陌生的成人都称之为“叔叔”。这两种态度的损伤性成分会对现实原则起着一种阻碍作用,尽管它们也起着调节作用。当它们转化成人格特征时,所涉及的机制便越来越有利于非理性的陈述。对有些被试来说,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难以理解,结果会使他们用童年时期的定型和人格化来予以应对。乍一看,

被试的陈述在政治上是理性化的,其实它们是个体在成长过程中从未克服过的非理性机制的复活。也许,这就是观点与心理决定因素之间的主要联结方式。

定型再一次地有助于组织对无知者来说似乎是困惑的东西:他越是不能进入真正的认知过程,他越是顽固坚持某些模式,对某些模式的信奉使他免遭真正卷入问题中去的麻烦。

在定型的强制性质阻碍尝试与错误的辩证法的地方,荒谬便乘机而入了。用布朗(J. F. Brown)的话来说,定型成了“怀旧情感”。这就是被试在政治领域里的实际表现,也就是说,无知,加上对客观材料缺乏深入的思考,阻碍了他们的体验。此外,在现实生活中,工业化的操作标准强化了定型的想法。只要生活本身是刻板的,怀旧情感就会被感到是正确的。现代的大众传媒是伴随着工业化而形成的,它们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定型体系。这种定型体系对个人来说也许是“无意识的”或“不可理解的”,但它却使一个人感到他的观点是符合时代潮流的。由此可见,政治问题上的定型是无法摆脱的。

不过,成人像孩子一样,也必须为他的矛盾手段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代价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被试在一种多重选择的问卷中把定型作为译解现实的手段,以此对问卷中的每个问题用+号或-号来标记。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手段是异己的,结果造成了个体的焦虑。这些焦虑不会因为定型的举措而有丝毫的补救,相反,它促使个体把真实的世界看做是颇具威胁的。由此可见,定型常与它的对立面即人格化相结合。这里,人格化这个术语具有十分明确的含义:根据个人的定型而非理智,用抽象的操作方法来描绘社会的和经济的进程,内部的和外部的紧张,以及政治纲领等。

定型和人格化对现实来说都是不合适的。被试的解释有助

于我们理解何谓“精神病的思维情结”,因为这种“精神病的思维情结”是法西斯主义人格的关键特征。显然,这种从主观上与现实相脱离的解释,除了与个人的心理动力有关外,还与现实本身有关,也就是说,它涉及到现实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要定型所规避的东西是以想像的、惩罚的和过度概括的思想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它就会错过现实,并将一种神奇的万能归因于这种思想。相应地,人格化会规避社会现实的具体化。它的性质决定了人是社会的附属品。定型和人格化是非经济领域的两个对立部分,它们彼此之间不仅不能调解,而且也不允许互补,因为这种互补会重新构筑真实的景象。

下面,我们分两大部分来介绍定型和人格化的案例。

### 1. 标签思维的案例

编号为 M359 的被试是一家皮革公司的部门经理,接受访谈时是在职人员心理学班的学员。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由于他满脑子的权力主义思想,因此他对推论性的论证具有极高的想像力,这似乎与典型的高分被试的心理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政治部分的陈述完全是抽象的和定型的。由于这个被试决非狂热之徒,所以他的陈述能够充分地说明无知如何为措辞所掩盖,以及从报刊上借用来的定型是如何为其反动倾向服务的。为了了解这种机制如何运作的具体情节,我们提供了他关于政治的完整陈述:

(你持何种政治倾向?)“我对外在事物不感兴趣。目前,政治到处可见,以致它们取代了对所有人来说的平等和公正。如果认为治理这个国家要靠掌权的党派,那么我认为这不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在罗斯福总统的治理下,人们愿意将整个生活计划交给政府,希望政府为他们做好每件事情。”(主要问题是什

么?)“除了为我们的退伍军人推荐职业外,还应该给他们某种程度的幸福,这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如果不能立即处理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有可能产生严重的危机,也就是说,会出现许多退伍军人的组织。”

(对此,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抵制政客,建立旧时的政府,一个我们始终拥护的政府。”(什么样的政府?)“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你对工会怎么看?)“不满意。尤其不能令人满意的是,有些工会只会理论不会做事,而且一遇到阻碍就大叫大嚷。它们只想摆平别人。工会应该为工人的工资平等而奋斗。另一个问题是,工会会员未能获得应有的民主,或者说工会只是被一些少数民族团体控制着。”被试强调指出,凡强求人们去参加的事情,最好不要去参加,因为这种工会领袖是无知的。他认为,需要提高工会会员的投票标准,工会领袖必须轮流当政,政府官员的水平必须很高,并把这些要求与商界领袖进行比较。

(那么,政府的控制呢?)“政府倾向于把一切事情都摆平,而不给人们以超越的机会。”被试强调政府工作人员过于平庸,其收入尚不足以发掘他们的最佳潜力,而且缺乏有刺激的计划,等等。

(现在的政府有威胁吗?)“也许,对我们今天的政府来说,最具威胁的危险来自人们对政府不感兴趣。此外,人们对工会组织和社会生活也不感兴趣。原因在于,在许多方面,只是少数家伙控制政权,或者说由少数自私的人作出决定。”这里,被试的曲解是由通过一种跳跃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从“平等和公正”这一十分抽象的概念跳向“治理这个国家要靠掌权的党派”这一形式主义的谴责。此外,被试所谓的民主既是包罗万象的,又是含糊其词的。这种民主充当反对任何特定民主内容的工具。不过,也应注意到,他关于工会的某些言论(他有过工会工作的经验)

是有意义的。

编号为 M1225a 的被试是一个中间分获得者。他曾在海上工作过 18 个月,对工程学有着强烈的兴趣。他的陈述与许多稳健派人士的政治陈述一样,具有老套和刻板的特征。不过,这些陈述也与无知有关。在他看来,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工会”。在描述工会时,他不偏不倚地应用了三个陈词滥调:社会危机、政府干预和工会领袖的奢侈生活。诸如此类的描述只是重复某些公式而已,至于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或一致性却被忽略了:

“问题在于他们拥有太多的权力。工会的社会主义成分似乎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政府的调查表明,工会采取的是社会主义形式。我也参加工会,我发现,工会的头头站在兄弟们的中间慷慨陈词,然后便开着一辆凯迪拉克离开了……工会的头头中十有八九不了解行业知识。那完全是吵闹……”

随后的许多回答与反动主义的模式相一致,主要是围绕“我不相信它”来予以系统阐述的,而且不讨论问题本身。下列段落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薪金的限度是 25000 美元吗?)“我不相信这一点。”

(对目前的政府来说,它最具威胁的危险是什么?)“我认为威胁来自政府本身。它拥有太多的权力。”

(那么,对此该做些什么呢?)“首先,必须去解决一些问题。譬如,搞活市场。”

(苏联与英美之间的冲突是怎么一回事?)“我不在乎苏联,也不在乎英国。”

在这个案例中,陈词滥调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借以掩饰信息的缺乏。被试似乎不知道他的任何一个答案都是报章杂志的口号,他重复这些口号,以表明他是那些不喜欢被告知和不喜欢进行思考的人。尽管他意识到像他那样具有政治观点的人应当如

何对政治问题作出反应,但是他却没有意识到问题本身。

编号为 F139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女性。她的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她激烈反对酗酒(这又似乎暗示着深层的“高分”倾向)。可以这样说,酒如同犹太人,她是激烈反对的。她认为自己是一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她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讨论问题,而在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想些什么。

她的观点与现实的脱节可由下列陈述来加以佐证:

“我最喜欢的政治家是列特维诺夫(Litvinov)。我认为,当代最富戏剧性的演讲是他在日内瓦大会上所作的演讲。他乞求联盟的安全。这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原本对苏联的无知和不信任,在战争期间得到冰释,尽管问题没有最终得到解决。在我们这个国家,有许多法西斯主义分子会对罗斯福开战,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

在国际事务等问题上,她对非暴力有着一个现成的公式:“当然,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如果我不是的话,那么我又怎么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呢?我还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在我看来,战争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这场战争亦如此。如果提倡民主的人尽早认识到他们的利益,并且采取适当措施的话,那么这场战争原本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现在,我们要问一下自己: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会不会由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而得到发展呢?显然,不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完全支持这场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因为我们面临人民利益能否得到发展的抉择,而且无法回避它。”

被试还提供了若干把定型和人格化联系起来的例子。例如,她的政治说服力诱使她根据喜欢的人来进行思考,而且优先考虑有名的人物。这种心态属于“人的定型”。

“除列特维诺夫外,我所喜欢的第二位政治家是我们的总统

罗斯福,当然,还有罗斯福夫人。我认为,如果没有她,罗斯福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她使他成为现在我们看到的那种人。我相信罗斯福对人民及其福利抱有一种十分诚挚的兴趣。不过,有一件事令我心烦,那就是酒。罗斯福夫人反对饮酒。在我看来,如果人们不饮酒,则他们能够得到极大的改进。”

她表现出低分者的显著特点:机械地相信进步,与高分者经常提到的死亡形成对照。这也是上面引述的编号为 M359 的被试的政治基调。

“人们必须做的是回顾人类的进步,这样他们就会感到乐观。如果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那么我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了。我们要比上一个世纪进步多了。当初还是梦想的社会立法,现在已经成为事实。”

## 2. 人格化的例子

人格化倾向既以美国传统的个人民主为能源(它主要表现在对行使宪法权力的政府行政部门的陈述上),又以传统的美国自由主义为能源(它把竞争看做是人们之间的比试,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里,原因和结果被颠倒了过来:由于在市场经济中所谓的“好人(优秀者)”是由竞争的成功来界定的,因此人们开始考虑把成功归因于优秀者。与此观点相符的是政治宣传的高度人格化特性,尤其在竞选活动中。被试在提及竞选活动时,那种得意洋洋的背后却隐藏着处于危险境地的客观问题。民主的理想常被误用,用以掩饰由政党机器所实施的控制。

让我们举些例子来说明这种人格化的倾向。

编号为 M116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男子。他喜欢华莱士(Wallace)而不是杜威(Dewey),因为“华莱士是一个好人,我通常投好人的票”。这里,人格化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究其原因,这两个人物实际上受到了被试思想上对抗的政治纲领的抉择。

编号为 M102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他的陈述几乎与 M116 一样：

“除了民主党人，我从不考虑党派。我不投党派的票，而是投好人的票。”

编号为 M117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男子，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科学社会主义者”，而且对社会心理学颇感兴趣。当他被问到有关美国的政党时，他讲了下面一段话：

“我不了解政党的情况。我只对人和人的能力感兴趣。我不关心他属于哪个党。”（那么，你喜欢什么人？）“罗斯福总统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刚当选时，我不喜欢他，但是，现在我承认自己错了。他干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他关心国家利益。杜鲁门总统也正在做一件好事。不过，参议员和国会议员较一般。杜威很杰出，我是这样想的，他有潜力，而且诚恳、老实，关心整个国家。作为地区律师，他也做过一件好事。”

只要我们分析一下被试对罗斯福的态度，我们就不难发现人格化的许多方面得到了描述。这里，我们提出两种品质，它们在人格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也经常出现在高分者关于杜威的陈述中。这两种品质就是诚实和诚恳。

编号为 F114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女子。她认为杜威是“强有力的、年轻的、勇敢的、诚实的。虽然他有缺点，但是这些缺点不足挂齿。我觉得他是一个强有力的年轻人”。很明显，被试的这番话与她崇拜力量有关，而力量在高分者的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参见第七章）。这位前地区律师的诚实主要来源于他的宣传，也就是他反对政治诈骗和腐败。他应该诚实，因为根据宣传家的舆论，他已经消灭了不诚实。从心理学角度上讲，杜威的意象是一种惩罚性超我的投射，它以一种外在的、严格的形式取代了超我。对他诚实的赞美，加上重复强调的力量和年轻，所有这

些都可以归属于“坚强的人”这一范型。

编号为 F117 的被试也是一个高分者，属于职业女性的被试组。她在反犹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且极端保守。她对杜威的人格化评价虽与 F114 稍有不同，但是符合同样的模式：

她觉得杜威要比罗斯福更了解金钱的价值，因为杜威来自一个不太有钱的家庭。在赞美诚实的背后，却是一种惩罚的心态，表现为憎恨舒适的生活，憎恨“势利的上层阶级”，因为他们追求那些人们予以否定的东西。杜威则相反，他在高分被试中代表着一种心态，也就是每个人都需要了解“一块美元的价值”。被试之所以认同他，原因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作为有前途的总统，拥有权力和光荣；另一方面，他的俭朴代表着属于中产阶级的被试本人的俭朴。

迷恋诚实在女性中尤为常见。也许，这不是偶然的。她们从消费者角度看待生活，不想受骗，因此诚实的许诺对她们具有号召力。

至于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在人格化方面的不同，我们只能予以尝试性地阐述。虽然它难以具体化，但却符合我们的临床研究结果。低分者的人格化成分是信心，即关注一个人的良好品行，包括照顾别人，体谅“竞争中的失败者”。它似乎来自一个人与其父母的那种亲近关系，来自现实生活的积极迁移。相反，高分者最欣赏的个人特征是力量。社会权力和控制是他们鉴别人物的主要依据。权力的象征取自一个严峻的父亲的形象，而这样的“父亲”是他们所仰望的。

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缺乏个性特征，不会理解社会过程，使得被试难以把他的生活经验与客观的社会动力联系起来。这种与社会分离的现象被一种表面现象掩饰起来，结果人格化得到了强调，它们为业已丧失的个性提供了补偿。随着被试在

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少地依靠个体的自发性,他们也就越来越多地坚持这样的主张:人就是一切。这样,他们便能在假设的全能人格中找到替代他们无能的东西。

### (三) 表面思想和真实思想

个人的政治范畴与其生活经验的分离(后者常常通过心理决定的权宜之计如定型和人格化来支配这种分离),有时会导致一种鸿沟,即在被试承认思考的政治经济与其实际思考的政治经济之间的鸿沟。他的“表面思想”与其思考的东西是相符的,而他的“真实思想”则是他的直接的个人需要的反映,或者说他的心理冲动的表现。“表面思想”属于政治方面客观化的范畴,而“真实思想”则属于被试的自我范畴,两者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它们的不可调和性。

这种政治思想的结构与被试对法西斯主义的易感性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伪保守主义有着直接的关系。下面提供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编号为 F116 的被试是在职人员心理学班的一名持偏见的女性学员,她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表面思想和真实思想之间冲突的例子。她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就该案例而言,深层的决定因素无疑是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这可从她强烈反对黑人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中得到佐证。她在其他一些政治问题上的回答又是高度矛盾的,例如,她称自己是一个民主党人,但是却投了威尔基(Willkie)的票,接下来又投了杜威的票。她“并不反对罗斯福总统”,不过,她声称“没有一个人是必不可少的”。看来,言词的背后掩盖着她那潜藏的敌意。

“我知道胡佛(Hoover)代表着什么,而我对他没有用处。但

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崇拜罗斯福。他是个好人,不过,当我看到人们为他的逝世而哭泣时,我就感到讨厌。好像他是必不可少的那样。”

在她的声明中,还有一个惊人的反常表现,那就是强调亲苏,并且直率地在国际政治问题上表达了反法西斯主义的态度:

“现在,我成了一个伟大的苏联仰慕者。也许,我不该大声地把它说出来,可我这样做了。我认为苏联政府是真正想为人民做些事情的。尽管有许多苦难和流血,但是想想他们为之而奋斗的事业就够了。我的丈夫为这事感到烦心。他说,如果我这么喜欢共产主义,那么我应该到苏联去。他还说,凡是羡慕共产主义的人都是主张变革的人,因此,在别人眼里,好像我要进行什么变革似的。由于我们已经拥有我们所需的東西,过得很舒适,所以他认为我的仰慕和变革是十分错误的。我对他说他很自私,在沙皇统治下有些人也可能这样想,结果情况变得越来越糟,于是就发生了革命,沙皇被消灭了。”(你对美国共产党人怎么看?)“哦,我不能说,因为我实际上对他们一无所知。”

“我认为美国也该受到指责,因为我们也有许多缺点。现在,我们的舆论好像我们憎恨战争,而且设法制止这场战争,那是不真实的。如果真想制止这场战争的话,那么实际上是有许多办法的。我记得那年墨索里尼向埃塞俄比亚大举进攻的情景,我一直认为那便是这场战争的开始。问题是,我们对制止战争不感兴趣。我丈夫不喜欢我批评美国。”在她的声明中,经常夹杂着与其丈夫意见的分歧。她与她的丈夫“政治分歧很大”,而且两人“激烈地争论”。我们的假设是,她关于政治的某些“进步”观点,并非是其理智和情感的真实表现,而是她对那个男人强烈不满的文饰作用。当她赞成苏联时,她的目的是要他因她的观点而发疯。对她来说,表面思想的坦诚和文饰似乎受制于

强烈的潜在的压抑。

我们在这个被试身上没有获得十分个人化的数据,因为她将一些涉及深层情感的问题撇在一边,而且她关于丈夫的讨论是没有深度的。不过,当她接触到政治问题时,这些问题对她确实意味着某种东西,致使她忘却了自己的理性,并且为了申辩的目的而发泄一通。不过,这里也有矛盾,正如我们在第十六章引用她的陈述时所证明了的那样,“她对她的反犹偏见并不感到十分自豪”。

编号为 M320 的被试也是在职人员心理学班的学员,只不过他是一个低分男子。他想成为一个风景设计师,但他常犹豫不决,非但没有进取心,而且害羞。他的政治观点是自由主义的、不持偏见的。他想努力维持他的自由主义,但是,在有些政治问题上,他要维持他的自由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在许多方面,他的冲动表明他并不承认他所声明的东西。他以典型的低分者的陈述开始:

“我对政府和政治没有多少想法,但是,我认为,现在许多人是更加自由主义的。也许,有些人喜欢目前美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对罢工采取了温和的反对态度:

“我不知道,我也不了解那种情况,他们只是直率地提出了要求,而不考虑公司的处境。对此,我没有发表过意见。价格上涨会使这种事情(罢工)发生。不过,在一家大公司里,老板也许还承受得起,但是对小公司来说,如果出现这种事情(罢工),则会产生灾难性的结果。我想我实际上是不赞成罢工的。”接着,他通过民主的“团结一致”的公式谈到了明确的反罢工立场。

“他们应当团结一致,要求增加 20% 或 30% 的工资。不过,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因为罢工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如果罢工问题得到解决,他们仍然必须签定某种协议,而这又将是被迫

的,裁员也是不可避免的……我想,人性就是以那种方式表现出来的。”最后一段陈述是相当矛盾的,因为它实际上属于高分者的模式,涉及人性的固有劣根性(参见第七章)。

在他表示了这种转变以后,他继续那种高分者对政府控制的谴责,而且以一种自相矛盾的方式表达了他对工资立法的看法。

“嗯,像那种情况,也许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想工资立法是必要的。不过,我不认为应当有最低工资的立法,因为雇主应当付给雇员工资,如果他不能支付,那么雇员就不必在那里工作了。同样,如果雇主支付不起工资,他也就没有必要呆在商界了……”

这是一种倾向,而不是任何声明。它证明被试在遇到具体问题时代政治上的进取愿望和心理上的明确变化。这个被试的“政治本能”(如果这个术语能被允许使用的话)是反对官方的。我们可以从下述观察中充分地推断“政治本能”,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注视一个人深刻的心理冲动而非公开承认的思想,那么我们就能在政治潜力之间作出更好的区分。

编号为 M118 的被试是一个得中间分的男子,我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类似的情况。他是在职人员心理班学员,也是一个注册的民主党员。他在反犹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中间分。访谈者的印象是,他属于潜在的“低分者”,但是某些人格因素又使他不属于真正的“低分者”。关于他的例外,我们可以通过他在不同意见层面之间的冲突而得到解释。他在一些抽象的政治问题上发表了“进步的”言论。

“存在一种社会主义倾向,我不知道如何评价它。劳工和企业之间的冲突也许可由政府来调解。政府会在劳工和企业的冲

突中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现在的问题是自由企业,它会导致垄断,大企业把小企业吃掉。贫富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人们都想往上爬,把别人推下去。鉴于这一原因,政府应该对经济施加影响,不论它是否走向社会主义。”

访谈者正巧与该被试同坐一趟车从伯克利去旧金山,因此他们以一种更加随便的非正式的方式继续进行讨论,议题涉及被试对工会的看法。在此情况下,基于一个人兴趣的表面思想和真实思想之间的差距便产生了:

他认为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要比其他工会好,而且他还认为工会应该在政治、教育和管理方面发挥它们的功能。但是,他不想参加联邦工人工会(他原本是有资格参加的),因为在他看来,该工会未能充分关注高收入的问题,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使贫困团体的工资保持在某种最低水平上。他希望这个工会多关心工资升级的问题,并且制订切实可行的升级标准。

编号为 M934 的被试是一个加拿大人,也是公开演讲班的一个学员。他正在努力学习,以便今后成为部长。他把自己称做“远离左翼的人”,但是又用下列陈述对这一表白加以限制:

“我属于务实性质的人,因此不会投社会主义者的票……我担心他们会进入政府。”对他来说,务实与社会主义是不可调和的。后者作为一种思想是不错的,但是不能让它具体化。

“我会投社会主义者的票……不让现在的政府太向右转……但是,我并不认为社会主义者有经验把他们的社会主义纲领付诸实现……而且,我认为他们的纲领必须修改。”他称赞美国工党政府,原因是它没有推行社会主义纲领。被试把这种节制行为解释成是“政治经验”的一种表现。

“嗯,我认为他们并不准备一下子就改变社会制度,这是他们成熟的一种标志。”该被试一方面想获得左翼知识分子的称

号,另一方面又想成为一个经验主义者。看来,他害怕思想的具体化,只想抽象地同意这些思想。

在上述例子中,被试所表白的思想是进步的,具有与表面思想相反的真实思想。看来,这与这个国家已经确立的民主有关,它使民主思想的表达成为可能,而且其中的一些表达是与正统思想相悖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的法西斯主义潜力主要在那些坚持传统思想的观念中表现出来,它可以称作自由主义,也可以称作保守主义,而潜在的“政治本能”则是靠无意识的人格力量来滋养的。对此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详述。

#### (四) 伪保守主义

我们已经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进行过问卷调查(参见第五章),结果区分了两种人:一种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的人;另一种是在两个量表上均得高分的人。这种区分是依据真伪两种保守主义来予以解释的,前者不仅支持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而且还支持美国的那些传统原理,正如被试拒绝反少数民族的偏见所表明了的那样,他们明确地反对压迫,呼吁实行真诚的民主。至于后者,我们应当强调指出,我们对伪保守主义思想的假设是与我们的心理学研究结果相一致的。我们认为,潜在的法西斯主义人格,不论在公开的表达层面上还是在人格的构成成分上都属于一种伪保守主义,而非真保守主义。与伪保守主义相一致的心理结构,是指那些在自我水平上的世俗性,对权力主义的顺从,无政府主义的冲动,以及无意识的破坏性。这些对抗的倾向已为我们的研究所证实。在我们的研究中,无意识和有意识这两极之间的范围是很宽泛的,其中的主题统觉测验是与访谈的临床部分联系起来予以考虑的。例如,权力主义的



攻击性和报复性可被认为是介于这些对抗倾向之间的重要因素。当我们转向这里所讨论的属于心理因素的思想时,我们应当记住,被压抑的冲动(例如,破坏性的内驱力)从未得到解决。当理性削弱了那些服从于禁忌的冲动时,它并没有使冲动得以消失,而是允许它们以一种容忍的、修改的和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以迎合自我准备接受的社会要求。因此,伪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不同于真保守主义者的思想,他们不仅具有反叛逆思想的保守形式,而且还具有一种潜在的破坏倾向。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今日的思想中,伪保守主义的倾向指向那些或多或少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并使思想中隐藏的暴力和歧视等倾向表现出来。所有的法西斯主义都在运用传统的思想和价值,但是,却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反人道主义含义。伪保守主义就是这种特征的现代表现。客观的社会条件很容易使这种人格结构在思想表述中表现出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这种伪保守主义的社会化过程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从许多颇具代表性的高分者的观点来看,政治的保守主义和传统的自由主义常被中立化,用来掩饰一种压抑的和破坏的愿望。伪保守主义者以维护美国的传统价值和制度为名义,以保护他们免遭威胁为借口,有意或无意地把隐藏的暴力和歧视表现出来。

这种伪保守主义形式可在编号为 M109 的被试身上看到。M109 是一个高分男子,一个持法西斯主义观点的警察。他在问卷上写下“共和党人”,作为他首选的政党,接着又划掉了。他赞同反新政的民主党人和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而不赞同新政的民主党人和传统的共和党人。这一态度在其访谈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当时,他说“政党并不意味着什么,而候选人却是值得讨论的”。<sup>[4]</sup>

当问起他关于威尔基式的共和党人的概念时,他说威尔基

的支持者与杜威的支持者是一回事。大企业既喜欢威尔基又喜欢杜威。

被试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偏高分。根据他对个别条目的回答,我们发现他并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他赞同许多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条目,在“儿童应当了解美元的价值”,在关于摩根和福特的条目上,他标上了+3;而在其他条目上,他则标上了+1或+2的记号。但是,可以注意到,他并不同意商人比艺术家和教授更重要的说法。他还相信,政府应当保证每个人都有收入,对公司和富人增加税收,而且医疗社会化也是一件好事(他在这个条目上标上了“+3”)。由此可见,他赞同政府的某些社会功能,但又认为控制权应当交给合适的人。所有这些已由访谈清楚地显示。他在从事警察职业之前,曾做过医疗保险业务。他说,他一直在与那些不赞成医疗保险的机构进行斗争。后来,他又放弃了这项业务,并且认为这一举措是明智的,因为医疗保险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在谈到他关于医疗保险的立场时,他说“我喜欢集体化的医疗保险,但是,我认为私营企业能比政府做得更好,因为政客们会做得很糟。人们需要医疗保险,如果它得到正常发展的话,那么我从理论上是喜欢它的。”

在访谈者看来,被试具有某种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念,但是,他又认为控制权应当掌握在他所认同的团体手中。这样的团体显然是指福特型和摩根型团体,而不是他所反对的工会。

尽管该被试具有反动的和渗透的权力思想(这些思想在访谈中已得到证实),但其社会主义倾向也是比较明显的。只不过他并非从生产手段国有化的意义上提及社会主义,而是提及了他意欲表达的愿望:自由企业和竞争制度应当由国家资本主义来取代,在这种国家资本主义中,经济上最强大的团体(也就是

重工业)应该占据支配地位。至于社会的生活过程,不应该受到居支配地位的团体的干扰,更不应该建立在表面上取决于民主而实质上却取决于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

这种“社会主义”,或者确切地说这种基于伪保守主义的伪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由反自由主义来予以限定的,致使它充当了反民意愿的民主外衣。在这种思想看来,惟有权力制度取代民主过程,人民才能拥有他们的权利。

编号为 M651A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的圣·昆丁男性囚徒。他犯有一级谋杀罪。该被试也是伪民主的一个典型例子。

(你怎样看待今天的政治倾向?)“在加利福尼亚州,我们的一个受迫害者当了州长……他们称他是民主的象征……民主是政府的最佳形式,但是……”被试强烈地批评罗斯福总统,尤其是他的“全国工业复兴总署(1933~1936)”。他提到他的父亲之所以失业,原因是这个“全国工业复兴总署”的迫害。不过,他在提及这件事情时似乎有点困惑:

“当民主正确运作时,民主是好的。我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少数人支配金钱。我不信仰共产主义……但是,毕竟有这么小人物从来不拥有任何东西……”

被试提到他的祖母每月只领到 30 美元的养老金。他说,“她无法生活下去……因此,法律应当改变……”被试强调应对那些年纪太大以至于现在的立法无法使他们受益的人提供养老保险……<sup>[5]</sup>

这里,涉及特别重要的动力因素。无须争辩的是,在目前的经济制度下,民主的形式尚不足以满足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需求,而民主形式的政府则表现得有点接近理想的社会。由此矛盾引起的不满,被那些未能认识其经济根源的人转而反对民主的形式本身。由于它不能实现它所许诺的东西,因此他们就认为它

是一个“骗局”,从而准备将它更换,用另一种制度取而代之。这种制度牺牲了人类的尊严和正义的要求,但是他们却模糊地期望这种制度能够通过更好的计划和组织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某种保证。甚至最为极端的美国民主的传统概念——革命的概念,也借助伪保守主义的政治思维方式而得以唤起。不过,它已经变得软弱无力了。存在的只是一种模糊的、激烈变革的思想,它只有在突发的和激烈的方面与革命有着共同之处,而在其他方面倒像一种行政措施。这种恶意的、反叛的、本能上被动的思想在前威尔士亲王访问美国北部的贫困地区以后变得著名起来,那就是“该为它做点什么”的思想。我们可以从编号为 F105 的被试身上看到这一倾向。被试是一个高分家庭妇女,37 岁,跛足,诉说常受挫折,并且具有强烈的偏执狂特征。她每次都投罗斯福的票,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民主党人”。当我们问她为什么想成为一个民主党人时,她说了以下的话:“我不知道。我主要反对资本主义,而共和党就是资本主义的。民主党试图让工人阶级有喘息的机会。我的父亲投托马斯的票已有好几年了。他认为,世界最终是会变的。”(你的理想是否反映了他的态度?)“噢,可能是。但是,我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就是投民主党的票。”(你认为战争结束后会发生什么?)“也许,共和党人又会回来执政。我认为,美国公众是十分易变的。也许,我也会变化。世界处于这样一种困惑状态,我们应该为之做点什么。我们不得不学习如何生活和与人相处。”

该被试的进步的虚假性在她提及少数民族问题时显现出来了(见后面的描述)。我们可以从其言谈中发现她是一个狂热的反犹分子。

为了推测这个妇女的变革要求与其反犹主义的关系,让我们来看一看编号为 M661A 的被试。他是一个强盗,现为圣·昆

丁囚犯,持有狂热的反犹主义态度。在访谈者看来,他从令人厌烦的颓废行为中获得满足,并且拥有“太多的经验”,由此产生一种虚假的贵族思想,而这种思想充当了他对那些被视做弱者的人进行暴力压迫的借口。“除了谈论共产主义,我极少关注政治,而我是赞成共产主义的。”当他被问到为什么时,他作了如下的陈述:

“举个例子,我不会忘记苏联革命……我认为他们是谋杀,我决不会宽恕苏联人,不会像宽恕法国人的革命那样宽恕苏联人……换言之,我仍然相信旧制度,而且认为在胡佛总统的领导下,我们是快乐的,因此必须维护他。我认为,在他的统治下,我会有更多的钱,而且,我也不赞成遗产税。如果我拼命干活赚了10万美金,那么我有权把它留给我所喜欢的人。我猜想,我实际上不相信人们生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由于他以朴素的个人主义名义接受对政府干预的传统批判,因此他赞同政府控制,只不过控制者必须是强者。由此可见,这个被试与前面提到的M109是完全一致的。

(你如何看待政府对商业的控制?)“我是半赞同半反对。我相信政府的控制,因为我实际上不相信民主。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在掌舵,我们就不会搞革命了。但是,由于我不大了解政治,所以我无权对此发表评论。”

在M661A的政治思想背后,实际上是所谓的“正统者”的概念。这可以从他为什么反对一切革命的解释中看出来:

“他们推翻了业已建立起来的秩序……他们始终是由那些一无所有的人组成的……我从未见过一个共产党人来自‘正统的社会阶层’,尽管我读过乔治·肖伯纳的论社会主义的著作。”

我们可以在下述两种伪保守主义者之间作出区分:一种人承认自己信奉民主,但他们实际上是反民主的;另一种人把自己

称做保守主义者,而实际上却沉溺于颠覆的意图。不过,这种区分似乎有点理性主义。上面引述的661A,从狭隘的意义上说,属于伪保守主义的团体。编号为M105的被试也是如此,他是一个前法律系学生,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强调自己的保守主义背景,同时又坦率地陈述其明显的法西斯主义倾向:

“我从父母那里获得有关共和党人的知识。最近,我认真分析了自己的思想,我发现我是赞同共和党的……我们的家庭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家庭。我们不想与社会主义有任何关系。我父亲对于投罗斯福的票感到后悔,那还是1932年的事。父亲写信给南卡罗林那州的参议员雷诺兹,谈了他对国家政党的看法。现在已经不是美国利益第一了,我认为,有人正在出卖我们的国家。”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被试对父亲的固恋和他对政治的权力主义表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关联。他运用了法西斯主义者的一个短语,用以表示当德国战败时他仍然坚持乌托邦思想的一种态度。

“美国正在参与这场战争。但是,如果我们赢得这场战争,那么我们就同时失去和平。这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两选一选择。”

一个从更加狭隘的意义上讲的伪民主的例子,可在编号为M108的被试身上看到。他是一个高分男子,研究除虫剂,具有强烈的法西斯主义倾向。他反对罗斯福,反对新政策,反对人道主义思想。不过,他又说他感到“自己有点像社会主义者”。

这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模式。德国纳粹分子借助这种模式痛斥过魏玛共和国,吹捧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却同时又将“社会主义”的词汇塞进他们的政党行话之中。显然,正如那些把自己吹嘘为保守主义的人所表示的那样,这种“社会

主义”实际上是把权力主义控制的欲望与某种含糊的集体主义混合起来。这里,私人利益(也即被试“从中得益”的东西)与客观的政治逻辑(盟国的胜利)之间明显的不相容性,被不择手段地用来为法西斯主义的失败服务。不论它如何发展,民主定将失去。

失败主义是伪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另一个特点:同情法西斯主义,同情希特勒德国。它很容易被理性化为人道主义的宽宏大量,甚至理性化为给人人以公平待遇的民主愿望。编号为M106的被试是一个大学生,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给人以理性的感觉,而且乍一看似乎对德国持批判态度。他通过对德国法西斯主义之根源进行夸张的追踪,从而达到为之辩护的目的:

“德国人好攻击,喜欢游行,而且始终保持那支庞大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们接受了不公正的和平。凡尔赛条约对他们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正因如此,他们就愿意听像希特勒这样的年轻人的话。如果当时给予公正的和平,就不会有现在的麻烦。希特勒上台时作了许诺,人们愿意跟他走,因为那时的社会有大量的失业、通货膨胀,等等。”

所谓凡尔赛条约“不公平”的神话,源自被试这样一种心理,即在非德意志的国度里,人们应对当时的处理表示内疚,惟有如此,希特勒才不会发动战争。该被试对希特勒的解释意味着同情,它由随后关于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政策的声明所证实:

“嗯,希特勒吗?他把事情搞过头了。现在看来,他的有些做法是正确的,有些做法则是错误的。总之,他不是一无是处的人。希特勒坚持这样的观点,即‘一只老鼠坏一锅汤’。”尽管如此,这个被试仍披着民主的外衣,避免露骨地对法西斯主义表示同情。当被问到生活在美国的犹太人时,他答道:“存在同样的

问题,但处理得较好,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

虽然伪保守主义是高分者的一个特征,但它在低分者中间也不少见,尤其表现在为纳粹进行辩护的态度上。例如,编号为F133的被试是数学系的女学生,自称“相当保守”。她在民族偏见量表上得低分,而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的表面思想是反对偏执,但在她提及她的爱尔兰血统时,她却对美国表示不满,从而导致她发表亲德的声明。这种态度是与她的法西斯主义得分相一致的,已经超越了仅仅是暗示法西斯主义的倾向:

“我反对英国。英国和爱尔兰进行了一笔肮脏的交易。英国说纳粹是黑的,苏联是白的,而我认为英国是黑的。它到处征服别人,而且极不公正。我也反对苏联。虽然他们以人民的事业为重,这是真的,但是,总体上说,他们是错误的,而且他们的政府比我们的政府差。”(你觉得纳粹怎样?)“德国人丧失了一切。他们得到的是失望。我不相信瓜分德国是为了让苏联和英国富强起来。说德国人发动战争是不正确的,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要两国的参与才能打得起来。所以,把责任统统推到一个民族身上是不公正的。德国人感到自己受到迫害,他们会更疯狂地挑起战争。我们应当让德国人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关于纳粹分子如何如何残忍的说法有点过头了。德国人没有得到公正的和平。苏联人会发动另一场战争,它对德国的蹂躏太大了。我很悲观,因为人们认为吃了败仗的都是坏人,赢得胜利的都是好人。强者欺侮弱者,尽管这是现实,但却是不公正的。”

这里,决定性的转移发生在被试要求对战争罪行讨个“公正”说法以后,也就是他抗议把纳粹的暴行说过了头的做法。

伪保守主义这个术语有可能为伪自由主义甚至伪进步所替代。我们在引进该术语时,意欲对被试的“伪装”进行理论探讨,也就是探讨“伪装”背后的真正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显露到何

种程度。对所有这些术语必须予以谨慎的处理。区分真假的政治思想,目的是为了 avoid 过分简单化,避免把持有偏见的人与“反动主义”等同起来,避免把法西斯主义倾向与“反动主义”等同起来。我们的观点是,法西斯主义具有许多“进步的”伪装。此外,下面的一个概念在我们开展研究之前也已经得到确认,那就是“维护美国的生活方式”。一旦这种“维护”显现出“美国维持治安委员会”的特点时,它就将暴力和破坏倾向掩饰起来了。它们既属于公开的政治表现,又属于人格特征。在公开的政治表述中,不论一个人是真的保守主义还是假的保守主义,只有根据关键词语才能确定,而所谓关键词语,指的是一个人对其决定的表白。至于心理的决定因素的区分,必须予以相对化的处理。由于被试的心理冲动渗透到各个方面,因此我们不可能把“真正的思想”与“表面的思想”分离开来。在真假之间不存在心理的分界线,而且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静止的关系。今天的伪保守主义可能成为明天的真保守主义。

鉴于这些考虑,谨慎地阐述“真”与“假”之间的区别,也许有着某种方法论的意义。当然,一种简单的操作过程是根据问卷和访谈的关系来限定两者的概念。我们可以把下面那些人称做伪保守主义者:他们在接受各种世俗和传统的价值观方面(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以及在接受法西斯主义量表方面更具破坏性,并在诸如犬儒主义和反犹主义两者之间表现出明显的矛盾。不过,这样的推断多少有点武断和机械,因为它虽对术语进行了解释,但却无助于对原因的揭示。若将区分建立在有意义的心理假设基础上,可能会更加令人满意。一种常见的假设是,把区分成功和不成功作为其出发点。这将意味着“真”保守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至少成功地与权力主义模式保持一致,而没有情感方面的冲突(没有明显的自相矛盾)。相反,“伪”保守主义

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权力主义身份只在表面上取得成功,譬如,他们努力使自己和别人信服他们属于社会的正统阶层。由于他们在接受遵奉主义的价值观方面所作的努力经常威胁到这些价值观本身,致使他们转向反面,就像他们狂热地要求保卫国家而使他人同情国家的敌人一样。

不过,在目前的条件下,这种区分仍要求某种证明。为此,请允许我们把伪保守主义与取自洛杉矶被试组的真保守主义进行对照。正如我们在第一章已经指出的那样,洛杉矶样本与伯克利样本不同,前者包括若干社会上层的成员或自封的成员。

编号为 F5008 的被试是一个具有美国血统的妇女,杰弗逊的后代。她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显然不为她的社会地位所动,也不强调她的良好的家庭出身或她的“正统阶层”。她是一个明确的不持偏见者。她的主题统觉测验表明,她具有神经质的过分乐观的特点。这种特点有可能决定她的反应,也有可能并不决定她的反应。我们认为,真保守主义者是确实存在的,但其人数正在日益减少,因为他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社会的一些人打着保守主义的旗号对劳工进行欺诈,或者推行种族仇恨。这种倾向越是增强,真保守主义者就越是感到他们在被迫承认民主的理想,而这些理想是与他们的心理模式不相容的。如果这种观察能够得到证实的话,那就意味着真保守主义者将因今天的社会动力而被驱赶到自由主义阵营中去。这就是为什么在高分者中间找出真保守主义者如此困难的原因所在。

如果我们的假设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为什么它与习俗观念(认同上层社会团体)具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就可以理解了。在许多案例中,认同父亲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不过,在有些被试

中间,未认同并不导致对权威的对抗,原因在于他们接受权力主义模式而未将其内化。他们很可能成为这样一些人,即从社会角度把自己看做是上层社会团体的成员。这种推测是与下列事实相一致的: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运动主要依靠各种受挫的中产阶级,因为他们丧失了经济基础,但又不愿承认失去社会地位的事实。失望之余,他们便选择了一条捷径,那就是参加一种强有力的运动,或者说参加一场意欲恢复实力的战争。伪保守主义者的这种社会经济原因很难与其心理原因区分开来,正如有些法西斯主义分子表面上认同父亲而实质上是想声称自己的社会身份一样。这种现象的社会根子基于这样的事实:倘若依靠正常的经济竞争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已经日益困难,那些抱着“提升”想法的人就会被迫寻找其他途径,以便再度跻身于统治集团。他们必须寻找一种“增补成员”的办法,把他们曾经谴责的谄上欺下民主化,并且作为他们自己精神结构的组成部分。那些希望干出一番事业的人必须依靠“拉和爬”,而不是依靠个人在事业或专业上的长处和优势。认同上层社会团体是向上爬的先决条件,至少对局外人来说是如此。这些人意欲保持他们“上升的社会运动性”,期盼一种他们在现实社会中希冀达到的地位,并且从中获得某些自我陶醉的满足。

我们在这里引用两个高分者的例子,两人都来自洛杉矶被试组。

编号为 5006 的被试在所有量表上都得高分。他是一个牙医的孙子,由于其父亲未能成为牙医,因此他热切希望重新获得祖父的社会地位。他承认自己有屠杀犹太人的动机(参见第十六章关于他的访谈)。至于未能认同的问题,表现在父亲的形象被祖父的形象所取代,或自己当前的社会地位被良好的家庭背景所取代。这种情况与德国法西斯主义者夸张地谈论自己的祖

先一样,只不过这种良好的家庭背景已被现实的经济发展搞得面目全非而已。

编号为 5013 的被试在所有量表上也得高分。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个医生,而实际上她的父亲是一个按摩师。如果说这个例子有什么启迪意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期盼那些自称为“科学家”和“医生”的人很容易被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纲领所吸引。<sup>[6]</sup>

### (五) 篡夺情结

伪保守主义者意欲达到的目标是恢复和建立经济上强大的集团,以及由此集团统治的专制制度。它们可以通过群众运动来达到,这种群众运动向那些所谓的“小人物”(也就是说,中产阶层和中下阶层的忧心忡忡的人们,他们不断坚持他们的社会地位和他们所假设的实力)许诺,如果他们在正确的时间跟着正确的人们一起参加运动的话,那么他们将获得安全和特权。这种愿望通过伪保守主义思想得以出现。现在执政的政府被谴责为曲解了民主。罗斯福和新政策被说成是篡夺权力。看来,伪保守主义者所责备的正是他们想干的进步事业。他们利用他们的告发作为“把这些流氓撵出去”的借口。他们号召捍卫民主的人们起来反对民主的“滥用”,并且通过对“滥用”的攻击来最终废除民主。由此可见,伪保守主义思想与心理投射完全一致。

人们可能会问,如果伪保守主义者真的认为罗斯福的政策是一种强制的独裁,因而不赞同它,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如此热衷于权力?看来,原因有好几种:首先,伪保守主义者认为他们不是新政策的受益者。在他们看来,新政策是为失业者和劳工设计的。即便他们从“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得到某些利益的话,他们也是不满足的,因为获得这种利益表明了他们最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也即他们原本属于中产阶层,而现在却丧失了经济基

础。其次,对他们来说,罗斯福政府实际上并不强大。他们充分意识到新政策受到最高法院和国会的阻挠,也知道罗斯福不得不作出的让步,即被迫给那些反对他的政治路线的人以惹人注目的职务,例如杰茜·琼斯(Jesse Jones)。尽管伪保守主义者意识到新政策根本不是独裁,从而也不符合他们思想中的权力主义模式,但是他们仍然高喊“独裁者”。再次,他们的伟人概念,不论以何种人格化术语来表示,总带有力量的意象,也即以强大的工业集团为后盾。在他们看来,政府中的进步人士是真正的篡夺者,他们通过微妙而非法的操纵夺取了与美国民主不相容的权利,从而损害了“正统的人”的利益。伪保守主义者具有“合法”的潜在意识,所谓合法的统治者是指这样一些人——掌握生产机器的人,而不是那些将权力基于形式政治的人。这个主题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对此应该予以认真对待,因为它与社会现实并不冲突。只要人民的生活依靠国家的经济结构,那么它就归根结蒂依靠那些掌握工业的人,而不是依靠那些由人民选出来的代表。伪保守主义者认为,所谓的民主政府并不真实。对此情况,他们反对的并不是经济不平等和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之间的矛盾,而是民主形式本身。他们不想解决这种矛盾,而是希冀废除民主形式本身,直接控制那些他们认为是最强有力的人。

独裁思想的这种背景(认为民主在现行的条件下并不现实),可从两个得中间分的男子陈述中得到佐证。编号为 M1223b 的被试声称,民主党人正在转向共产主义化,而工会应该受到限制,“人民应该治理国家”。

编号为 M1225a 的被试在谈论民主时较为谨慎:“政府应该由人民代表选举产生。”

当问到我们这个国家是否具有这种政府时,他坦率地说:

“没有。”不过,接着他又用下面的陈述限制了这种“没有”。他说,可以有一个相当标准化的政府,“我们应该尽量接近它”。

与此相似的是,编号为 M1223b 的被试在限定他的批评时说:“虽然美国仍很民主,但是它开始离开民主朝其他方向发展了。”

上述两人相互矛盾的言谈,暂且不论其愿望如何,表明他们被形式的政治民主和实际的社会控制之间的对抗搞得很烦乱。他们不敢对此进行解释,而是婉转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以免变得“不现实”。遵奉主义在其政治思想中起到了刹车的作用。

下面再举几个所谓篡夺幻想的例子。

编号为 M208 的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在访谈者看来,他坚持认为,根据新闻广播和他父亲所作的统计,“罗斯福总统已经失去民心”。由于这个被试赞成“独创和竞争,反对政府的贻误和无效”,因此他对由合适的组织来实施社会控制抱有坚定的信念:“对一个公民来说,他在社区生活中所隶属的最佳组织应该是当地的商务部门。通过改良你所生活的社区,你能使它变得更具吸引力,并且创造出财富。”他说旧金山的商务部门是他隶属的部门,他的组织将很快在大规模的会员征集运动中向城里的每个人发送明信片。

编号为 M656 的被试是一个得高分的囚犯(因偷窃和伪造罪而被判刑)。他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久接受了访谈。当问到他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时,他说:“我们刚刚拥有的政府,发动这场战争的政府,纳粹独裁的政府。”

编号为 M108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除虫剂专家,他深信罗斯福贯彻了胡佛的思想。这种谈论在持偏见者中间司空见惯,他们认为新政策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

为。当问到关于罗斯福的一些问题时,他继续说道:“他篡夺了权力,篡夺了许多权力……他在位太久了。据说,有些交易正在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酝酿,我们不了解这些交易的具体内容。”看来,“篡夺者”的概念符合阴谋家的概念,因为“篡夺者”正在从事不利于国家的“秘密交易”。

这种“篡夺者”概念的频繁性及其强度,加上我们材料中许多断言的幻想性质,证明我们将其称之为“情结”是正确的。就我们所知,在心理学的文献中尚未对这种“情结”给以任何重视,尽管戏剧性的篡夺情结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即其中肯定存在某种根深蒂固的本能动力因素。我们只需回忆一下莎士比亚的一些著名的悲剧人物就够了:哈姆雷特、李尔王、麦克贝斯、尤利厄斯·凯塞,以及查理三世。他们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篡夺”有关。在席勒的戏剧中,也始终贯穿着篡夺者的主题,从弗朗兹·摩尔到德米特里厄斯。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尽管它比较抽象和表面),很容易得出这样一种解释:权力和特权的存在,要求享受不到这些权力和特权的人作出牺牲,从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深深地刺伤了他们对平等和正义的渴望。在他们的心灵深处,特权是非法的。但是,他们又不得不为这些特权而生活,迎合这种权力关系的制度。这一矛盾历经变化,如今已经成为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意味着人们已经学会如何压抑他们对权力的不满,并且把自以为不合法的东西当做合法的东西来接受。由于自特权问世以来人类的苦难从未停止过,因此对它进行的革命也从未停止过。可见,人们对特权所持的态度基本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被有意识地接受了;另一方面,它又被潜在的不满所取代。这种矛盾是以下述方式来解决的:在被迫接受权力和抗击权力之间达成某种情感的妥协。不满的情绪从权力的“合法性”转移到了从他们手里夺取权力的人身上。

在他们看来,篡夺权力的人既把自己等同于权力,但同时又违反了权力关系的准则。这种转移的理想对象是政治篡夺者,他们一方面斥责政治篡夺者“对权力贪得无厌”,另一方面却又对业已建立的权力关系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表明他们对篡夺者仍有同情之心。正是这种同情和攻击之间的冲突决定了他们的戏剧性冲突。

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述思路并未充分解释篡夺者的情结。其中,还有许多深刻的机制尚未涉及。一般说来,篡夺者的情结是与家庭问题联系着的。篡夺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声称自己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但又不属于这个家庭,或者假装拥有另一个家庭的权利。需要注意的是,甚至在奥狄浦斯(Oedipus)神话中,篡夺者的情结也被包括进去了。只要奥狄浦斯认为他是养父母亲生的孩子,那么他也就同时卷入了悲剧。这种情况与我们研究的关系使我们作出这样的假设:人们害怕他们不是父母亲生的孩子。这种恐惧可能以下述的模糊意识为基础,也即他们的生物学起源与婚姻和一夫一妻制的制度不相符合。他们感到生活在这种文明的庇护所里并不安全,家庭的根基建立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之上。于是,他们将不安投射于篡夺者身上,因为篡夺者不是他们的亲生父母,惟有赶走篡夺者,他们才能重新获得平静和安全。

#### (六) 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美国第 32 任总统)

篡夺情结集中在罗斯福身上。他的名字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在他们关于政治经济问题的访谈材料中看到。

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谈到已故总统的话题都是人格化的。所涉的政治问题主要是这个人的品质。他因其这样或那样的行



为而受到批评和赞扬,与其代表什么没有关系。最激烈的谴责是对战争贩子的谴责。这种谴责常采取阴谋幻想的形式,因为它们篡夺情结的一个明显特征。

编号为 M664c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由于伪造文件罪而在圣·昆丁监狱服刑一年。他承认他原先是亲罗斯福的。

“见鬼,在那次选举中我竟然会支持罗斯福。那时,我们正在经历严重的经济衰退……我们不需要战争。”

用“红色的罗斯福”来称呼美国总统,实际上属于一种政治厌恶和偏执狂的夸张。尽管我们可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高分被试身上发现这种态度,但是它们在低分被试的陈述中也有表现。让我们看一下编号为 F140 的被试发表的评论。她是一个年轻的护理员,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反犹太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首先提到了她的父亲。

(你的父亲是否反对罗斯福?)“噢,当然。他认为罗斯福所说的一切全是共产主义的话。”(你对此有何感想?)“噢,说不清楚。我想他是。”

有时,被试还怀疑罗斯福是亲俄的战争贩子。这种怀疑披着合法论据的外衣,例如谈论他在战时突然离开国家的那件事情。

编号为 F101 的被试在所有量表上都得高分。她是一个自以为经常受挫的女大学生。她说她的父亲“是极端反罗斯福”的。当问到为什么时,她答道:

“没有一个总统能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离开国家,而他却随心所欲地想走就走。他有点太独裁了。”

关于国内的政治问题,编号为 F359 的被试用相当客观的措辞描述了反罗斯福的矛盾情绪。她是政府部门的一个财会人

员,我们在第十六章曾经提到过她。她由于“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举措而不喜欢罗斯福。在她看来,“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举措导致了一批懒汉的产生,他们宁可每周拿 20 美元也不愿工作。她认为罗斯福没有去从事她正在从事的事业——提高贫困阶层的生活水准。

编号为 M1223h 的被试来自海事学校被试组,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都得中间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他不喜欢罗斯福,说他是“社交界的高手,拥有太多的权力”。与此相似的是,编号为 F117 的被试(一个得高分的已婚妇女,37 岁,在公共卫生部门工作)则认为罗斯福不知道如何处理金钱,因为他生下来家里就很有钱。“现在他到处撒钱,这里撒几百万,那里撒几百万。”

这与被试对杜威的赞扬恰恰相反。由于杜威出身低微,所以他很节俭。在类似的例子中,伪保守主义者的“民主外衣”基于这样的断言:那些所谓为人民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不能被批准,因为执政者并不是人民中的一员,没有权利代表他们行事。他们只是篡夺者而已。

认为罗斯福总统年纪太大,疾病缠身,还认为新政策已是日薄西山,这些想法在反对罗斯福的论据中起着特殊的作用。这里,有着对罗斯福之死的不祥预感。我们可以由此推测一种心理活动:对罗斯福死亡的恐惧被对他的死亡的期待所掩盖。至于罗斯福年纪太大的说法,属于一种不合逻辑的情结:他应该让位于别人,让位于“年轻一代”,让位于新鲜血液。这种情况与下述事实相一致,即德国纳粹也常常谴责魏玛共和国的代表们年纪太大,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也十分强调年轻化的概念。只要我们把临床研究结果与所谓的年纪太大、疾病缠身等描述结合起来,我们就能清楚地发现高分被试在临床研究中如此赞美

身体健康和精力充沛的原因了。由于价值观念的外化,加上偏见人格的反内感受作用,他们似乎非常害怕疾病。如果高分者的心态与精神病倾向的某些特征具有联系的话,那么我们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如此关注自己的身体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是一种与“去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的机制有关的现象。<sup>[7]</sup>这种“去人格化”代表着一种极端的本我的“自我分离”,亦是高分被试的一个主要特征。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法西斯主义的整个思想中,诸如身体健康、血统纯洁、恐惧梅毒等想法起着重要的作用。

编号为 M104 的被试是公开演讲班的一个高分学员。他通过学习工程学改学法律便是一个例证。

被试原来投杜威的票。他认为整个新政已变得停滞、陈旧和老朽。“虽然罗斯福做了些好事,他的有些做法对经济萧条是一帖良药,但是现在则是改变党派、选出新总统、让年轻人上台的时候了。”

正如我们在许多例子中看到的那样,其中的有些论点是相当理性的,譬如,罗斯福的在位时间要比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总统都长。不过,关于“时间太长”的抱怨是在由年轻人执政的名义下发出的,而不是在进步思想的名义下发出的。

对老年人的不满也具有心理的原因,而且与反犹主义有关。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被试将他们反对父亲的敌意转移到了老年人身上。照此模式,犹太人的形象具有老年人的特点,于是便把压抑的敌意发泄到犹太人身上。下述说法决非偶然,即犹太教被认为是父亲的宗教,而基督教被认为是儿子的宗教。对犹太人的主要定型涉及东方犹太区居民的显著特点,例如胡子或邋遢的衣服等,这些都具有老年人的属性。

可以认为,对老年人的敌意既有心理方面的原因,又有社会

方面的原因。后者表现为,无力再工作的老年人被认为是无用的人,从而应被拒之门外。但是,这种想法与罗斯福的关系不大。被试的主要矛头是指向犹太人的,只不过在提及罗斯福时,把矛头转向了他而已。原因在于罗斯福总统是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人物。

至于那些赞同罗斯福的被试,抱有兩種清晰的动机:一是“那些为自己着想并接受独裁权力的人”现在被颂扬为一种伟大的人格;二是左派分子和新政的开创者被作为竞争失败者的朋友而受到热爱。这两种动机与痛恨罗斯福的人的动机正好相反。

所谓“伟大的人格”,可以从编号为 M711 的被试的言谈中觅得。他是一个低分男子,在政府部门工作。他具有许多典型的低分特征,如温和、文雅和犹豫不决等。

“罗斯福是这个国家惟一伟大的人物,他有资格参与战争……我要说的是,他与别人相处的能力……这种能力为我们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编号为 F126 的被试是一个青年女子,在反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正在研究新闻学,但实际上对“创作”感兴趣。她声称她的小叔子能够找到许多证据来批评罗斯福总统,而“我认为总统是支持竞争失败者的,我也是支持竞争失败者的”。

编号为 M102 的被试是一个学习地震学的学生。他之所以上大学,是因为不想“当一个电气工”,他称赞罗斯福的“才能”:

“嗯,凡是像罗斯福那样的候选人,我都会投他的票。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个候选人具有他那样的才能。”

编号为 M106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具有“向上爬”的社

交运动性。尽管他也为“老年”情结所困,但是他却赞同罗斯福。

“罗斯福的工作十分出色,但是我们需要年轻人。罗斯福控制了通货膨胀,帮助失业者,在外交问题上运筹帷幄。他是一个普通人,钓鱼、休闲,所有这些都正是我喜欢的。虽然他患有小儿麻痹症,但你不得不欣赏他所做的事情。罗斯福夫人在政治和社交等事务中也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不过,该被试也有偏见,他为权力思想所困,而且反对犹太人。

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如果一个人被有些人称颂为“普通人”,而被另一些人斥责为“社交高手”,那么这些判断所展示的是主观的价值尺度而非客观事实。

美国总统业已确立的地位,罗斯福的无可辩驳的成功,以及他的象征性父亲式人物对无意识产生的巨大影响,在上述例子中似乎制止了伪保守主义者的篡夺情结,使之仅仅表现出模糊的攻击,而这种攻击带有似真似假的成分。

### (七) 官僚主义者和政治家

在有些被试看来,罗斯福身边的人也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毫无仁慈可言,他们是掠夺者、寄生虫,对人民的需要一无所知,他们应当被“合适的人”所取代。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反对官僚主义者和政客的言论极为丰富。尽管这些言论主要来自得分者,但也不限于此。可以认为,它们是政治思想的模式之一,既见于右派,也见于左派。

若要分析美国人为什么不信任职业政治的原因,已经超出了本研究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该否认,确实存在一个极度膨胀的官僚机构,包括由于战时的需要而设立的那些机构。这些机构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为了使之永远存在,也形成了一些令人不悦的特征。不过,当我们仔细分析了被试对官僚主义者和政

治家的批评以后,我们发现,他们的言论是缺乏证据的,一些针对官僚机构的指责也是不能成立的。人们难以回避这样的印象,即“官僚主义者”这个术语在新闻记者的帮助下和电台评论员的配合下已经变成一个神奇的字眼,致使它起到了一种“替罪羊”的作用。人们只要对政府不满,就会使用这个字眼。这使我们想起了犹太人的反犹主义意象,而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非常符合这种意象。可以这样说,反官僚主义的抨击和反政治家的抨击与人们的体验是不成比例的。其中的一个规律是,凡是表示不问政治的人,凡是用脱离政治来表示不满的人,都会转而反对那些代表政治的人。官僚主义者是一种政治的人格化,或者说是一种去人格化的现象。

关于高分者的这种态度,可以从前面提到过的麦克的政治声明中看到,也可以从前面提到过的 M359(一个具有明显的反犹倾向的皮革厂经理)的陈述中看到。

有时,对政治的抨击以下述言论出现:政治被斥之为太政治化。

编号为 M1230a 的被试是一个年轻的电焊工(他想学习工程学)。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

(你认为目前的政治倾向是什么?)“哦,它们令人困惑。我们对目前的政治倾向已经讨论得很多,而其中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喜欢的。行政当局似乎过于卷入政治了……政治家的风度已经不复存在……你不能相信报上读到的东西,我们读报主要是为了取笑……”

最后一段叙述具有摆脱政治的特点,它以一种评论新闻可靠性的不信任态度作了自我表述,因为这种新闻已经经过审查,并为某些利益所驱动。只不过这种不信任找到了替罪羊(官僚

主义者和政治家),而且成了被试的笑柄。编号为 F120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妇女,她在罗斯福和官僚主义者之间作了区分。<sup>[8]</sup>

(你对罗斯福及其新政怎么看?)“我钦佩罗斯福,我也投他的票,尽管我不赞成新政的许多政策。所有那些机构,如果它们真的对人民有所帮助的话,我们是不会追究那些开支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不满在于浪费的行为,尤其是那些耗资巨大却又无所事事的官僚主义机构。”

编号为 M1214b 的被试是海事学校的中间分获得者。他以传统主义的方式反对政治,认为美国政治的最终方向尚未确定。

“我对政治家没有敬意,他们都是一些夸夸其谈的人。他们把一些事情吹得天花乱坠,目的是让人们跟他们走。但是,罗斯福、林肯、杰斐逊和布莱恩等人例外,他们都是一些诚恳的公仆。威尔逊也很诚恳。”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看编号为 M112 的低分者的陈述。当问到政治问题时,他这样说:“我不喜欢它。我们没有政治也能过得很好。别以为人们都应该成为政治家,人们希冀的是普普通通的生活。即便有时需要担任职务,也不要仅仅为了政治而受训,或者说除了政治就没有其他别的东西了。应当了解人们需要什么,包括人们为什么需要政治。”

这种谴责的言论不同于高分者的措辞。该被试似乎担心官僚主义具体化,致使它们不能民主地表达人们的愿望。

低分者批判官僚主义者和政治家的动机与高分者不同。从现象学上讲,它使我们联想起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有些情况下,那些反对政治的低分者可能被法西斯主义的运动所吸引。

#### (八) 非乌托邦的理想社会

高分者的政治思想通过他们接近最终的政治问题的方式而

达到完美境界:他们意欲建构一个“理想的社会”。他们的理想模式不仅涉及手段,而且还涉及终极的社会目标。

按照我们这里所分析的心理框架,人们必须“现实”一点,因为不可能存在理想社会,人们也不应该存在关于理想社会的想法。不过,这种现实主义是指这样的假设,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对个人及其意识的制约作用。如果人们在社会改革方面抱有现实主义的态度,则他们就会放弃称做“白日梦”的东西,重新塑造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这种态度是由政治观点来加以反映的。

必须指出的是,反理想的情结似乎更经常地发生在低分者的访谈之中,而不是发生在高分者的访谈之中。也许,前者更愿意承认自己的忧虑,较少受到“官方的乐观主义”的影响。由桑福德、康拉德和弗兰克(Sanford, Conrad & Franck)所从事的“乐观地对待战争结果的心理决定因素”的研究,证实了高分者和低分者看待理想社会的差异。官方的乐观主义,以及那种“保持微笑”的态度,具有蔑视人性的潜在特征(正如法西斯主义量表中犬儒主义者的态度那样),它把高低得分者区分开来。相反,低分者准备承认消极的事实,尤其是关于他们自己的消极态度,而较少沉溺于“样样都好”的陈词滥调上。不过,从其观点的深层水平上可以看出,他们对人类潜力抱有充分的信心。鉴于这种差异,我们认为,高分者否认理想社会的目的是最终不希望它具体化,而低分者反对理想社会的目的是为了拒绝“上帝创造的国家”。后者对理想社会持怀疑态度,因为他们认真地考虑过它的可能性,发现现实的社会条件不可能使理想社会得以实现。

编号为 M345 的被试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一个高分男子。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当问到他理想社会有何想法时,他这样回答道:

“我不认为有什么理想的社会,因为人的条件还不够。有些人不寻常地富裕,有些人则不寻常地贫穷。”

这一回答具有多方面的意义。否认理想社会的可能性是以这样一种假设为基础的:人的条件还不够。如果不改变这种现状,也就是说,不尊重存在,世界是不会改变的。人的条件应当在世界改变之前先发生变化,这种论点成为反理想社会的主要依据。在被试看来,由于外部条件不利(贫富不均),就不可能发生内部的变化(人的变化)。而且,以此方式讲话的人甚至不承认理想社会的可能性,相反,他们假设人性外部的固有的“坏处”,这有点像我们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讨论的犬儒主义模式。与此同时,社会条件的产物(富裕和贫困)也被被试人格化了,好像它们是天生的、自然的特性一样。这种人格化既排除了理想社会的可能性,也有助于确立不可改变的概念。对理想社会的拒绝就是以此为来源的。我们认为,该被试的陈述暴露出一种否认理想社会的思维模式,它特别容易传播,只不过很少有人会像这个被试那样对这种思维模式进行上面所述的概括。

前面提到过的 M105,也像我们的其他被试一样,表现出公开的法西斯主义。但是,他关于理想社会不可能的想法,是直接和最为紧迫的问题相联系的,那就是废除战争。

“诚然,我很喜欢美国。问题是,当我们放弃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去加入世贸组织是否值得?日本人用廉价的产品向我们倾销。如果我们确想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我们便应当有钱。要知道,世贸不会阻止战争。战斗本能就在那里。”

这里,有意义的事实在于“战斗本能”的假设。它显然是不会消失的,并以一种现实的方式与经济利益(金钱)联系起来。此外,被试反对战争,原因在于他“看不到自己能从中得到些什么”。

编号为 F340B 的被试是一个得中间分的执行秘书。她的声明是自相矛盾的。她的人格,以及她的政治观点,更接近于高分的类型,而不是中间分的类型。根据她的表面思想,她想成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根据她的特定反应,她则被“现实主义”所吸引。

“我对我们的外交政策感到讨厌——它既不够明确,也不够理想。”(你想批评什么呢?)“看来,我们没有外交政策。”(你希望哪种外交政策呢?)“我想看到四种自由,现在的大西洋宪章实际上适用于其他国家。虽说我们必须现实一点,但我们也必须理想一点——围绕最终实现的理想。”

关于上述言论,似乎有点伤感的味道。认为一个人必须“现实”一点,以便最终实现理想,这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抽象地考虑现实,对如何实现最终的理想没有任何特定的概念,真理被当做流言误用,而个人却试图保持行善的良知,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她将太幸福了。

从心理学上讲,反理想社会的政治思想模式是与施虐—受虐的特征相关联的。这些特征在编号为 M662A 的得高分的圣·昆丁囚犯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当问他“一个理想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时,他回答道:“人人都有工作做,所有的罢工都停止了。”

从这个被试天真的回答中我们可以推测,他也许属于贫困阶层,目前的制度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僵化到这样的程度,致使他无法想像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对他来说,所谓的理想社会就是人人有工作做。这不仅包括满足一个人的基本需求,而且也包括人们不要再为职业而奋斗。制度的完善使得理想的社会成为这样一种社会:任何罢工都会停止,其中包括必要的罢工和不必要的罢工。

需要指出的是,当谈论美国问题时,有些被试会一反常态,从否认理想的社会突然变成赞美理想的社会。我们来看看他们的陈述。

编号为 M619 的被试是圣·昆丁被试组的一个低分者。监狱的管理使他学会了政治服从:“我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原因在于,生活在这个国家,一个人做的梦可以实现。”

当然,这种梦想的表达可以用一个工人挣的薪水来衡量。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的是,在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中,还存在着一种乌托邦的成分,这种成分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冲击现实的真理。

显然,反理想主义者无论如何对他们的“现实主义”感到不自在,但却用一种强烈认同现实的方式来寻找一种发泄,也即用一种认同自己国家的方式来寻找一种发泄。

编号为 M628B 的被试是圣·昆丁的囚犯,一个低分—中间分获得者。由于他在生活中并未失去什么,所以他直率地说:“这个国家用所谓的美国方式对人民进行教育,我不认为它是最好的国家。它强调实用和实惠,但是,我的生命价值并不在于物质的满足。”

上述声明的含意与 M619 有点相似,属于宿命论的屈从。有些低分者,即便不是反理想主义者,也会以准宿命论的方式看待理想的社会。譬如,“它好像是事先构想出来的某种东西”,“它好像是人们‘仰望’的某种东西”。对于理想的社会是什么样的问题,编号为 M711 的被试说:“这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它是否以四种自由为基础?”

### (九) 不怜悯穷人

人们也许会期望,对现实社会持抨击态度的被试,在政治和社会领域里,其心理框架应该是尽可能帮助和同情受苦的人。问题是,反理想社会的悲观主义哲学并没有被叔本华(Schopenhauer)的仁慈所打动。在我们的研究中,被试并不怜悯穷人,不论是本国的穷人还是外国的穷人。这一特征主要限于高分者,而且是政治哲学领域最具区分性的特征之一。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强调由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测得的某些思想和由法西斯主义量表测得的某些态度。取消失业救济,不希望国家对劳务市场的供需游戏进行干预,“不劳动者不得食”等言论,常被高分被试所强调。他们认为,自由主义的制度正在受到社会主义的侵害。由此涉及的思想具有惩罚和权力主义攻击性的色彩,而且这些思想成为某些偏见人格的心理冲动的容器。例如,“除非施加压力,否则人们是不会工作的”,这种推理方式与愤世嫉俗的恶意中伤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外,还涉及到投射机制: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谴责穷人,认为他们正是因为被动和贪婪而需要帮助。

编号为 M664C 的被试是圣·昆丁囚犯的高分者。他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分极高。他认为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它对国外挨饿的人提供的帮助太多了”。他的陈述也表明在他的“不怜悯穷人”和宿命论情结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天哪,我们吃掉了那些国家,现在我们倒要被他们吃掉了……我认为,我们应当让他们挨饿,尤其是那些日本人……幸运的是,我的亲属中没有人在这场战争中战死。我真想走出去杀几个日本佬……我们将会面临另一场经济萧条,而且几年内还会有另一场战争。”

作为对照,编号为 M658 的被试也是一个高分囚犯,他将其情感转向反对失业者而不是反对日本人:

“我认为人人都应当有机会。不应该有什么失业。他们失业的惟一原因在于他们像我们一样太懒。”

这种表述可被认为是我们访谈中施虐—受虐思维的一个典型例子。被试由于鄙视自己,所以也希望粗暴地对待别人。他的惩罚性显然是他内疚感的一种投射。

女性被试不受“不怜悯穷人”的情结所支配。确切地说,她们会根据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而对它进行过度补偿(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福利是一种“高”价值)。以下陈述可被看做是这类女性的特征。

编号为 F359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者,她把世俗性与对黑人的偏执狂主张结合起来。在她看来,穷人应该由国家或社区来照顾。社区中的人应该团结起来,例如,像人们组织男孩俱乐部那样,或者像组织舞会那样,这星期人们聚集在一个人家里,下星期人们又聚集在另一个人的家里。人人都应该贡献点什么,诸如拿出少量的收藏品等。在穷人居住区,人们的活动可从市政府得到资金。如果需要,人们也可以动用物业基金。

对穷人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以及对富人和成功者表示仰慕,更加突出了高分者对法西斯主义受害者的潜在态度。有些人从精神上羞辱那些被踩在脚下的人们,当他们瞧不起外团体时,他们就会这样做。当然,这种态度具有强烈的社会决定因素:向上爬的社会运动性,把自己隶属于某个上层社会,承认竞争是衡量个人价值的标准,以及试图减弱下层群体的潜在威胁。不过,这些社会动机与上面提到的心理机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特定的童年期含意可以表明如下:儿童或多或少意识到,他们在成人世界中的社会地位与穷人在富人世界中的社会地位之间有着

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促使儿童“向上爬”,并将受到的阻碍或惩罚投射到被踩在脚下的人身上。可以这样说,同样的公式也对高分被试产生重要的影响:富有是富人自己造就的,贫困也是穷人自己造就的。

#### (十) 用教育替代社会变革

对“不怜悯穷人”的情结的一个补充是,在我们的访谈中,被试过分强调对人民进行教育的重要性。讨论一下这个题目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它并未出现在我们的访谈计划之中。没有人会否认政治教育的必要性。可是,把教育人民视做是一种社会特权的化身,这就值得关注了。那些不愿承认自己具有反民主倾向的人很喜欢采纳这样的观点:只要人民受到教育,那么民主便没有什么问题了。对“教育”的谄媚经常发生在未受教育的人们中间,而教育已经成为美国思想领域的一种灵丹妙药。至于它是指一般的教育还是某种特殊的政治教育,以及这种教育如何得到贯彻,我们的被试是不加限定的。

教育情结不只限于高分者,它在中间分者身上也有表现。这里提供几个例子。

编号为 M1230A 的被试是海事学校被试组的一个高分男子。他是这样说的:

(理想的社会该是什么样子的?)“得经过几代人的培养,才会把每个人都提高到同样的教育水平……不论班级大小……目的在于改进一个人的主动性。”

这里,教育思想显然充当了一种微妙的手段,通过这种手段,反理想社会的人可以采取行动,以阻止变革。它还具有这样的特征,即长期规划的教育过程应始终伴随下述的思想:承认阶层之间的区别。

与此相似的是,编号为 M934 的加拿大被试是一个中间分得者,他对劳工运动谈了这样的看法:

“在今日的劳工运动中,最为重要的事情是对老百姓进行教育。否则的话,今日的劳工是发挥不了更大影响的。”

编号为 F104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女子,她主修西班牙语,并对商业很感兴趣。她对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的政治分界是与她的教育的政治分界相吻合的。

“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民主党人通常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实际上不了解发生了什么事。目前,行政当局已经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由此可见,教育思想诠释了这样的事实:与共和党人相比,民主党人属于较低阶层的政党。

在低分者中间,教育思想与传统的社会主义启蒙愿望混淆起来了。被试经常抱怨群众的冷漠,以及对政治缺乏兴趣等。让我们以编号为 M117 的被试为例。

“我们的政治制度具有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的人民对政治不感兴趣,或者说没有充分的准备,在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政治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决定的。”

教育情结把我们带回到本章开头讨论的内容,也即无知和困惑。由于无知和困惑,我们的许多样本在政治思想方面变得模糊起来。当一个人说他讨厌政治时,他实际上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于是他只能用教育来进行搪塞。由于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因此也就免除了对政治思想的追求。此外,在许多案例中,教育还服务于这样的目的:把自己的无知投射于别人,以便使自我表现得见识渊博。

最后,由于高分者强调教育,因此人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反犹陈述:“犹太人全力以赴搞教育,目的是为了逃避艰苦的体

力劳动。”这种教育情结的核心是有意识地排除某些人,以便在自得其乐中贬低这些人。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必再受教育,那么他就会把接受教育的必要性投射到别人身上,而凡是被选中的人,一般都具有使投射者感到不舒服的特征。

## 二、若干政治和经济的题目

鉴于我们的研究方法,前面的讨论是以主观条件而非客观条件为依据的。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是被试的政治思想模式,而不是他们对客观的政治问题所持的立场。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研究也导致了对诸多政治题目的讨论,例如对罗斯福总统的评价,对政府官僚主义的态度,对“理想社会”的看法等。但是,我们尚未在主观的政治问题和客观的政治问题之间作出严格区分。现在,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被试对迄今为止访谈计划尚未包括的政治题目所持的态度。当然,其中有些题目,尤其是关于官僚主义情结和政府控制商业等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触及。

### (一) 工会

在我们的访谈计划中,有关工会制度的问题是一个重点强调的问题,不只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十分流行的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因为这个问题具有高度的分辨性。问卷中的条目如“工会应当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具有更大的影响”,已被证明在统计上是具有分辨力的(在问卷 40~45 上,男性的 D.P. 为 3.16,女性的 D.P. 为 3.49)。但是,访谈报告却提供了不尽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原先所谓的低分 = 亲工会,高分 = 反工会等公式不再成立。对工会的批评是普遍的,而且不少直率的低分者在工会



问题上出现偏离现象。亲工会的人为数不多,他们都是一些具有政治意识的左翼分子。高分者和低分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表现,远远超出了简单的亲工会和反工会的差异。它们既涉及非工会会员所持的批判态度,也涉及工会会员所持的批判态度。

问卷和访谈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这是因为,问卷要求直率的陈述,而访谈则允许被试在思考的基础上组织思想。这里,访谈比问卷更接近被试的真实思想。由于劳工问题和倒闭问题以直接的方式影响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因此比起人们在华盛顿讨论政府机关来,分离因素,以及与此相伴的无知和困惑,就较少起作用。

我们必须认真对待被试对工会的批评。这种批评不等于反动。它们在现实中有其基础,而且有些抱怨也是合理的。比起诸如政治家或犹太人等问题来,工会与劳工的关系更为密切。劳工组织面对的是这样一种经济生活,它们由庞大的联合集团来支配,从而倾向于成为“垄断集团”。这一现实会使许多人感到不舒服,他们在其事业中面临一种强权,干预了他们作为自由竞争者来说的属于他们个人权利的东西。有意义的是,至少高分者不满劳工垄断,而不是它们的工业垄断模型。这是不奇怪的。劳工与劳工组织的接触要比他们与工业组织的接触更加直接。例如,底特律汽车制造中心遍布全美,但对劳工来说,他们必须与当地工会就加班费、加班时间、增加工资和劳动条件等进行谈判,至于底特律汽车制造中心这一工业组织则离他们远多了。当然,这里也涉及到社会认同的深层动机。

劳工的垄断直接影响到工人,他们发现自己受到庞大组织的指挥,而他们作为个体却无法对这种组织施加影响,结果,他们就会把自己看做是“圈外人士”,从而感到无助。在批判劳工组织方面,这种体验必须得到承认,以免武断地作出结论。

在被试的批评中,有些情况反映了法西斯主义潜力的存在。由于被试知道他们对劳工组织的批评有许多论点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取消工会,代之以政府控制公司”就很容易成为他们的议题。这也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主要经济目的之一。当然,只有在被试详细描述对劳工组织的理性批评和非理性仇恨时,我们才能对法西斯主义潜力进行有效的分析。被试的有些颇具特征的反应至少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下面,让我们举一些例子,用以说明被试对待劳工组织的态度。在低分者中间,最为常见的态度是有限度地接受工会。我们认为,在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中间,反劳工组织的态度也是可以预测的。

编号为 M310 的被试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所谓的自由企业制度实际上是垄断”,而且“劳工应该增加 30% 的工资”。他说:

“哦,我不喜欢看到人们为了某种要求而设定武断的数字。不过,我对增加工资的要求深表同情。例如,目前的汽车工人就应该增加工资。此外,旧金山的面包房工人仅仅为了基本的兑换率而举行罢工,而实际上他们现在的收入已经超过了基本标准,看来,他们是在考虑将来怎么办。我赞成工会,但是,我们也应当承认,有时它们成为自私的利益集团。他们对劳工运动不感兴趣,而对他们自己获得较高的收入感兴趣,尤其是那些工业工会或垄断企业工会。”

在上述言论的背面隐约地呈现一种模糊的意识,即对今天的劳工组织来说,其目的不在于追求一个良好的社会,而是为了满足某些利益或获得某些特权。这种情况与典型的高分者的抱怨恰恰相反,高分者认为工会变得太政治化了。对此问题,我们后面再讨论。

编号为 M112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的大学二年级学生。据称,他意识到这样一种危险:庞大的工会可能会逐渐变得不再民主。他反对垄断,希望把高度集中的机构分解成若干较小的单位,用此办法来制止上述倾向。

“我不喜欢大型组织。诚然,应该有当地的工会、当地的公司,但规模不能太大。”

编号为 M620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囚犯。他对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表示不满。

(你对现今的政治倾向有何看法?)“哦,我认为劳工应该具有一种责任感……哦,在我看来,一纸合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被试反对罢工,尤其反对组织严密的罢工。(你怎样看待增加 30% 工资的要求?)“我认为,如果工人工作出色,他们应当获得加工资的待遇。如果他们得不到回报,那是不正确的。”(你怎么看待通用汽车公司的罢工?)“不管采取什么方式,应当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劳工组织忽视小人物……我对罢工感到辛酸……我觉得劳工组织负有很大的责任。”

编号为 M711 的被试是职业介绍所退伍军人被试组的一个低分者。他将工会的力量与法西斯主义的威胁混淆起来。

(你对工会怎么看?)“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理论上讲,我是赞成工会的。”(你对增加 30% 工资的要求怎么看?)“哦,我不赞成……我认为工资增长的要求应当与生活开销联系起来。”(你的意思是指什么?)“事实上,我认为增加 30% 的工资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生活费用也会随之上涨。”(通用汽车公司的工会要求增加工资,但希望物价不涨,对此你觉得如何?)“我认为工资和价格都应趋于稳定和平衡……”(有人说工会应该变得更加强大,而有人则持反对意见,对此你怎么看?)“哦,我不同意前者的观点。我认为如果工会变得更加强大,则会导致一种法西斯主

义状态……毕竟,希特勒在其早期阶段没有利用工会,也没有使它们变得更加强大……我知道,旧金山的有些工会已经成了小帝国。此外,还有一些工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我并不认为它们应当受到控制,而我们的有些参议员却希望它们受到控制。”

前面已经提到过编号为 F340B 的被试,她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学员,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在工会的积极作用和工会的消极作用之间作了区分,用人格化的术语把有些工会领袖说成是“资本家”。

(你对工会是怎么看的?)“我认为它们的存在是必要的。我的意思是说,工会的理念是不错的,但在实践中,很遗憾,我有幸遇到过本地区几位不敢恭维的工会领袖,他们的行为使我对工会产生了不好的看法。”(什么行为?)“哦,如果说真有‘资本家’的话,那么他们便是彻头彻尾的资本家。他们把工会组织搞得像企业一样,无非是想从中获利。”(那么,对于此事,你认为该做些什么?)“他们无权反对对他们的财务进行审计。财务收支必须增加透明度。”(你认为该由政府来建立标准吗?)“对,我希望看到强大的舆论促成此事,使这些工会领袖意识到应该更加公正和公开。”

尽管我们没有进行过统计,但是细读全部访谈材料后,我们得出的印象是:许多被试对工会抱着谴责的态度,至少在那些不是明显的反动分子中间是这样。

也有少数被试作出了亲劳工组织的陈述。下面两个例子来自圣·昆丁监狱,而且都是得低分者。

编号为 M628B 的被试是一个杀人犯,他的回答如下:

(你觉得工会怎样?)“我并不像相信这个国家那样相信私人

企业。如果工会赞成倒闭,那我就不会赞成它……我不想评论宪法,我也不靠它过活。我的孩子工作很努力,他总有一天会变得伟大,这是好事……但是,当你没有穿、没有住时,我要说那是一种凌辱……”

编号为 M619 的被试是一个性罪犯,精神病医生称他为“单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他虽然也批评劳工组织,但是认为工会的弱点正在逐渐消失,正在成为一个进步的组织。

(你认为今天的劳工领袖怎么样?)“我以前不赞成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似乎越来越接受它了。我认为它已经克服了自身的缺点……当然,工会在开始时采用过高压手段,不过,事实证明他们采用的手段是正确的。”

对于劳工组织的批判,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强调,那就是工会不该参与政治。尽管这个问题与劳工的经济体验没有关系,但是它有可能使被试产生某种信念:按照美国的传统,工会除了代表劳工进行谈判外,它不应该干预其他事情。这里,工资争议和罢工问题被淡化了,或者说被有组织的劳工需求理性化了。由于在美国这个国家里,工会确实较少带有政治性和阶级意识,因此这种反对与前面讨论过的反对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它才是真正的反动主义表现。

编号为 M621A 的被试是圣·昆丁监狱的一个囚犯,因盗窃罪而被判刑。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也得低分,但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我羡慕工会,但是它们不该煽动劳工(指的是参与政治活动),不该想方设法去赚钱,而应该更多地帮助人们。它们应该使物价下降……工会不要参与政治。”

编号为 M627 的被试也是一个圣·昆丁囚犯,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

得高分。他是一个精神变态的酗酒者,犯有轻微的性骚扰罪。

“不应当过问政治。任何工会组织都不要过问政治。我认为不要把劳工和政治混为一谈。”(你认为它应该禁止参与政治吗?)“当然。”

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可以找到许多对劳工组织直率地表示敌意的陈述,这是毫不奇怪的。不过,引人注目的是,这些陈述不仅发生在高分者中间,而且也发生在中间分和低分者中间。

让我们再举一些例子,从中可以看到被试反对工会制度的主张。

编号为 M202 的被试是一个建筑工程师,得分很低,然而却自以为是企业家。访谈者称他为“保守主义者而非法西斯主义者”。不过,他抨击劳工组织。当问起他对待工会的态度时,他回答道:“我熟悉工会。但是你的问题使我陷入困境!”他在1935年加入一家公司,成为一名化学家。那时正逢经济萧条,他离开加利福尼亚,对工会没有多少感受,只是想找一份工作。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想活下去的话,他就必须有工作,因此他对夺去他人的工作并不感到内疚。他一直在那家公司工作,直到罢工结束。他把自己描绘成是一个“公司人”,全力以赴地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拼搏。他反对工会的原因有两个:(1)工会的政策认为年纪大的比年纪轻的更优秀,因而把较好的工作给了年纪大的而不是给了年纪轻的;(2)工会对倒闭无可奈何。他认为,人们应当有权“享受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人们不努力工作,却仍能得到一份工作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会尽力。例如,他曾雇过两名服务员,结果发现他们不好,于是便把他们解雇了。但是,工会却要求把他们找回来,他不得不遵命,否则的话他将雇不到为他工作的人。同样,如果一个人看到旁边干活的人不卖力却仍然获得了像他一样的工资,那么他也就没有了工作的积极性。

工会无权阻止一个不愿加入工会的人去工作。访谈者提示说,罢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工资。被试回答说,如果一群工人联合起来,要求对熟练工人增加工资,或者制订出更好的生产措施,那是应该得到支持的。如果一家公司不愿为熟练工人增加工资,那么熟练工人也就没有必要再在那里工作了。通过概述,我们发现,被试反对工会的主要理由在于,工会不仅不鼓励努力工作,甚至拆台。

上述例子表明,一个人尽管在政治上不抱偏见,但却可能与劳工组织发生尖锐的对立。应当强调的是,被试尽管把自己描绘成“公司人”,但是他并不羡慕商人,而且认为贫穷可以通过变革我们的社会制度来得到消除。他赞成政府在许多方面实行控制。他的观点可被概述为一种冲突的观点,也就是进步的思想与自己的直接利益发生冲突。这一结构在许多“自由主义者”身上可能标志着一种危险的潜在模式。不过,看来这个被试的不一致不是由于心理因素。他的反工会性质源自他是一个技术人员,他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发现,工会的干预不仅没有提高效率,反而降低了效率。因此,他的态度不像表面思想所显示的那样不一致。他之所以在反动(反对工会)与进步(追求技术)之间发生冲突,是因为两者在目前的生产条件下达不到一致。

编号为 F316A 的被试是一个 22 岁的女子,一个得低分者。她在一家石油公司从事初级化工师的工作。由于在工作中引发了妒忌心理,以致引发了她强烈的反工会情绪。

被试觉得目前的劳工情况很糟,罢工使得工业处于瘫痪,而工会的要求又太多。(美国产联的情况怎样?)“美国产联这种工会是不民主的,凡事都由部门负责人作出决定,然后在会议上告诉会员,要知道这些部门负责人本人甚至还不是工会会员。”(你们这里也有一个公司工会吗?)“你指的是工业科学家协会吗?”

它不是一个公司工会(表情愤怒),而是美国产联玩的一个肮脏把戏,或者确切地说,不是肮脏把戏,而是诡计,因为美国产联不让它进行登记,于是它便不能成为雇员的交易代理机构。那些人认为,如果他们能够阻止它登记,或者拖延它 1~2 年,那么它就会自然消亡。原因在于,一旦它成不了交易代理机构,它就无法为工人签订合同,无法为工人服务。虽说工业科学家协会在这里只有一个分会,但是我认为它是不受公司支配的。”(难道实验室助手的工资与初级化工师不一样吗?)“对,初级化工师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170 美元,而产联给实验室助手争取到每月 180 美元的工资,结果公司不得不给初级化工师增加工资,变成每月 200 美元。产联抱怨说,尽管他们做了一切,但是初级化工师仍然不愿加入。”(为什么?)“我想可能与登记有关。”

对高分者来说,他们反劳工组织的主题是:它是一个骗局。在他们看来,有些劳工组织施加的压力类似于有组织的犯罪和阴谋,它们是非法的。他们在访谈时提到道德的概念和自由市场的概念。可以这样说,把额外的经济因素引入产业领域,并非工业垄断及其价格协议所致,而是工会垄断的结果。这里,“合法性”概念(即认同强者的概念)再次起作用。按照这种思路,工业联合体是一种自然倾向,而劳工组织只是人们的集会,目的只有一个:意欲获得比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更多的东西。

从纯粹的心理学角度来看,“劳工组织是一个骗局”属于一种类似于犹太宗派观念的定型。它可以追溯到在缺乏适当的恋母情结期间对父亲权威的內化或认同。我们的假设是,典型的高分者由于害怕父亲,于是便设法和他站在一起,屈从他的权力。“诈骗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冒着使父亲光火的危险而提出过多的要求(尽管被试自己的要求也不少),同时也引起了焦虑。这种焦虑反映了被试自己的内疚感,它们通过投射而得到

解除。根据内团体和外团体的原则,高分者想使外团体把他们看做圈内人物。由于他们自以为处于上层的社会地位,他们就有可能谴责那些被视做弱者的人。当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时,在他们看来便成了骗子行为,或者说是一种犯罪。这些心理倾向像磁铁一样被符合投射模式的现实所吸引。

编号为 M352 的被试是一个工头,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自称是“操作工的领班”。

“哦,在标准石油公司没有工会组织。我从未成为工会会员。如果工会正常运作的话,那么它们就会有力量。但是,今天有许多工会成了骗局,成了政治影响的源头,尤其是美国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工会不应在政治领域卷入太深,不应成为一个政治组织。许多工会由于想赚钱而变成了骗子。官员们稳坐自己的职位,直到老死。他们花钱是不讲条件的。如果当工会组织能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来管理自己的话,则所有这些就应该得到控制。人们都说官员们太保守,而在我看来他们太自由主义了。他们把罢工作为要挟的手段,而不是作为求助的手段。”

下面,如同在许多其他例子中一样,批判指向工会本身。被试抱着浪漫的想法,认为只要淡化制度,工会就会自动变得好起来。

编号为 M658 的被试是上面引述过的圣·昆丁男犯,他甚至鼓吹取消工会:

(你怎样看待今天的政治倾向?)“噢,我认为我们被许多小丑统治了,被许多工会统治了。看看所有这些工人,除了懂得如何敲钉子以外,其他事情一概不懂。(对此,该做些什么?)“纠正他们的错误思想,让他们明白他们属于什么领域……把他们的章程拿走。”(什么意思?)“哦,每个工会都有章程。废除这些章程。如果有必要,取消他们的会议。”(你对罢工怎么看?)“那正

是我考虑的事情……它们对国家造成损害。”(如何处理罢工事件?)“不再雇用参加罢工的工人,也就是解雇他们。不要以为工人一个星期赚了 150 美元以后罢工就会停止——这种想法是愚蠢的。”

在洛杉矶样本中,可以找到一些极端反工会制度的言论。编号为 5014 的被试是一个 20 岁的小伙子,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当问到他对劳工组织的看法时,他说“我反对它。我像许多退伍军人一样,不会为了赚大钱而举行罢工”。

编号为 5031 和 5032 的被试是一对收入很高的夫妇。两人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均得高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偏低分。他们两人都反对劳工组织。丈夫对这个问题反应强烈。尽管他认为繁荣会继续,但他觉得这是以反对劳工组织的要求为代价的。在他看来,劳工的要求是不合理的,“即便我们满足了劳工的要求,我们也不可能从木匠、管子工那里获得回报”。他们两人声称在少数民族问题上不持偏见,譬如,他们提出让学校接受犹太孩子的问题,而那所学校也正是他们的儿子上学的学校。

编号为 F5043 的被试是一个得极端高分的中年家庭主妇,属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在她看来,“一切都糟透了”。她用“身为母亲”的风格创造了一幅危机的图像,从而把谴责转移到了劳工组织上面。

当问到有关劳工的情况时,她痛惜地说:“我从未看到过这样的境况。天哪,我们的孩子们在为某种东西而战斗。可是,他们迟早会发现,他们不得不在缺乏许多东西的境况下生活……甚至没有安身之处……都是因为罢工的缘故。”被试因当前的危机而责怪劳工组织,对工会的发展和力量表示不满。她还认为

退伍军人像工人一样会闹事,并且害怕内乱。她还谴责罢工者对不断增长的失业率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扩大就业的可能性表示悲观。不过,她并不感到政府干预太多。事实上,她怀有十分强烈的反劳工和反罢工的情绪,并对社会前景失去信心。她重复地说“一切都糟透了”。

低分者对工会通常采取一种“yes...but”(“是的,不过”)的态度,他们既认为工会在原则上是健全的,又认为“工会走得太远了”。高分者则不分青红皂白地为了假设的社会情境和生活标准化而谴责他们。此外,他们的独裁目的也是直率的。对于高分者来说,他们之所以反对工会,原意不在于对当前处境的不满,而是为了表示一种反动主义的要领,其中也自然包括反犹太主义,对外团体的敌视,对新政策的仇恨,以及与美国社会消极意象(它们构成了法西斯主义和准法西斯主义宣传的基础)相结合的所有那些敌意态度。

## (二) 企业和政府

正如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主张政府干预企业的思想模式是与上述的劳工模式相一致的。一种观点认为,某种程度的政府控制是不可或缺的,尤其在战时。不过,它与经济自由主义原则发生了矛盾。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干预属于邪恶的范畴。在高分者看来,政府干预企业是篡夺情结和独裁武断的表现,它侵犯了辛德勒等挣钱者的权利。应当指出的是,在关于政府干预的问题上,虽然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但是两者表示批评态度的方式则是不同的。

以下一些例子是对政府干预抱积极态度的例子,它们选自得中间分者和得高分者。

编号为 F340A 的被试是一个年轻的职员,属于大学在职人

员班,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但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她以某种理智和公正的态度作了阐述,从中可以看出“反偏执狂”特征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表现。

她赞成政府对企业的控制,认为政府控制交通、煤气、电力和供水也许是件好事。(理由何在?)“也许,价格会便宜一些。对此,我尚无把握。但是,不论怎么说,如果发生罢工的话,政府会出面干涉,使工人回去工作。当政府告诉你干某件事时,你就干吧。”

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到,在肯定政府的干预方面存在一种模棱两可的成分:既因政府干预违反了自由主义原则而感到不满,又因政府干预有助于解决劳工问题而感到赞赏。我们还记得,国家社会主义者也曾抱怨魏玛共和国的福利主张,但是后来却被德国社会党实施的国家干预取代了。

编号为 M109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者,他的回答使人想起了编号为 F340A 的被试的回答。他在支持政府干预方面立足于权力主义,而不是立足于对自由企业的无政府状态进行限制。

在那些直率地反对政府控制的被试中间既有高分者也有低分者,而低分者的回答是特别令人感兴趣的。

我们已作过引述的 M711 是一个低分者,他认为国家干预是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表现。显然,他没能意识到罗斯福政府的干预具有进步作用。

(你对政府控制如何看?)“我不赞成。这样做可能重走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老路。但是,有些控制还是必要的。”

被试表现出一种困惑的特征,看来他已经成为法西斯主义宣传的牺牲品。正如上面提及的那样,他也曾证明自己的反工会态度是正确的,并断言希特勒也赞成工会。

编号为 M204 的被试是精神病诊所组的一个年轻男子,患有焦虑性神经症。他是一个低分者,自称是社会主义者,认为新政策过于保守。他说道:“政府不应当控制一切。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政府控制可能出错。我们应当保持个人自由。”

让我们作一小结。低分者对政府干预的批评依据的是传统的自由思想,被试害怕政府干预会影响民主制度和个人的生活方式。这种态度有利于抗击任何一种实施计划经济的企图。看来,如果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价值仍能在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得以保持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改变政府的客观功能。当然,被试尚未意识到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一个过分强调个人主义的时代,必然会导致社会控制。

可是,高分者反对政府控制的陈述则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在他们看来,工会制度、新政策、政府控制等,是同一回事。那些原本不该统治的人却实施了统治。这里,对政府干预的不满与“不怜悯穷人”的情结是混淆在一起的。

编号为 M664b 的被试是一个圣·昆丁囚犯,他的陈述如下:

(你怎样看待今天的政治倾向?)“哦,就是目前进行的那种方式吗?我认为,它对我们国家造成损害。”(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一个人应当独立谋生,不能期望政府进行施舍。我不相信新政策,也不相信劳工治理国家……”

编号为 M651a 的被试是一个圣·昆丁监狱的杀人犯,被判无期徒刑。他也反对政府干预。

(你怎样看待政府对生意的控制?)“我不赞成政府对生意的控制。我相信自由企业。我认为生意人应当自由地从事他们的生意,除了战争期间之外,因为战时我们要实行限价……”

可以看出,对政府控制的感觉,尤其是那些高分者的感觉,尽管代表了对新政策的憎恨,但是仍然没有像他们反对工会制

度那样激烈。这可能是由于权力的作用,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尊重代表权威的政府,即便它的一些做法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但是遵奉权威的潜在力量仍然存在。我们的许多访谈是在战争期间或战后不久进行的,那时如果没有政府控制便办不成任何事情。可是,如果今天进行访谈的话,情况就可能十分不同了。

在此领域,有一个特殊的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被试对垄断主义的态度。一方面,垄断是自由企业的产物,是健全的个人主义的结果;另一方面,被试也主张政府对垄断实行控制。例如,编号为 M115 的被试是一个非法西斯主义的兄弟会男子,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他的感受是:“当企业搞得太大时,应当及时加以控制。在某些领域,像交通、电力等,大规模的组织是必要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防止垄断,并且限制利润。”

被试在反垄断问题上代表着很多人的意见。实际上,他的目的是想人为地“制约”经济发展。这些中产阶级的观点在思想上是反大型联合企业的。

编号为 M118 的被试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低分男子,他在垄断问题上深受传统经济概念的影响:“现在的重点在于‘自由企业’,但是它容易导致垄断。大企业把小企业逼上绝路,贫富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人们都想往上爬,把别人踩在脚下,没有商量余地。鉴于这一原因,政府应当对经济产生更大影响,不论它是否与社会主义有关。”

被试还批评了华莱士,说他“不切实际”。我们的印象是,垄断主义被视做一种模糊的否定公式,极少有被试意识到垄断对他们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工会问题在他们的思想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 (三) 贴近被试生活的政治问题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们曾指出,政治上的困惑和无知,以及表面思想和具体反应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于下列事实:对今天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政治既离他们的经验太远,也离他们的利益太远。这里,我们想简要讨论一下访谈计划中的某些政治和经济的题目。这些题目比较贴近被试的生活,从中可以看到被试对这些问题的各种反应,以及这些反应与他们对其他政治问题的反应有何差别。

首先,让我们来说明一下所谓“贴近”是指什么。在我们的访谈计划中,包括这样一个问题,它属于现实主义范畴,属于“投射”性质。这个问题就是关于年收入 25000 美元的限制。对此问题的回答,更多地涉及“美国梦”,而不是政治态度。尤其对我们的被试来说,他们中有些人意欲达到这样一种收入。他们认为人们应该在这一水平上生活。不过,大多数人的观点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人人都应当被允许赚许多钱,而如今的事实是,赚钱的机会已经成为幻想。这种美国式的理想要比擦皮鞋的男孩成为铁路大王的梦想更难实现,或者说要比没有贫穷的世界的梦想更难实现。

在那些公开赞同收入限制的被试中间,有一个圣·昆丁的囚犯,编号为 M664C,他因涂改支票而入狱。他是一个高分男子,对每件事情都充满怒火和妒忌,尤其不喜欢富人。

(你对年收入 25000 美元工资的限制是怎么看的?)“作那种限制干啥?那比平均主义好不了多少。无论怎么说,25000 美元的收入算高的了。”

编号为 M621A 的被试也是圣·昆丁的囚犯,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均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

表上得高分。

“他们不该那样限制。如果一个人有能力,他就可以拿得更多。”

除了收入限制外,其他一些题目是被试在陈述过程中提及的问题,其中就有物价管理局和健康保险等。

我们的访谈表明,物价管理局被视做是政府干预的一个“官僚主义”机构。下面的例子是随机取得的。

还是那个曾经提到过的 M621A:

(你对物价管理局怎么看?)“我认为它在这个国家干了一件好事,例如,在圣地亚哥它对住房价格作了规定(被试认为物价管理局应该解决住房问题)。”

一个例外是编号为 5031 和 5032 的一对富裕的洛杉矶夫妇。他们对“新政、优先权和物价管理局的举措感到讨厌”。

此外,也有被试虽赞同物价管理局,但语气中却带有某种调侃的意味。例如编号为 M627 的圣·昆丁囚犯。这个低分者认为:“如果物价管理局控制黑市,那么他们就算真正做了一件好事。”

上述观点也出现在编号为 M658 的圣·昆丁高分者的访谈之中,这个被试试图取消工会:“如果物价管理局有铁手腕的话,那是很不错的。问题是,它没有。相反,那里的工会为了赚 10 万美元而用 100 美元打发了一名雇员。”

相似的观点也表现在健康保险方面。高得分者和低得分者(只有极少数例外)对此反应都很积极。编号为 M656A 的被试是一个圣·昆丁组的高得分者,犯有二级谋杀罪。他在声称 25000 美元的年收入不是上限以后,就公共卫生保险问题说:“我赞成健康保险。”

上面引用过的低分男子 M711 也很热情:“公共卫生保险



吗？它与理想社会的措施一样重要。”

最后,让我们的注意力转向经济领域,它对法西斯主义的形成极为重要。这个问题就是纳税。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抑制的怒火得到了自由的发泄。对高分者来说,这种怒火含有希望暴力的意思。一个被试自称是权力主义运动的“候选人”,他用拳头敲击桌子,抱怨说赋税太重。诸如此类的抱怨不仅涉及政府将数百万美元赐给懒汉和官僚主义者,而且涉及(用其中一个被试的话来讲)“这个世界还究竟是不是属于人民”的问题。这里,被试感到他们要为实际上得不到的回报作出牺牲。正如我们的一个被试所抱怨的那样,他看不到从这场战争中可以得到什么。被试对纳税人能够得到的好处是模糊不清的。他们看到的是付出,而看不到回报。这种情况似乎与交换的概念相抵触,而自由主义的市场概念是以这种“交换”概念为基础的。纳税情结的表现证实了这样的假设:它既取决于深层的人格因素,又取决于一个人对自己的收入被剥夺而未见回报所产生的不满。要知道,纳粹是很懂得如何利用纳税情结的。在他们统治的头几年中,由戈林牵头公开推出了一种所谓的“纳税赦免”政策。后来,当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比以往更加沉重的赋税时,他们却巧妙地将此加以伪装,用诸如慈善事业、自愿捐款等形式推出,通过非法威胁而非官方的税务立法收集到大量金钱。

反对征税的例子如下:

编号为 M105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男子,一个过激的反犹太主义者。他说:“正是因为我们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南美洲,所以我们被一些国家视做傻瓜。”

编号为 M345 的被试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一个雷达工程师,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他认为:

(你对政府控制企业是怎么看的?)“它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公民的赋税太重了。”

纳税情结不只限于高分者。编号为 M116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男子,一个世俗的保守主义者。他反对偏见,赞同其父亲的观点,接受他的共和党人立场:“我和我的父亲都反对征税。”

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失业使得高额征税更为必要,而这时人民的收入也已缩减,这种情结无疑会起到特别危险的作用。面对这样的形势,一个不强行征税的政府会垮台,而在征税方面采取强硬措施的政府将会与一些原本支持它的团体发生对抗。我们的访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施的。

#### (四) 外交政策和苏联

就我们的被试而言,他们在外交政策领域比在其他领域更加缺乏信息。他们对国际间的冲突并不清楚,夹杂着对个别议题的片断了解,因此正如编号为 F340B 的被试所集中体现的那样,他们的情绪表现大多是沮丧、焦虑和不满。这个被试说:“看来,我们没有什么外交政策。”

上述心态很容易被报纸所利用。报纸上的言论是由专栏作家写的。这些专栏作家把我们的被试缺乏安全感和方向感说得更为严峻。

编号为 M711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者。他的陈述如下:

(这个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难以回答……也许,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适应世界……对我来说,我关注在中国发生的事……如果我是四大自由火炬的携带者,那么我认为我们在中国和印尼的行动有点不一致。”

上述观点取自报端而非自己的思想。不过,应当指出,它属于低分者的反帝国主义的范畴。

政治不安的象征是原子弹,人民对此感到恐惧。对原子弹的看法把高分者与低分者区分开来了。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高分者强调原子弹的威慑作用。

编号为 M662A 的被试是圣·昆丁的囚犯,他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

(目前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原子弹。如果其他国家得到了它,它们就会用到我们头上。我们要提防苏联。虽说我支持苏联,但是我认为他们迟早会与我们打仗。”

被试对毁灭性的战争抱有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似乎那是一场自然灾害而非人类所为。这与我们在临床中了解到的男性高分者的心理被动性是相一致的。

低分者意欲把原子弹宣布为非法,或者公开它的秘密。

编号为 M627 的被试是一个酗酒的性骚扰者,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

(目前政府面临的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我认为是原子弹。”(如何解决呢?)“嗯,应当把它宣布为非法……”

编号为 F515 的被试自称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她呼吁国际对原子能加以控制:

“杜鲁门不想放弃原子弹,而我认为应该放弃。”

尽管被试的总体思想是害怕战争,但是高分者的态度表明,他们一方面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对制造战争表示了某种潜在的同情。例如,编号为 5003 的被试是一个得高分者,具有高度的神经质特征。他认为:“为什么我们不应该有另一场战争。我们都是动物,我们都有动物的本能。达尔文早就说过,那是‘适者生存’。我相信人们在精神上可以建立兄弟关系,但是毕竟强者为王。”

上引的“为什么我们不应当有另一场战争”,表明了与“精神上建立兄弟关系”的矛盾。运用达尔文的“适者生存”,目的是为了文饰赤裸裸的侵略性。尽管它借用了进步的理想和启示,但却为美国“自然主义”的法西斯潜力所利用。

编号为 5009 的被试是加利福尼亚州某镇上的一个 32 岁的校长,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不存在无战争的世界,而且下一场战争是与苏联开战:“美国始终把自己放在反对独裁的位置上。”

被试表明了其典型的高分者态度(在心理上与愤世嫉俗和对人类的鄙视相联系),也即认为美国为了维护民主、反对独裁而发动战争是正确的。

前面提到过的 5031 也赞同战争。他是一个富裕的建筑承包商。在他看来,我们最好现在就与苏联打仗,并且制服它。

这里,高分者所持有的愤世嫉俗(把对人类的蔑视和潜在的破坏性融合起来),是在未加审视的情况下表达出来的。由于私下的心理冲动很难为常规的人道标准所接受,于是就借国际政治领域而得以释放,因为那里存在的是集体主义的需求,而非集体主义的超我。

认为战争无法消除的假设(用有些被试的话说,只有当军人管理联合国组织时才有希望消除战争的假设),是与行政的准技术主张相融合的。不论是“摆脱战争”还是“制服苏联”,战争与和平成了技术上的权宜之计。

至于其他一些政治题目,例如对苏联的态度等,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其本身并不构成对高分者和低分者的区分。首先,存在一种对苏联的“假低分”态度,它与高分者普遍地羡慕力量是一致的,而且只有当苏联的军事力量被作为参照因素而予以考虑时才会表现出来。一旦苏联的力量被视做潜在的危险时,它

又转化为敌视。这种情况发生在圣·昆丁囚犯 M621A 身上。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他通过人格化表达了其真正的反苏情绪:

(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什么?)“我认为是苏联(被试担心由于原子弹而迟早会与苏联开战)。苏联想控制中国的领土,美国和英国也是这样。”(你最不喜欢苏联什么?)“哦,它太具侵略性了。当然,他们也做了一些了不起的事情,例如五年计划、自我教育等。苏联教育人民养成在艰苦条件下坚持下去的耐力。”(你对苏联的感觉如何?)“我遇到过许多苏联人,我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太傲慢。”(你的意思是指什么?)“他们喜欢自行其是(被试主要在中国上海遇到过一些苏联人,其中大多为苏联商人)。他们实际上相信‘篡夺’。他们不很干净……以前我对苏联人没有十分明确的看法。”

可以指出的是,被试对苏联的态度接近某些反犹的定型。不过,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事实上他老婆就是犹太人。看来,在此背景下的反苏主义可能是一种置换现象。

不过,还有一种“真正”低分的反苏态度,它建立在厌恶极权主义的基础之上。例如,编号为 M204 的被试是一个精神病诊所的病人,患有焦虑性神经症。访谈者称他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和平主义者。他在所有量表上都得低分。他对苏联抱怀疑态度,不赞成他们的极权主义方式,但是对他们的“有趣实验”颇感兴趣。

另一个例子是 M310。他是大学在职人员班的一个自由主义者,某广告社的副经理。他在所有量表上都得低分。他的批评涉及形式上的民主,与此同时,对苏联政府的寡头政治表示厌恶:

(你怎样理解民主?)“人民应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纳粹德国和苏维埃之间存在差别,苏联是民主的。我认为没有必要采用投票制度,尽管我喜欢民主选举……”(你是在批评苏联吗?)“我不赞成把政权集中在少数几个人手中。”

有时,低分者的这种批评表现为不赞同美国共产党,因为该党全盘接受苏联的政治。

编号为 M203 的被试是一个教师,一个“不太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他说:

“让具有理智的自由主义者来领导是件好事,不能让激进主义来领导,后者是不好的。”(能否举个例子?)“哦,像我们国家里的共产党。他们不理智,太激进,而且有许多做法效仿苏联。”

应当指出,该被试是一个直率的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让比尔博(Bilbo)呆在国会里是件不光彩的事。”

至于在低分者中间发现的亲苏态度,也是不能忽视的,因为它具有机械的观点。这里,定型的成分在低分者中间清楚地得到显现。编号为 M713A 的被试很说明问题。他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军人,研究风景建筑,在所有量表上均得低分。

(你认为苏维埃怎样?)“一个了不起的社会实验……我相信它在数年内将成为最强大的国家。”(你是否同意共产党的路线?)“就方式方法而言,他们有点太暴力了,尽管我了解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应该更接近它一点……只需花 100 年的时间,进入共产主义就会像进入军队那样容易——我们也要朝那个方向努力。”

被试的思想是否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还是值得怀疑的。应当指出的是,把社会主义视做一种“实验”,此类思想产生于中产阶级的“常识”,借以取代传统的关于阶级斗争的社会

主义概念,而且还含有一种冒险的意味——也即主张美国可以尝试社会主义,改变现存的财产关系。问题是,这种思维模式与该被试所赞同的社会理论是不相一致的。看来,他像其他被试一样,极少探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和特定的苏联问题,而是以相当概要的积极立场来使自己获得满足。

接下来就是“强国”概念了。这种想法在低分者中间并不少见。换言之,被试对苏联的积极立场可能与苏联在战场上的胜利和在国际竞争中的胜利有关,而不是与苏联的制度有关。这一点已由编号为 M619 的圣·昆丁囚犯予以证实。他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他不相信任何一种理想的世界:

“哦,毫无疑问,苏联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最近几年,他们上升到了强国地位,而且比其他国家取得更大的进步。”

我们把被试对苏联的态度归纳如下: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存在构成了一种不安的根源。这种制度的崛起和存在,尤其是它废除了自由企业,对被试来说,既是对这个国家文化基淮的威胁,也是对“美国生活方式”的一种威胁,并且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经济和自由主义政治。另一方面,苏联的胜利,尤其是它在战时的表现,有力地冲击了美国的信念。它告诉人们,所谓的价值观念可由结果来鉴定,可由它的“作用”来测试,这种理念本身就是深刻的自由主义思想。被试在处理这种评价时,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对高分者来说,苏联与他们的参照构架不一致,所以应当予以废除,因为它属于外团体,从心理意义上说属于“异端”(甚至苏联已经取得的成功事实也服从于这种幻想)。于是,苏联的力量被夸大,具有一种模棱两可的含意,并与“犹太力量”的定型相比较。对低分者来说,苏联并

不“异端”。这种态度在现实中有其基础。但是,他们设法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例如采取“欣赏”的态度等。当他们表示对苏联的直率的同情时,他们会把苏联的制度描绘成比实际情况更加无害的和民主的东西,或者视做一种拓荒者的冒险,由此使人想起美国自己的传统。不过,低分者的亲苏心态具有间接的性质,它不是作为一种“我们的事业”来感受的,而是作为一种对理论思维和道德反映的认同。他们对苏联的评价是期盼和犹豫相混合的,既包含一种赞赏苏联进步的成分,又包含一种担心美国落后的成分。

#### (五) 共产主义

在被试心中,苏联情结是与共产主义情结密切地联系着的。由于共产主义在公众的心目中不再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式,因此这种联系就越发变得自然了。问题是,被试的共产主义情结是与苏联政府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相结合的。在我们的样本中,几乎找不到把生产资料国有化作为共产主义纲领的陈述。

高分者的共产主义情结是把共产主义视做“怪物”。他们的概念不仅在内容上空洞,而且容易转化成各种敌意的投射。实际上,高分者的思维具有这样一种显著的特征:共产主义的概念是模糊的,它的形态是未知的,它的力量是不可预测的。

上面提到过的杀虫剂专家 M108 就具有这种情感的原始表现形式。他是根据民族中心主义来描述共产主义的:

(你为什么反对共产主义?)“哦,它是外国的产物。尽管我尊重社会主义者,但是共产主义者来自外国,这里没有他可管的事。”

另一个高分男子是编号为 M664B 的被试,一个非理智的性骚扰者,属于圣·昆丁被试组。他未受过教育,在所有量表上均

得高分,并把共产主义与战争危险联系起来。

“如果劳工获得更强大的力量的话,我想他们是会喜欢苏联的。这就是引起战争的原因。”

上述两个例子包含着非理性的成分,它们表明在谴责想像的共产主义方面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可以依靠哪些心理资源。如果对这些态度进行论证的话,正如编号为 M664B 的被试所陈述的那样,他在区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时,真正的用意是对劳工的敌视。

低分者与此不同。编号为 M910 的被试是一个低分的学生部长,他的观点如下:

(你如何看待苏联政府?)“我认为在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是有区别的。1936 年宪法是一个了不起的文件,因为它保证了社会的权利而不只是个人的权利。”(你反对苏联的主要依据是什么?)“嗯,首先,我认为苏联在联合国常说‘不’,他们需要这种权利,他们得到了它。我们还以为我们在领导联合国,其实我们在愚弄自己(被试强烈地反对欺骗性外交)。”

高分者认为共产主义不够个人主义化。他们所用的措辞表明他们主张独立。……

编号为 5008 的被试是一个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杰斐逊后代。他的回答使人想起了一个关于男孩的故事。当有人为该男孩提供酸味的菜肴,并且问他是否喜欢时,他回答道:“好极了,不过,我想当我长大以后我会喜欢它的。”在被试的心目中,共产主义对别人是件好事,尤其对“那些外国人”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他们输出共产主义。不过,“共产主义也许能在苏联有所作为,但它在这里肯定是会彻底失败的。”

编号为 M115 的被试是兄弟会成员,一个得低分的男子。他声称“不需要马克思主义。但是,它在贫穷的国家里,例如苏

联、德国等,是有市场的。美国不需要它。我们已经拥有许多东西,我们已经发展了”。

当访谈者告诉他,集体主义经济在工业高度发展的国家更易推行时,他并未为这样的主张所打动。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确实可以通过更具效率的组织来提高生产力,但是他害怕这样做会危及市场经济。

编号为 M1206a 的被试来自海事学校组,一个极低分获得者。他认为,“尽管我们不能把苏联的制度移植到我们的国家里,但是,苏联的政府制度是十分理想的,美国最终也会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被试对美国共产党也表达了立场:“哦,我对它了解得不多。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成为共产党员,那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还是他的责任……他的言行要使别人信服……我认为苏联会不失时机地成为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斯大林虽然有点残酷无情,但是……”

有时,这种论点会与下列思想混淆在一起,即认为社会主义不切“实际”,它的存在纯粹是为了经济原因。编号为 F359 的被试是一个得高分的政府部门财会人员,她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行得通,但在这个国家行不通,尽管它在这个国家有其势力。她信奉私有制和私有企业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比苏联的制度更有效。她对政府控制公共设施(例如供水等)不以为然,认为它们在私有制下面也许运作得更好,也就是成本更低。

其他被试也表达了同样的论点。例如,编号为 M107 的被试是一个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但在法西斯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的医科学生。他说:

“我们能与苏联合作,但是他们有权选择共产主义,我们有权选择我们的制度。”

这种自由主义的方法论(附带说一句,希特勒就是在张伯伦的不干涉政策下获益的),并不像它所表现的那样宽宏大量。它还隐含着这样的信念,即政治上无所谓客观真理,每个国家像每个人一样,可以随心所欲,惟一算数的事情是成功。正是这种政治的现实主义最终界定了法西斯主义的哲学。

显然,由我们的量表所测得的反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地简化。在我们的早期研究中,反犹主义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相关是很高的,<sup>[9]</sup>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天这种相关不会很高了,至少从表面上看是这样。这是因为,最近几年,美国的宣传机器从一种非理性的“恐惧”意义上致力于营造反共产主义的情感,除了美国共产党的追随者外,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这种连续的思想压力。与此同时,公开的反反犹主义通过报章、杂志、书籍和电影也已形成一种气候。这种相关的降低表明了政治宣传的极端重要性。

## 注 释

[1] 本章为阿道诺(T. W. Adorno)所撰。

[2] 在本研究完成以后,本章作者才开始读到冈拉克(R. H. Gundlach, 46)写的有关文章。

[3] 这种情况在讨论有关犹太人的意象时已经指出过了(参见第十六章)。

[4] 正如被试所表述的那样,人格化具有明显的法西斯主义潜力。它强化了个人反对民主控制的意识。在谄媚“伟大人物”的背后,是一种“追随领袖”的心理状态。

[5] 本案例将在第二十一章以“罗纳德”名义详加描述。

[6] 从社会学角度说,这种以纳粹德国为背景的伪医生的表白,是与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失去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的上升愿望相联系的。从心理学角度说,它们是与纳粹思想的偏执性相联系的。看来,强调“血统的纯粹性”与强调“人格的纯洁性”,两者之间有着一种直接的关联。

希特勒创造的第一把学术交椅是“自然痊愈”的交椅。希特勒的私人医生就是一个江湖郎中,也是纳粹第二号人物希姆莱(1900~1945)的按摩师,而鲁道夫·赫斯则鼓励各式各样的迷信疗法。应当指出的是,相似的倾向在美国的“疯子”中间也有表现。在美国,不切实际的鼓动家把犹太人的欺诈与“健康食品”运动联系起来,表面看来他们的矛头指向“美味佳肴”,实际上则是指责犹太人。

[7] 参见奥托·芬尼奇尔(Otto Fenichel)的著述。

[8] 这一观察与我们在纳粹德国看到的情况是相一致的。在纳粹德国,人们曾以窃窃私语的形式广为传播关于党的等级的各种批评和笑话,而希特勒则似乎与此批评无关,因为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评论:“元首不了解这些事情”——甚至在涉及集中营问题时也是如此。

[9] 参见莱文森(Levinson)和桑福德(Sanford)的著述。

## 第十八章 访谈材料所反映的 某些宗教思想<sup>[1]</sup>

在我们的研究中,偏见与宗教之间的关系起着相对来说较小的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样本并不包括特定的宗教团体,也不是从诸如“圣经地带”(美国南部严格信奉《圣经》的地区)或爱尔兰天主教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这些城市的宗教思想具有相当的社会重要性)提取的。如果我们的研究沿着目前的思路进行下去的话,则应该涉及这些地域,从中可以看到宗教因素要比目前的研究更易得到揭示。

除了这一限制以外,还有另外一个更为基本的因素:宗教并不像它曾经有过的那样在人们的心理框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它很少有机会成为人们社会态度和社会观念的原因。这种情况已被目前的研究所证实。我们在第六章所获得的量化关系并不特别引人注目,尽管专设了用于宗教的访谈计划,但是还不能说收集到的材料已经十分丰富了。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人们对宗教的冷淡使得他们在这一思想领域比起其他思想领域较少充满情感,而宗教的“狂热”和狂热的偏见之间的传统等式也不再那般醒目。

不过,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密切注意我们在宗教问题上获得的数据,尽管数据比较单薄。一些人在传播法西斯主义和利用宗教传媒方面所起的作用,强烈地提示我们注意这样一个

事实:对宗教的冷淡倾向并不意味着宗教劝说和社会问题之间毫无关联。虽说宗教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容易刺激人们的狂热,可是我们仍然怀疑,人们在深层的无意识水平上对宗教传统、原有信仰和某些派别的认同。

我们的研究方法受制于某些理论考虑,它们是我们整个研究框架的组成部分。为了说明我们观察的内容,指出这些理论所反映的基本东西也许是合适的。

我们从一开始就估计到,宗教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一方面,基督教关于仁爱的教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是与偏见相对立的。这种教义无疑有着历史的条件,那就是承认少数民族“在上帝的眼里”与他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基督教关于自然的相对论,以及对“精神”的强调,是与某些倾向(例如把“种族特征”看做是判断价值的标准,或者根据一个人的血统去断言一个人)相悖的。

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上帝的儿子”的宗教,包含着一种含蓄的反犹太人的对抗性。这种对抗性自圣·保罗(St. Paul)以来一直继续着,并且因下列事实而不断地得到强化:犹太人由于坚持他们自己的宗教,拒绝“上帝的儿子”的宗教,以及《新约全书》将基督之死的责任栽到他们头上。所有这些已由一些伟大的神学家反复指出过,从迦太基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量(Tertullian)和奥古斯汀(Augustine)到丹麦神学家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都曾指出过这一问题。至于基督徒所接受的基督教本身也包含了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它们产生自“上帝是人”这一似是而非的教义性质。除非这一说法能够有意识地用宗教概念来阐述,否则它会助长反对外团体的敌对情绪。正如塞缪尔(Samuel)曾经指出的那样,基督徒对犹太人公开否定“上帝的儿子”的宗教深感不满,然而他们也意识到这种否定态度是以他们信仰的似

是而非的教义性质为依据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反犹太主义的许多理念产生自基督教,或者至少与基督教的动机有关。反对犹太人的斗争效仿了耶稣基督与魔鬼之间的战斗。乔舒亚·特拉亨伯格(Joshuah Trachtenberg)提供了详细的证据,表明犹太人的意象是中世纪魔鬼意象的世俗化。关于犹太银行家和放债人的各种想像,在耶稣把高利贷者从寺院中驱逐出去的故事中有其原型。把犹太知识分子视做诡辩家的看法,与基督徒对法利赛人(Pharisee)的谴责如出一辙。犹太叛徒(出卖耶稣的犹大)不仅背叛了他的主人,而且也背叛了他的整个群体。所有这些思想由无意识的倾向(例如,十字架和淌血)反映出来,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无意识的倾向。尽管这些思想已经成功地“基督教的人道主义”所取代,但是它们的心理根源仍须加以认真考虑。<sup>[2]</sup>

为了评价这些宗教因素对偏见的影响,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基督教目前的处境:它面临一种“冷淡”。这种冷淡使它不再引人注目。基督教既受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影响,又受到科学精神的挑战。基督教的“神奇”成分和基督教信仰赖以存在的基础已经开始动摇。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基督教已被废除。尽管它已经变得虚弱无力,但是它仍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获得的社会功能。这种情况表明,它的教义,它的社会权威性,以及它的各种成分,既有被保持的,也有被抛弃的,如同传统艺术所面临的处境那样。

上述的宗教信仰问题可从编号为M109的被试的陈述中得到证实。他是一个得高分的罗马天主教徒,经常去教堂。他在问卷上写道:“宗教是一种重要的存在,应占休闲时间的2%~5%。”

宗教一度被认为是生活的基本领域。然而,把宗教降为“休

闲”内容,并且分配给它时间,这象征着人们对宗教的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根据M109的陈述,我们也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严肃的信仰与个人的体验开始分离。尽管宗教的某些特征,例如善与恶的对立,禁欲主义思想,强调个人的努力等,仍然具有相当的实力,但是分离使得这些特征缺乏具体的内容,只能以公式的形式出现,譬如严格、不能容忍等。我们可在持有偏见的被试身上发现这些特征。

由于社会变迁,导致人们用非信奉的思想形式保持宗教。然而,虽说它被剥夺了固有的真理,但它逐步转化成“社会的水泥”(social cement)。社会若要维持现状,就需要这种“水泥”,于是它的权威性就有可能被高扬,它的敌视性和否定性就有可能走向前列。宗教转化成社会的遵奉力量,使它与其他遵奉主义倾向相一致。在此情况下,基督教容易被滥用:用内团体成员对该团体的信念是否忠诚来掩盖对无神论者、持异议者和犹太人的仇恨。它会被用来营造一种具有宗派色彩的宿命论氛围,而团体内的成员倾向于形成抽象的内团体—外团体的区分。前面讨论的民族中心主义就具有这种模式。

这些理论阐述并非想成为假设,假设可由我们的研究结果来提供。确切地说,理论只是提供了某种背景,在此背景下,我们的一般观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 一、一般观察

我们的访谈材料支持了这样一种看法:宗教越是世俗化,它就越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相符合。对此问题的说明,可从编号为F5054的被试身上看到。该女性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



高分。

被试似乎接受了一组相当教条的道德密码,致使她感到有些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无神论的青少年”,意欲逃离宗教的圈子。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她之所以想迁离韦斯特沃,主要原因在于她的小女儿可以从此不受那个邻居男孩的影响。那个男孩是一个无神论者,他的父亲对他说“宗教是一派胡言”。为此,她感到沮丧,因为她的女儿也“不想去教堂”。

从上面这段话来看,她赞同有组织的宗教,在宗教问题上愿意成为一名遵奉主义者。基督教的伦理道德被视做绝对的真理,任何偏离都将受到惩罚。

同样的情况也在编号为 5057 的高分男子身上表现出来。被试虽不信奉“个人的上帝”,但却坚持加入教会。

被试认为大多数新教是相同的。他选择了基督教,因为“它要比其他宗教安静”。当他与他的祖父母生活在一起时,他上的是主日学校,而且喜欢教会。他结婚时加入了基督教科学教会,因为妻子及其家庭都是基督教科学教会的成员。“宗教不应该干预基本的生活要素。不过,宗教应当阻止一个人过分沉溺于某种类型的生活,譬如酗酒、赌博等。”

编号为 F103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女子,她说:“我的父母让我自己作出选择,于是我们就都去了教堂。”这里,我们看到被试对宗教内容缺乏兴趣。她之所以去教堂,不只因为“这是她要做的事情”,而且还因为她想取悦于父母。最后一个例子是由编号为 F104 的持偏见的女子提供的。她评述道:“在我认识的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是不信教的。我认识一个家伙,他有点动摇,原来他是一个十分病态的人。”被试似乎想告诉我们,凡去教堂的人都是正常的人,或者至少是属于正常的人。

上述例子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那些以内化形式“考虑”

宗教的个体或团体更易反对民族中心主义。在德国被证明为正确的东西,例如,反纳粹主义的基督教运动,卡尔·巴斯(Karl Barth)的辩证法神学等,在神学的“精英”之外也有所表现。当一个人生活在“中性化”的宗教氛围中时,他实际上在为宗教的意义担心,这一事实表明了一种非遵奉主义的态度。它可能导致反对“正常人”(在这些“正常人”看来,去教堂只是“第二需要”),正如不准犹太人到他们的乡村俱乐部去活动一样。此外,强调宗教的特定内容,而不是强调那些属于基督教的忠诚和不属于基督教的忠诚之间的区别,必然会使一个人关注以世俗的宗教模式为背景的爱和激情的动机。一个人与宗教的关系越是具体,他对那些“不属于宗教”的人的看法就越人格化:他们的苦难使人想起宗教主观主义者的殉道思想是与他关于基督的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克尔凯郭尔在一百年前称之为“官方基督教”的东西很可能是民族中心主义的。尽管他所属的宗教组织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激进的”基督教徒则倾向于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予以不同的展示。

极端的宗教主观主义反对客观主义教会的宗教经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潜在的法西斯精神保持一致。排除任何约束原则的宗教主观主义为权力主义的需求提供了精神气候。此外,将此观点发展到极端的人,其教派精神不仅会导致一种被称做“疯子”的攻击性内团体情绪,而且会导致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这种潜在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构成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特征)。当法西斯主义鼓动家在宗教环境中运作时,宗教主观主义在其思想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sup>[3]</sup>

在那些拒绝宗教的人们中间,存在着许多重要的差别。正如我们的量化结果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尚无法作出非宗教的或

反宗教的人与“低分者”相一致的结论。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可知论者”或“无神论者”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坚持进步的观点。当然,这种“进步”的实际意义有着很大的变化。由于反宗教的进步分子明确地反对偏见,因此当他们接触到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时,他们就出现了分化,有些人成了“标签思想家”,毫无保留地赞同容忍和无神论,有些人则在宗教问题上建构了有着自己看法的自主态度。

此外,一个人是以受压的和反作用的同盟形式来反对宗教,还是以愤世嫉俗的功利主义态度来拒绝一切不现实的和不明晰的东西,两者也是不一样的。我们期望前者相对来说是不持偏见的,而后者则相对来说是持有偏见的。此外,还有一些人属于法西斯式的非宗教人士,他们因宗教幻想的破灭而变得愤世嫉俗,主要表现是谈论自然法则、适者生存和强者为王。法西斯主义的候选人是从这批人中间招募来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可见编号为 5064 的被试(我们在第十六章已经讨论过他)。他是一个男童子军领袖,在所有量表上得高分。当问及有关宗教问题时,他称自己“崇拜自然”,喜欢体育运动和野营。他的综合特征包括:主张泛神论,信奉“权力”,强调集体领导,以及坚持民族中心主义和伪保守主义思想。

正是以这种观察(关于宗教和现代偏见之间关系的观察)为背景,下面的具体问题才能被理解。

## 二、具体问题

### (一) 高分者和低分者的宗教功能

在我们的访谈材料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特征证实了我们关

于“中性化”宗教的假设。这种特征就是把宗教视做手段而非目的。被试之所以接受宗教,不是因为它的客观真理,而是因为它对实现目标(这些目标用其他手段也可以实现)的价值。这种态度表现为被试服从或者放弃自己的判断,而这正是那些追随法西斯运动的人所具有的一种思想特征。他们不是根据理解或相信,而是根据可以利用的价值或武断的决定来接受一种思想。这里,有着纳粹的顽固的、有意识的和可操作的非理性主义的根源,正如希特勒的一句名言所归纳的那样:“一个人可以为自己不理解的思想而死。”这句话就其逻辑而言无异于蔑视真理。如果说一个顾客根据广告宣传的商品而选购了该商品的话,那么一个人也可以照此模式而选择世界观,无须考虑实际的内涵。将此态度用于宗教,必然会产生自相矛盾的情况:一方面,宗教声称自己表达绝对的真理;另一方面,一个人却为其他原因而接受宗教。结果,随着宗教的本意遭到否认,宗教本身也被拒绝了。

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中间,用宗教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是相当普遍的,或者说两者没有区别。不过,在持偏见和不持偏见的被试中间,则在强调的目标和服务的方式等方面存在区别。

高分者要比低分者更经常地利用宗教思想,借此获得某种直接的利益,或者操纵他人。编号为 F201 的年轻女子就是一例。她持有高度的偏见,把定型的宗教作为维护其社会地位和关系的手段。她说她对“稳定的社会”感兴趣,因为在此社会中阶层之间划分得清清楚楚:

“我是在圣公会教会中长大的,上的是女子学校。我的朋友也加入圣公会教会。与基督教科学相比,它具有哲学的倾向,因为它会提高你的做人标准。圣公会的哲学依据新教教会的模式,它适合上层社会。”

民族中心主义的被试常认为宗教对一个人的精神健康具有实际的帮助。编号为 F109 的被试如此陈述：“我不大了解宗教。对我来说，宗教如同神话故事。我不知道我是否相信上帝。尽管人们说存在上帝，但是我仍将信将疑。不过，宗教给了我某些可以依赖的东西，我把我的生活建立在它们之上。”如果宗教仅仅服务于可供“依赖”的东西，那么这种需要也可以由其他东西来服务，例如权威、法西斯主义等。也许，存在着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法西斯主义对那些积极信奉宗教的德国女性特别有效，因为从心理上说，法西斯主义可以实施世俗化和基督教替代物的功能。正因如此，纳粹主义崛起于具有深刻的罗马天主教传统的南部德国也就不是偶然之举了。

编号为 M118 的被试是一个高分者。他在其宗教信仰中显示出武断的成分，并且混合着一些伪科学的陈述：

“我相信上帝的存在。对此，我无法作出解释。达尔文不是说世界是从旋转的气体开始的吗？那么，谁创造了世界？世界从何而来？这也许与教堂的礼拜极少有关。”

这种推理与被试的信教没有逻辑关联。接下来的一段话则是诡辩，它不仅反映了习俗化宗教的不诚恳一面，而且还导致了对人们赞同的价值观的恶意蔑视。他继续说道：

“我相信祷告的力量，即便它只能满足祷告者本人。我不知道是否有直接的交流，但是它确实帮助了个人。正因如此，我赞成它。实际上，我们也处在一个内省的社会，你不妨停下来瞧瞧你自己。”<sup>[4]</sup>

认为宗教对人有益的观点反映了被试自己的需求，因为它可以用于操作的目的。被试一方面把宗教推荐给别人，另一方面却暗示用不着真正认同它。这使我们想起了 19 世纪欧洲中部的牧师，他们一边教导人们说宗教是良药，一边却愤世嫉俗。

同样，在今天的社会里，有些人声称宗教对人有益，但他们自己却在从中谋利。这种宗教态度与那些在纳粹德国发挥重要作用的特征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在纳粹德国，许多人一面私下排除统治的思想，一面却高谈阔论党的领导。具有法西斯心理的人惟有将自己的自我分裂成若干部分才能安排他的生活。其中，有些部分与官方的教义保持一致，而另外一些部分则保护他免遭思想的失衡，并使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这种分裂在未受过教育的人身上变得十分明显。让我们以编号为 M629 的被试为例。他是一个得中间分的男子，在圣·昆丁监狱服刑。他作了下列不同寻常的陈述：

“就我在书籍中了解到的情况而言，我个人认为我相信宗教，但它还没有被界定过。在我看来，宗教对信奉它的人来说具有一种价值。那些利用它的人把它作为一种逃避的机制。”被试用一种非逻辑的方式把宗教看做镇静剂。之所以有此心态，无须心理学的解释，只要借以下事实来说明便可：他已经蹲了 19 个月的监狱。

即便是老于世故的人，有时也不得不对付同样的冲突。例如，编号为 5059 的被试是一个温和的高分女子，她反对无神论，理由是“无神论者的葬礼如此冷漠”，她不承认科学和宗教之间存在冲突，并称这种冲突是一种“恶意的制造”，借此把她的冲突的不安情绪投射到那些“恶意的制造者”身上。这种表现与纳粹的行为相似，他们用批评社会制度的方式来掩盖其对社会的的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低分者也接受宗教。他们接受宗教的目的不在于用宗教来帮助他们坚持内在的真理，而是把它作为一种推动人类进步的手段。这种实用的宗教可从编号为 F126 的被试身上看出。被试是新闻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她在反犹太

义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均得极低分。

“我的家庭成员都是虔诚的信教者。我现在很少去教堂。可是,我十分尊重宗教,并且认为宗教可以发展成某种东西,为人们提供忠诚和相互理解。我们需要某种信仰,但它不一定是宗教信仰。有些人虽然不信宗教,却对他人抱有爱心,只不过这样的人不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宗教态度与上述的外在化态度有着某种共同之处。然而,我们的印象是,当实用的宗教出现在低分者的思想中时,它的内容(或者说它的背景)通常不同于高分者所表达的思想。因此,尽管上述被试认为宗教有益于人民,宗教“可以发展成某种东西”,但是她还似乎暗示着人民需要宗教是为了人道的和理想的目标,以便“相互之间具有更多的了解”,而不仅仅是为了相处得更好或更为有效地运作。虽说低分者和高分者都认为宗教对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影响,但是高分者认为,由于人们脆弱,所以宗教对他们有益,尤其在人们面临外部压力时,宗教可能对他们有益;相比之下,低分者是从内化的角度对宗教进行思考的,将此作为一种消除仇恨的手段,或者作为一种解决内部矛盾、减少紧张的手段。实际上,在我们的低分者中间,没有一个人把宗教作为谋取成功、地位和力量的辅助手段,或者依据习俗价值将其作为一种存在意义的手段。

## (二) 信神,但不信永恒

如同强调宗教的实际应用会导致把宗教的真理与宗教的权威分离开来一样,对宗教内容的理解也服从于选择和适应的过程。访谈材料表明,有选择地信奉宗教的倾向是持偏见者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的一个共同点是:信神,但不信永恒。让我们举两个例子。

编号为 5009 的被试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据访谈者

称,他诚挚地表白自己信教和信神。但是,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对死后的生命如何走向,抱有怀疑的态度。

而编号为 5002 的被试称,他是一个“基督徒”,信神,相信死后还有生命。虽曾怀疑,但认为一种实在的宗教复活或一种新的宗教神话对世界有益无害。

尤为普遍的是这样一些声明,即被试认为自己是信教的,或者说教会信徒,但却不同意“它的某些教义”,包括奇迹、不朽和永生的说法。这种观点证实了一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潜在模式,它的成分已在我们的心理分析中描述过。上帝的抽象概念被视做是父亲概念的一种拓展,而普遍的破坏性在反对不朽的教条中体现出来。具有这种观点的被试需要一个神,将其作为绝对的权威,借此找到服从的对象,而内心却希望个体会毁灭。

构成这种思想之基础的概念乃是惩罚的绝对本质。这种宗教倾向在那些得高分的囚犯被试组里普遍存在(参见第二十一章),这是不足为奇的。

编号为 M627 的被试因强奸罪而判无期徒刑。他在宗教信仰上“遇到麻烦”,因而不相信“存在一种设定的崇拜方式”。但是,他不顾宗教反叛的潜在含意,仍坚持认为“只要一个人相信存在一种比自己更强大的力量,他就应当具有自己的崇拜方式”。

这种力量以外部权威的形式出现,但却具有抽象的性质。这里,除了投射的力量之外,别无他物。

“嗯,我听到过许多人在谈论他们信奉的力量……我也设法在我自己身上找到这种力量。但是,我找不到……我阅读了各种宗教书籍……仍然一片迷茫。”

同样的思路也由编号为 M656A 的被试进行了表述。他因伪造罪而被判刑(我们在第二十一章中用“罗伯特”的名字称

呼他)。

“哦,我对宗教议论得不多,因为我对它并不了解。我信奉圣经,相信有某个人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人都强大……我不常去教堂,但是……我设法以正确的方式生活。”对这个被试来说,无论何种宗教内容,比起力量的概念,比起道德主义的善恶定型来,是微不足道的:

“例如,天主教像我信奉的那种宗教一样好。两者都遵循同样的生活模式,非对即错。”

在宗教问题上,这种“抽象的权力主义”很容易转化成愤世嫉俗,导致一个人对其信仰的东西表示公开的蔑视。当问及编号为 M664C 的被试关于他的宗教观时,他这样答道:

“噢,我对此并不重视……但我信仰上帝,信仰属于上帝的所有东西。那就是一切。”

“东西”这个词是抽象的,哪些“东西”属于上帝,被试自己也不清楚。除了他发誓信奉的对象(这里上帝象征着权力和权威)外,所谓的“东西”是没有的。

这种虚无主义在编号为 M651 的谋杀犯身上得到了清楚的揭示:

“我喜欢宗教基于这样的事实,它能使别人幸福,尽管它并不涉及到我。实际上,你也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圈子里,伪善比比皆是……”

当访谈者问他宗教里哪些东西最为重要时,他说:

“信仰,我认为信仰就是一切。它就是把你们捏在一起的东西。”

当访谈者要求他谈谈自己的宗教情感时,他答道:

“……我认为,当你死去时,生命是短暂的,而永生则是长久的。上帝怎么会为了永生而送你去地狱呢?如果这样做,既不

仁慈也不公正。”

这段话表明,被试在对力量的抽象信仰,对宗教的具体拒绝,对永生的迫切追求,以及对暴力的遮掩之间存在关联。由于这种暴力对身处牢狱的被试来说是一种戒律,于是它被投射到了上帝身上。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全能的上帝概念(一种完全抽象的概念)在 18 世纪是十分盛行的,比起不朽灵魂的教义来(所谓不朽灵魂的教义,具有“神奇”的内涵),它更易于与“科学精神”相调和。这种非神秘化的概念在清除哲学的绝对概念与泛灵论的踪迹这两者时,后者比前者更容易一些。

不过,我们在占星术和泛灵论的嗜好者中间也可以观察到与此相反的倾向。他们虽然信仰灵魂的不朽,但却因为泛神论而强烈否认上帝的存在。因此,对编号为 M651 的被试来说,他的陈述与其以前由于外部原因而承认宗教不相一致,他声称自己信仰占星术,原因是他不信上帝。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态度的最终结果是悲剧性的。

### (三) 不信教的低分者

不信教的低分者和信教的低分者之间的差异与摆脱偏见的理性和情感的决定因素之间的差异是一致的。编号为 M203 的被试具有前者的特征。访谈者称他为“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具有“抽象的理性主义精神”。他的反宗教态度并非像实证主义那样以政治信仰为依据,相反,他是因为“逻辑的原因”而拒绝宗教。他在“基督教伦理学”和“有组织的宗教”之间进行区分,认为前者与他的进步观点相符。他的反宗教态度可能产生于他的反习俗的叛逆行为:“我之所以去教堂,是因为别人期望我这样做。”

这种叛逆由于属于纯粹的逻辑性质而被理性化了。也许,

与某些无意识的内疚感有关。他对宗教的理性批判如下：

“我始终对它抱怀疑态度。我认为它是虚假的、狭隘的、偏执的、势利的、伪善的……无意义的。它违背了整个基督教伦理学。”

这里，宗教既被体验为一种人道因素（基督徒伦理学），又被体验为一种压抑的力量。毫无疑问，这种模棱两可性能在宗教自身的双重作用中找到其根源，而不能单单归因于主观因素。

M203所使用的“伪善”这一术语，既发生在低分者的访谈中，也发生在高分者的访谈中。它通常与教会的组织有关，并与“真正的”宗教价值观形成对照。不过，对伪君子的憎恨可能以两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是作为启示，另一种是作为愤世嫉俗和蔑视人类的理由。看来，使用“伪善”这个术语，像使用“势利”这个术语一样，越来越具有妒忌和不满的内涵。它谴责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借以确立某种评判人的标准。<sup>[5]</sup>与谎言进行斗争也可以作为破坏性动机的一个借口，而这种破坏性动机被假想中的人的“伪善”和“傲慢”理性化了。

这种现象可在民主文化背景下予以理解。把宗教视做“伪善”而进行批判，这种批判在欧洲局限于理性层次，或者遭到形而上学哲学的反对，但在美国却与广泛传播的基督教联系起来。对宗教的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可由基督教传统和科学精神的无处不在进行解释。这种双重文化导致了对宗教的不一致态度，而并不涉及个体的心理结构。

尽管美国崇尚科学，但是宗教气氛仍很浓烈，这一事实有助于解释不信教的得低分者的一般特征：他们的实际“否定”或虚假“否定”。与编号为 M203 的被试一样，编号为 5028 和 5058 的被试均报告说他们“脱离”了宗教。在美国文化中，很少有“生下来”就不信教的人。许多人是在儿时或青少年时期历经冲突才

成为不信教者，这种冲突的动力赞同非遵奉主义的同情心理，从而走向偏见的对立面。

被试若在目前盛行的文化条件下有意识地不信教，提示着他们身上存在某种自我的力量。其中的一个例子是编号为 M202 的被试。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分极低。访谈者称，“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不是法西斯主义者”。

被试在童年时期信教，每星期天与家人一起去教堂，而且他会“跪在街上”为某事而祷告。可是，19岁那年发生了变化。他对教堂里的闲言碎语感到厌烦。那些教友会告诉他“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某个人的情况，还有一些人也会前来作证。他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为什么如此不一致。

在这个案例中，反宗教的态度显然产生自被试对外部干预个人自由的不满，这种情况与基督教相比，亦是美国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这里，个人心理与宗教的矛盾反映了我们文化领域的客观对抗性。

编号为 M310 的被试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陈述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不信教的叛逆例子。尽管被试的父母信教，但是被试本人却拒绝基督教传统。他不承认与父母有什么公开的冲突，而事实上他们的关系十分冷淡。他把与父母的冲突转移到对宗教的不满，从而避免了个人的困难和麻烦。许多思想矛盾都有可能借家庭冲突来掩饰，亦是一个人在理性化水平上表示其敌意的一种手段，以免深刻的情感卷入（它也使一些青少年以恋家为借口来逃避社会的压力和人际的纠纷）。此外，他也有可能以攻击父亲式的人物来表示对自己父亲的不满。不过，应当强调的是，“理性化”这个术语并不意味着“不真实”。理性化是思维的心理活动，它本身既不决定真实，也不决定不真实。理性化过程能否在思想上终止，取决于客观成分在思想所占的

比例。

与那些经历了“消极”转变的不信教的低分者相对照的是那些容易相处的低分者,例如编号为 M711 的被试。他的对宗教的消极态度并不借助对立物突现出来。他相当坦率地承认自己在宗教问题上存在某种混乱。当问到他对宗教的态度时,他答道:

“实际上,我无所谓态度。(笑声)我是没有观点的人。我想我也许被你所谓的宗教问题给搞糊涂了。(笑声)”

看来,他无须拒绝宗教,因为他没有和它过不去。他也没有自相矛盾的迹象,因而也就没有憎恨的迹象。不过,确切地说,他对宗教抱有一种人道的和疏离的态度。他对宗教的看法是容忍,也就是以一种非习俗的方式和消极的选择来表示他的看法,而不是以一种听起来高尚的“理想”来表示他的看法。被试虽然说“现在,我已经意识到自己不能容忍了”,但是他并未利用这种意识来增强自我,而是倾向于把他脱离宗教的行为归因于外部因素:

“如果我继续留在丹佛的话,我也许会去教堂。但是,现在我吃不准,我也不去想它。我并不感到特别需要宗教。”

有趣的是该被试关于祷告的讨论。他承认祷告的心理效应,但是也意识到宗教的这种“疗法”与宗教思想本身无法相容。在他看来,祷告是一种自主的暗示,虽然它能产生某种“结果”,但是“我看不到接收者为何人”。

该被试还作了不同寻常的但又特别深刻的陈述:

“我的宗教好奇心不会持续很久。也许,到那时我对摄影学产生好奇了。(笑声)”

只有运用精神分析的解释才能对上述句子进行处理。好奇是被试把宗教兴趣和摄影兴趣联结起来的一个因素,是他意欲

“了解”事物的愿望的一种升华。摄影之所以成为被试后来追求的目标,是因为它被犹太教和新教置于沉重的戒律之下。

应当指出,被试对无神论的态度与其反对宗教相比并不“激进。”<sup>[6]</sup>他说:

“哦,我对无神论者思考得也不多。事实上,我与一些自称是无神论者的人交谈过。也许,我就是个无神论者。(笑声)我的印象是,职业无神论者是一种花招,譬如,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

也许,这表明温和的低分者对“标签”的怀疑。他意识到任何一种严格的公式最终会堕落成宣传。<sup>[7]</sup>

顺便说一句,被试清楚地意识到 100 年前在《波德莱尔日记》(*Baudelaire's Diary*)中阐述的东西:在一个客观精神属于宗教的世界里,无神论是会被废弃的。无神论的含义经历了历史的演变。18 世纪启蒙运动的冲动在今天看来起着一种分裂的作用,而马蒂尔德·鲁顿道夫(Mathilde Ludendorff)除了屠杀犹太人外,还与罗马天主教徒作战,从而将俾斯麦(Bismarck)的文化斗争传统转化成迫害狂的型式。

#### (四) 信教的低分者

关于信教的低分者,可以参见编号为 F132 的被试的简要访谈。这是位年轻妇女,她从小长于印度,其父母是那里的传教士。她把基督教与具体的容忍思想结合起来,主张“人人平等”。据说,这来自她“与印度人一起生活的经验”。不过,她的教会不可能从她的容忍思想中提取政治结果:

“我不喜欢甘地,我不喜欢激进的人。甘地是激进的,他做了许多颠覆和分裂国家的事。”

她与教会的关系涉及到宗教因袭主义,这种因袭主义通常

与民族中心主义有关。不论她亲近教会还是亲近教义,她的宗教观念具有实用色彩:

“宗教使一个人快乐、满足。宗教给人以心理的平静。这时,你知道你位于何处,有哪些事情可以为之奋斗。至于对后世的希望,我相信永生。”<sup>[8]</sup>

该被试在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她在殖民地长大,“官方的”宗教和自发的宗教以人道主义的名义相结合。她的态度至少在表面上取决于她对内团体—外团体问题的洞察。不过,这个例子也似乎为下列假设提供了某种支持:只有意识清晰的、非习俗的基督徒才有可能摆脱民族中心主义。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样本中,信教的低分者极为罕见。正如上面提及的那样,这是因为样本的构成所致。不过,这种罕见提示了某种基本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分裂成“进步的”和“现实的”两大阵营,它们都可能伴有宗教的倾向。至于现实的思想,与民族中心主义的观点有关。不管这一假设是否正确,就宗教有否可能产生与偏见相反的倾向而言,仍需经过广泛的研究以后才能下结论。

#### 注 释

- [1] 本章为阿道诺(T. W. Adorno)所撰。
- [2] 马克斯·霍克海默和阿道诺(Max Horkheimer & T. W. Adorno)已就基督教和反犹太主义之间的关系进行过详细的理论分析。
- [3] 阿道诺已经详细分析过复兴精神、宗教主观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宣传之间的相互作用。
- [4] 这种态度也可在低分者中间发现。不过,在高分者中间所发现的特征,表明被试未能解决下述两种态度之间的矛盾:一种是对宗教抱以客观性的批判态度,一种是为了纯粹的主观原因而对它抱以积极的态度。这也许就是偏见者的思想特征。面对矛盾,他停止了思考,让其保持原样。这意味着被试对权力主义的屈从。

- [5] 参见第十七章关于罗斯福的一节。
- [6] 温和的低分者很少激进。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会成为走中间道路的人。他意识到概念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性,而且他基本上是非极权主义的。所有这些都是位于他容忍概念背后的东西。
- [7] 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材料可参见第十九章。
- [8] 分析由“信仰”这个词经历的意义变化是一件诱人的任务。它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宗教的中性化。以前的信仰概念主要是和宗教教义联系着的。今天它实际上应用于每件事,被试感到有权作为他自己的东西而拥有,作为他的“意见”(因为人人都有资格拥有意见)而无须使它服从于任何客观真理标准。“信仰”的世俗化伴随着一个人相信的断言:它是按照偏爱一种或另一种商品而形成的,而且跟真理概念极少有关。信仰的这种运用几乎等于平常的“我喜欢它”,它大概失去了任何意义(比较第二章中提供的麦克的陈述“我喜欢历史和耶稣”)。



## 第十九章 类型和特征<sup>[1]</sup>

### 一、研究方法

在当代美国心理学中,几乎没有一个概念像类型学的概念那样被彻底批判过。这是因为,类型学的教义在人格问题上未能提供完整而又科学的研究方法。这种教义主要存在三个缺陷:一是它没能抓住独特的东西;二是它的概括并非统计意义上的概括;三是它不具启发的价值。就人格的动力理论而言,人们发现,类型学的方法以分类为主,把高度动态的人格特征转化成静止的、准生物的特征,并且忽视了历史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就统计而言,人们特别注意到双重类型的问题,其归类的不完善尤其引起争议。至于类型学的启发价值,包括它的交叠,以及构筑“混合类型”等,实际上否认了原先的结构。所有这些批评的核心思想是,人们不同意把类型的概念刻板地或机械地应用于动态的心理现实。

例如,与旧的“气质”学说相比较,现代类型学的发展有其精神病学的根源。人们为了精神病分类的需要,把分类作为一种促进诊断和预后的手段。克雷佩林(Kraepelin)和洛姆布罗索(Lombroso)可谓是精神病类型学之父。由于在将精神病进行划分的同时淡化了疾病之间的联系,因此类型学的分类基础已不

复存在。这种分类常被说成是“行为理论的分类”,它的阐述“倾向于描述、静止和乏味”。如果精神病患者能够按照类型而被精确地进行区分的话(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动力主要根据严格的模式来予以置换),那么,对于诸如克雷奇默(Kretschmer)那样的处理办法还有没有成功的机会呢?难道该处理办法的存在理由是狂郁症和痴呆症的标准分类吗?

关于类型学的讨论,已由安妮·安娜斯塔西(Anne Anastasi)总结如下:

“类型理论已经受到普遍的批判,原因在于它们试图将个体划分成具有鲜明区分特征的类目……这样的过程意味着多重型的特征分布。例如,内倾性格者被置于量表的一端,而外倾性格者则被置于量表的另一端,两者之间的分界应当是十分清楚的。不过,实际的测量反映了所有特征的单一型式的分布,它们与钟形的正常曲线十分相似。”

“与此相似的是,将特定的个体划分成一种类型或另一种类型,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当类型学家面临这种困难时,他们就建议采取中间类型,或称‘混合’类型,以消除两个极端之间的差距。为此,荣格(Jung)提出了一种中间性格的类型,它既不代表内倾也不代表外倾。不过,观察表明,中间性格的类目是极为庞大的,而内倾者和外倾者相对来说则是极少的。例如,我们可以为读者介绍由海德布雷德(Heidbreder)获得的分布曲线。他用一种内倾问卷对200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人们可以预期,大多数分数是中间分,而随着曲线趋近内倾或外倾这两个极端,案例数也同时变少了。曲线没有明显的中断,而是连续地从中间向两端分布。除了内倾和外倾外,个体的其他一切可测特征也是如此,不论它们是社会的或情感的还是理智的或身体的。”

“看来,很清楚,由于类型的理论意味着将个体按类划分,因

此它们在大量无可辩驳的数据面前是站不住脚的。然而,这样的假设不一定是所有类型学所固有的。与原来的概念相比,有些类型理论具有大众版和修改版的特征。可以肯定,类型心理学家试图对个体进行分类,但是这种分类并非他们理论的主要部分。此外,他们的概念也经过充分的修改,以适应特征的正态分布。”

我们暂且不论这些类型理论与早期类型理论的区别,应当看到,从“名义上”排斥类型学的分类已经取得这样的胜利——它几乎等于一条戒律。这条戒律与众多精神病学家所推崇的概念密切相关,也就是认为精神病基本上是不可解释的。如果我们假设,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已经成功地地为许多精神疾病建立了动力图式,致使它在个体的心理生活中变得更具“意义”,那么类型学的问题将需重新予以界定。

毋庸置疑,对心理类型学的批判反映了一种人道的“冲动”。这是因为类型学会被一些人用来对人们所属的阶层进行分类,而这种分类在纳粹德国达到了顶峰,也就是不顾人们的特定品质而给他们贴上“标签”,这种“标签”决定了他们的生死。奥尔波特(Allport)曾特别强调过这种动机,而博德(Boder)在其“纳粹科学”的研究中也详尽地指出了阶层分类的社会效应。看来,由于存在类型学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偏见时应该特别谨慎。可以说,有些人之所以强调社会阶层的划定,也许与其潜在的法西斯人格有关。这里,我们不妨提及那些具有爱尔兰血统的高分者,他们把自己的个人特性归因于他们的民族血统。贾恩施(Jaensch)曾经提出过“反类型”的概念,认为它是投射结构的一个范例。在我们的高分者中,这种投射结构已被有效地建立起来。贾恩施的分类基本上是非动力的、反社会的和准生物学性质的,它既与我们的理论对立,又与它的实证结果相悖。<sup>[2]</sup>

不过,所有这些反对意见并不等于解决了类型学问题。而且,也不是所有的类型学都将人类分成公的和母的,或者美的和丑的。相反,有些类型学反映了某些观点,尽管还非系统化,但却使我们想起了某些理论,譬如克雷奇默、荣格和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应当指出的是,弗洛伊德强调心理动力,并于1931年发表了他的类型学。虽然他没有在方法论上花多大力气,但是他却从基础类型中建构了“混合的”类型。正如奥托·芬尼契尔(Otto Fenichel)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根据正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这种分类是值得考虑的。我们只须看一下唐纳德·麦金农(Donald W. Mackinnou)在其《人格结构》(*Structure of Personality*)中关于双重类型的描述,便可获得一种印象,即类型学不是武断的,它没有违背人类多重性的事实,况且它在心理现实中有其基础。

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是理性的,它并非一种静止的生物学方法,而是一种动力的和社会的方法。人类社会分成阶层,而社会压抑的标记深深地印在人们的灵魂之中。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默(Durkheim)曾经系统地描述过等级的社会制度是如何渗入到个体的思想、态度和行为中去的。除了“社会阶层”的印记之外,人们还被烙上各种“心理阶层”的印记。在我们的被试中,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相对分化性从心理学上讲反映了不断增加的可辨性。根据这种可辨性,我们的社会可以粗略地分成两个原始的对立阵营:个人主义和非个人主义。两者都是社会思想的折射,只不过前者以个人的利益和好恶来进行分类,而后者则是根据人们自身的特征来进行分类。换言之,对类型学的批判不应忽略下列事实:从传统的19世纪哲学意义上讲,人从来不是作为“个体”被评价的。“标签思维”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人的思想受制于“标签”,或者说受制于一种定型的社会分层。看来,同

样是类型学,它们的基础却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必须探究决定着社会分层的心理类型,因为我们是带着我们的心理活动生活在分类世界中的,由此产生的不同“类型”的人,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区分。

建构心理类型学并不意味着把某种“秩序”带入多样化的人格领域。实际上它是对这种多样化进行“概括”的一种手段。正如弗洛伊德在其基本陈述中已经界定的那样,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是有意义的。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摆脱个案表现的束缚,深入到对心理事实的描述。也就是说,超出个案案例,从反复发生的心理事实中揭示一组特征,它们相当接近于“类型”的概念。例如,那些具有强迫性质的主张,尽管产生于个案研究,但是,不论它们的表现多么“独特”,它们只有在满足下述条件时才是可信的:在个人动力内部所发现的结构属于这样一些基本的群集,它们被期望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排斥类型学是不合逻辑的。

在我们的研究领域,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反映,那就是实用主义的反映:科学为我们提供了反对法西斯主义潜在威胁的武器。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威胁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已是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对持偏见的人进行心理“治疗”是困难的,一则因为他们数量很大,二则因为他们并非真正“有病”。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在表面水平上要比不持偏见的人得到更好的“调节”。不过,由于现代法西斯主义没有群众基础是不可能死灰复燃的,因此了解其追随者的人格就显得特别重要了(不考虑追随者的主观因素就不是一种现实的态度)。也就是说,鉴于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威胁在群众中有其基础,所以被试的心理反应方式会因该潜在威胁作用于特定团体的方式的不同而不同。可以认为,我们的发现是,法西斯人格的

某些基本变量可作明显的社会区分,而这种区分实际上是一种心理的区分。持偏见者和不持偏见者的心理活动都是有“类型”的,即便我们在习俗的反犹分子和施虐—受虐狂的“家伙”之间进行区分,也都是以代表性的表现为依据的,而非以个案表现为依据的。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以下列三种标准划分类型:

1. 我们的类型既非依据传统的类型划分,也非依据想像的类型划分。我们的类型是借助类型的名义来组织特征或倾向,或者说将这些特征或倾向分别归入相应的背景中去,以表明特征或倾向与背景之间具有某种意义的关联。我们认为,这样的归类是科学的,因为它把特征或倾向与决定特征或倾向的背景结合起来,根据两者的因果关系来寻求对潜在动力的心理解释。这一标准基于下述假设:用以归类的特征不是偶然的表现,而是有意义的表现,或者说具有代表性的表现。类型意义的一致性表明,所有的特征都可从潜在的心理冲突的基本形式中得到诠释。

2. 我们的类型是依据社会功能来进行分类的类型。例如,一种刻板的类型意指社会定型或“标签思维”(例如高分者的定型判断和传统思想)。这里,我们的类型存在二分法:被试是以“标准化的思维”进行思考,还是以“个性化的思维”进行思考。二分法在高低得分者之间作了区分。高分者大多以“标准化的思维”进行思考,而低分者则大多以“个性化的思维”进行思考。不过,进一步的观察发现,有些低分者也会用“标准化的思维”进行思考,或者说他们也会不明智地表达他们内部的法西斯主义潜力。<sup>[3]</sup>

3. 我们的类型是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建构的,也就是说,揭示思想的“原始”结构(心理动力),而个体之间的差异则很少

起作用。这好比精神病院的一些做法。在精神病院,如果不把病人分成狂郁症患者、精神分裂症患者或偏执狂患者等,治疗就无法进行。尽管精神病医生也充分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随着治疗的深入,这些区分很可能会消失。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从被试的陈述深入到他们的心理动力,那么我们会发现“原始”的结构(或者说基本的里比多)。我们可以用艺术史的相似性来说明这个问题。罗马式建筑和哥德式建筑是有区别的,其原始的区别在于圆形的拱门特点和尖形的拱门特点上。问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许多建筑是较难区分的,因为上述两种特征是交叠的,从而掩盖了两种风格之间更为深层的结构对照。正因如此,我们最终仍须恢复原始的分类,即用拱门特点来界定某个特定的建筑是属罗马式还是属哥德式。在我们的被试中也存在某种相似的情况。例如:“你能否列举持偏见者的具体表现?”这样的问题显然要比我们根据前生殖器发展阶段或生殖器发展阶段来解释类型更能公正地对待分类的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还原,它们能够通过社会标准与心理结构的结合来实现(这里的社会标准既可指被试的社会身份,也可指他们的社会目标、态度和行为模式)。把心理结构与社会标准联系起来的任务已在我们的研究中得到了贯彻,因为我们的许多临床类目(例如遵奉惩罚的父亲)是与社会态度(例如为了权威的缘故而遵奉权威)密切关联的。因此,我们可以为了分类的目的而将许多基本的心理学概念“翻译”成与其十分相似的社会学概念。

上述考虑是由我们的研究性质所决定的。我们的类型(或者说特征)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组织的,以便使它尽可能“自然地”适合我们的实证数据。应当指出的是,我们的材料(尤其是问卷和访谈)并非取自真空,而是依据我们的分类设想取自现实

生活。正是由于我们的假设是以精神分析理论为背景的,所以我们才能根据特征对被试进行归类,而非根据特征对被试进行“分析”。也就是说,我们根据从精神分析角度上讲有意义的特征来对它们进行归类,而不是根据深层心理的动力模式来对它们进行归类,尽管后者在我们分析特征的原因时是需要的。

在将下列类型置于我们的假设之中时,我们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开头所说的法西斯量表基本上属于单一的“特征”。由此得出的一个结果是,“高分特征”属于一组特征,它与各种“低分”特征是可以区分的。此外,还存在着诸如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人格,它们本身属于一个“结构单位”。换言之,像习俗性、权力主义屈从、攻击性、投射性、操作性等特征通常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们这里所勾勒的“次级特征”并不是想“孤立”这些特征。它们在高分者身上是可以看到的。将它们进行区分的东西是那些用来表示特征的动力因素。在我们看来,鉴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结构的相互联系性质,应该说它们是“动态”的,也就是说,只要通过分析某些特定因素的增加或减少,就可以看到从一种态势过渡到另一种态势的变化。问题是,就我们目前的研究而言,我们还没有对一组特征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将一组特征进行归类的原则是它们的刻板性、定型和缺乏移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代表了动态的“量表”。要知道,它们属于潜力,而非公开的偏见。

实用主义的要求还使我们发现高分者要比低分者更加“类别化”,致使我们把兴趣集中在持偏见的被试身上。然而,我们也认为有必要构筑低分者的一组特征。我们的研究方向引导我们去强调心理的决定因素。可是,我们不应忘记,偏见决非完全是心理上“主观的”现象。我们在第十七章已经指出:“高分”思想与我们社会的客观精神有关。由于不同的个体会因不同的文

化刺激作出不同的反应,因此我们若想了解个体的态度,偏见的客观成分是不能被忽视的。我们不能问“为什么这个人或那个人是民族中心主义的”?而应该问“为什么他对这种刺激作出积极的反应,而对那种刺激却作出消极的反应”?潜在的法西斯人格被认为是偏见的文化氛围和一个人对这种氛围作出“心理”反应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前者不仅由原始的外部因素所组成(诸如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而且还由属于个人的观点、主张和行为所组成(它们既不产生于个体的自主思维,也不产生于他的过于自信的心理发展,而是受制于他所处的文化)。尽管这些客观模式对个体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但是它们却有助于我们解释为什么一个人会拒绝这些客观模式或为什么一个人会接受这些客观模式。换言之,低分者的心理问题与高分者的心理问题一样,我们只有了解低分者的心理问题,才能把握影响偏见的客观因素。正因如此,确定“低分”特征就显得十分紧迫了。根据我们的研究原则,它们是以下述方式被选择的,只不过比起“高分”特征来它们是更加松散地联系着的。

即将讨论的特征是逐步发展的。我们使用了社会研究院制订和出版的计划,在对其略作修订后用于低分者身上。修订后的计划更加强调心理因素,特别在洛杉矶样本中。对于这些样本,访谈者尽可能确定他们的案例研究结果与假设的类型之间的关系。这里提出的特征便是该修订计划的结果。应该说它是在我们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被修订的,也是在不断的理论批判的基础上被修订的。然而,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它们仍须重新根据可以量化的标准进行界定。现在提出的证据基于下列事实,也即它们可以充当未来研究的向导。每组特征都由一个特定案例的陈述予以说明,它们主要依据被试的访谈报告。

## 二、高分者的特征

若干类型的特征在其被提出之前已经得到过描述:(1)“表面不满”是根据积极的或消极的社会焦虑而被确认的。我们的访谈对心理固恋或防御机制不作任何暗示。(2)“习俗的”模式是以接受习俗的价值观念为标准的。对这些被试来说,超我尚未得到确立,个人主要受制于外部的支配。最为明显的潜在动机是害怕“不同”。(3)“权力主义”类型是由超我来支配的,而且超我不断地与强大的、自相矛盾的本我倾向进行斗争。被试害怕自己成为弱者,其行为被这样的恐惧所左右。(4)在“反叛者”中,受压抑的本我倾向占据上风,但是它们却以受阻的和破坏的形式表现出来。(5)“怪人”类型和“操作”类型是通过自恋(退缩到他们的内在自我中去)来解决恋母情结的。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易变的。怪人主要通过想像的内部世界来置换外部现实,他们的主要特征是投射,而他们的主要恐惧是怕自己的内部世界由于接触可怕的现实而被“玷污”,所以他们被沉重的戒律所困扰。与此相反,操作者则是将外部现实降低至一种行动的目标,借此避免精神疾病的风险。他们也无法从事任何积极的移情。他们甚至比权力主义者更具强制性,而且其强制性完全是自我分离的,也就是不现实地将外部力量转变成一种超我。他们把拒绝爱的冲动作为最具效果的防御。

在我们的样本中,习俗的类型和权力主义的类型是最常见的。

### (一) 表面不满

这里讨论的现象与后面区分高分者和低分者的各种“类型”

并不处于同样的逻辑水平。事实上,它本身并不属于一种心理“类型”,确切地说,就它们可以与深层的无意识相区别而言,它们是理性的或有意识的。可以说,许多高分被试因其具有或多或少理性的动机而被归为一类。当然,也有少数高分者则缺乏理性的动机,或者说理性动机不合逻辑。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高分者能用某种理性来陈述偏见就表明他们没有法西斯人格的心理机制。我们在下面所提供的—个女性被试的例子表明,她不仅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高分,而且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她的偏见观点具有代表性。我们认为,这种偏见观点的背后隐藏着一种起决定作用的潜在的人格倾向。可是,我们仍然感到,尽管“表面不满”的现象受到深层的心理因素的影响(在我们的讨论中是不应当忽略这些因素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低估对法西斯潜力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因素。

我们在这里所指的一些被试常从外部接受偏见的定型,把它们视做一种现成的公式,借此从心理上摆脱他们面临的困境。由于他们的人格属于高分者的人格,因此偏见的定型本身并未太多地被里比多化,而是保持着某种理性的或伪理性的水平。他们的经验与他们的偏见之间并不完全断裂,两者可以相互对照。这些被试能为他们的偏见提出各种理由,从而引发理性的论争。这里,可被归类的是那些永不满足的和咕咕啾啾的父亲:如果有人因他的破产而代他受过的话,他会很开心;如果他能从反对少数民族的歧视中得到物质利益的话,他会很开心;如果他能从实际的或潜在的“被击败的竞争者”那里得益的话(所谓“被击败的竞争者”是指小零售商,他们的经济因为犹太人开的连锁店的发展而受到损害),他会很开心。我们由此想到纽约哈雷姆区的反犹的黑人,他们由于不得不向犹太人支付超额的租金而憎恨犹太人。所有这些人分布在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编号为5043的被试是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所有量表上均得高分。她“经常听到街坊邻里在议论犹太人”,而她则是一个“十分友好的中年人”,“喜欢无害的闲聊”,对科学表示高度的尊重,对绘画具有严肃的兴趣。她“对那些身着佐特服饰的人参与经济竞争感到害怕”,而且“对黑人持有同样强烈的态度”。她自青年时代以来在社会地位和经济发展等方面相当倒霉。她的父亲是一个极其有钱的牧场主。

她于1927年嫁给了现在的丈夫,那时他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婚后的家庭经济条件很好。但是,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和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她不得不为生活而奔波,最后甚至与她富裕的婆婆一起搬家。这种情况引发了一些磨擦,同时也使其减轻了不少责任。被试把自己归入中产阶级,从而在上层阶层的背景和中产阶级的地位之间取得平衡。但是,她不容许这种情况进入她的自我,而且对金钱和地位的丧失很痛苦。她的反犹偏见可能与她害怕经济水平降低直接有关。

据访谈者称,被试之所以得高分,是因为她“持非批判的态度”(她始终“同意”问卷上的问题)。至于法西斯主义的偏见,在访谈过程中没有出现。

她不受严格的纪律约束,相反,她的父母对她的意愿一再予以让步,而她则成了他们的宠儿。家庭成员之间从来没有过磨擦,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

她为什么会作出“表面不满”的反应?原因可在她对待民族问题的态度上找到。她对“所有少数民族团体均表现出十分强烈的偏见”。而且,“认为犹太人是—个问题”。她的定型追随“传统模式”,这种模式是她机械地从外部吸纳的。

在她看来,所有犹太人都表现出共同的特征,他们之间无法通过外貌或其他特征予以区分,除了他们大声嚷嚷和咄咄逼人

以外。

最后一段引文表明她并不认为那些犹太人的特征是与生俱来的。它既不涉及投射,也不涉及破坏性惩罚。

她认为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最佳办法是同化和教育。

她的咄咄逼人显然指向那些可能“从她手里夺取东西”的人,不论是经济上的篡夺还是地位上的篡夺。

她既对那些搬入社区的犹太人公开表示敌意,也对那些“经营电影”的犹太人公开表示敌意。她害怕犹太人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尤其对来自欧洲的犹太人表示强烈的不满。

她还在外部定型和具体经验之间进行了区分,借以掩饰她的偏见。然而,根据访谈者的看法,如果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话,那么“她就很有可能接受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对犹太人表现出更多的敌意”。

她把她与犹太人的接触看做是非个人的接触,而且认为只有一二个较熟悉的犹太人是“好人”。

可以证明,如果反犹主义的“替罪羊”理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这种理论是很适用于她的。这类被试的“盲点”在于狭隘的、小资产阶级的经验局限性。他们把犹太人视做在经济领域对他们构成威胁的人,因而对犹太人横加指责。这是他们为了获得自我平衡而采取的一种假设,也就是说,他们必须找出对他们的不稳定地位负有责任的“替罪羊”,否则的话,世界的正义秩序将被搅乱。在此过程中,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失败者”或“受害者”。而指责犹太人使他们摆脱了由失败所导致的内疚感。反犹主义为他们提供了自己为什么会成为“弱者”的原因,为他们提供了把过失置于某种可见实体之上的满足。这些被试也许与犹太人从未有过消极的经历,而是从外部的信息中提取对自己有利的刺激,借此作出判断。

## (二) “世俗的”特征

这组特征也来自外部的定型,只不过这些定型在人格内部被作为一致性的组成部分而得到结合。在女性中表现为特别强调整洁和女性特征,在男性中则表现为特别强调“正常”男子汉的气质。在他们看来,接受流行的标准要比满足或不满足更加重要。他们根据内团体和外团体进行思考。偏见不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只是作为追随某个团体的一种手段。他们在言词的使用方面持有偏见,也就是说,机械地把他人的判断移植过来,而自己则不对问题进行探究。他们的偏见是“理所当然的”,或者说是“前意识的”,甚至不为他们自己所了解。只有在某种条件下,他们的偏见才会变得“有意识”起来。他们在偏见和经验之间存在某种对抗性。由于他们缺乏狂暴的冲动,也由于他们全盘接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的偏见很少直接涉及他们的担忧。虽说具有这种特征的人大多是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反犹分子”,但决不限于上层社会。

编号为 5057 的被试是一个 30 岁的电焊工,“其风度特别迷人”。他的陈述由访谈者概括如下:

他所表现的人格和态度在熟练工人当中经常遇见。他既不邪恶也不具开拓性,只是一味反映他的内团体的偏见而已,而且是以“习俗的”反犹形式进行这种反映的。

他对自己处境的接受,以及他对自己地位的关心,可借他对职业态度的描述来证明:

被试喜欢自己的工作,对自己从事的工种没有怨言。他把自己看做是一个熟练的工匠,并且认为自己在焊接方面拥有许多创造性和建设性的机会。不过,他也承认电焊工不是“白领”工作,不仅较脏,而且随时都会遇到危险。他对目前工作的满意

度也为他的问卷所证实:如果他的选择不受限制的话,他仍会选择电焊工种作为其职业。

他的职业就其现实主义而言是乐观的,而且没有虚假的迹象。他的习俗主义则是走向极端的:他选择了基督教科学,因为“它比其他宗教更加平静”。不过,“其他宗教也会阻止一个人过度沉溺于某种类型的活动,例如酗酒、赌博等”。他没有违背祖父母的教导,也没有对他的宗教信仰产生过怀疑。

被试的态度大多取自问卷。例如,“哪种心境或情感最令你心烦?”对此投射问题,被试在回答时提到“我的家庭或周围混乱的环境”。他发现他最难以控制的冲动是“告诉别人他出了什么问题”。在回答“什么东西会使人发疯?”的问题时,他说道:“是担心。不过,一个人应当既能控制他的身体又能控制他的心理。”

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暂且不说他的温和和“坦荡”,他是属于高四分位数的人。他的反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由他强调内团体—外团体的二分法来提供的。他不喜欢与外团体“接触”,并把他的内团体模式投射到“接触”之上,指责外团体搞“宗派”。他的敌意由于他的一致性而减弱。但是,他的刻板性在他深信外团体的特征不可改变的信念中清楚可见。当他遇到一些偏离他的模式并使他感到不安的人时,他就会进入一种冲突情境,这种情境会强化他的敌意而不是减弱他的敌意。他的偏见主要针对黑人,显然,这里的内团体和外团体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

关于其他少数民族,他作了如下的评述:

在被试看来,目前最大的少数民族问题是日裔美国人的问题,“因为他们正在大批返回美国”。被试觉得应当“以某种方式限制他们,而且他们的父母应当被放逐”。至于他们的品质,“除了在学校里,我与他们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然,我对他们没有

个人的厌恶”。

当被问到“犹太人问题”时,被试评论道:“他们团结在一起,比新教徒更加相互支持”。他认为,犹太人不当因为他们是以犹太人而受到迫害。“在美国,犹太人应像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权。”接着,他又说道:“我不喜欢看到太多的犹太人从其他国家迁来美国。我赞同排斥犹太移民。”

他之所以排斥犹太人,原因在于犹太人和他的内团体理想不同。不过,犹太人本身也因同化程度不同而有所区分:

被试能够通过卷发、粗眉大眼、大鼻子,以及厚嘴唇等来认出犹太人。至于犹太人的“特征”,被试认为:“不同类型的犹太人就像不同类型的非犹太人一样。犹太人像那些生活在贝弗利山的人一样。”

至于定型和经验之间的关系,被试认为:

“当我在贝弗利山经营加油站时,我与犹太人打过交道。我记不得我与他们是否有过不愉快的交往。事实上,所有的经历都是愉快的。”被试详述了他在海洋公园与一个犹太熟食店老板的交往。当时被试大约8~10岁,在该地区叫卖杂志。那天,他走进店里试着卖一本杂志给店主。在等待店主的反应时,他发现了一个极其奇特的咖啡蛋糕,他很想得到这个蛋糕。店主买了杂志后,注意到他脸上渴求的表情。显然,他已经意识到被试无钱来买咖啡蛋糕,于是他从柜子里取出蛋糕,放入袋中,送给了被试。从这件事的描述中可以看出,这一举动既是羞辱也是满足。被试回忆起当时的尴尬处境:“在店主眼里,我好像又穷又饿。”

被试认为既有“好的”犹太人,也有“坏的”犹太人,就像既有“好的”非犹太人也有“坏的”非犹太人一样。不过,“犹太人作为整体是不会改变的,因为他们团结一致,并且坚信宗教理想。只



要他们不那么贪婪,人们就会改变对他们的看法。”被试允许这里的犹太人继续留下,但他又补充道:“当然,犹太人最好返回巴勒斯坦。看到他们走,我不会感到遗憾。”尽管被试建议“为犹太人单独建立学校”,但是他对教育配额制度也表示同意。

### (三)“权力主义”的特征

随着这组特征在我们的研究中凸现出来,高分者的形象也就越发清晰了。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曾以“施虐—受虐狂”为题阐述过这些特征。根据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的理论,外部的社会压抑伴随着冲动的内部压抑。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的“内化”,被试对权威的态度,包括权威的心理力量,呈现了非理性的一面。被试通过在屈从和隶属中取乐的办法,实现了他自己的社会调节。这使得施虐—受虐狂的冲动结构既是一种条件作用,又是一种社会调节的结果。以此为背景,被试的施虐倾向和受虐倾向都得到了满足。将这类满足转化为人格特征的模式是恋母情结的解决办法,后者限定了这里所讨论的一组特征。恋母是在严厉的禁律之下产生的,其中的一个结果是,对父亲的憎恨随着反应形成而转化成对父亲的爱。这种转化导致特定类型的超我。由恨转变成爱是个体早期发展中无法回避的困难任务。在“权力主义”的心理动力中,原先的攻击性一部分转化成受虐狂,另一部分则转化成施虐狂,它在那些不被被试认同的人身上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而它们最终是外团体。犹太人成了被憎恨的父亲的替代对象,他们呈现十分相同的品质,被试在反父亲的过程中反对的就是这些品质,例如实用的、冷酷的、趾高气扬的,甚至成为性欲的竞争者。一方面,被试盲目地崇拜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却随时准备攻击那些被视做弱者的人和社会上公认为“受害者”的人。在这组特征

中,刻板的思想定型不仅是被试鉴别社会的一种手段,而且在他们的心理还具有“经济”的功能:它使被试按照其过分严格的超我要求来沟通他的里比多能量。于是,刻板的思想定型本身倾向于里比多化,并在被试的内部发挥重要的作用。被试发展了“强迫的”性格特征,部分原因是他退回到发展过程的肛欲—施虐阶段所致。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这组特征在欧洲成为中产阶层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可以期望它存在于那些实际的地位与渴望的地位不同的人群中间。这种情况既与社会满足形成了明显的对比,也与缺乏冲突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后者更是“习俗”特征的一大特色)。“权力主义”特征是与遵奉主义特征相一致的。

编号为 M352 的被试陈述如下:

(你对自己的工作满意吗?)“嗯,我是领班,或者说工头(被试强调“地位”)。我的部门很小,只有 5 个人。我有 5 个人为我工作,他们来到我的跟前,寻求生产的建议,而最终的决定是我作出的。事实上,在最终的决定中,我是正确的,而且始终是正确的。了解到我是正确的,给了我很大的满足。同样,了解到我正在取悦于老板,也给了我很大的满足。”

强调精神的满足,否认物质的满足,表明了一个受到限制的超我。这里的快乐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有人听命于他,另一方面是他取悦于老板。

他的向上的社会流动性,在他公开认同那些权威人士中得到了证实:

(金钱能使什么东西成为可能?)“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准,购买汽车,迁入豪华住宅,经商,与兄弟会的成员加强联系,等等。对于那些地位较高的人们,你除了经常与他们保持联系并结交朋友之外,还可以获得更多的教育和更多的经验。一旦你进入

到这个圈子,与人建立联系之后,你就会发现你还想迈向更高的阶段……”

他的宗教信仰具有某种强制的和惩罚的成分:

“我的信仰就是遵循圣经的教义。确实存在一个上帝。世界在前进,需要一个救世主,于是一个救世主诞生了,他决定着生存、死亡和复活。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有人获得永生,有人就此毁灭。”

被试的刻板性还表现出自相矛盾的痕迹:一度遭到禁止的东西,如果它不导致社会冲突的话,是可以接受的。过度刻板的超我实际上未被结合,而是为外部的力量所左右。

“通奸,只要没有被发现,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被人发现,那就成问题了。由于一些颇受尊敬的人也有通奸行为,因此我想那一定是没有问题的了。”

关于上帝的概念是与这种外在化的超我相一致的,或者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是与“自我理想”相一致的。它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所有特征:

“当人们接触到基本原则时,他们是有某种观点的。也许,有些人不信上帝,但是他们会努力仿效一种理想。异教徒也有某种宗教信仰,这是他们忠予的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能够帮助他们。”

“权力主义”特征和恋母情结的施虐—受虐狂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可由被试关于他儿时的陈述来予以证明:

“哦,父亲是一个十分严厉的人。他不信教,但在培养后代方面很严格。他的话就是法律,不论何时,只要不听他的话,就会受到惩罚。我12岁时,父亲几乎每天都打我,原因是我进入了他的工具间。他解释说工具间的东西很值钱,我不能随意取走(被试说他后来不敢再进入父亲的工具间,理由是‘我无法把

取走的东西归回原处’)。不过,你得知道,我从不反对父亲。他订出了法律,如果我违背,就会受罚。父亲是个好人,我从不怀疑这一点。他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

“父亲是个伟大的人,他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外出,参加委员会的活动。他是一个优秀的交际家,人人都喜欢他。他还是一个优秀的提供者,他能提供我们需要的每样东西。但是,他反对奢侈。他感到不必要的东西都属奢侈。是的,他相当严厉。尽管他差不多要把我打死,但是我能和他谈论任何事情。”被试强调指出,父亲始终给每个人(其中包括被试自己)公平的待遇。

被试在父亲问题上调整得过分了。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他的反犹主义得到了充分体现。

“犹太人在利用今天的形势,我是这样认为的。现在,他们正在从欧洲迁入美国,他们似乎能够垄断资本。他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除了金钱之外不关心任何事情(被试意指犹太人为金钱而昧了良心)。如果你阻碍他们搞钱,他们会把你踢向一边。”

犹太人的定型意象在“习俗”的特征中已经清楚可见,而被试的主张是具有高度惩罚性的:

“在我看来,犹太人像菲律宾人一样,他们遵循他们的宗教纪念日。实际上,他们并未美国化。”(如果对他们不抱偏见,结果会怎样?)“我不知道。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不会变化,他们不会丢失他们的本能,他们会一直保持犹太人的特征。”(对此,你觉得该做些什么呢?)“他们应该得到控制。现在,我们在想方设法制止他们,也就是说,通过某种法规去制约他们。”

权力意识再次得到体现:犹太人必须被“控制”,否则就有危险。

我们在第十七章讨论过“不怜悯穷人”的思想,它也是“权力

主义”的一个特征。“权力主义”人格一旦与力量结合起来,就会产生对“下层社会成员”的拒绝。这种拒绝还伴随着道德的谴责。

被试继续强调说:“你应当把黑人与白人分开,以避免不必要的问题。”他指的是黑人中间流行的性病,他认为这是因为黑人的道德水准低下所致。在访谈者的追问下,他最终把原因归之于“生活条件”。

被试表面上恐惧“密切的身体接触”,而内心却是内团体—外团体的二分法。他希望能与整个内团体保持一致,这也是他的主要心理结构之一。通过这种结构,他把权力主义纪律强加于自身,以免被内团体所排斥——这是他的潜在的自相矛盾心理所特有的一种企图。

#### (四) 反叛者和变态者

用“权力主义”解决恋母情结的办法并非高分者的惟一解决办法。为了反对父母的权威,“造反”也会发生。当然,在此情况下可能会排除施虐—受虐倾向。造反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发生,它使权力主义的人格结构基本上不受影响。<sup>[4]</sup>于是,被憎恨的父母权威只有在被另一种权威替代的情况下才能取消。这种过程由“客观化”的超我结构予以实现。这时,受虐狂在无意识水平上向权威转移,而抵抗则在意识水平上发生。

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对一切权威的非理性的、盲目的憎恨,并且具有强烈的破坏性,伴随着与“被憎恨的”强者联手。若想把这种态度与非权力主义态度区分开来是特别困难的,而且,要想在纯粹的心理水平上作出这样的区分是不可能的。这里,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社会行为决定一切,也就是说,决定一个人是真正的独立,还是借消极的迁移来取代他的依赖性。

当后者(借消极的迁移来取代一个人的依赖性)与采取伪革命行动以反对那些弱者的冲动相结合时,就是“反叛者”的特征了。这组特征在德国曾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已故的罗姆队长(Captain Roehm)在自传中称呼自己为“叛逆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39年,社会研究院曾就类型学问题描述过“反叛者”的特征,现在让我们摘要如下:

他们是虚无主义者,声称自己没有“破坏的内驱力”,对个人的存在抱着一种随便的态度。他们大多产生于失业者,不过,他们与其他失业者的区别在于,除了他们感兴趣的职业外,其他一概拒绝。他们恨犹太人,原因在于失业,或者说失去经济保障。所以,他们特别易受宣传的影响,而且准备跟随领袖人物。还有一些人来自危险的职业群体,例如殖民地的冒险家、赛车手、王牌飞机驾驶员,等等。他们的理想实际上是英雄主义,并对犹太人的“破坏性”特别敏感。在其心灵深处,它们对自己的理想尚不十分信服,希望用极端的方式使其理想得以实现。

就特征而言,这组特征首先具有这样的特点,即追求各种“过度的行为”,从过度酗酒和同性恋,到“造反”意义上的暴力举动。这类被试不像那些表现出传统的“权力主义”特征的人,他们并不刻板。

“精神变态”是一个精神病学术语,其特征的极端代表是“难以对付的人”。这里,由于恋母冲突,超我似乎完全被削弱了,个体退回到童年期的万能阶段。这些个体是最具“孩子气的”:他们未能“发展”,没有受到文明的影响。他们是“不合群的”,其思想为破坏性的冲动和非理性的方式所左右。他们的行为接近罪犯,而且迷恋于迫害或施虐,其攻击指向无助的受害者。他们中有流氓、无赖、施虐者,以及所有那些在法西斯运动中干出“肮脏事情”的人。

罗伯特·林德纳(Robert M. Lindner)曾研究过“没有原因的叛者”,并对“难以对付的人”提供了描述和解释。他分析了这种类型的人与“叛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与“权力主义”人格的关系。林德纳的观点是:

变态者不仅是一名罪犯,而且也是处于萌芽状态的“纳粹冲锋队员”。他们是非遗传的对立主义者,其攻击性可以在目标明确和领袖人物的煽动下被激发起来。他们把放纵视做法律,原始的欲望视做可以随时获得的道德,并把可能受到惩罚的强制性行为视做秩序。

变态者常被描绘成是“准则和标准的违背者”,其主要特点是不能等待,“无法做到延迟的满足”。由于超我未能建立,而自我已经遭到削弱,所以他们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至于受虐狂的组成成分,可以引述林德纳的下列描述:

变态者背着内疚的包袱,而实际上却在寻求惩罚。我们认为,这种奇异的行为起因于恋母冲突。他们被剥夺了通往令人满意的恋母之路,而且不断地受到继后发生的乱伦的和杀父的幻想之困扰,这种结合的罪恶只有用赎罪的办法方能解脱。“我对我父亲犯了罪,我一定会受到惩罚”已经成为变态者的非言语化的行为主题。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行为不受获得性动机的支配:在男性中,娶妓女做老婆;在女性中,将她们的魅力用于职业。这类活动构成一种“神经症获得”。除了寻找和接受惩罚之外,他们还满足于来自惩罚行为的“自恋的收获”,并且将此作为原始需要的中介。显然,这些行为处于理解的阈限水平之下,它们不是直接可以报告的,但却可以注意到。

叛者—变态者的例子可在我们的圣·昆丁样本中找到。例如,变态者福劳德(编号为 M658)和“难以对付的人”尤金(编号为 M662A)。我们将在第二十一章详细讨论他们。如果说这

里考虑的特征不像第二十一章那样生动的話,那是因为圣·昆丁被试组的研究受到我们变量的限定。此外,还需记住的是,监狱情境对变态者的特征表现起着制约作用,毕竟变态者不是精神病患者。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行为是相当“现实主义的”。此外,他们是为了“此时此刻”而活着的。缺乏自我同一性使得他们成功地适应一种特定的情境:当他们与访谈者交谈时,他们很可能不去直接表现“难以对付”的态度。确切地说,他们的“难以对付”需作间接推断,尤其是根据某些陈述来推断(例如,提到暴力的频率等)。正是鉴于这些标志,那两个圣·昆丁被试的陈述才值得一读。总之,他们既具“难以对付”的特征,又具某些潜在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 (五) 怪人

如果说“权力主义”特征中父母的纪律要求意味着对本我的压抑的话,那么这组特征从广义上说便具有挫折的含义。于是,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模式,其标志是挫折起着特定的作用。该模式可在这样一些个体中找到,他们未能成功地适应世界;在接受“现实主义原则”时未能正确处理取舍之间的关系;不只在童年时期,而且在整个成年期,他们的内部生活是由外部强加于他们的否认所决定的。这些个体被迫进入孤立状态,不得不建立起一个不合逻辑的内部世界,甚至接近妄想状态。一方面,他们借助自我夸大而存在;另一方面,他们对外部世界予以激烈的排斥。他们的“灵魂”成为他们最具价值的财物。此外,他们是高度投射的和怀疑的。这些行为与精神病的关系不容忽视,因为他们是“偏执狂的”。对他们来说,偏见是绝对重要的,它既是一种借助内团体和外团体比较的办法来逃避精神病的手段,也是一种通过建构现实的办法来逃避精神病的手段(他们的攻击性是在

不违背“现实原则”的基础上针对这种现实)。他们的思想是定型的,以此证实他们的投射公式是正确的,致使他们的刻板性几乎达到接近宗教信仰的程度。这些表现可在妇女和老人中找到,她们的孤立随着她们被排斥在经济生产过程以外而得到强化。这些人中有战时的母亲,追随宣传鼓动家的信徒等,甚至在种族主义宣传处于低潮时期也是如此。有人称这些人处于“疯子的边缘”,因为他们的强制已经达到了狂热的程度。为了确认他们建构的虚假现实,他们很可能形成宗派,这与他们关于犹太人的投射概念是相一致的,也即认为犹太人永远是坏的,或者说犹太人喜好阴谋,试图控制世界,等等。他们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特征是准博学性,也即神奇地信奉科学,使他们成为种族主义理论的理想追随者。编号为 F124 的被试是一个 50 多岁的妇女,身材高大结实,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其蓝灰色眼睛、尖鼻子、薄嘴唇等。

她不想提及她所处的阶层,也不愿提及该阶层内其他人的名字,否则的话,“我会因为泄露太多而具有危险”。

她瞧不起和她一起干活的工人,认为他们没有常识。她不想提起这些人的名字。她说有些人除了把时间花在闲聊上别无它用。她,自我感觉优越,态度清高。譬如,她说“他们根本不认识我”(这句话意味着她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或者说与众不同)。

由于她过分强调内部地位与外部地位的联系,因此她的陈述具有明显的“参照思想”:

她说她在 X 总统家里做过“家庭教师”,与他的儿子相识(先是大儿子,然后是次子),并在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时,与身处白宫的总统夫人通过电话。

至于她的不合逻辑的“内部世界”和伪理智,可借下面的描述来说明:

她读过许多“好”书。在得克萨斯老家,她一直读到七年级。她也画画和写作,学习弹奏乐器。她在得克萨斯学校画过一幅画,但从未向任何人展示过。这幅画表现的是太阳映照在山谷间,雾气从谷中升起。她说这是她的“灵感”所致,而非什么无意识活动。她也写小说,在她成为一个寡妇时,她不像有些妇女那样再寻新欢,而是写她的小说。作品之一展示了她对玛丽·皮克福(Mary Pickford)的幻想。但是,她从未给任何人看过这部小说。该小说取名为《小梅和奥琼》(*Little May and O'June*),灵感来自一次她与孩子们的野餐。这是一部关于小梅(女孩)和奥琼(男孩)爱情幻想的故事。她的女儿很有天赋。一位艺术家看到她女儿的作品后说:“你的女儿是个真正的天才。”他想给她的女儿上课,但是女儿拒绝了,说:“不,妈妈,他只会破坏我的风格。我知道如何画出我想画的东西。”

在种族问题上,她的憎恨体现了她的偏执狂倾向。一方面,她肆意诬蔑她感到不满的每个团体;另一方面,她又把自己纳入她所喜欢的团体圈子。

她认为“日本佬、犹太人和黑鬼应当回到他们来的地方去。同样,意大利人也应当回到意大利去。不过,意大利人不同于这里所说的日本佬、犹太人和黑鬼”。

她的反犹主义倾向反映了她的强烈的投射痕迹,尤其是关于“血统”的伪神秘主义痕迹,以及性别妒忌的痕迹。以下陈述表明了她的态度:

“犹太人总以为他们要比非犹太人优越。他们不会与非犹太人通婚,生怕玷污了他们的血统。他们榨取我们的钱财,把我们的女人当做情妇,但是他们不会与我们结婚,因为他们希望他们的妻子没有缺点。Y 总统的家庭经常款待犹太人。我不知道他用的是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投 Y 票的原

因。我在犹太人的家里看到过许多肥胖的犹太女人和鹰钩鼻子的男人。我听说罗斯福总统的母亲也有犹太血统。我之所以离开B家,原因在于他们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像个宫殿。当然,他们希望我留下。”

被试在其思想方法和某种古怪的宗教运动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她随时准备听从“内部的声音”,因为这些声音为她提供了道德的建议:

她喜欢天主教徒,羡慕天主教徒,但是不会加入天主教。因为她的身体内部有一种声音在说“不”(被试边说边作出拒绝的手势)。她信仰个人主义的宗教。当她每天清晨外出散步时,她会举起双手,仰面朝天,似乎表明她相信一种超自然现象。

#### (六)“操作”型

这组特征十分危险,其守旧的思想模式走向极端:定型的概念变成了目的而非手段,整个世界被分为虚无的、有序的和管理的三大领域。被试缺乏客观的移情,没有情感的联系。如果说“怪人”的特征具有某种偏执狂成分的话,那么“操作”的特征便具有某种精神分裂症的成分了。他们的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是没有联系的,并不出现“内倾”的表现,相反,他们以一种强制的、过分现实主义的方式把每个事物和每个人都看成是可以操纵的对象,也即可以由他们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来加以处置的对象。他们把重点放在“操纵”上,但对事情的内容则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这种模式既可在许多生意人中间找到,也可在新生的管理和技术阶层中找到。他们的人数正在增加。在德国,许多法西斯主义的反犹分子就具有这组特征。其中,希姆莱(Himmler)可能是他们的象征。他们具有适度的理智,加上他们缺乏感情,致使他们成为残忍的人。他们观察事物的组织方式是事先

具有权力主义的倾向,所以他们会用毒气室杀人而不是用机枪扫射。他们用行政手段对付犹太人,而受害者根本与他们不认识。反犹主义被具体化了。他们的愤世嫉俗是明显的:“犹太人问题将被严格地依法处理”是他们谈论大屠杀的方式。犹太人问题对他们来说如鲠在喉,既因为犹太人的行为方式是对他们定型模式的一种挑战,也因为他们在犹太人身上发现了他们所缺乏的那种人际关系。内团体和外团体的关系成了他们的处事原则,好像整个世界就是按此原则组织起来的。至于这种类型的心理原因,我们的材料为我们确定了范围。需要指出的是,强制性与我们的社会理论所指的“抽象概念具体化”的心理活动有关。“操作”者的强制性特征,加上他们的施虐狂倾向,是不能被忽视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该特征与“权力主义”特征相似。但是,他们的极端的自恋表现又使得该特征与“权力主义”特征有所不同。不过,只有当我们进行表面化观察时,我们才能发现这种矛盾,因为我们无论把一个人的情感和理智称做什么东西,它们都是心力内投的结果。从我们的案例中可以注意到,被试对性的兴趣几乎达到了成见的地步,而且只要考虑到实际经验,他们便会发生倒退。有个被试描述了自己的童年。他对手淫忧心忡忡,当其他孩子打垒球时,他却收集昆虫。这里,肯定有着童年期的创伤,也许发生在前生殖器水平上。编号为M108的被试原先打算成为一名杀虫药剂师,现在却为标准石油公司这样的大机构工作。他开始时在大学里学化学,但是约从第三学期开始,他便怀疑这是不是他真正想学的东西。他在童年时期对昆虫发生兴趣,后来遇到一位在昆虫学方面颇有研究的同事,谈到了把昆虫学与化学结合起来的可能性。这个人说,他认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被试发现,研究杀虫剂是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此外,他还可以借此谋生,而不至于使自己

成为一个像化学师或工程人员那样的过剩者。

表面看来,被试的职业选择是偶然的,但是,当我们对其整个访谈背景进行观察时,我们却发现它具有某种意义。罗文塔尔(L.Lowenthal)曾经指出,法西斯主义的演说家常常把他们的“敌人”比做“害人虫”。这个被试之所以对昆虫产生兴趣,原因在于他认为昆虫既是令人厌恶的又是弱小的,可以作为他操作的理想对象。<sup>[5]</sup>

被试对其职业选择的操作由他本人作了强调:

当他被问到除了经济原因外他还希望从工作中得到些什么时,他说他希望在组织领域也插上一手。

他过于强调“操纵”,甚至欣赏那些他曾痛恨的人(这种“欣赏”带有攻击的含义)。让我们再引用一下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被试关于罗斯福总统的陈述:

当问到罗斯福有什么优点时,被试说:“哦,他在第一届任期内使美国引人注目。有些人认为他只是贯彻了胡佛的思想,他们不知道他实际上做了一件人们迫切需要的好事……不过,他也谋得了权力,而且利用了权力。”当问起他的政策是好是坏时,被试答道:“哦,无论如何,他做了一些事情。”

被试的政治概念是由朋友—敌人关系来界定的,这一界定方式与纳粹理论家卡尔·施密特(Karl Schmitt)界定政治本质的方式如出一辙。被试除了希望在组织领域插上一手外,还迷恋于对自然的支配:

“始终会有战争。”(有没有防止战争的方法?)“不可能有,因为人们不是为着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相反,倒是共同的敌人交上了朋友。如果人们能够发现其他星球,并且去那儿谋生的话,那么他们也许可以逃避战争于一时,但是最终那里还是会有战争的。”

他的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在其关于黑人的陈述中变得清晰起来:

(我们能对黑人做些什么?)“做不了任何事情。我们和他们是两种性质的人。我不赞成通婚,因为这将产生劣等民族。黑人还没有达到高加索人的发展水平。”被试赞成把黑人隔离起来,但他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希望采用希特勒的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法:希特勒的方法和种族同化。根据被试已经阅读的东西,他知道种族同化已成事实,但是他仍持反对的态度。这种逻辑只允许一个结论:消灭黑人。与此同时,他观察操作的预期目标的方法也是非情感的:尽管他的反犹主义是明显的,但是他却不要求你“通过外貌来辨别犹太人,因为他们像其他人一样,也是各式各样的”。

他的种族歧视再次由他对通婚的观点予以证实:

他说,如果他是生活在德国或英国的一个美国商人,他也许会娶一个美国女人为妻,或者娶一个德国女人或英国女人为妻。

不过,像犹太人那样的人,在他的选择中是没有机会的。确实,他对他的西班牙小舅子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但是他却用了这样一句话进行评价:“你不能从白人的角度向他传递信息。”

由于操作的目的,他对教会采取了积极的态度:

“哦,人们需要宗教教会,因为它为他们设定了标准。但是,并非人人都需如此,对有些人来说,没有必要加入教会,因为他们出于一种普遍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坚持同样的标准。”

他的形而上学观点是自然主义的,具有强烈的虚无主义色彩:

当他被问到他的信仰时,他说他是一个机械论者,不认为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物体,事物是按照物理定律来运作的。人和生命只不过是一种偶然事件,一种不可避免的偶然事件。接着,他

试图解释这种“偶然事件”：当地球起源时，某种物质自然增长，与此同时，生命也就完全偶然地产生了，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至于他的情绪结构，他说他的母亲“只是妈咪”。他似乎对父亲抱有敬重之意，因而也十分尊重父亲的意见，但是他并不依恋父亲。他说，作为一个孩子，他有许多朋友。不过，当访谈者进一步追问时，他却提不出亲密的朋友。他对儿时的情况谈得很多。譬如，与其他孩子相比，他没有参与过打架。他的亲密朋友很多，其中在他读十年级或十一年级时亲密朋友最多。“迄今为止，我还知道他们中有些人在哪儿工作和生活。”（朋友重要吗？）“哦，童年时期的朋友尤为重要。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你成年时，你没有朋友也照样生活。我不希望我的朋友来帮我生活。”

最后，应当提及的是，在该被试的思维中起着重要作用的道德品质是忠诚，这也许是他对自己缺乏情感的一种补偿。他的忠诚涉及到他无条件地认同他所属的团体。他已彻底向他的“团体”投降，而且为了“团体”的利益甘愿放弃自己的特点。正如该被试所说，他之所以反对犹太难民，是因为他们“不忠于德国”。

### 三、低分者的特征

下列观察可能有助于我们朝着“低分者”的特征定向：(1) “刻板的”低分者具有强烈的超我倾向和强迫特征。父亲式的权威常被某种集体的形象所置换，而且按弗洛伊德所谓的兄弟群体的形象来塑造。他们的主要戒律是不允许违背兄弟之爱。(2) “抗议的”低分者与“权力主义的”高分者有着许多共同之处，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父亲思想得以升华的同时，伴随着

对父亲潜在的敌意，导致拒绝受外界支配的权威。他们的主要特点是，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显示暴君的样子，他们便予以反对。(3) “冲动的”低分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强大的本我冲动从未与自我和超我相结合。他们被压倒一切的里比多能量所控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像高分的“怪人”和“操作者”那样接近精神病。(4) 至于“随和的”低分者，其本我很少受到压抑，它们升华为同情，且超我得到充分发展。有时，这些被试表现出类似神经症的症状。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害怕自己会“伤害”人与物。(5) 对“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他们的超我、自我和本我达到平衡。对此，弗洛伊德认为是最为理想的人。

在我们的样本中，“抗议的”低分者和“随和的”低分者最为常见。可是，需要强调的是，低分者作为一个整体，要比高分者较少“类型化”。因此，我们须谨慎从事，以防不适当的概括。

#### (一) “刻板的”低分者

我们可以从一组“低分”特征开始描述。它们与“高分”模式有着许多共同之处。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十分突出的刻板思想或定型特征，但却没有偏见。在我们的样本中，大部分被试没有偏见。我们在前面说过，表面思想无论如何一致，必须与被试人格联系起来考虑，而高分者的表面思想是由其人格决定的。但是，我们也发现，有些被试的特征像高分者的特征一样与其人格相联系。后面那种低分者在其思维中显然倾向于权力主义。我们遇到过一些被试，他们在思想上与某种进步运动保持一致，例如为少数民族的权利而奋斗。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些思想含有强迫的特征，甚至具有偏执狂的特征。许多变量表明，他们在刻板性思维方面几乎难以与高分被试区分开来。所有这些特征实际上能与高分者的“表面不满”相对应。他们的观点的偶然性



使他们倾向于改变态度,正如在纳粹统治下某些激进分子的行为为那样。他们可能以对少数民族问题不感兴趣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有时他们也会谈论少数民族问题。他们运用陈词滥调的频率不低于高分者。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淡化种族歧视的严重性,仅仅把它说成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副产品(这种态度可能表明了他们的受压抑的偏见)。这组特征常可在年轻的“进步”人士身上(尤其是学生身上)找到。鉴定这组特征的最佳手段之一是注意被试从某些一般的公式中演绎出他们对少数民族问题的看法,而非自发的陈述。他们也可能提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但是这些判断并非以讨论中的问题为依据的。

编号为 F139 的被试是一个布道者。她认为自己在过去的 10 年间十分进步。最近,她极少有时间阅读,但是她的丈夫经常阅读,而她则是通过与丈夫的讨论来跟上形势的。“我最推崇的政治家是列维诺夫(Litvinov)。我认为,当代最具戏剧性的学说是他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集体安全的演讲。它使我们很高兴地看到因苏联的无知而导致的这场战争终于结束了。当然,事情还没有最后解决,因为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许多法西斯分子。一旦有可能,他们会向苏联开战。”

她对列维诺夫的热情在我们讨论定型思想时已经提到过(参见第十七章)。在她断言自己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以后,紧接着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不是基督徒的话,我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吗?”这是一种典型的“演绎”方法,它是刻板的低分者的一个显著特征。

被试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而且,在她看来,这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惟一可能的观点。

关于“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说法,需要加以注释:凡是不受定型影响的人大多倾向于承认差异,并对分化采取积极的立场。

被试说这句话的含意在于,“在上帝的眼里,人人都是平等的”。

正如我们在讨论政治一章中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她的进步理论的表面性是通过她对酗酒问题的抨击态度表现出来的。她本人曾称这是一个她“十分关注的问题”,而她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却与高分“怪人”的某些偏执狂思想一样。艾尔弗雷德·麦克克伦·李(Alfred McClung Lee)曾经指出,禁酒和偏见的思想方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事实上,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刻板的”低分者具有许多“高分者”的特征。被试在提及她的女儿时,尤其强调了“地位”问题:

“我对女儿的学校感觉很差。要知道,那么多教育和文化水平很低的人涌入学校,当然会对学校产生影响。”

被试还有一些毁灭性的想像,不过,这些想像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道德面纱:

“吸烟也一样。在我们的家庭里,没有人吸烟或喝酒。但有一个例外,那便是我丈夫的妹妹,她吸烟,现在已经死了。”

言谈之中带有惩罚的理性化:

“如果明天能让我下达禁酒令的话,我就会那样做。我认为,对人类没有好处的东西都应禁止,因为它对人类有害无益。有人说,如果你禁止某种东西,那么人们就会偷偷地去追求这种东西。哦,我说,关于谋杀、抢劫和吸毒该怎么看?我们要不要禁止它们?我们并没有取消禁止令,但是照样有人犯罪。”

最后,被试持有官方的乐观主义,这是对潜在破坏性的一种反应形成:

“如果人们对事物的发展不抱希望,那么他或她的基督教义还意味着什么呢?”

一旦条件具备,她可能参加颠覆运动,只要该运动代表着基督教名义下的“事物的发展”。

## (二) “抗议的”低分者<sup>[6]</sup>

这组特征在许多方面与高分的“权力主义”特征相对应。它的决定因素是心理的而非理性的。它以解决恋母情结为基础,因为恋母情结严重地影响了我们的被试。由于他们反对父亲的权威,因此他们也在较大程度上将父亲的形象进行内化。他们身上的超我如此强大,致使它转而反对自己的“楷模”(父亲)以及所有外在的权威。他们受“良心”的指导,这种良心是相当自主的,不为外部的权威所左右。他们出于纯粹的道德原因而“抗议”社会压制,或者反对它的某些极端表现,例如种族歧视。<sup>[7]</sup>在我们的样本中,许多“神经质”的低分者的表现证实了这组“抗议”的特征。他们中大多数人因各种怀疑和犹豫而感到烦恼。有时,他们显示某些强迫的特征,甚至对偏见的反应也受严格的超我的制约。他们充满内疚,认为犹太人确是“受难者”,但他们自己明显不同。在他们的同情和认同中存在一种定型的要素,使得他们受下述渴望的驱使,也即从“积极的意义”上理解对少数民族不公正的事件。与此同时,他们很容易被犹太人的真实的或想像的品质所吸引。由于他们的思想方法是非权力主义的,因此他们的心理受到约束,不能像他们的良知要求一样生气勃勃地行动。良知的内化使得他们受到严重的压抑,甚至导致心理上的“瘫痪”。他们的内疚感促使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有罪的”。尽管他们痛恨歧视,但是他们发现有时却难以反对它。从社会角度上看,他们似乎属于中产阶级,不过,难以用精确的术语解释他们的团体成员身份。我们的材料表明,他们常可在那些经历了严重的家庭问题的人群中找到。例如,编号为 F127 的被试是一个“校花”式的漂亮女孩,身材苗条、皮肤细腻、金发碧眼。她穿一件运动衫,短裙子,还戴一枚大学女生联谊会徽

章。她十分友好、有趣,喜欢讨论,但在回答家庭问题上闪烁其词。她的父母离异,访谈时她对此事避而不谈。随着访谈的深入,她才开始毫无顾忌地谈论起自己的感受。

被试似乎十分关心自己,对心理学有着一种奇特的信仰,期望心理学家对她的了解要比她对自己的了解更多。

她首先想要的东西是成为一名精神病学家。(为什么?)“因为精神病学家能够更多地了解别人。他们会向我倾吐他们的问题。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比帮助别人解决问题更能使人满意的了。但是,我没有水平和耐心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这只是一种想法而已。”

她对其父亲的态度是敌视的:

父亲是一位律师,曾在军队服役,驻扎在太平洋某个地方,负责一个黑人营地。(他对此有何想法?)“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想法。”

她的社会态度既是遵奉主义的,又是追求享乐的(好像她的良知命令她享受一样),而且还是不求显要的(她对“地位”抱无所谓态度)。

(你有什么兴趣?)“噢,你说兴趣吗?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喜欢阅读和讨论。我喜欢聪明人,讨厌那些专门依赖男人的孤立无助的女子。我喜欢跳舞、打扮,不太善于运动,但偶尔也玩玩,例如网球、游泳等。我加入了女生联谊会,做了许多战时服务工作,包括接待军人。”被试说出了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名称。(那是一个好场所,是吗?)“他们这样说,可我不认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她的社会进步性既含恐惧的成分又具正义的特征:

(你对贫穷怎么看?)“我不喜欢考虑它,我认为没有必要考虑它。”(谁应该对贫穷负责?)“噢,我认为穷人不该受责备。我

不知道,到目前为止我们想不出一一种可以使每个人都富的办法。”

她的焦虑使她比其他低分者更加意识到法西斯主义的潜力:

“这里也有纳粹,那是可怕的。不过,确有纳粹。他们希望在德国发生过的事情在这里再发生一次……许多犹太人面临艰难,不论在服役中还是在就医中都遭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会出现歧视?)“我不知道,也许是纳粹的影响。我想总有一些人有着纳粹分子的思想。”

她的愤怒基本上指向“不公正”。“总有一些人有着纳粹分子的思想”这一理念是很了不起的:高度发展的责任使她对社会问题产生一种理解。从心理学上讲,她之所以不持偏见,原因在于她的超我作用。该被试有过一段相当不愉快的经历(她4岁那年曾被一个黑人绑架过),要是没有超我的作用,这种经历原本会使她产生偏见的。但是“他没有伤害我,我甚至没有受到惊吓”。

至于她的态度的遗传背景,可从下述临床数据中推断出来:

“有人说我很像我的父亲,那不是一件好事。他是一个没有耐心的人,十分专横,而且处处想着自己。我和他相处得不怎么样。他喜欢我的妹妹,因为她奉承他。不过,我们两人都为他感到烦恼。如果我像孩子们打架那样骂了我妹妹,他就会打我屁股,而且很重。这时,母亲会感到不安。她从不罚我。可是父亲一直罚我,而且大多数惩罚是没有原因的。我经常被打屁股,这事我忘不了。”(你是否认为你与你的父亲彼此相爱?)“不,也许他是这样认为的,但是我和我的母亲都忍受不了他对待我们的方式。她想和他离婚。”被试在说这些话时脸红了,而且眼中充满泪水。当访谈者暗示她有没有意识到父母离异时,她说:“我

不打算讲这件事,我做不到。”

关于神经症的特征,可从强烈的恋母中窥其迹象:

“我不希望母亲再婚。”(为什么?)“我不知道。她没有这个必要,她可以交些朋友。她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有许多朋友,但是我不愿意她再婚。”(你认为她会再婚吗?)“不,如果我不同意,她是不会的。”

还有一组性抑制的特征,基于她对父母离异的体验:

(你对男孩如何看?)“噢,我不会严肃地对待他们,我也不希望他们严肃地对待我。当然,我也有过接吻之类的体验,但是,我不会给他们表明我轻率的任何暗示。我也有不喜欢的家伙。”

她声称,由于害怕战时婚姻,她不想承担与婚姻有关的任何义务。这也许是一种文饰作用。

### (三)“冲动的”低分者

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和桑福德(Frenkel Brunswik & Sanford)曾经描述过一个“充满冲动的”低分者的案例。他们写道:

在我们的低分者中间,最突出的病理学案例表明了一种模式,它与我们认为的低分特征有所不同。这个女孩充满着冲动,她的自我和她的本我齐头并进。在她看来,各种过度的言行都是可以允许的。在叙述她为什么喜欢犹太人时,她提供了一个与高分者憎恨犹太人的理由十分相同的理由。

我们认为,这个案例有其自己的一组特征,它们在某些方面与心理病理的高分者特征相似。这组特征在我们的被试身上较为突出,他们具有极强的本我,但是相对来说不受破坏性冲动的支配。他们鉴于自身的里比多,从而同情每一件他们认为受压的事情。此外,他们也是对各种刺激作出强烈反应的人,致使内团体—外团体的关系对他们来说已经变得没有意义了。确切地

说,他们易被“不同的”事情所吸引。如果说他们具有破坏性成分的话,那么这些成分也是指向他们自己而非别人。这组特征的范围涉及各种“嗜好者”,从反社会人物如妓女和非暴力罪犯到某些精神病人。据说,在德国杂技演员和流浪汉中极少发现纳粹分子,因为这些人是被纳粹投入集中营的。我们很难确定这组特征的深层的心理根源是什么。不过,他们的超我和自我都有弱点,致使他们在政治问题上有点不稳定。他们肯定不会以定型的模式进行思考,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不会成功地进行概念化判断。

让我们用编号为 F205 的被试为例来说明问题。被试来自精神病诊所。

她是一个愉快的、有吸引力的女大学生,她因严重的心理障碍而就治于精神病诊所。她的情绪容易波动,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学业之上,而且没有生活目标。有时,她会陷入极端的情绪烦乱之中,号啕大哭,抱怨说没有得到即时的帮助。治疗师认为她无法忍受任何一种深入的探测,因为她的自我十分虚弱,有可能导致精神病,所以对她的疗法只是支持性的。被试有精神分裂症倾向。

她反对偏见,十分强调“混血”。这也许表明她在男女乱交方面的冲动:

(你在种族问题上有偏见吗?)“如果种族之间进行杂交的话,那么这就会有助于文化的结合,导致文化的国际化。我想应该有这样一种教育制度,尽管它不是实用的,但它强调种族之间的结合,这样的话,优秀的特质就能得到积累,而低能者也就有不育的可能。看来,目前的社会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水平,整个社会是病态的和令人不悦的。”

最后一句话表明她不满足于移情,而是对社会进行相当激

烈的批判。她的敏锐洞察还被“不同的”东西所吸引,这在她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上清楚地显现出来:

“目前,确实存在着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偏见。有些人由于对少数民族缺乏了解,因而产生恐惧。我希望所有的团体都达到同化,这样,国际化才有可能。我也希望世界的教育统一起来。少数民族自身也会游离于他们的社会之外,因为社会使他们成为被遗弃者,而他们也以此方式作出反应。”(那么,他们中间有没有差异?)访谈者力图让被试描述团体之间的差异,但是被试却坚持说:“所有差异起因于对歧视的情感反应。”(你对犹太人怎么看?)“我不知道作为一个团体他们有什么不同。我有犹太朋友。也许,他们对人们的偏见比较敏感。但是,那是件好事。”

根据临床数据,被试是一个女性同性恋者,因为搞同性恋而受到过严厉谴责。后来,她又尝试过异性恋,“目的是检验自己是否对男人有性欲反应。”她说,“这给我带来了情绪上的烦乱。”后来的经历表明,该被试的同性恋倾向大于异性恋倾向。

需要补充的是,洛杉矶样本包括3个应召女郎,她们都已摆脱偏见,而且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得低分。由于她们的职业性质,使他们对性深表不满。而且,由于她们承认自己具有性感缺乏的症状,因此看来她们并不属于“冲动的”特征组。可是,深入的分析发现,构成她们性格基础的仍是“冲动”,只不过后来的反应形成使之显得隐蔽而已。她们的低分也许与社会因素有关,因为她们的职业性质决定她们要与各种人物接触。

#### (四)“随和的”低分者

这组特征与“操作的”高分者相反。它的一个特点是“顺其自然”,不愿对任何事物采用暴力(这种“不愿”表面上给人一种

遵奉的印象)。另一个特点是不愿作出决定,这种“不愿”甚至影响到他们的语言:他们常常使用未完成句,用以表示他们不想为自己承担义务,并且留给听者自己去进行推断,以确定未完成句后面的真正意思。就其积极意义而言,他们倾向于“舍大于取”,以表明他们的欲望不为获取所支配。没有不情愿和不知足的表现。他们显示了某种心理上的富足性:享受事物、充满想像,有时甚至表现出自嘲形式的幽默感。不过,后者像他们的其他态度一样极少破坏性,好像他们准备承认自己的各种弱点,不为强烈的内部安全感所驱使,以致产生强迫症行为。他们可以放弃自己,不用害怕失去自己。他们的政见极少激进,听起来他们好像生活在没有压抑的条件之下,或者生活在理想的人类社会之中。这种态度有时会削弱他们的抵抗力。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具有精神分裂样倾向,他们甚至不抗拒既定的模式。

“随和的”特征之原因尚不清楚。具有这类特征的被试既不能用心理力量来解释,也不能用退回到童年阶段的假设来解释(尽管从表面上看,他们的有些行为带有孩子气)。确切地说,对他们应给予动态的理解。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人:其人格结构并非静态,不能用弗洛伊德的类型学予以设定,而且能够容纳各种体验。不过,这种行为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自我是虚弱的,而是意味着没有创伤体验和缺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正常的”。问题是,这种正常性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给人一种不成熟的印象。不仅他们的儿时生活没有经历严重的冲突,而且他们的整个童年期是在母性般的氛围中发展的。<sup>[8]</sup>也许,他们不具备对女性抱有恐惧的特点。这也许是他们不存在攻击性的原因之一。对他们来说,世界仍然具有女权制的特点。这组特征的代表可在下中阶层中看到。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使自己顺应于政治的或心理的法西斯主义。前面提到的 M711 就是一个温文尔

雅的人。他很随和,说话缓慢,体势反应有点迟钝。他的陈述具有明显的限制条件,对于这些限制条件,他给予了比命题本身更多的重视。他似乎深受犹豫和怀疑之苦,对自己的想法不能肯定,在许多问题上不能给予积极的陈述,而且不论从理智上还是情感上都不想卷入被议论的事情中去。

他说他对职业的选择纯属偶然。有趣的是,他原先是一个园林建筑师(该职业可能意味着恢复自然而非支配自然的欲望),后来却成了政府人事部门的一个接待人员。这个工作给了别人许多满足。他并不自恋地强调自己视财富如粪土,也承认自己有“安全”的愿望。但是,他完全没有把金钱视做首选的需要。他的宗教态度在第十八章已有描述,表明其在心理上符合这组“随和”的特征。还需补充的是,他“并不信奉纯洁的概念”,认为“纯洁并不存在”。

当问到儿时的纪律时,他的回答是“实际上没有任何纪律”。他强烈地依附于母亲,没有任何压抑。他说他在童年时期惟一出现的“争论”是在他母亲“展示其占有欲”时:“她不喜欢跟我一起玩的女孩。”对于女性,他的描述如下:

“很难说。当我接受一个女孩时,我似乎有了我所喜欢的一切。和她在一起很有趣,她有头脑,还很漂亮。她喜欢我,那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互分享喜悦。”(你们喜欢在一起做些什么事情?)“听音乐,阅读,游泳,跳舞。许多事情无须太多能量。”

被试没有反对父亲的敌意痕迹,因为他很早就失去了父亲。不过,对父亲的想像则在他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关于父亲的记忆愉快吗?)“有许多愉快的记忆。当他在家时,他把我们给宠坏了。他经常想出一些奇怪的念头。”(母亲和父亲相处得怎样?)“我想是很好的。”(你小时候主要由父亲照顾还是母亲照顾?)“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太熟悉父亲。”(父亲有缺

点吗?)“不知道。”

最有意思的是他对种族问题的看法:

(你对少数民族问题怎么看?)“但愿我能了解。但是我不了解。我想有个问题我们应当重视。”(什么问题?)“黑人问题。根据报道,现在已有许多黑人来到西海岸……”(你有没有把黑人当做朋友?)“当做朋友,但是并不亲密。我认识一些我喜欢的黑人。”(你对通婚问题怎么看?)“我认为反对通婚是错误的……有人问我,如果你的妹妹嫁了一个黑人,你怎么办?坦率地说,我是不会反对的。”

谈到犹太人,他不为他们“辩护”,而且实际上否认他们是个“问题”:

(你认为犹太人是“问题”吗?)“我认为不存在犹太人的问题。我想对那些煽动者说,这是一个离题的讨论。”(你的意思是什么?)“希特勒、三 K 党等都是煽动者。”(你对犹太人的特点怎么看?)“我已经注意到犹太人表现出所谓的犹太人特征,但是非犹太人也有他们的特征。”

在这组“随和的”特征中也蕴含着危险,也就是说,被试不愿意用暴力反对暴力。我们可以用下列一段话来说明:

(关于吉拉尔德·史密斯,你怎么看?)“我认为应该给吉拉尔德·史密斯讲话的机会,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一个团体想提出抗议,该怎么办?)“如果某个团体想这样做,那么他们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认为这样做不一定有效。”

被试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态度实际上是以一种具体的和回避的意识为基础的,这可由下列解释来说明:

(你刚才所说的不知疲劳的领导人是什么意思,能不能具体阐述一下?)“是的,我说过。譬如,休伊·朗(Huey Long)和希特勒就是一些不知疲劳的领导人(笑声)。”(你的意思是什么?)

“哦,我羡慕威尔基,我敬佩罗斯福,我推崇华莱士。我认为我不应当拥有玩弄人们忠诚的领导人。人们需要的领导人是不为自己着想的人。”

该被试的访谈以下列辩证论述而告结束:“有权力的人有可能滥用权力。”

### (五) 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与上述模式相反,这组特征在反应方面是十分坦率的。具有这组特征的被试有着强烈的个人自主感。他们无法忍受外来力量对其信念和信仰的干预,也不想干预他人的信念和信仰。他们的自我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但并非里比多化,也极少“自恋”。同时,他们愿意承认本我倾向,采纳本我的要求。他们的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道德勇气,而且超越了他们的理性评价。如果别人做错了事,甚至出现自损行为,他们便无法“保持沉默”。他们把人看做个体,而非抽象的概念。他们具有在低分者身上发现的某些特征,如“冲动性”、没有压抑等,甚至不愿自己“受控”。他们的情感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地指向某人。他们具有“怜悯”之心。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组特征解释为“具有同情心的”特征。他们像“抗议的”低分者一样认同竞争中的失败者,既没有强迫性质,也没有过度补偿的痕迹。他们像“随和的”低分者一样,也是反权力主义的,只不过他们在反权力主义时更有意识,没有犹豫不决的成分。正是这些特征构成了“真正的自由主义者”。

为了说明上述问题,我们以一个女孩为例。据访谈者称,她的“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性格清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天真”。

编号为 F515 的被试是一个 21 岁的大学生,没有“标签思维”。她虽不漂亮,但颇具气质。她的态度是坦诚和率直的,她

的体格是运动员型的。我们能从她身上看到热情。她有着一种强烈的欲望,那就是在一切关系中奉献自己,而且不为习俗所困。

她除了对音乐感兴趣外,还“喜欢绘画和业余演剧活动”。不过,关于她的职业,她迄今尚未确定。她参加过护士急救,喜欢以此方式帮助别人:“我喜欢它。现在我感到能照顾病人了。我愿意给病人端便盆,接触他们的肉体而不受惊吓。我学会对有些事情应该讲点策略。他们喜欢我。”(为什么喜欢你?)“因为我常微笑,因为我做事勤快。”

她关于少数民族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

“少数民族应该像我们一样拥有许多权利。我们是人,他们也是人,他们应该拥有权利。其实,少数民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个体组成的,我们应当就个体而论个体。”

(你对黑人怎么看?)“同上述的观点一样,仍然作为个体来处理。尽管他们的皮肤是黑的,但是他们仍然是人。作为个体,他们有喜怒哀乐。我认为不应该由于他们是不同的民族而排斥他们,或者逼得他们无路可走。当然,我不会嫁给黑人,因为我不想嫁给一个具有我不喜欢的特点的人,例如大鼻子,等等。我不想生出黑皮肤的孩子。不过,我不在乎他们是否住在我隔壁。”在访谈开始时,被试曾举过这方面的例子。譬如,她在从事护士工作时专门照看过黑人病人,包括给他们洗澡等,而她并不在乎这一些。

(你对犹太人怎么看?)“哦,我想我可以嫁给一个犹太人。我甚至可以嫁给一个黑人,如果他的皮肤不那么黑的话。我喜欢浅色的皮肤。我认为犹太人和白人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他们都有较浅的皮肤。”(你认为偏见的原因是什么?)“妒忌。”(能解释一下吗?)“因为犹太人聪明,而且他们不想与我们竞争。我们

也不要任何竞争。如果他们真想竞争的话,我们不一定赢得了他们。如果他们真想和我们玩智慧的话,我们不一定胜得了他们。”

最后的陈述表明她在犹太人问题上不存在任何内疚感。接下来是这样一段话:

“也许,犹太人一旦拥有权力,他们便会消灭我们。那样做就不聪明了,因为我们会回击。”

她在宗教观点上稍带一点幽默的格调,它们主要集中在理想境界上。当她谈到柏拉图的著作时,她提到了“理想的境界——乌托邦”。她的宗教主旨包括在下面这句话里:“在那里,也许我们都能得救。”

她以非习俗的方式描述了她的父母,其中包含她的自我理想的要素:

“父亲在公司的货运投诉部门工作了25年。他的工作涉及许多人。属他管辖的人大约有150个。现在,他可能已经是副总裁了。他有头脑,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还欠火候。他宽宏大量,在做决定之前总要听听不同的意见。由于这个原因,我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论据收集者’。他理解别人,不像母亲那样情绪化。母亲重感情,父亲重事实。母亲也很善良。她具有她自己的人格。尽管她有点情绪化,但是她把她的一切献给了我们,她也使父亲感到十分满意。”(她以哪种方式使他满意?)“她为他营造了一个家,那就是生活。他们的婚姻是很幸福的,人人都这样说。母亲很友好,同情别人,人们喜欢跟她讲话,不时有人打电话给她,她们成了好朋友!不过,她也比较敏感,容易受伤害。”

被试对性的态度是抑制和开放并存。她的男友每次与她约会都想进行性交。事实上,他第一次与她约会时就提出性交的

要求,但是她没有同意。她认为友谊关系应当先于性欲关系。不过,她也认为性关系是达到相互了解的一种方式。现在,她已经分手。他说:“就让我们做个朋友吧!”但是,她不想和他保持朋友关系,原因是性问题使她讨厌。他和她第一次跳舞时就向她提出性要求,而她只想亲密一点。她的亲密不是指性交,但他却理解为是性交。

她的情欲性格与她对父亲的情感有关,她曾说过:“我想嫁给像我父亲那样的人。”

访谈者将访谈结果归纳如下:

在这个案例中,最能揭示低分特征的因素是父母的开诚布公,以及母亲给予孩子的伟大的爱。

如果上述特征可以概括的话,尤其是高分者的特征可以概括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一个人是否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潜在人格,与其家庭结构和家庭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

## 注 释

[1] 本章为阿道诺(T. W. Adorno)所撰。

[2] 需要指出的是,贾恩施的“反类型”是由联觉来解释的。博德曾就联觉概念解释如下:“有些人具有这样一种假设的或实际的倾向,也即当他们听到一种音乐时会产生颜色的感觉,或者当他们看到一种颜色时会产生音乐的感觉。”这种倾向被贾恩施视做是一种退化的症状。我们认为,这种解释是以历史回忆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心理学研究为基础的。对联觉的崇拜在法国作家的诗歌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用“堕落”的概念解释联觉,博德莱尔(Baudelaire)就是如此。联觉意象在他们的著述中具有特定的功能。他们根据工业化文明的实际要求,通过淡化不同知觉领域之间的界限,回避了不同种类之间的严格分类。那些坚持类型学的人把背叛旧思想的人作为敌人进行攻击。同样,纳粹也无法容忍背叛其计划的行为,甚至不敢使其“传统”看法具体化。

- [3]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在这两种类型之间进行区分:一方面,有些被试因为表现出明显的心向模式而被归入特定的类型;另一方面,有些被试只能从形式逻辑的意义上被归类,因为他们缺乏标准的品质特征。所以,确定一个人究竟是属于“真正的”类型还是“逻辑的”类型是很重要的。
- [4] 请参阅埃里克森(E. H. Erikson)的《希特勒的意象和德国青年》。
- [5] 这种分析当然是肤浅的。我们知道,在精神分析学说看来,昆虫和害虫常被作为兄弟姐妹的象征。这里涉及到的想像可能是被试的一种渴望,也即渴望打他的小弟弟,“直到他保持安静为止”。操作可能只是一种形式,而渴望控制兄弟姐妹才是真正的目的。这种类型的人意欲对那些与他们地位相等的人施以飞扬跋扈式的控制,例如统治兄弟姐妹。这位杀虫剂学家经常提到儿时与妹妹的争吵。
- [6] 这个术语由布朗(J. F. Brown)提出。
- [7] 我们在第十八章曾经指出,当宗教被内化时,它对偏见起着一种矫治的作用,或者说对法西斯潜力起着一种矫治的作用,尽管它本身具有权力主义的因素。
- [8] 需要指出的是,被试“在女人的家庭中长大,也即与母亲和祖母生活在一起”。



## 第五部分

### 个体和团体的分析

## 第二十章 权力主义人格与遗传的关系： 两个个案的研究<sup>[1]</sup>

我们已经运用各种研究技术跟踪了麦克和拉里，他们的反应与其他被试的反应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既涉及人格也涉及思想。我们发现，两人在研究的每个领域都出现了差异，从表面态度到主题统觉测验所检测的深层需要。我们已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不同的思想模式与人格结构的差异有关。本章的任务是描述这些人格结构，以了解它们在思想领域是如何表现的，尤其是了解它们是如何发展的。两个被试的许多人格特征已经得到揭示，主题统觉测验已经告诉我们两人各自的核心力量是什么？不过，对两人的完整阐述有待于访谈材料的结果。当我们把这些材料与前面讨论过的检测结果联系起来进行解释时，我们也许能够得出完整的和有意义的结论。

我们在分析这两个个案时，会重新提及前面几章讨论过的许多变量。我们认为，通过审视特定的细节，我们也许能够揭示某些具体的现象。尽管在具体的现象中我们的变量会变得较为抽象，但是我们却能够在这些具体的现象中获得某些有意义的发现。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关注并不像关注个体内部的变量模式那样来关注特定的变量，而是关注具体的权力主义人格与遗传的关系，并且借此与非权力主义人格相对照。

就麦克和拉里而言，我们也许会给麦克以较多的关注，因为

本书的主题是偏见。相比之下,给拉里的关注较少,因为他不持偏见。所以,拉里主要用于对照的目的,既与人格结构的有关成分相对照,又与偏见的形成和发展相对照。

## 一、麦克的例子

麦克访谈的临床内容如下:

“母亲长时间卧病在床。我还记得,她给我们讲故事和唱歌。她把最后的力气都花在了我们身上。至于父亲,我的童年景象有点模糊,不过有个印象很深刻。那是一个春天的早晨,母亲去世了,他来告诉我们。当然,他的年龄和我的年龄相距很大,他现在已经77岁了。母亲经历了三次手术。她离开我们时我很沮丧。邻居阿姨来照管我们。母亲死后,每逢我们生病,父亲都会长时间陪在我们身旁。”

“我姐姐比我大4岁。她结婚已有三年半了。她是一个家庭主妇,有个2岁的儿子,还希望生一个。我与她的关系很好,虽然有些争论,但是不像我与其他兄弟姐妹的关系那样。她负责烹饪,并且照料我。我们称她‘小老太’。她帮助我上学,给我买衣服。她是一个出色的速记员和藏书家。她借给我钱,让我去东方大学读书。我已经把钱还给她了。不过,她对我的思想没有多大影响。她对宗教不很认真,但有理想。她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因为父亲管得紧。”

“读中学时,我对任何事情都想得不多。在我上中学时,姐姐已经毕业。中学的四年我主要与父亲一起过。我毕业时,他跟我们住在……”

(在你父亲身上,你特别钦佩的东西是什么?)“他对我们这些孩子的重视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为人诚实。在整个社区

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言九鼎的人。他的最大贡献是牺牲自己的快乐来照顾我们这群孩子。”(你与父亲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吗?)“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我有我的心理,他有他的心理。我们有争论,但是我不记得因为我的异议而挨揍的事。我们的争论大多涉及我想做而他不想让我做的事情。譬如,我10岁那年想要一支来复枪或一辆自行车,可他没有同意。他花钱十分谨慎。他不让我过早工作,认为那是有失我身份的。他怕枪会伤害我。但是,他从不拒绝给我所需要的东西。”(年龄差异对你有什么影响?)“哦,我必须设法自己谋生。我的第一个社会工作是在德莫莱。开始时我只是一般人员,后来成为顾问。我曾在中学里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在商业学校读书时担任过学生会主席。他很高兴,经常鼓励我。”

“博德是我的表弟,他比我小2个月,喜欢打垒球和狩猎。我们经常在一起,很亲密。现在他在印度,我们很少通信。”

(你对童年时期最愉快的回忆是什么?)“博德与我度过的愉快时刻,还有我与其他群体度过的愉快时刻。我们滑雪,坐雪橇。我的欢乐是十分简单的,而且始终如此。但是,我喜欢精致的装备,譬如说一支好的步枪,这是父亲在后来替博德和我买的。父亲常在这儿过冬,自己制作冰鞋。他也教我们如何制作。”

(你童年时最担心的是什么?)“哦,主要是一些因缺乏资金而寸步难行的事情。我担心这类事情。读七年级时,我的拼写经常得优,但是,我还记得,在一次县级拼写比赛中,我被一个女孩子打败了。我发现,我常常在离成功一步之遥的地方遭遇挫折。譬如,在服役期间,我在接受一个重要任务之前生了病。现在,当我真正空下来时,我倒没有麻烦了。”

“12岁那年,他们发现我患有贫血。18岁那年,我第一次胃

出血。以后,每当我工作太劳累时,就会复发。”

(你在哪里得到性知识的?)“我从来没有从父母那里得到过任何性知识。虽说我的姑母给过我性方面的一些知识,但那不是真正的性教育。我的知识都是从书本中读来的。我听人们谈论过,但是接受得极少。我根据我读到的东西进行掂量。”

(你的第一次性体验是在什么时候?)“那是 1940~1941 年的事,也就是在华盛顿的一次新年晚会之后。那次晚会有酒。我是一个落伍的男孩,我希望娶一个比较成熟的女孩。她应该是一个好搭档、好伴侣。许多女孩只对玩感兴趣,而且总跟一些有钱的家伙玩。我没有钱给她们。我恋上的那个女孩现在住在离我 9 公里的地方。在她读中学时我曾经与她有过一次约会。我从部队退役后在一家木材厂工作,她毕业后开始教书。她的叔叔是一家银行的副总裁。他曾托我买一辆她感兴趣的汽车。我替她物色,由于我对汽车不大在行,所以把每辆车子都说成是最佳的。我就以那种方式和她发展了关系。我发现她对钱不感兴趣,但是我对钱感兴趣,因为我刚从部队退役,健康状况又不好,前景黯淡。她为人很好,虽不漂亮,但人品很好。她是法国人,有爱尔兰血统。身材不错,体型秀美。我们何时结婚要看情况而定。那是一种责任。她现在想结婚,但是我却受到大兵法案的管辖。如果我能考取大学,我就在今年春季结婚。我俩非常合适,我知道她对我感兴趣,尽管我能提供给她的东西很少。我们两人都处于合适的年龄。我想做点兼职工作。我不赞成她教书,我要靠自己的能力养活老婆。我始终有那种想法。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那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是一个好厨师,那是一笔财富。当我告诉她你也赞成我俩结婚时,她会高兴的。不过,这个决定要我自己来作。”

## (一) 环境力量和事件

### 1. 社会经济因素

麦克对其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十分了解,部分原因在于他未被充分地询问,部分原因在于他试图歪曲事实。我们从他的问卷中得知,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木材厂工人”,年收入为 1000 美元。访谈时我们被告知,他的父亲已有 30 年未工作了(也就是说,当他 47 岁时就不工作了,大约是麦克出生前 6 年),因此他目前的收入主要依靠“股票和债券”。我们还得知,在他工作时,他的工资是每月 75 美元,加上股票和债券,勉强凑成年收入 1000 美元。我们似乎有理由假设,麦克是在猜测。自他父亲退休之日起,主要收入恐怕来自退休金。麦克说:“他虽然拥有木材厂,但是他更喜欢为他人工作。”其实,父亲拥有的只是一个家,他有责任使家庭稳定。不过,我们没有理由怀疑麦克确是“因为缺乏资金而寸步难行”,或者说,这也是他的担心所在。

家庭地位处于社会下层,从实际的社会或经济发展意义上说,极少有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家庭地位确是一个现实问题。母亲和姑母设法把孩子送入主日学校,但是父亲(麦克认为是他的主要向导)却似乎没有参与这一努力。我们被告知父亲要儿子进入商界,而不是当一名侍者,也许是因为“那不符合我的身份”,这句话听起来肯定与地位有关。不过,它还是有点含糊其辞,致使我们怀疑这究竟是父亲的地位意愿还是儿子的地位意愿。看来,麦克想用下列方式来获得威望,一方面,他试图给我们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即他的父亲扮演着多重角色,既是一个退休的伐木工人,又是一个在社区一言九鼎的人;另一方面,他向我们显示,尽管经济条件不好,但他仍旧干得不错,以此来达到

同样的目的。在 47 岁时退休,且一年拿 1000 美元的人,或者两个孩子都处在婴儿期的人(甚至还没有出生),几乎不可能被描绘成有成就的人,或者被描绘成努力为孩子谋取利益和地位的人。麦克并没有告诉我们,他之所以这样说,原因在于他没有能力批判父亲。

## 2. 父亲

即便父亲没有追逐地位的倾向,但也没有证据表明他在传统道德或商业社会的价值等方面抱不屑一顾的态度。由于麦克夸大了父亲的美德,因此他的一些评论就具有了真理的光环。父亲虽然不去教堂,但仍“遵循教堂的规则”,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他“在交易中十分诚实和严格,甚至对我也从不姑息”。这些评论意欲告诉我们,父亲是一个遵守道德的人,至少对他儿子是如此。

麦克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暗示:每当他描述父亲的权力主义特征或父亲的行为模式时,他似乎不去否认它、排斥它,而是提出一些相反的特征,譬如,尽管“他把他的决定强加于我”,但是“他也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争论的内容涉及到“他不让我拥有我想要的东西”,但是“他从不拒绝给我所需要的东西”;“他虽责骂我,但却就事论事”,而且“他对我们孩子的重视是很可钦佩的”。对此陈述,应当取它们的表面价值,因为麦克描述的这种不一致性在父母中是常见的。这个个案的结论是,我们的被试既要处理权力主义的纪律,又要处理父亲的担心。对麦克来说,把父亲既放在纪律施加者的位置上,又放在爱的对象的位置上,因此他必须服从纪律以免失去爱。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母亲死后,<sup>[2]</sup>麦克的父亲起着核心的作用。令人怀疑的是,麦克似乎要我们去相信,他从父亲那里得到许多东西,或者说他像他的父亲一样也起着支配的作用。当谈

到他与父亲的年龄差距这一问题时,麦克的回答不是模棱两可的。他不仅对父亲的高龄感到烦恼,而且认为悬殊的年龄差异使得父亲变得难以理解,致使他在提到老人的退休时发出对父亲的怨言。人们很容易相信,一个“单独在山区过冬”的人往往是极度内倾的;而且,人们也很容易想像,在他妻子死后,他会花许多时间在家里盘算,不时地提醒自己发出一些指令,并且告诉自己应该对“孩子”更感兴趣。这种情况在偏见者的父亲身上是很难找到的。于是,人们会推测麦克的父亲是无偏见的人。但是,即便如此,他的沉默和保守在决定麦克走向偏见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这位父亲确实拥有上面提及的那些品质,那么它们在麦克身上肯定是没有的,因为他说他“无法理解”父亲的退缩。一种可能性是,母亲死后,麦克转向父亲,寻求爱和安慰。但是,没有证据表明父亲以适当的方式接受了他。就父亲而言,他没有温柔的暗示。于是,作为替代,偏见的被试便把那些空洞的美德(严格和仁慈)赋予父亲。父亲的沉默和父子的距离不亚于无意义的攻击,它们可能成为唤起儿子恐惧和敌意的刺激。

总之,我们可以估计父亲在现实中像什么样子:他是一个被打败的男子;他以一种权力主义的态度强迫儿子遵循习俗的道德标准,但却没有用实例表明坚持这些标准会导致哪些有价值的结果;在他妻子死后,他设法在他与孩子的关系中把某些母性作用移植过来,但是由于他的人格问题,他没能理解他的儿子或给予儿子足够的爱。

## 3. 表弟博德

尽管麦克对博德描述不多(这个表弟比被试小 2 个月),但是他似乎为麦克提供了交往的伙伴关系。这里有个暗示,即博德是两个男孩中较强壮和较武断的一个,而麦克却疾病缠身,胃部出血,最后未能考上大学。至于博德,我们的访谈表明,他作

为军人驻扎在海外。

#### 4. 母亲

在探讨麦克的母亲实际上是个什么样子时,我们遇到了像探讨他的父亲时所面临的同样困难:被试倾向于美化他的父亲,而且在总结他的一些特征时,加强了对自己人格需求的修饰,致使我们无法根据表面价值来接受他的评价。麦克告诉我们母亲是慈祥的和奉献的(“她把最后的力气都花在了我们身上”),她在道德方面是严格的(“她在教义的指导下把我们抚养成人”)。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大多数持偏见的被试都是这样报告的(它与不持偏见的被试恰成对照)。问题是,麦克的母亲(以及大多数高分男子的母亲)是否真的像他描绘的那样(这种情况促使我们了解这类母亲的影响与儿子偏见的关系),或者说,被试的人格是否具有这样的需要,即他必须这样描绘其母亲,尽管实际情况完全相反。

看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母亲的严格是按麦克的需要来展示的。她努力依据卫理公会(教会)的道德原则抚育她的孩子,而且她与父亲差不多,能为被试提供性教育。这种严格的模式在母亲死后由姑母和姐姐来继续贯彻。人们可以想像,姐姐被如此牵强地推到了母亲的位置上,成了“小老太”。这在试图强化习俗道德标准方面做得过头了。但是,如果认为麦克是“母亲统治”的受害者,那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严格性与我们在下层阶层母亲中看到的严格性差不了多少。

麦克可能感到他被这些女人控制了,或者说他发现他所得到的爱远远不够弥补强加在他身上的限制。确实,麦克从他母亲那儿接受了某种真正的爱。他还记得“她给我们讲故事和唱歌”,他对父亲并没有这样的印象。他报告了在获悉母亲死讯时的沮丧心理,而且他在主题统觉测验时也说过:“有一段时间,我

想到一位母亲那儿去,如果我有一位母亲的话。”看来,很清楚,他至少知道被母亲所爱是什么感觉。但是,麦克失去了这种爱,从而觉得很艰难。爱的丧失在他身上引起的被剥夺感很容易使他把后来的限制看成是不公正的。如果母亲的严格使麦克怀有某种不满情绪的话,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出于内疚感竟然把她理想化了。

母亲的疾病(“她长期卧病在床,而且经历了三次手术”)也成了影响被试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就是说,尽管他得到了相当的爱,但他仍感到靠不住:当他的需要超出了她能给予的条件时,或者说当她卧病在床而使他无法提出要求时,这种靠不住就变得很现实了。

#### 5. 麦克的毛病

麦克童年时期所患的疾病既可被视做对他后来的行为和态度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又可被视做由疾病引起的心理变化。疾病的严重性和长期性可从下列表述中清楚地看到:“12岁那年,他们发现我患有贫血。18岁那年,我第一次胃出血。”而且“服役期间,我在接受一个重要任务之前生了病”。这些疾病对麦克意味着什么的标志,在其问卷陈述中可以找到:“我的身体一直很弱,过去的4年基本上是在疾病中度过的。”这是使他最感烦恼的情绪或感觉。<sup>[3]</sup>

### (二) 深层的人格需要

这里,我们关注的是麦克人格中的那些需要。这些需要起因于他早期生活的特定刺激,后来却受到了压抑,从而使它们在目前的活动中只能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些需要并未形成他的“良好自我”,因为它们并没有被他的自我所接受。而且,对于这些需要,他既会向别人隐瞒,也会向自己隐瞒。因此,为了

评价这些需要,必须利用一些特殊的技术,以获得表象下面深层的内在成分。主题统觉测验和投射测验为我们提供了某些证据,表明这些需要直接与人格的抑制倾向有关。访谈材料的分析(它们特别重视“揭示”隐藏的动机)也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需要与人格倾向的关系。当我们把这种分析结果与投射材料结合起来时,或者说当我们把得出的结论用以观察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时,<sup>[4]</sup>我们便可获得有关深层人格需要的有意义的阐述。

### 1. 依赖性

在阅读了麦克的访谈记录以后,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他的依赖性(他渴望被照料、有依靠)不是深层的。他毫不隐瞒地告诉我们,他十分信赖他的母亲,依靠姐姐的关心,有时还转向圣经以求安慰,甚至当他谈到即将来到的婚姻时,也显然为有人可以照料他的前景所吸引。但是,麦克实际上不愿接受他目前的依赖性。只有在特殊的条件下,爱和依赖的需要才会公开表现出来。第一个条件是,设法使这些需要看起来好像是属于过去的,作为已经忘却的原先自我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表达出来。我们只需从他有一段时期需要一个母亲的意愿中便可探知这一需求。第二个条件是,这些需要可以由疾病的事实来说明。他似乎要让我们相信,他虚弱的身体是他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在此条件下,如果他因为体弱而从别人那里接受帮助的话,他就不会受到谴责。因此,正是患病使他转向圣经,或者说使他能够容忍女朋友为他赚钱和做饭的想法。即便在这些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麦克对依赖性仍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有必要作出这样的断言:事实上,他现在是,而且过去也是相当独立的。这种防御机制似乎是无意识地运作的。麦克根本没有意识到他在描述疾病的过程中隐含着同情。

可以肯定,一个年轻男子之所以想压抑他的依赖性,原因在于这种依赖性与他的男子气理想不一致,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在麦克身上,我们需要对付的是他的依赖性冲动。它们非常强烈,尽管麦克在抑制这些冲动时感到十分痛苦,但是这些冲动还是从深层来到了表面。我们可以说,他之所以不让自己公开表示这些冲动,原因在于它们太孩子气,或者说它们在儿时受到压抑,现在无法转变成更加成熟的表述形式。正是在这一点上,母亲的去世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我们有理由相信,童年时期的麦克的确从母亲那儿接受了相当多的爱和安慰。母亲的病情强化了他的需要,而她的死对他是一个严重的创伤。由于爱和安慰的主要来源均已丧失,因此他试图压抑他对依赖的渴望,这也是很自然的。他的姐姐和姑母看来不是合适的替代物。而且,如上所述,他曾试图从父亲那里获得“母爱”,但是由于他与后者的“距离”而遭到挫败。麦克提到父亲的奉献和关注可被理解为一种愿望的表示,而不是陈述父亲实际上像什么样子。

麦克在主题统觉测验中所表现的依赖性,似乎更多地与父亲有关而不是与母亲有关。正如研究人员指出的那样,他所需要的是向导和建议,而不是关爱和理解,这些需要是由害怕拒绝引起的。麦克的依赖性反映了他在童年晚些时候与父亲的关系,而不是与母亲的关系。我们的一个假设是,母亲死后,父亲既成了纪律的实施者,又成了爱的对象,所以麦克必须按照父亲的意愿严格行事,以免进一步失去爱。可是,这并不是他所期盼的那种温柔和安慰,也就是他曾经从母亲那儿获得过的那种温柔和安慰。这方面的依赖性需要受到严重压抑。麦克只有在其男子气理想被充分理性化以后,才能承认依赖父亲和依赖母亲两者的冲突。但是,由于对母亲的依赖处于更深的层面,所以导

致了他的防御。要使这种深层的依赖找到一种间接表示的方式,就必须借助符号作用。在教堂里享受音乐可能具有这种意义。同样的解释也能用于麦克对投射问题的回答:他着迷于自然奇观和稀有的珠宝金属。它们作为“母亲”的替代品,使原先指向母亲的需要,现在不起作用了。麦克对“事物”的依赖(例如对食物和《圣经》的依赖),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我们已经讨论过把疾病作为依赖得以容许和满足的条件。剩下的问题是,麦克的胃溃疡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因此它可能与无意识的依赖性有关。<sup>[5]</sup>

## 2. 敌视父亲

如果上述关于麦克父亲的描述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为什么被试会对他的父亲抱以敌视。当儿子需要爱时,父亲却表现出沉默,并且提出权力主义的纪律要求,这些都是容易引发攻击的刺激,麦克也不例外。不过,如果麦克拥有这些冲动的話,它们也会受到严重压抑的,因为他不敢责备他的父亲。这里,潜在的敌意是被隐藏起来的,只有通过微妙的暗示才表明它的存在。

在回答投射问题时,麦克告诉我们说,他发现“愤怒”是一种最难控制的情绪。这与访谈中他提到“脾气急躁”和“个性执拗”是相一致的。他试图给我们留下男子气的印象,以示自己是一个不可小视的男人。如同一个在黑暗中边走边吹口哨的男人,他的公开行为看来好像不惧怕黑暗,而其实他是非常胆怯的。在对投射问题(“谋杀和强奸是最坏的犯罪”)进行回答时,我们获得了一个暗示:攻击性可能是麦克的一个成见。随着我们接触主题统觉测验,证实这一推断是正确的。这里的分析似乎反映了“对世界的潜在敌意”、“原始的攻击性想像”,以及“冲动的反社会行为”等倾向。他在故事中列举了一个年轻小伙子的例

子,说他“如果被过分排斥的话,他就会采取暴力”。至于暴力的形式如何,或者暴力行为有可能指向谁,我们得不到直接的说明。这种回答与投射问题中的“怒气”十分相似。在这个例子中,麦克也许给我们讲了真话:他发怒的原因是想释放一些能量,这些能量对他来说并不熟悉,而且被模糊地想像为原始的和混乱的,但却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报复。

导致这种敌意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已经看到,父亲既是麦克童年时期想像的核心人物,也是麦克重大挫折的主要根源。主题统觉测验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主人公反对父亲人物的攻击行为,但是这种攻击性却是我们的被试最希望控制的,结果就表现为自我一异己现象。这种自我一异己的攻击是指向权力人物的,或者说指向“压迫者”的。“那个年轻人如果受到压迫的话,他也许会自杀。”问题是,主人公并未同压迫进行斗争,相反,用我们主题统觉测验的行话来说,“他认同这种压迫的力量”。正因如此,主题统觉测验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假设:对父亲的潜在攻击必须放弃或抑制,因为父亲被想像为强大的,在此情况下实施攻击,则攻击本身就会被看做是危险的。

重新阅读麦克的访谈材料,我们清楚地发现,他对父亲的感情是矛盾的。对麦克来说,有必要把对父亲的批评予以抑制,或者说用“好”特征来取代“坏”特征,否则的话,敌视的态度就有可能公开化。与之相伴的还有灾难性结果的想像。麦克究竟反对什么东西,是由他对投射问题的回答来提供的。麦克在访谈中说:“我看着我父亲,心想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行事。我已经喜欢上了社交,尽管我对此仍很畏惧。”喜欢上社交是麦克反抗父亲的一种表示,但他又感到“很畏惧”。就我们掌握的材料而言,麦克在其他例子中没有表现得如此勇敢。惟有在访谈时,当他了解到“父亲感到高兴,并且还对我进行鼓励”后,他认为这一定



是对他的安慰了。

### 3. 顺从、被动和同性恋

鉴于上面描述的念头,我们不难推断,麦克对父亲的表面态度是顺从和钦佩(它是与被试主张的自主和独立相悖的)。我们认为,面临父亲的不可抗拒的力量,麦克惟一可以求助的对象便是顺从,从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平衡。其实,这是一种用同性恋手段解决恋母情结的办法。<sup>[6]</sup>因此,我们在麦克的主题统觉测验中所发现的他害怕同性恋攻击的一些迹象就不足为奇了(参见他对待“催眠师”的态度)。

即便没有这种直接的证据,我们也会假设受压抑的同性恋,以便对麦克人格发展中的某些特征进行解释。访谈材料充斥着顺从的表示。与此表示同样清楚的还有上帝的概念:“他是一个严格的人,他对待我们如同父亲对待儿子一样。”看来,麦克渴望父亲的爱,试图用一个“好父亲”的意象去取代一个“坏父亲”的意象,“好父亲”会“花很多时间和我们在一起”。问题是,麦克不承认这种需要。即便当他以一种顺从的和恭敬的态度行事时,他也似乎坚持这种信念:他是一个具有男子气和自信的人。我们可以充分相信,导致这种自欺行为的原因在于,麦克的本意是屈服于一个权威,以便获得他的爱,但是这一本意却与被动性和缺乏男子气的原始意象相冲突。我们认为,麦克的同性恋在童年时期的施虐—受虐关系中受到压抑,从而停留在婴儿的水平上,没有充分地得到升华,而且在与男性的友好和平等关系中无法得到满足,相反,它决定了这种关系的统治—顺从性质。

### 4. 对虚弱的恐惧

麦克的受压抑的同性恋可能是他恐惧虚弱的主要原因。如果虚弱意指没有男子气,或者说意指他必须听命于一个不可抗拒的男性权威的支配,那么我们就不难看出为什么他竟然会竭

尽全力使自己表现得坚不可摧。

对虚弱的恐惧,以及隐瞒虚弱的需要,在麦克身上差不多已经表面化了。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它似乎位于他的特点和态度的背面。正是由于麦克努力掩饰他的恐惧,恐惧存在的证据便不易获得了。也许,最能揭示其心态的东西表现在他对投射问题的回答之中。对于“哪种心境最烦人?”的问题,他的回答是“身体虚弱。过去4年里健康状况一直欠佳”。如果虚弱仅指身体方面,而且可以借健康欠佳为理由,那么对麦克来说这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它并非单指身体虚弱,而是一种普遍的不适应感,我们可从麦克对投射问题的回答中推断出来。该问题涉及最大的财富是什么。他的回答是“从身体上、经济上和社会上满足自己的欲望”。在麦克的案例中,这一论据被不同寻常地强调,而且与主题统觉测验的陈述相一致。我们还记得,麦克对故事的描述也十分强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或者说“像大多数人一样”。该欲望的背后隐藏着潜在的恐惧和不适应感。

主题统觉测验相当直接地揭示了麦克对性的态度。他蔑视和厌恶女人的态度显然来自这样一种思想:她们会把一个男人搞垮,或者削弱他“坚强的性格”。正是由于女人有着这样的特性,所以她们是不该被信任的。她们削弱男人,通过让他卷入“肮脏的性交易”而削弱他的男子气。

我们不应低估麦克对虚弱的恐惧。我们可以想像得到,疾病的体验重新唤起了婴儿期的无助性焦虑。更有甚者,“病孩”的意识使麦克在与表弟博德的关系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于是再度引起同性恋感觉(其结果已在上面讨论过了)。此外,麦克越弱,父亲对他就显得越强。正是这种想法(父亲太强太危险)阻止了他对自己的认同。这种不能认同的心态本身也足以构成他害怕自己缺乏男子气的基础。母亲的生病和死亡也是一个因

素。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我们有某种理由相信,他在童年时期是相当强烈地认同于母亲的(他的疾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与母亲有关)。随着母亲的离去,内在的安全感丧失了。从母子的一致性走向父子的不一致性,是麦克易受伤害的一个原因。

对麦克恐惧虚弱的考虑,似乎有助于说明他同依赖性的斗争。也许,在他看来,他的依赖需要是一种虚弱的表现,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不愿承认这些需要的一个原因。如果公开承认从一个女人那里接受帮助、关爱和安慰,那就意味着与她的身份相一致,丧失了男子气,所以必须与女人进行斗争。如果公开承认从一个男人那里接受帮助、关爱和安慰,那就意味着他被那个男人作为女人来对待了,从而也丧失了男子气。由于在麦克的深层自我中很想以此方式受到对待,因此虚弱感经常受到刺激,没有一种相反的力量可以完全驱逐它。

### (三) 表面行为和态度的动力

在提供了这些潜在倾向(依赖性、对父亲的敌视、顺从、被动性、同性恋,以及对虚弱的恐惧)以后,我们便可对麦克的人格特征和态度予以合理的解释了。这些表面倾向大多是我们讨论过的深层需要的衍生物,只不过通过心理结构使表面与深层联结起来。

关于麦克人格的系统阐述,就其遗传而言,早期的力量和事件是其基础,而对虚弱的恐惧处于中心位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它一方面产生于对依赖的深层倾向,另一方面则产生于对顺从、被动性和同性恋的深层倾向。也就是说,一方面这种恐惧需要若干保护手段,它们导致各种行为模式和表面态度;另一方面这种恐惧必须加以否认和减弱,如果有可能的话,加以克

服。因此,我们在麦克身上观察到,他试图通过言语的否认和难以对付的样子来隐瞒其虚弱感,通过对他人的投射来去排除这种虚弱感(主要是对外团体的投射,也即谴责外团体),以及通过对权力人物的认同来减弱虚弱感。

麦克直率地对虚弱进行了言语上的否认。在他的访谈期间,他尽力暗示我们说,他不仅不弱,而且很强壮。如果确有什么虚弱的话,那也是由外部环境造成的。麦克易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影响,这可从下列事实中看出:为了为虚弱寻找借口,导致他歪曲现实,夸大自己的力量,并且按下列公式错误地理解外团体的意图(“如果我确有表现虚弱的地方,那是因为他们太强大,而且对我进行不公正的利用”)。尽管麦克身上的冲突要比我们在精神病患者中发现的紧张程度少得多,但是这种“迫害情结”常与受压抑的同性恋联结在一起。这里,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包括他与之斗争的一切,以及关于犹太人、新政策和华盛顿政府机构的投射思想等),就是他的论点中所蕴含的自怜。只不过麦克的斗争是从他儿时与父亲的关系角度提出的:“父亲那般强大,我又怎么去反对他。在这种情况下,没法指望我变得强大和独立,成为一名真正的男子汉。”他通过把整个情结置换到每个人的父子关系中去,以免去反对强大的个人或团体。也就是说,他在暗示我们,他的思想(儿子反对不了强大的父亲)带有普遍性,几乎为每个人所有,借此给人一种他是“正常的”印象。

麦克设法装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以隐瞒他的虚弱。“精致的装备,例如一支好步枪”也许是男子汉的一个标志。但是,他得不到,于是就用健壮的身体来予以补偿。<sup>[7]</sup>如果连身体健壮都做不到,那只好用心智健全来予以补偿。他的反内感受作用可被理解为是回避任何“虚弱”。

驱除虚弱感的最佳机制是投射：“我不弱，他们弱。”麦克利用了这种机制。他把个人和团体置于残酷的“强弱对抗”之中。他所关注的不是认同虚弱，而是将自己与犹太难民和女人区分开来（他是强的，后者才是弱的）。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同情弱者反而憎恨他们，那么他会回答这些人的虚弱是真正的虚弱，或者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通过把这些人投射为虚弱，他就显得强大了。

麦克的回答具有双重含义。首先，这些弱者使他想起自己的虚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所有恐惧。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弱者是危险的。当他说犹太人“不该”对他们受到的迫害“表示不满”时，我们很容易推论出，他已经意识到他们确实对迫害表示不满，而且想伺机进行报复。正如主题统觉测验所揭示的那样，女人和黑人被认为与犹太人是一丘之貉。母亲的严格，以及后来姐姐和姑母对母亲政策的贯彻，都有助于教会麦克说女人是咄咄逼人的。但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关于“弱者”的危险基本上是以投射为基础的。受迫害感在他身上引起了暴力的冲动（“那个小伙子如果被过分排斥的话，他可能会杀人”），他甚至想像“受践踏的人”也会有同样的行为。

正如已经指出的那样，对女人的恐惧不仅能够用来解释麦克的性问题，而且能够为问卷和访谈中的道德主义性态度提供充分的证据。那么，既然他对女人抱拒绝态度，又如何解释下列事实呢：麦克把自己的母亲理想化，并且打算娶一个具有“极好人格”的姑娘。这里，必须考虑的是，麦克实际上具有两种女人的概念：一种是坏的、弱的、危险的、剥削的和性欲的女人概念，她们把男人拖下水；另一种是好的、完整的、赐予的和无性欲的女人概念。前面那种女人能与任何一个人发生性关系，譬如“那次新年聚会的遭遇”；后面那种女人与前面那种女人相反，譬如

她对“玩得很开心”，“花掉伙伴们的钱”或者任何一种“肮脏的”东西不感兴趣。毫无疑问，这种“好女人”的意象主要来自母亲的意象，“她把最后的力气都花在了我们孩子身上”。当然，麦克很想重新获得曾经从母亲那儿得到过的关爱和安慰，于是就将这种动机予以恰当的理想化。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他对母亲的赞赏似乎有点过头了，以至于暗示我们，他之所以把母亲理想化，目的是缓解内疚，也即排除对她的敌视态度。对于麦克未来的婚事，我们不抱乐观态度。原因有两个：一方面，他的需要超出了任何一个女人所能提供的能力，另一方面，他感到向自己的妻子要这要那是一种虚弱的表示。

有关材料还表明，麦克为力量和地位而奋斗（“提升”自己或“向上”运动）实际上是一种过度补偿。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便可以理解当依附和认可的需要出现在主题统觉测验中时，为什么会表现为他想比别人高出一筹的欲望，以及为什么作为“德莫莱”的一名顾问和商业学校的一名学生会干部对他来说如此重要。在麦克的思想中，地位内驱力的作用已在他关于职业和收入的评论中得到了表现。看来，对他来说“向上爬”意味着社会等级的提升，而统治集团和被统治集团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他的目的不在于改变这种现实，而是意欲在统治集团中占据一席之地。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讲，这是改善个人命运的一种欲望。由此可见，麦克关于团体关系的想法是受“强”和“弱”的类别所支配的。根据前面的人格分析，我们可以说，麦克对团体关系的解释是他与父亲关系的折射。强弱对立已成显著的事实，这种想法主要来自儿时的创伤经历。由于麦克无法想像自己能够反对不可抗拒的强大父亲，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尝试便是使自己深信父亲是“好的”，从而与之结成同盟。这种情况与麦克关于团体关系的思想相一致：他实际上不敢反对任何一个强大

的团体,相反,把这些团体说成是好团体,对它们表示钦佩和顺从,试图通过迎合他们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软弱。

我们把这种态度称之为权力主义顺从,它也是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麦克人格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态度有赖于通过认同强大的力量来克服自身的软弱。只要权力主义顺从是克服软弱的一种手段,那么它能够作为一种抵抗的力量来对付潜在的同性恋和被动性。在对强大的团体和个人施以美化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一种对父亲般人物的敬爱、支持和顺从的需要,因为上帝“严格地说也是人,只不过他要比世界上任何人都伟大,他对待我们如同父亲对待儿子一样”。由于表示真正需要的渠道均已关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美化强大的团体和个人是允许公开化的。不过,这些团体和个人必须十分强大,强大到足以使他有可能会参与其中,强大到足以使他的顺从能被轻易地原谅。也许,有人会问:“罗斯福总统在这个国家里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父亲式的人物,为什么没有被麦克愉快地接受和钦佩,反而作为一名‘独裁者’被拒绝呢?”回答似乎是他(罗斯福)还不够强大:“在与温尼(Winnie)的竞争中才居第二位。”<sup>[8]</sup>至于马歇尔将军,“无人可以改变他的地位”。

我们在第二章已经详细地描述过权力主义顺从如何使这个被试在政治上持保守主义态度,在道德上持习俗主义态度的。由于缺乏内化的超我(这是未能实现与父亲的一致所带来的结果),麦克只得从外部寻找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的指导,从而转向强大的权威当局。可是,他不愿承认这是他的真实心态,而是认为这是他的固执性格所为,或者说他是一个只相信自己决定的男人。

最后一段话表明麦克与他的权威当局的关系并不和谐,他对自己作出的这种安排并不感到舒服。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他的

权力主义根源,则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来自他对父亲的敌视。这种敌视导致了以恐惧为基础的顺从。尽管顺从也为他提供了回报,但是恐惧在麦克对权威的态度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是这种情况,促使他坚持习俗的标准。

麦克对少数民族团体和其他团体的敌视态度,也可在他的道德评述中看到。他所求助的道德标准也就是他所顺从的外部权威当局的道德标准。因此,他的攻击性也是以权威名义进行的。他之所以如此安排这样的道德判断,目的在于他的道德标准和他的深层的反社会冲动能够协作起来运作。但是,只要我们问一下他关于外团体的概念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概念会对他产生刺激,那么我们就又重新被引向导致他产生内团体权威的概念和态度的同一个根源中去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所见到的那样,外团体因为自私和攻击而遭憎恨。认为外团体是“弱者”的观点也是一种逻辑的矛盾,而非心理的矛盾。麦克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思索是受无意识过程支配的,从而无法被期望与逻辑规则相一致。<sup>[9]</sup>外团体谋求权力的特征与内团体令人钦佩的特征都可理解为对父亲的童年期意象的衍生物。由于麦克不敢反对他的父亲,相反只能顺从他,因此他必须使自己相信父亲是好的。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并没消除他对父亲所抱的敌视。此外,麦克也不想运用自责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缺乏自我批判。他所做的是将敌视转向外团体,或者把原先准备怪罪于父亲以挫折、惩罚和迫害转向了外团体,然后对它们抱以憎恨,因为归因于它们的特征正是内团体权威当局会严加谴责的特征。因此,所谓父亲拥有的“良好”特征其实是与“不良”特征相对立的,而后者则是犹太人所具有的:父亲的“最大贡献就是放弃自己的欢乐来照料我们这些孩子”,犹太人则“对人道主义不感兴趣”。当父亲以“诚实”闻名时,人们

应该对犹太布商备加小心了。与此同时,父亲身上的一个特征麦克是予以批评的,那就是社会性退缩,而这种特征在犹太人身上也是很突出的:“他们拒绝同化,拒绝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如果犹太人看到麦克对其父亲的自相矛盾的感情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获得一种安慰,也就是说,麦克对犹太人的感情也是相当矛盾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麦克对犹太人的评价就很清楚了。他对犹太人面临的压力所给予的“补偿”是:“他们都是商人。”我们知道,麦克对商人除了敬佩外别无他言,尤其是那些代表着“财富集中的阶级”,例如“大资产阶级”。不过,遗憾的是,犹太人并没有从麦克的矛盾心理中得益,因为他们被假设的无能对他来说更加危险。好父亲的形象与坏父亲的形象相分离是麦克调节其人格的一个核心要素。与他在父亲身上看到的“坏”相比;他关于犹太人的印象也是没有“好”人。

我们的材料表明,麦克是通过他的民族中心主义来发泄其攻击性的,也就是对各种外团体施以权力主义攻击。不过,潜在攻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也为他的攻击性情绪提供了发泄的渠道,那就是愤世嫉俗。关于被试的这种倾向,我们在第二章和第七章已有过描述。现在看来,它的主要原因是受压抑的不满情绪,这是目前的分析必须予以关注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愤世嫉俗的破坏性既针对自我又针对世界。<sup>[10]</sup>不仅被试把自己的攻击性投射到他人身上(他人被斥责为谋利的和好战的),而且对他人的蔑视与对自己的蔑视紧密地联系起来。在麦克的案例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其他权力主义人格),自我蔑视产生于他的虚弱感,正如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是屈从于其父亲的后果。这种屈从不为被试所谅解,但是他又不敢对那些强大的人物实施攻击,于是就会产生一种恼人的提示,也即他实际上是弱的。他设法使自己摆脱这种思想,将蔑视投射于他人,这样一

来,说他恨别人就有根据了。

为了完成这样的描述,我们必须回到麦克的依赖性问题上。在失去母亲以后,麦克产生了被剥夺感,而且日益感到由于他的软弱,别人可能会抛弃他或者利用他。在他看来,别人应该给他些什么,而不是剥夺他或利用他。他对母亲、父亲、姐姐和未婚妻的赞扬是因为他们能够为他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而“坏”人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自私或“对人道主义不感兴趣”。不难推断,他之所以关心公正,目的是想获得某种东西。一个人能够一会儿动情地谈到正义,一会儿却又建议把那些受到希特勒迫害的人赶出美国,这种情况表明被试没有在根本的意义上使用“正义”这个术语。但是,他的“谋利”遇到了他的习俗道德,后者是反对这样做的。于是,他十分小心地向我们保证说,他已经“偿付了”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在叙述收入方面的问题时,强调自己是颇有节制的。根据麦克的社会观点,这种获得性冲突的意义在于这样的事实:它为反对外团体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外团体被说成是“唯物主义的”和“金钱挂帅的”。由于外团体被谴责为做了他的内团体已经做过的但又想予以否认的事情,所以必须施以这种投射。

麦克的依赖性特点是自我一异己的,而且,作为一种无意识力量,它导致了对他人的错误判断和拒绝。这种情况已在上面关于潜在的依赖性的讨论中描述过了。它把我们引向麦克的定型模式。该模式不仅是他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而且对他的偏见有着重要的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关于社会现象的定型模式与他的反内感受作用的态度和依赖有关。可以这样说,麦克对社会现象的解释之所以如此原始和简单,原因在于他不会运用社会的或心理的观点。当然,这不是由于他缺乏理智或缺乏信息(因为对他的访谈所作的考察表明,他在这些方面超过了

大学生的平均水准),也不是由于他的教育存在问题(因为在这个国家里,诸如此类的现象十分普遍,它无法用来解释为什么麦克会从那么普遍的现象中突显出来)。原因在于,他能够运用社会的和心理的观点,但是他却不愿这样做。我们可以充分地相信,个体心理因素在这里起着重要的作用。麦克的案例至少暗示我们不能认真地考虑他人的社会因素或心理因素,因为他无法把握自己行为的条件或前提。他不愿对他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观察,因为这会引起他太多的焦虑。看来,他只能看到他以前看到的,了解他已经了解的东西。在我们对麦克的反内感受作用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力图回避对人类因素的内省或注意,以免影响他讲究实际的感觉。对他的人格所作的全面分析也表明,他的问题要严重得多:他不得不处理各种强烈的无意识冲动,它们不仅不与自我相结合,而且还容易失去控制。总之,维持他的压抑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种情况在前面各章被描绘成自我虚弱,而麦克的例子则对这一概念提供了极好的说明。当他还是一个孩子时,他所面临的问题(失去母亲,与父亲有“距离”)已经超出了他那未曾发展的自我所能处理的范围。于是,原始的防御(主要是压抑和反移情)就成为必要的了。自那时以来,自我不得不花许多能量来维持这些防御,致使自我本身得不到正常的发展。自我一方面受到内部的情感冲动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到外部的权力主义指令的制约。由于内部的冲动比外部的权威更为可怕,因此他就必须严格坚持后者的标准。问题是,这些权威并未被他真正接受,于是这种坚持也可能在某些情况下被放弃,而且惟有如此他才会感到安全。正是因为儿时的创伤体验没有与自我结合起来,所以他就会运用童年时期看待世界的方式来支配现在的思想。人格内部缺乏自我,导致被试不能容忍内部冲突,不

会进行自我批评,相反,倒是形成了一种以异己为标志的对世界的敌视态度。

## 二、拉里的例子

我们现在转向拉里的例子。对麦克的最终评价,以及对该个案的实际含义的判断,只有在我们比较了两个例子后才能作出。

在对拉里进行访谈时,访谈者作了如下的观察:

拉里是世俗的、保守的、彬彬有礼的、顺从的、文静的,而且是一个遵奉主义者。显然,他可以被归入一个被动的女性化的类别。他阅读过戴尔·卡内基的著作,并因此变得彬彬有礼、友好和开朗,但较缺乏内涵。

外表上看,他身材矮小,秃顶,有点女子气。他的依赖性极强,积极参与访谈,而且看来十分喜欢访谈。访谈结束时还专门作了评论,关注该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尽管他在政治上高度保守,而且有着自己的商业目标,但是在他身上仍具有某种朴实和超凡的东西。

下面是拉里的访谈内容。

(你童年时期是个什么样子孩子?)“我极少挨打。我很活跃,能玩各种游戏。不是我说大话,我确实讨人喜欢,例如讨一些女邻居的喜欢。她们说我是一个好男孩。那是我大约10岁以前的事。但是,一旦我走出家门,我就调皮起来了。我很少遭遇困难。我的哥哥大我半岁,我们经常在一起,打架,互相妒忌,然而也会友好地去看展览或其他别的什么。他的身体比我结实。我一直长得很矮小,现在仍然很矮小。我哥哥比我热心,也比我保守,他不大会利用机会。他身材好,相貌又英俊,加上判

断力比我强,我十分钦佩他,但是我始终保持我自己的独立性。”

(幼年时有何特别的经历?)“3岁那年,我的一位叔叔去世了。我记得他的遗体放在屋子里,而且整天放在那里。过后,柩车把他拉走了。他活着时常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我很喜欢他。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我的婶婶也特别好,她常常哄我玩。一次,我想大约也是3岁左右,我爬上围着公牛的木栅栏,公牛朝我冲来,雇工及时把我抱走,我吓得要死。我记得母亲当时也在附近,她也吓得要死。另一次,大约我3岁或4岁,我和哥哥在农庄里捉兔子。兔子钻到后院的长管子里面,我和哥哥使用长竹竿把兔子从管子里捅出来,它从管子的另一端钻了出来。我和哥哥使用竹竿敲兔子的头,然后生擒了它。特别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还生擒过一头野兽,我甚至抚摸过它的毛皮。还有一次,我骑在一匹马上,既害怕又快乐。”

拉里努力回忆,想起了许多事情。

(你与父亲的关系如何?)“我记得我2岁半时父亲曾十分厉害地鞭打过我的哥哥。结果,母亲便带着我和哥哥到镇上去了。我记得我们去了律师事务所,并在那里过夜,因为没有其他地方可去。第二天早上,父亲来到律师事务所找我们,并与母亲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就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言,这是我所知道的惟一事件。从那时起,两人不再争论,相处得很好。我有一个很好的家。”(你的父亲严厉吗?)“他并不严厉,但是,当他要我们做某件事时,我们就必须去做。我们很少挨打。不过,当我们挨打时,那是很厉害的。”(你挨过打吗?)“我挨打的次数没有我哥哥那么多。我会略施小计,逃避挨打。12岁以后就不再挨打了。但是,我记得哥哥在15岁时还挨了一顿打。由于我学会了使用计谋,我就不会重蹈哥哥的覆辙。当我还很小时,我就能做一些避免惩罚的事情。母亲打我们的次数更多,但不像父亲那么厉

害。我们害怕母亲把我们的过失告诉父亲,以招致他的惩罚。母亲的主要威胁不是‘我要揍你’,而是‘我要告诉你的父亲’。至于她自己动起手来,那是十分适度和有节制的,我们几乎喜欢上这种惩罚了。”

(你害怕什么?)“直到16岁或18岁,我还怕黑暗。但是我克服了它。除了蛇以外,我不怕其他动物,现在我仍害怕蛇。”

(你做恶梦吗?)“我做恶梦,但是我想不起做过哪些恶梦了。我经历过一个恐怖事件。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们住在一所大的农舍里,刮风时农舍会发出响声,我躺在那里睡不着,心想有谁会在那里,于是就害怕了。我记得有一次夜里无论如何睡不着,结果爬到母亲床上去睡。”

“我会做一些不愉快的梦,我不知道它们是否属于恶梦。譬如,我梦见自己的心脏停止跳动了,或者我得了一种好不了的病。一次,我梦见我的腿被截肢了,我不得不触摸它,看看它是否仍在那里。这也许是由于战争的缘故吧!最近,我梦见我躺在床上,有人要抓我。我无法动弹或叫喊,我好像完全瘫倒在那里,后来我终于醒了。我还梦见我看不到周围的人,好像我变瞎了。”

(青少年时期的情况怎样?)“我顺利地度过了青少年期。我并没有注意到我的生活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化。”(性欲情况怎样?)“没有多大问题。我一直在想女孩子,就像大多数男孩子通常所做的那样,而且我会用眼睛盯着她们。15岁那年,我便与女孩外出。我很喜欢她们,常在学校里和社区里与她们交往。你知道,人是有性欲的,但是你不会让性欲来控制你。”(你对性道德怎样看?)“我觉得一个女孩子无论如何应在21岁或22岁前保持贞洁。如果她期望以后要结婚的话,那么她就应该等到结婚以后再有性生活;但是,如果她不想结婚的话,那么她与一

个未婚男子发生性关系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他们不乱来,他们的道德标准就不会降低。她可以与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但不该同时与几个男人发生性关系。”

(你与女孩有过性关系吗?)“我从医院出来以后与一个女孩有过几次性关系,那时我已经24岁。在我有把握之前我不会结婚。她最好是一个处女,当然也不绝对。我不会尊敬已经和别人睡过觉的女人。我知道那很自私,但是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想的。”

(你理想中的妻子该是什么样子的?)“她不当工作,没有职业。她应当留在家里,爱我,照管家庭,对穿得好和玩得好不抱太多的期望。她应当有个好名声,有吸引力,身材不要比我高,但也不要太矮,譬如说比我矮2~3厘米。她应当有智慧,大学毕业,容易相处,有同情心,是个贤妻良母,能与我同甘共苦,即使我病了她也不会变心。她不当过度饮酒,适度饮酒是没有问题的。她不当与其他男人太友好,你知道有些已婚妇女会用手臂挽住其他男人,但是她应当对男人持友好态度。她应当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也就是说出身很好。她的财富不仅仅是物质的。”

(你理想中的丈夫该是什么样子的?)“他应当给女人幸福,为她提供安全、家庭、汽车、享受和娱乐。他应当有钱旅游。对孩子来说他应当是个好爸爸,不应给妻子带来任何担心。他不当酗酒,而且应该忠于自己的妻子。”

(你理想中的好父亲的标准是什么?)“他应当为孩子作出奉献,为他们提供温饱和教育。他不当把他们宠坏,譬如在中学期间就给他们买汽车,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他要对他们好,带他们去度假,以仁慈的、坚定的方式管教他们,从小教他们相应的道德,为他们提供良好的环境。”

(你在学校里擅长什么?)“我擅长历史和经济,对其他东西不很擅长。我的平均成绩为C+。我在中学里读书时并不努力,是个混混儿。我喜欢运动,在中学里打了4年篮球,但是,由于我太瘦小,因此无法取得很大进展。我在语文和数学方面都较困难。我上了一年大专,接着就生病了,在疗养院呆了4年。出院后参加了工作,后来又回到学校读书,现在已有一个学期了。目前我住在一个合作社的房子里。”

拉里的人格特征是两组特征的混合:一组是依赖性、被动性和女性化的特征,另一组是内化的但却狭隘的和限制的超我。这两种模式在该被试身上要比其他不持偏见的人更为显著。由于依赖性、被动性和女性化在低分男性中较为常见,因此拉里的“软弱”是具有代表性的。他的保守性、世俗性和权力主义的攻击(在该案例中,这些倾向可以归属于超我)都是十分显著的,他所表现的许多特征在高分者身上也有发现。他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高分。不过,拉里和麦克之间仍是可以比较的。

拉里的许多特征能在下述的基础上被归类:它们反映了依赖性、被动性和女性化的一般模式。他相当公开地表达了他的理解、支持和欲望,以及准备接受他所期待的物质帮助。他想被人喜欢,为此目的他抑制了攻击,并且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到愉快。此外,他需要欢乐、安慰和休闲,还需要具有慷慨的和可靠的供应源。他对世界持有“索取”态度。阻止他不去索取的原因在于这样的信念: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种信念甚至助长了他的慷慨。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应拥有充足的东西,而且快活,包括他自己在内。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他接纳人际关系,认同别人,既分享他人的感情,也为他人提供感情。这种态度使他对那些被践踏的底层者表示同情,亦是他对少数民族团体持积极态度的一个基本特征。他不受下列思想的支配,即认为“软



弱”会使一个人实施攻击,他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而这一倾向在麦克身上是与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他能体验人类的情感,知道如何内省,懂得享受生活,承认自己具有恐惧、焦虑和怀疑。与所有这些相一致的是这样的事实:他与女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认为她们与他本人相比没有什么不同。

这些倾向在拉里的行为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他的情况与麦克的情况不同,在麦克身上,这些倾向是在人格的表层以下运作的,从而使他否认和反对这些倾向。那么,究竟什么东西造成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呢?看来,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是被试在童年时期与其母亲的关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麦克屈从于严重的创伤体验,相比之下,拉里与其母亲的关系是亲密的,而且大多数是得到满足的。母亲在拉里的童年时期显然处于核心地位。我们有理由相信,母亲关心他,而他也强烈地依恋母亲。这种寻觅关爱的态度后来转移到了他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之中,他谋求获得她们的爱,并且通过成为一个“好男孩”而保持这种爱。长大成人后,他仍然希望获得孩提时代接受过的那种满足,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与此相比,麦克则被迫压抑童年时期的依赖需要,找不到表达它们的适当方式,因而产生挫折、不悦和自怜。可是,拉里仍然认为他在儿时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现在也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因此他对关爱和支持颇为敏感。正是因为尚未得到充分的满足,拉里才会在儿时认同其母亲。认同是接近母亲和依附母亲的一种策略,也是保护自己免受拒绝和敌视的一种手段。不过,这种认同对拉里来说是适合的,它建立在关爱的基础之上,而非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之上。

拉里之所以对他的女性化特征感到舒服,另一个原因在于他的母亲在很大程度上是坚强的。被试告诉我们,当父亲对拉

里的哥哥严加惩罚时,母亲就带领孩子见她的律师去了。这等于宣告她不怕与父亲作对,从而使拉里从小获得一种安全感,找到了保护之源。结果,拉里站在女性(母亲)一边,与她保持一致,没有无助的感觉。这种情况与麦克正好相反:不管母亲何等“甜蜜”或“奉献”,麦克也不可能接近母亲,或者与她保持一致,因为她被认为太软弱了。很显然,拉里认同一个女性角色基于这样的前提:不把弱者看做是无助的,不把失败看做是不能容忍的,这样一来,即便把弱者和失败者的痛苦与女性角色联系起来,也是不会曲解她们的。

如果说拉里的被动性和亲密性是其儿时依赖母亲的一种产物的话,那么在其人格内部应该存在一种功能,它充当着防御机制,反对潜在的攻击性冲动。拉里在访谈时,以及在对投射问题进行回答时,表现出对攻击性抑制的关注。他曾说,如果他只有6个月时间好活的话,那么他将充分享受快乐,而且“所有都不会伤害其他人”。这种“伤害某人的感觉”是他最感烦恼的感觉之一。他关心“真实的人际关系”,为受压迫的人民而担忧,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他的爱是为了不去恨。当然,拉里也有潜在的攻击性,主题统觉测验提供了他具有“强烈的潜在敌意”的证据。不过,这些冲动既指向女性也指向男性。对女性的敌意起因于害怕自己被拒绝,从而可以理解为上述讨论过的依赖母亲的一种结果。这种情况与麦克不同,麦克之所以对女性抱有敌意,原因是害怕她们会把他拉到她们的水平上去。至于拉里的敌意,则与反叛有关。这里,拉里表示的态度涉及到他的父亲。访谈材料表明父亲常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人,并对孩子施以鞭打。这可能成为拉里为什么具有敌意和反叛的理由。不仅如此,主题统觉测验还提供了这样的线索,即拉里责怪父亲没有给予他充分的爱。访谈记录也表明,拉里所说的做父亲的标

准似乎与这里提供的线索相一致。但是,拉里也爱他的父亲,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他保持一致。这种情况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反叛的攻击违背了拉里的良心,并使他深感内疚和不安。为了避开这些情感,他必须赞美其父亲,屈从于他的理想,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其实,这已是高分男性的特征了)。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拉里和麦克之间最为关键的区分上来。两个被试在攻击的性质、强度和方式等方面均有所不同。拉里对他的攻击负责,他意识到自己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对其父亲进行报复。至于麦克,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的攻击性似乎与他的人格的其他部分没有关联(这些部分已经遭到否认),而是以盲目的冲动方式突然爆发的。我们把麦克的攻击性归因于他对父亲的极端害怕,而拉里的害怕尚未达到这一程度。拉里告诉我们他害怕父亲的惩罚,而麦克则不承认这种害怕。拉里的表现是他仅仅害怕被鞭打,而麦克的表现则是害怕手足被撕裂。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有两个:第一,拉里的父亲从客观上讲较少危险性,也就是说他更富有人性,更善解人意;第二,拉里有母亲支持他,母亲敢于和父亲作对,尽管“她会把我们的过失告诉父亲”,但是父亲不公正时,她又会保护他。

两个被试处理攻击的方式也不同。对麦克来说,这种攻击受到直接的压抑,并被转移到外团体上去;而对拉里来说,这种攻击则转向自我,引起内疚和自贬。拉里的这种表现使他不可能去谴责其他个人或团体,相反,倒是准备谴责自己,怀疑问题可能出在自己身上。这是良心(通过既认同父亲又认同母亲而建立起来的一种良知)在起作用。拉里愿意接受并内化父母的惩罚或异议,因为他享有充分的爱,使得他把这种牺牲看做是值得的。在麦克的例子中,父亲成了一种实际的危险源,只是因为恐惧父亲,才使他与父亲保持一致。

当然,不能把拉里视做人格整合的典范,因为他在感到自己必须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他认为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之间存在显著的差距。由于他继续依赖父母的关爱和支持,因此他就不得不努力,以免失去他们的关爱;由于他潜在的攻击倾向没有充分地与自己结合起来,因此他就必须对这些倾向予以谨慎的防御,包括对受虐狂、被动性,以及对受害者的过度怜悯的防御;由于他对少数民族团体的积极态度部分地是以神经症的倾向为基础的,因此当他看到自己身上或其他团体中确实存在某种邪恶时,他就会无所适从。拉里要想改变目前的心态将会使他陷入严重的沮丧之中,这是因为,尽管美德和善行确能导致爱的回报和物质的支持,但是他将继续忍受忧郁之苦,而且没处公开发泄。

不过,必须指出,拉里是能够进一步成长的。他愿意对自己进行观察,探究自己的动机,这一事实说明,他可以达到更高层次的人格整合。随着他对自己的了解的深入,我们可以期望他对世界的了解也会增长。

我们不应期望拉里在民主信念方面会变得更加直率,我们也不应期望他在紧急关头会起领导作用。这是因为他太弱了,以至于不会发起公开的攻击。确切地说,他的策略是用非冒犯的方式来息事宁人,以便人人都以“合作”的态度行事。

拉里的例子告诉我们,决定低分者摆脱偏见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为自己身上的“邪恶”承担责任。但是,正如我们的临床样本所显示的那样,承认自己的软弱并不要求人人像拉里那样连一点攻击性的反抗都没有,同样,对自己的“邪恶”负责也并不意味着像拉里那样一方面继续依赖父母,另一方面还怀有潜在的敌意和过分的内疚。

让我们现在回到麦克的问题上来。在此案例中,有关的治疗包括向他说明他的挫折和不幸的根源在他自己身上。只有获

得这种顿悟,他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错位的评价。他必须学会接受自己的软弱,并对自己的攻击性进行调适。不过,由于这些倾向的根源存在于人格的深层,因此不用个体疗法就不可能在他身上产生任何重要的改变。鉴于他在访谈中显示出能对年长的男性作出积极的移情,可以推测个体疗法也许会起作用,但是他是否愿意接受这种疗法是值得怀疑的。另一个问题是,他的行为很容易控制。在他的心理结构中,几乎不具有抵抗法西斯主义宣传的能力。他不可能靠他的那种主动性成为一个激进的领袖,但他可以把自己的想法传递给别人。至于他会不会靠他的那种主动性去公然攻击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并不取决于他是否害怕自己会受到伤害,或者得不到别人的赞同,而是取决于内团体权威的态度。他求助的不是同情或良心,而是他的恐惧和顺从。要知道,决定他思想的是权威的态度。如果那些代表民主的人们意欲感化他的思想,那么他们除了告诉他他们对社会改良具有怎样的理想和计划外,还要向他证明他们是多么的有力量。

#### 注 释

- [1] 本章为尼维特·桑福德(R. Nevitt Sanford)所撰。
- [2] 应该记住的是,母亲之死对麦克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正如本章所讨论的那样,在我们的样本中,有7名被试也遇到了同样的不幸,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都得高分。
- [3] 我们在第十二章已经讨论过,高分被试要比低分被试“更关注身体症状”。需要指出的是,在本研究中,来自精神病诊所样本的7名被试(参见第二十二章)像麦克一样,都患有胃病,其中4名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没有一人得低分。
- [4] 这方面的材料可参阅阿克曼(Ackerman)、贾霍达(Jahoda)、琼斯(E. Janes)和桑福德等人的著述。桑福德和康拉德(Conrad)已经报告过一

个与麦克十分相似的个案研究(它也完全根据问卷和投射材料)。

- [5] 参见亚历山大(F. Alexander)等人的著述。
- [6] 参阅弗洛伊德(S. Freud)、琼斯(E. Jones),以及汤普逊(C. Thompson)等人的著述。
- [7] 参阅布朗(J. F. Brown)运用罗森茨威格(Rosenzweig)的图片挫折测验所作的关于“被动的反犹主义”的研究。
- [8]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第十七章已有详尽阐述。
- [9] 请参阅弗洛伊德关于“消除矛盾”是无意识过程的一种特征的讨论。
- [10] 在愤世嫉俗这一问题上,桑福德、康拉德和弗兰克(Frank)已经发表过一些以问卷为基础的研究报告,其结果与这里提到的研究很相似。

## 第二十一章 犯罪和反民主倾向: 囚犯的研究<sup>[1]</sup>

### 一、引言

#### (一) 问题

正如前面几章已经表明的那样,超我整合的失败,难以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以及对被动性的过度反应等,都是存在于人格内部的潜在的法西斯倾向的重要根源。现在的问题是,囚犯在我们的量表上是否也会得高分呢?这一疑问促使我们把圣·昆丁监狱的囚犯作为一个重点的样本来予以考虑。<sup>[2]</sup>

我们可在精神变态人格中看到超我整合失败的表现(参见第十九章),这种失败所导致的性格结构已由许多学者在犯罪行为中予以描述,例如卡普曼(Karpman)、林德纳(Lindner)和格鲁克(Gluck)等人的描述。有些学者把罪犯特征概括为自我中心、没有内疚感、情感控制失调等,而且认为它们也是精神变态的主要特征。不能与他人建立情感关系也许是精神变态的一个主要标志,尽管洛莱(Lowrey)将此归之于青少年犯罪人格的特征。毫无节制地渴望地位和权力,意欲对弱者或没有防御能力的人实施攻击,以及要求全面的认可等,在罪犯中也是十分常见

的。此外,艾考恩(Aichorn)、亚历山大(Alexander)和希利(Healy)也把潜在的虚弱、被动和同性恋等描述为是罪犯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与法西斯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一些罪犯类型相符。具有这种罪犯类型的人被称做“城市流氓”,他们对少数民族团体成员、主持正义的工会会员、自由主义者和激进分子施以恐怖的行为。

不过,人们还发现,有些罪犯的表现与上面提及的特征十分不同,他们在我们的量表上也许会获得低分。亚历山大和斯图布(Alexander & Staub)所描述的“正常罪犯”,桑福德(Sanford)所描述的“反社会违法者”,其反对现状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一发现提示我们,有望在得低分的圣·昆丁被试身上找到相同的倾向。最后,在桑福德所描述的“反社会的攻击者”中,对爱的需要和爱的剥夺都是明显的,而不仅仅表现为敌意。关于这些反权力主义的取向,在刑事犯罪中出现的频率无据可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与上面提到的权力主义人格倾向相比,比例要低得多。

#### (二) 样本的采集

问卷统计所依据的囚犯样本由监狱精神病部门提供一组囚犯被试,按下列条件选择:(1) 选取一个攻击组样本,大致符合整个囚犯总数的比例;<sup>[3]</sup>(2) 年龄超过 55 岁的囚犯予以排除;(3) 意志薄弱的囚犯予以排除;<sup>[4]</sup>(4) 受学校教育时间低于 8 年的囚犯尽量予以排除。<sup>[5]</sup>除了这些限制条件外,约 20 份问卷最终也被排除了,原因在于下述几点:第一,它们不完整(有 8 个或 8 个以上的条目未曾回答);第二,他们属于黑人或犹太人囚犯;第三,他们属于监狱精神病患者。经过这样的筛选,最后剩下的有效样本为 110 人。统计数字据此而作出。

在监狱的精神病房内,囚犯以6人或8人为一组填写问卷(问卷45)。填表说明与其他被试组相同,惟一的例外是:为了获得被试的真实想法,不仅保持无记名方式,<sup>[6]</sup>而且告诉他们填写问卷与监狱当局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口头保证当然不可能改变监狱的氛围,因为监狱强调的是强制和遵奉。不可否认的是,这样一种环境有助于与问卷条目所反映的习俗的权力主义价值观念取得一致。况且,这一因素对被试的回答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被试的回答有着广泛的个人间和个人内的差异,这些差异导致分数的散布,而且见于除超高分者之外的所有被试。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屈从于权力主义压力的表现本身就表明了人格中的权力主义倾向,表明了被试在面对压力时未能维持其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

由于外部的一些干预因素(例如噪声等),被试在回答有些条目时可能会误解,作出不正确的回答。尤其对于那些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囚犯来说,误解的可能性自然会增加。我们在跟踪访谈时发现,有些囚犯确实误解了一些条目,并且用与自己原意相反的方式回答这些条目。不过,这种歪曲相对来说还是较少的(甚至是偶然的)。

有15个被试接受了访谈。在所有这些囚犯中,8个得高分,4个得低分,3个得中间分。为了便于分析,这些中间分获得者的访谈不包括在本讨论的范围之内。选择被试参加访谈的依据是,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高分或低分)、攻击性(从每个样本组取样)、智力水平(平均水平或较高水平均可从问卷的回答和使用的语言中获得),<sup>[7]</sup>以及他们回答投射问题的暗示性。

被访谈者不是自愿参加访谈的,而是由监狱的精神病诊所安排的。访谈者尽可能让被试明白他们不是监狱当局的人。有

表 21-1 对监狱囚犯组被访谈者的鉴定数据

假名	年龄 <sup>a</sup>	婚姻状况	家庭社会地位 <sup>b</sup>	上学年限	智商 <sup>c</sup>	服刑前职业	目前的犯罪	以前的违法情况	典型的自我性格归纳
伪民主的									
罗纳德	30	离婚3次	上下	9	26	厨师	团伙抢劫 时杀人	盗窃	把抢劫“作为一项业务”,“我常常引人注目地结婚”。
罗伯特	32	分居	下中	12	15	杂货店 经理	争吵中杀 了情妇	支票诈 骗;抢劫	是个“好男孩”,“艰苦…白手起家…事业成功”。
尤金	28	独身	下下	10	15	管子工	支票诈骗	酗酒, 抢劫	“我喜欢打架”;“我有点野”。
威尔伯	42	已婚	下下	0	6	卡车司机	用刀子杀 了房东	无	“希腊人喜欢惩罚的穷人”之一。
克拉伦斯	63	丧妻	下中	3	4	农民	强奸未 遂	强奸未 遂	是个“好男孩”;“一个追随者”;“被人们视做有政治才能的人”。
法西斯主义的									
弗洛伊德	23	单身	下中	11	25	打杂工	团伙抢劫	酗酒,扰 乱治安	“我干的每件事都是行动”;“我吃不起苦”;“我得到的惟一帮助来自我父亲”。
安德里安	30	单身	下上	14	22	同性恋 男妓	用手枪 抢劫	酗酒,同 性恋	“人们的优越感使我光火”;“我必须有个上帝”;“我父亲常纠缠我”。
伯克	32	离婚2次	下中	8	3	“牧牛人”	酒醉时支 票诈骗	强奸幼 女	“钱是主要目标。” “你不认为我是一个色情狂吗?”
低分的									
吉姆	28	单身	下下	11	17	通讯员; 职员	酒醉时用 棍子打死 了老妇	几次偷 窃;为母 亲买生 活必需 品	“我实际了解的惟一幸福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看上帝是各民族中的善者。”

假名	年龄 <sup>a</sup>	婚姻状况	家庭社会地位 <sup>b</sup>	上学年限	智商 <sup>c</sup>	服刑前职业	目前的犯罪	以前的违法情况	典型的自我性格归纳
顿	42	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妻子离异	上中	12	28	售货员	抢劫银行:为了帮母亲还债	无	“终生帮助别人”,“被各种情感问题包围”。
迪克	26	离婚,现在正在订婚	上下	12	12	职员	喝醉时偷汽车	无	“我从不喜欢争论”;“当我们分手时,我有点野”。
阿特	31	结婚2次	上中	14	30	商业艺术家	喝醉时支票诈骗	喝醉时支票诈骗	“对自己的恋母情结进行精神分析,以改进社会适应性。”

a. 统计时间为1945年11月。

b. 这种分级是由访谈者设计的,运用了劳伊德·沃纳的分类法:“上上”“下上”“上中”“下中”“上下”“下下”。

c. 这个栏目所提供的智商是依据韦克斯勒量表获得的,由一个在监狱的精神病诊所工作的囚犯进行实施。

些访谈受到外部噪声的干扰。但是,除了一次访谈以外(由于没有地方,对一个高分者的访谈不得不在一间办公室里进行,那里正有一人在工作),所有这些干扰因素并不严重影响访谈的顺利进行(正如我们在自由情境里进行的访谈一样)。

在本章中为被访谈者提供的名字与前几章提及的数字相匹配的情况为:

罗纳德:	M651A	罗伯特:	M656A	尤金:	M662A
威尔伯:	M662B	克拉伦斯:	M664B	弗洛伊德:	M658
安德里安:	M661A	伯克:	M664C	吉姆:	M619
顿:	M620	迪克:	M621A	阿特:	M621B

### (三) 讨论计划

像本书的其他地方一样,呈现的程序是从表面态度到深层动力的。讨论的主题涉及访谈材料,尽管每个部分也提供了相关的问卷统计。在本书前面提出的概念,尤其在第九至十三章中提出的概念,这里也被系统地予以运用,以便对法西斯主义有所了解。<sup>[8]</sup>从这个被试组中获得的访谈材料,可以用来对分化的变量进行详细的例证,并且与本章后面要讨论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我们曾经作过尝试,以表明囚犯在哪些方面与前面提及的被试组相似,以及哪些特征使得他们之间产生差别。为了了解被试,表21-1概述了一些关于他们个人的事实。

监狱组也被进行了区分,因为有些高分者公开表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态度。有3个高分者与其他人有着明显的不同,对此应予以专门的考虑。就每个题目来说,将被试分成三个小组进行讨论:伪民主的高分者、法西斯主义者和低分者。有些变量在两种高分者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来自法西斯主义者的有些陈述在讨论伪民主的高分者时也常被包括进去。“法西斯主义者”这个术语(与伪民主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不同)用来说明这样的特征:公开表示对少数民族的敌视,认为“有必要”镇压这些少数民族团体,而且赞成动用武力。还有一些被试主张“强大的”政府应该保护商业力量来反对工会和进步的政治团体,甚至对他们不惜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 二、民族中心主义

### (一) 问卷统计及其重要意义

监狱组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45)上的统计结果可以参见表 21-2。与其他测试组相比,囚犯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均获高分,平均每个条目为 4.6。<sup>[9]</sup>尽管有极端高分者,但却没有极端低分者。<sup>[10]</sup>这种分布产生了较低的标准差。<sup>[11]</sup>根据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条目的平均分,囚犯与其他团体之间的差异可由囚犯在非犹太条目上的高平均分来说明(对此结果,将在后面讨论)。

这些研究结果使我们得出下述一些结论。第一个重要的结论是:囚犯不是根据某种原则而行动的真正反叛者,他们与权威的矛盾也伴随着对弱者的某种关注。此外,他们对竞争失败者表现出憎恨和恐惧。由于他们本人未获得特许,因此他们与社会遗弃者(一种外团体)一样难以认同其他外团体。这种情况与我们的观察是相一致的:囚犯之间并不互相认同,他们常把自己与其他罪犯区分开来。看来,每个囚犯如同“一个孤岛”。尤金是一个高分被试,他对“种族问题”的态度表明了这种孤立主义:“我完全赞同把他们全部区分开来。”

表 21-2 来自囚犯组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统计结果

条 目	高四分位数 平均/人	低四分位数 平均/人	分辨力 平均/人	总分 平均/人
5. (穿佐特服装者)	6.17	3.22	2.92	5.18
10. (黑人权利)	6.86	2.70	4.16	5.26
15. (外来思想)	5.90	3.11	2.79	4.78
20. (黑人工头)	6.79	2.78	4.01	5.16
24. (犹太商人)	5.69	2.63	3.06	4.06
28. (娶犹太人)	5.07	1.30	3.77	3.20
32. (黑人生活)	5.72	1.67	4.05	3.49
36. (犹太人—丘之貉)	6.52	2.70	3.82	4.63
40. (犹太邻居)	6.03	1.78	4.25	3.92
45. (世界组织)	6.59	5.93	0.66	6.38
总平均/人	61.34	27.82	33.52	46.06
平均/人条目	6.13	2.78	3.35	4.61
区间	5.5~7.0	1.6~3.6		1.6~7.0
标准差:1.28				
信度:0.65				

第二个重要结论是:问卷 45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为 0.65,比其他被试组的信度低了一些。<sup>[12]</sup>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被试对条目的误解,以及主试记录回答时的失误,这与被试所受教育较少和主试分心都有关系。不过,主要原因也许可以追踪到团体结果的两个统计特征:一个特征是,对分配的较短一端进行了相关的截短。我们知道,对一个双变量的任何一个

极端部分进行截短(包括裂半的信度分配)都有可能减弱相关性;另一个特征是,在计算信度时使用的民族中心主义条目的特殊对分,使得其中一半(A组)包括了5个条目,而在这5个条目上,监狱组的平均分要比其他组的平均明显高得多。此外,A组还包括了具有最低分辨力的3个条目(参见表21-2)。由于这些“缺陷”,高达0.65的信度系数也就不足为奇了(参见第四章)。

对该组来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平均分模式是很有趣的(参见表21-2)。在条目45(该条目声称美国必须在世界范围内保持完全的独立)上,被试获得了很高的平均分。尽管这种观点导致较高的平均分,但是对囚犯来说,高数值的结果提示我们,监狱中的低分者可能像高分者一样屈从于十分强大的民族主义宣传。看来,这个条目特别有助于囚犯投射他们的严重受挫的心态(也即他们意欲摆脱管制的需要)。除了这个反对世界组织的陈述之外,具有最高平均分(第5、10和20)的3个条目有一共同特点:每个条目对那些被视做沉沦的外团体(例如“穿佐特服装者”或“黑人”)表示了强烈的地位焦虑。该特征的意义在下面关于黑人的陈述中有所表明(黑人是一个沉沦的外团体)。

## (二) 关于黑人的思想:一个沉沦的外团体

### 1. 高分者

反黑人思想的内容似乎与下述事实有关:黑人被视做一个十分沉沦的外团体,与人们想像中的“占支配地位的”外团体(例如犹太人)形成鲜明对照。在访谈中,由高分者归属于黑人的主要特征有:没有节制的性欲、“懒惰”、“肮脏”、赤裸裸的攻击、反社会的攫取性、病态的(婴儿般的)撒谎,以及裸阴癖。总之,黑人被认为具有“野性本能”,该本能使得他们既“原始”又“幼稚”。

这种想像部分地反映在问卷条目32中:黑人是“懒惰的、无知的和没有自制力的”。

持有偏见的被试罗伯特用下述言语概括了这种思想:“他们具有一种原始的特性……属于人类中的食人番类型。”法西斯主义者倾向于更加形象化:“他们与丛林的关系十分密切。他们是丛林而存在的”(弗洛伊德);或者,黑人“起源于类人猿”(伯克),“不管他们如何穿着,他们都是准非洲的野人”(安德里安)。<sup>[13]</sup>

在上述这些陈述中,蕴含着遗传论,这种遗传论充满着潜在的法西斯主义思想。

持有偏见的被试最为坚持的偏见之一是声称黑人的非社会化性欲:“他们身上有着许多兽性……”(什么兽性?)“哦,一条母狗沿街奔跑,有5条公狗爬到它身上……”(罗纳德)。法西斯主义者似乎更具偏见:黑人“充满兽性,像动物一般”。另一个法西斯主义者认为黑人是“十分多产的”(安德里安)。

被试还对黑人接近“白人妇女”表示了特有的焦虑:“有一件事是我无法容忍的,那就是我看到一个白人女孩和一个黑鬼鬼混”(罗纳德)。“当他们观看表演时,黑人男孩对着荧屏上的白种女人喊道‘瞧,多性感的妞!’……在我看来那是极不公平的”(尤金)。“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白人都该与有色人种通婚”(克拉伦斯)。“我反对白人娶有色人种”(威尔伯)。

被试在涉及反社会本能,以及黑人的低级超我和自我理想等方面持有共同的观点。正因如此,试图在商界“谋利”的罗伯特关注黑人的“懒惰”:“我认为他们不想满足他们的自我。”这类措辞涉及到一种冲突,也即在罗伯特的“谋利”内驱力和他用“自我”来掩饰的需要之间的冲突。他说:“他们不要自我,而是要他们的老乡……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一个目标。”由于黑人被偏见者



指责为未能与整洁的文化保持一致,因此罗伯特对黑人也表示了同样的厌恶:“他们好像从不洗澡。”被试强加给黑人的其他特点还有:

反社会的攫取性:“他们中许多人手脚不干净。他们对自己需要的东西会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克拉伦斯)

攻击性:黑人是“令人讨厌的。他们常惹麻烦……打架……制造许多麻烦……想当大亨”(尤金)。被试承认自己也有制造麻烦的一连串记录,尤其是喝醉酒“打架”。

病态的说谎:“你不能依靠他们……因为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对你撒谎。”(伯克)

夸大的言语和好出风头:“他们像一群猿猴,聚在一起时会说个没完。他们还像孔雀那样炫耀自己……你只需看看他们的服饰就明白了。”(弗洛伊德)

持有偏见的被试对黑人的态度还涉及到地位焦虑。所谓地位焦虑是指被试害怕“黑人”会起来向“白人”的权利挑战,并对后者施以胁迫。黑人必须“安分守己”,也就是说,保持他们原先的沉沦地位,以免高分者感到担忧。这种地位焦虑既出现在黑人与白人的比较方面,也出现在坚持吉姆·克罗政策(Jim Crow Policies)方面,并以下面的表述最为典型:

“我不相信他们能同化。我认为他们应当有自己的学校。在我看来,我们不当跟他们一块吃饭。”(克拉伦斯)“我一直抱这样的态度:他们是黑人而我是白人……我不会和他们一起工作……应该让他们呆在原地。”(尤金)“黑人应当呆在原地……不能与白人混合。”(威尔伯)罗伯特虽然认为在雇用标准和生活水准方面不应对黑人抱有歧视,但是“我的意思不是说要混合。对黑人来说,他们应当在市镇上有自己的居住区,而且我们应当废除黑人担任公职。”

罗纳德抱怨说:“我最难接受的事情是南方黑人来到北方,并且利用各种机会,设法进入某个地方。他们之所以进来,不是由于需要,而是为了令我们烦恼。”他描述了发生在中西部城市黑人居住区的一个事件:在一辆有轨电车上,他迫使一个黑人从他的邻座上走开,结果遭到一个黑人警察的逮捕,并被处以罚款。为此,他对“黑人警察的傲慢态度”表示不满:“他自以为很有力量。”

罗纳德对黑人警察的“傲慢态度”的不满,说明了偏见者的另一个特点: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平等为何物。这种充满焦虑的盲点使得偏见者产生了某些奇异的曲解:

“黑人自以为他们比白人好。”(克拉伦斯)“他们认为他们比我们强。”(尤金)“当白人给他们一点希望时,他们就以为他们比白人强了……如果你给他们机会,他们就会加倍谋利。”(威尔伯)

暂且不论上面勾勒出来的反民主态度,有5个高分被试表现出了我们在第三章和第十七章描述过的那种伪民主思想。他们为了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与“美国信念”的民主价值观保持一致,就会设法掩盖或否认他们的权力主义敌视态度。他们的内在焦虑使得他们不愿意公开表示对黑人施用暴力。

“他们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抱有种族仇恨。”(克拉伦斯)“有些黑人也不错,他们并不制造麻烦。”(尤金)

罗伯特甚至想为黑人争取平等的权利。他认为黑人应该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以便获得“生活的目标”。黑人的压抑的欲望象征着罗伯特本人压抑的欲望,也即那种被动的和寻求快乐的愿望。他感到压抑这些欲望有助于自己的男子气概。罗纳德甚至承认“也有一些好的黑人”。当问到如果黑人继续要求更多的平等,人们该做些什么时,他机智地压抑了自己的冲动,并且

说：“我们没有什么可干的，因为我们的民主制度决定我们不会作出任何蠢事。”

不过，威尔伯的陈述则表明他处于从伪民主向法西斯的过渡阶段。他一方面坚持“只要黑人呆在原地，我就没有什么可反对的”；另一方面则认为，如果黑人组织起来要求平等的权利，“那么我们就会有许多事情要做……就像对日本佬开仗一样”。竞争中的失败者要求平等的权利，这在威尔伯身上唤起了一种被压抑的恐惧感，于是他被驱使着用绝望的偏见方式进行“反击”。

## 2. 法西斯主义者

被试中有3个法西斯主义高分者，他们是安德里安、伯克和弗洛伊德。3人表现出同一类型的反黑人的思想模式，而且也都带有紧张的地位焦虑。此外，他们还显示了两种公然反民主的特征：没有伪装的憎恨和用物质力量压制外团体。

伯克的愤怒表现在诅咒黑鬼：“他们一点也不好……我不希望他们接近我。他们应当呆在原地。不应该让他们到这里来！”弗洛伊德甚至更加极端：“他们是一些无知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送回海地或者利比亚去，但这是做不到的。”（如果他们继续妨碍白人，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发生流血事件！”

安德里安的服从模式防止了他的极端仇恨的表现。但是，他赞成疯狂的法西斯主义的压迫：黑人“应该明确他们的地位，那就是理由”。（如果黑人不明确他们的地位，那会发生什么？）“他们会明确自己的地位的。”（如果不是这样呢？）“他们了解他们的地位。”进一步的探究引出这样的话题：如果黑人坚持寻求政治表现，那就会出现“内战”，人们会镇压他们。安德里安还把黑人和其他下层团体象征性地等同起来：（黑人该不该和白人在同一家工厂里一起工作？）“如果他们和白人在工厂里一起工作，

他们无疑也成了穷苦的白人了。”

## 3. 低分者

尽管在3个表示对沉沦团体地位焦虑的条目上，监狱组获得了不同寻常的高平均分，但是这些条目对于低四分位数来说，却具有相当低的平均分，从而也就具有相当高的分辨力（参见表21-2）。这种情况表明大多数低分者相对地不受反黑人偏见的支配。但是，对4个低分者的访谈发现，没有人完全摆脱对黑人的歧视，只不过他们的态度在某些方式上与高分者的态度有所区别。

首先，在表现偏见方面他们较少敌意，较少定型，对黑人也较少表现出地位焦虑。他们中有3人强调说：“对黑人的工作不应抱有任何歧视。”被试吉姆对自己的态度表示内疚（见下面的陈述）。被试以个性化态度为基础，倾向于把黑人当做朋友来接受，或者把黑人视做与自己一样的人。例如，被试顿在南方的一个州里长大，他声称他选择朋友“主要根据一个人的为人而非种族”。被试迪克也在南方长大，他描述了两个他喜欢“与之交谈”的黑人医生。“尽管我们成不了知心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受到像我一样的教育，那么成为知心朋友是没有问题的”。关于阿特和吉姆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我们将在后面予以描述。4份实验报告既提供了4个被试不想完全摆脱黑人的证据，也提供了他们不赞成“通婚”的想法。不过，在这个问题上，4人要比高分囚犯更加轻松和灵活。他们把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障碍归因于外部的社会压力。

这种障碍是“年复一年从历史上传下来的一种习俗”（迪克）。“我主要想到的是那些孩子”，他们可能“在社会上受到排斥”（顿）。“社会是不能接受这种障碍的”（阿特）。被试还认为这种障碍不会是永久性的，“如果我在纽约长大而不是在南方长

大,我的感觉就两样了”(迪克)。在一些国家里,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是被普遍接受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也许,不是我本人,但我不想对这个问题持教条主义的态度”(顿)。(如果种族之间的通婚被社会普遍接受,那么你是怎么看的?)“我不知道。反正现在还没被社会普遍接受……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阿特)。

看来,这些被试持有真正的民主价值观。然而,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他们中间没有人完全摆脱反对黑人的偏见。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可由他们思想的一个特征来予以提示:被试抱有一种低估反民主程度的倾向,不愿对内团体的冲突进行谴责,尤其不愿谴责那些持有反民主态度或行动以欺压弱者的人;被试还持有一种“摆平”的态度,敦促双方保持“理性”,以免极端态度(好像双方都有错,“各打五十大板”似的)。被试似乎面临一种冲突,也即在坚持民主价值观和害怕反对上层团体的反民主行为之间的冲突。由于他们没有能力反对强大的上层团体,因此只能采取“减弱”强弱团体之间冲突的方式,用一种假公正来缓解这种冲突。正因如此,尽管阿特也提到他认识一些黑人,但是,由于他不能积极地抑制习俗的反民主制裁,所以他不喜欢“与他们社交,理由在于:这是社会不能接受的”。这种情况解释了为什么被试的“不偏不倚”是假的,因为处于压力之下,他们只能对反民主的价值和政策表示屈从。为了证明这种让步是正确的,也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被试可能转向外团体,认为它们是“麻烦”之源。难怪阿特这样宣称:黑人“应该拥有像我们一样的权利,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分化了”。当要求他进一步阐述时,他又退回到更加“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我不认为他们是自行与我们分离的,而是社会舆论把他们与我们分开的。”“社会舆论”是无记名的,被试可以避免谴责任何人。因此,很清楚,即便囚犯组的低分者,也没有摆脱“高分”的倾向。

低分者在表示拒绝黑人时,也准备用内感受作用和自我批判来对自己的态度进行考察。一个例子是迪克的陈述,他说:“如果我在纽约长大而不是在南方长大,我的感觉就两样了。”吉姆更加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特点。他公开表示对黑人所持的不民主态度感到内疚,并且客观地把这些态度描述为他自己心理的一部分:“我对与黑人共事抱有一种本能的厌恶。但是,我的内心告诉我那是错误的,不公平的。”吉姆看到自己身上的矛盾,他的解决办法不像高分者那样希望外团体发生改变,而是寄希望于内团体的态度:“根据人类的概念,这肯定是不公正的。看来,我们确实对他们怀有一种天然的厌恶。问题是,一个人生下来就是黑人,这是他们自己无法决定的,就像白人天生是白人一样。”这一陈述所蕴含的意思是无偏见思维的另一个特征:被试似乎对解决团体间的冲突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它“最终会解决”。具体地说,“到了他们不再被分离时,我认为问题就趋于解决了”(吉姆)。

像其他低分者一样,这些低分被试知道,当他们把某些人格特征归因于黑人时,面对环境的压力,如何为这些特征提供社会心理学的解释。正如我们可以期望的那样,这种情况与他们的乐观主义密切相关,就像偏见者的遗传论与他们的悲观主义密切相关一样。被试进行社会心理学思考的能力与他们移情于外团体成员的内在情感有关。因此,迪克会说:“如果一个黑人处于监督和压迫之下,那么他自然不会有任何主动性了。”

### (三) 关于犹太人的思想:一个假设的“占支配地位的”外团体

#### 1. 高分者

反犹太主义的思想模式与赋予黑人的特质明显不同,它们表

现为把犹太人视做一个“占支配地位的”外团体的概念。有一个问卷条目(条目 24)明显地区分了高分者和低分者关于犹太人垄断商业的谴责(参见表 21-2)。这种情况表明了偏见者对“犹太人”的典型的意象,以及对犹太人的态度。犹太人似乎反映了我们文化的价值情结,这组价值情结围绕着获取和“成功”的内驱力,也就是“向上爬”。为地位和权力的内驱力所驱使,高分者提供了自发的想像。以下的典型例子表明,被试把极端的获取性作为一种假设的犹太人的特征:

“他们喜欢到有钱的地方去,想方设法取走那里的钱。”(威尔伯)“即便你把犹太人放到石头上,他仍然会赚钱……他们很节俭,总想领先一步。”(克拉伦斯)犹太人具有“特殊的动力”,而且“始终追求金钱”(罗伯特)。

这种内驱力被想像成最终导致犹太人对统治和权力的向往:

“我认为他们在这个国家里经营了许多事业,而且参与了大量的政治活动。”(尤金)“我认为犹太人在这个国家里控制了大量的金钱。”(罗纳德)“犹太人的行为告诉我,他们有权决定一切。”(罗伯特)

随着想像的发展,这种力量是通过获取性动力与“宗派活动”相结合而取得的:

犹太人“常常抱成一团”(尤金)。“他们以‘自我为中心’。当一个犹太人进来时,你可以预计他的后面跟着 50 个人”(罗纳德)。“他们在自己人中间混得很好,就是与其他人合不来”(克拉伦斯)。

值得注意的是,没有一个伪民主的囚徒把单一的本我特征(原始本能)归属于犹太人,尽管他们在反对黑人时具有这种思维模式。把一个外团体想像为“统治的”与把一个外团体想像为

“沉沦的”形成鲜明对照,这乃是囚犯自发强调的问题。

偏见者对犹太人的态度与他们对黑人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对犹太人的态度与他们假设犹太人的统治和垄断形象有关。这种态度围绕着因犹太人的权力而导致的受害的想像,以及害怕被那种力量所制服。这里,思想的个性化比反对黑人的态度更加引人注目。

正因如此,尤金说:“假定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就会在我旁边开一家更大的杂货店。”他们“进入小镇(尤金在小镇长大),接管了杂货店”。罗纳德说:“如果你让犹太人进入办公室,那么你就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工作。有 5 个犹太人设法取代你……他们认为他们比任何人做得都好,而你如果不认为他们好,你便是傻瓜。”

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威尔伯具有反希腊人的思想。他虽然也表现出反犹太主义的想像,但是,这种想像没有他的反希腊人的思想特征那样强烈。<sup>[14]</sup>被试的这种思想似乎与一名希腊房东的态度有关。两人因为房租问题而发生争执,结果,趁威尔伯上班时,房东将威尔伯一家赶了出去。威尔伯怒火冲天,开始跟房东算账,于是出现了一场斗殴。由于房东被打成重伤,导致了威尔伯被监禁。威尔伯的情感冲突(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感冲突)使他不去反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而是滋生了对“希腊人”的执拗的想法,把他们想像为一丘之貉,故意“来到这里”惩罚穷人,扣克工资,令人难堪,等等。

有趣的是,偏见者的反犹太主义不满情绪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们对假设的“占统治地位的”外团体表示妒忌;另一方面,他们又渴望被该外团体所接纳。下面的例子揭示了这种自相矛盾,即对“犹太人权力”的妒忌和羡慕:

“上帝知道犹太商人不是好人,但却支持他们。”(安德里安)

“他们可以抱成一团,但是为什么要牺牲他人的利益呢?”(罗纳德)“他们是聪明人,你说是吗?”(伯克)“尽管他们做不到这一点,他们仍然……”(尤金)“麻烦的是,他们喜好宗派活动……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愿意被同化。”(弗洛伊德)

表面上积极地认同“犹太人”的内驱力,在罗伯特身上得到了说明。他的羡慕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钦佩犹太人“有赚钱的诀窍”,“有远见”,“有抵达彼岸的动力和雄心”。他的妒忌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我认为,如果白人获得这些机会的话,他们也许会做得更好”。弗洛伊德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他由于几个星期来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而藐视自己,但却对犹太人的“辛勤努力”表示妒忌:“他们为了他们的所得而劳动……我曾与一个犹太男孩谈过话,他说他是为了10年以后得到某种东西而学习。”

暂且不论被试的反犹主义,从其言论所蕴含的反民主敌意中,我们不难推测他们的伪民主思想。他们回避对自己的敌意,而把注意力集中于“外团体的错误”方面。

因此,他们常常声称自己是“不持偏见的”(罗伯特),并且认为犹太人“应该集中住在某个地方,不能让他们逃出国门”(克拉伦斯),或者“他们不该受到迫害”(罗纳德),或者断言“如果犹太人不令我讨厌的话,我是不会找他们麻烦的”(威尔伯),或者“我猜想他们是没有问题的”(尤金)。

这些被试还认为希特勒“通过大企业来控制德国,并因其专横的行径而面临真正的问题……”(罗伯特)。被试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认为那是野蛮的行为。

这种伪民主的特征不仅可在犹太人的敌意定型中看到,而且可在被试回答下列问题的答案中看到。我们给被试的问题是:“如果犹太人真的拥有控制权的话,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

被试回答:“除了革命,没有其他办法能将他们赶走。”(罗纳德)威尔伯在其对待“希腊人”的态度上也反映出类似的精神状态:“如果他们不停止惩罚穷人,那么就会有更多的美国人蹲监狱。”在他看来,“他们”应该被遣返到希腊去。

## 2. 法西斯主义者

这3个法西斯主义者的反犹思想模式与高分者的伪民主思想模式十分相似。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获取”上,集中在宗派和垄断的权力上。被试强调了赋予犹太人的一些特征,而这些特征在其他高分者没有提到过的,也就是过度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

伯克特提到犹太男子沉溺于性欲和同性恋:(你是怎么看待犹太人的?)“大多数犹太人的话题与性有关,或者是如何诈取别人的钱财……”(就性问题而言,他们谈些什么?)“当他们外出时,他们就打算干那种事,譬如,今晚他们就打算……”(弗洛伊德)。<sup>[15]</sup>被试的自相矛盾是一目了然的,他们指责犹太人“不愿通婚”。对犹太男子的潜在取向可从下面一句话中看出:“有些犹太妇女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安德里安)该被试并不提及犹太人沉溺于享乐的话题,而是表达了这样的想像:(犹太人在性行为上与别人不同吗?)“他们比别人更加色情,更加激情,更加罗曼蒂克。我不喜欢这样,但是他们喜欢。”

像其他高分者一样,法西斯主义者害怕自己成为犹太人权力的受害者。此外,他们还附带一种自相矛盾的渴望,即渴望被假设的“占统治地位的”外团体所接纳。正如他们的反黑人思想一样,他们的态度是由毫不掩饰的仇恨和试图用物质力量压迫外团体来加以区分的。这种情况伴随着公开赞同法西斯主义的攻击。

伯克认为希特勒对犹太人“没有做错事”,因为犹太人比可

以诅咒的毒蛇还要下贱。“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应该对他们保持警觉……假如我处于希特勒的位置,我也会做他所做的事情!”(弗洛伊德)安德里安对他的权力主义敌视态度相当坦率:(你对犹太人的讨厌情绪是否有增无减?)“不,恰恰相反,我对犹太人已经麻木了。”他希望政府强行遣返所有在美国的犹太人,以此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迫害:“把他们全部送回到巴勒斯坦去。”尽管他“不同意希特勒所采取的解决德国犹太人问题的措施,但是,鉴于他们确实垄断了企业,所以必须对他们采取行动”。在美国,“犹太人也试图垄断工业”。由于犹太人被指责成攻击性太强,因而被试认为迫害犹太人是正确的。

这种矛盾促使法西斯主义者不去探索思想的深层意义,而表现为一种“思想上的机会主义”。所谓“思想上的机会主义”,指的是不考虑民族原则和真理价值,判断的依据为假定的“事实”所取代,以此为真实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机会主义思想得以出现的背景涉及到“统治一服从”的冲突心态,致使被试表现出对上层人物的认同(不管他们是谁,或者他们代表什么),并且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因同情下层人士而带来的焦虑。他们对人类的幸福抱着冷漠的态度,或者说对人类的幸福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在他们看来,为权力而权力才是最终的目标。这种机会主义也出现在伪民主的高分者身上,只不过以更加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参见第十七章)。

安德里安的机会主义是由他对身份的证明来反映的,这种身份证明发生在“欧洲的战事开始之后”。他对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同情随着美国反对轴心国的态度而有所变化。他认为希特勒的侵略“似乎更多地属于征服而非抵御共产主义”,而且“我不希望日本的战火越出中国,烧到其他地方”。其实,安德里安的思想没有任何变化,他的态度只是一种表面的迎合,以免与一个

属于支配地位的内团体(美国)发生冲突。

弗洛伊德的机会主义似乎更加清楚一些。他明确赞同由德国工业家使用的“调和”策略,因为德国工业家意欲通过希特勒来“解决”阶级冲突。由此推论,希特勒的对象不是犹太人,这个不可救药的恶棍只是被德国工业家所利用,以排斥对德国工业家构成威胁的犹太势力……(希特勒的做法是否正义?)“在德国人民的心中是正义的。”(在你的眼中呢?)“人人都得为自己的国家着想。”

伯克除了支持纳粹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外,在其行为中还表现出一种令人感兴趣的机会主义思想方式。他对“犹太人的问题”和“犹太人的特征”抱以敌视的伪民主的否定。例如,“像其他人一样,犹太人也应拥有谋生的权利……就我所知,他们获得了一种赚钱的方法。我所能说的一切是,他们很有力量……我对他们了解得不多”。但是,对于“你能否一眼就认出一个犹太人来”的问题,他显然意识到他不会由于表示敌意而受到惩罚,甚至还有可能获得赞同:“只要我跟他们说话,我就能认出他们来。”由此观点出发,伯克表现出对犹太人强烈的攻击性。

### 3. 低分者

低分者常常拒绝反犹太主义的思想模式。迪克说,如果说有什么“犹太特征”的话,那是“杜撰”出来的。“在我看来,犹太人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种宗教。”吉姆还宣称:“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被人专门挑选出来进行比较,以示他们与众不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些被试是谴责反犹太主义的。

“当一个人在犹太人或黑人问题上太离谱时,我就会设法让他走开。”(顿)阿特解释了隐藏在伪民主反犹太主义背后的敌意,并以平等主义的思想进行表述:“我经常听到这样的评论。我的一些朋友是犹太人。哦,见鬼,我的一些朋友都是人民!听起来

好像你在对他们作出让步。”阿特把他的父亲描绘成一个“狂热的犹太憎恨者”。

此外,与支配高分者思想的狭隘的个性化神话形成对照的是,这些被试表现出宽泛的思路。一方面,他们能以一种分化的思想方式去衡量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对其他人又抱以怜悯和尊敬。他们采用的一种方式是把犹太人作为一个外团体,对此抱以同情。

吉姆评论说,犹太人可能“有点自我中心,但这不是他们的特征,我认为,他们中间有些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歧视。他们比其他人更加努力,而且,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团结一致,相互合作。”这种说法与罗纳德的抱怨颇不相似。罗纳德抱怨说:“他们认为他们比任何人做得都好,而你如果不认为他们好,你便是傻瓜。”顿则认为:“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可以反对的特征的话,那是从他们被限制在某些职业和生活条件的意义上讲的,他们是‘历史的前妻所生的孩子’。”阿特说得更加明白:“犹太人追溯历史而非基督,因而他们的努力受到限制……他们在金钱方面成了狡诈和精明的人……于是人们就把那些最可鄙视的特征赋予他们了,譬如狡诈、贪得无厌等。”阿特还说,他认为所谓犹太人“精于交易的名声”是毫无根据的,但是“我不知道这对社会有益还是无益”。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他既没有被内部的冲突所驱使,也没有把偏见投射到犹太人身上。迪克对反犹主义的原因不知所以,他只能暗示说那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

### 三、政治—经济态度

#### (一) 一般的问卷统计

表 21-3 显示了监狱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统计结果。在该量表上,监狱组获得最高平均分 4.68,在所有采用问卷 40 或 45 的被试组中间,除了军人俱乐部男性组以外,监狱组的平均分最高。<sup>[16]</sup>看来,囚犯在政治上较为保守。关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表 21-3 表明,不仅高四分位数的平均数相当的高,而且低四分位数的平均数也比其他被试组更高,也就是说,如果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有极端低分者的话,那也是极少的。事实上,在 110 个囚犯中,只有一个囚犯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分为 5,也即每个条目平均得分 1.0。接下来两个最接近的分数是每个条目 2.2 和 3.0。因此,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平均分辨力只有 2.41 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这在采用问卷 40 或 45 的被试组里算最低的了(参见表 5-9)。此外,对监狱组来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之间的相关只有 0.14。

这些结果(囚犯的普遍的保守主义,以及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得分之间较低的相关性)该作如何解释呢?首先,关于普遍的保守主义,访谈材料提示,反民主的情感态度起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因素是被试缺乏评估政治经济事件的信息和合适的参照构架。<sup>[17]</sup>这种现象已在第十七章讨论过了。就这种缺乏而言,囚犯要比其他被试更为极端,也许这与监狱的隔离状态有关。当然,也与囚犯教育水平较低,因而对此不感兴趣有关。

表 21-3 监狱囚犯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结果

条目	高四分位数 平均/人	低四分位数 平均/人	分辨力 平均/人	总 平均/人
3. (工会)	5.93	2.74	3.19	4.16
7. (美国方式)	6.80	5.22	1.58	5.87
11. (政府控制)	5.30	2.67	2.63	4.52
14. (福特和摩根)	6.07	3.33	2.74	4.94
17. (经济安全)	4.93	3.04	1.89	3.90
总平均/人	29.03	17.00	12.03	23.39
平均/人/条目	5.80	3.40	2.41	4.68
区间	5.4~7.0	1.0~4.0		1.0~7.0
标准差	0.96			

鉴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受制于被试的有限信息和兴趣,因此这些因素也有助于说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相关较低的原因。除此之外,某些囚犯的两个特点也可能使民族中心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的相关性偏低:一个特点是被试抱有表面的自由主义态度(这在访谈材料中得到证明)。这种表面的自由主义态度与他们生活中的一些现实因素有关,例如社会地位不佳,经济上感到不安全等等。被试常用个性化的压抑语调来反映这种缺乏真实性的态度。另一个特点是,高分囚犯在公开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经济态度方面具有更大的发生率。这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倾向于降低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条目 11 的分数。由于法西斯主义者坚持保守的反劳工、亲商业的思想方式,

因此他们在渴望“强大的”政府控制方面(这种政府控制不是社会对商业的控制,而是商业对劳工的控制)不同于传统的保守主义者。

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条目平均分和分辨力的解释,与上面对囚犯的保守主义解释和对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参见表 21-3)之间关系的解释是相一致的。对于条目 7(美国方式)的含意,如果缺乏明显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的表述,那是不大容易把握的。正如人们可能期望的那样,这个条目具有相当高的平均分和相当低的分辨力。另一方面,条目 17(经济安全)被期望具有较低的平均分,因为它触及了高分囚犯和低分囚犯的个人体验,所以会降低它的分辨力。最后是条目 3(工会),它在高低得分者之间应该获得清晰的区分。由于它以纯粹的形式呈现了自由主义—保守主义问题,因此了解它的含意并不复杂。这个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条目实际上是所有条目中最具区分度的。

## (二) 被试的一般原则

访谈材料证实了这样的假设:许多囚犯在政治上是不一致的。在接受访谈的那些囚犯中,许多人的平均智商和所受教育都较低。他们除了在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表现出无知和混乱以外,许多被试还承认他们对这个领域缺乏兴趣。

“我不了解政治。我对它们从来没有进行过研究。我也从来不谈论政治……除了在收音机里听到一些消息外,我想得不多。”(威尔伯)“我对政治简直是一无所知。”(尤金)“我是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罗伯特)“我对罗斯福的新政了解不多。”(弗洛伊德)“我对政治事件从来不很关注。”(伯克)“我对它不很重视,我不了解那些东西,但是我却愿意做一些共和党人做的事



情,不管什么事情。”(安德里安)“这是一个我从来不予重视的问题。”(迪克)

被试之间不仅在政治觉醒的程度上存在一些差异,而且也在某些一般的态度方面存在一些差异。

### (三) 高分者

我们尚不清楚低分被试的政治经济态度与伪民主被试的政治经济态度之间是否存在差异。5个伪民主男性中有4人(罗伯特、尤金、威尔伯和罗纳德)表现出亲劳工的态度,尽管这些态度是不一致的。例如,在1945年末和1946年初,所有这些被试都认为工资增长可由物价飞涨和雇主有能力支付更多工资来予以证实。不过,他们之间在工会应该如何活动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尤其是在罢工问题上犹豫不决。比较典型的回答是罗伯特的观点,他认为“工会的要求已经超出他们的权限”。所有这些被试都谴责有组织的劳工的政治运动。而且,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支持有关社会安全的立法。罗伯特甚至赞同这样的措施,例如公共卫生保险和政治经济规划。他们全都反对像战时的薪水限制那样的平均主义。

另一方面,克拉伦斯一贯坚持反动的态度。他支持大企业的强硬政策,坚决反对工会活动,而且认同雇主的“顽强性”。他宣称:“如果一个人无法在自己的企业中赚钱,那么他就干脆关门算了。”他抱怨说:“人们把所有的麻烦都归罪于公司。”罗纳德也运用相似的观点说:“我相信自由企业,我认为企业应当实施它们自己的业务。”克拉伦斯、罗纳德和尤金对政治经济方面的外团体表示了明显的地位焦虑,害怕自己被这些外团体所控制,因为“有组织的劳工”“共产党人”和俄国开始占据统治地位(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被试在黑人问题上的地位焦虑,理由是黑人成

功地上升到更加接近民主平等的地位)。克拉伦斯的担心在于:“如果劳工获得更多的权力,那么我们会像俄国一样了。那便是引发战争的原因……以全国产联为例,大多数产联是共产主义的……我认为共产主义应当被驱逐!”罗纳德抱怨说:“现在的工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致使它们正在设法管理政府。”尤金既担心我们的政府受到“罢工”的威胁,也担心我们的政府受到俄国的威胁:“我们需要提防俄国……我认为它迟早会与我们开仗的。”

对于这4个人来说(5个被试,除罗伯特外),已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他们的自由主义态度是伪装的。理由在于这些态度并非以真正的民主原则为基础的,而是以思想的个性化为基础的(这种思想的个性化在他们的种族主义态度中得到反映)。被试具有受害的想像,于是政治经济问题被过度地简化为一种假设的个人的冲突,或者说在“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正因如此,克拉伦斯对工会的态度受制于一种过度补偿的“个人主义”:“我已经工作了一辈子,我不会让任何组织告诉我何时可以工作,何时不可以工作。”他对所谓的“最佳的政府形式”持有矛盾的态度,而且反映了一种“好人—坏人”的社会理论:“当然,在我们的政府里有腐败的政治家。”罗纳德对政治事件的偏执狂解释也证实了下述思想,那就是我们所期望的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思想。他对我们询问的第一个反应是:“人们在加利福尼亚州选了一个迫害者当州长。”他拒绝对此观点进行解释,相反,他继续攻击罗斯福总统,把他说成是另一个“迫害者”。他描述了他的父亲如何被人解雇。因此,他首先明确表示“不相信共产主义”,并且抱怨说:“社会上有那么多小人物,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人的故事,那就是祖母的养老金太少。他从中得出结论说,法律必须改变,以使老人获得更多的

津贴。不过,在公共健康保险的问题上,他持反对态度,因为“有许多私营保险公司”。当他被问到对增长 30% 工资的要求持何看法时,他再次把问题个人化了——辛酸地提到了监狱食堂价格太贵的问题。他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监狱的“腐败”,并且暗示说“有人在从中获利”。他还谴责工会,拒绝政府控制企业的主张,并且说“政府应当通过与企业协商,在没有工会干预的情况下安排工资增长”。这种态度与其下列感觉相一致:“一旦民主成为政府的最佳类型时,政府也就没有效率了。”

与“邪恶力量”造成的受害感密切相关的是对“善的力量”抱有同样的个人化态度,也就是顺从—依赖的崇拜权威的态度。尤金关于罗斯福总统的陈述充分证实了这一点。尤金把罗斯福称做一位父亲式的英雄,认为他单枪匹马地拯救了美国:“他就是样样都好。他使这个国家冲破了陈旧的习俗。他把那些生活在马路上没有工作的家伙送进了地方资源养护队。<sup>[18]</sup>换句话说,他是拔尖的,那就是一切。”威尔伯也是一个“穷人”,他同样以个人化的方式崇拜罗斯福,理由是他“安排到位,使得人人都有活干,丰衣足食”。不过,两个被试都没有把新政策视做一种由民众的民主要求引发的社会改革运动。威尔伯用下面的话表达了他对物价高涨和工资较低等问题的关注(注意,那时是 1945 年 12 月):“他们试图把小人物排除掉。”表面上看,这话好像与经济上受到压迫的情绪相一致,但是,我们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威尔伯对罗斯福总统抱以个人化的态度,而且事实上他也缺乏民主哲学的思想。他对希腊人所持的迫害性妄想和民族中心主义心态也增强了我们的这种怀疑。威尔伯真正想表白的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希腊人对穷人的压迫,扣克工资,使人受苦”等等。这种情况表明,威尔伯对经济挫折所作的反应,能够转化成寻找替罪羊来实施攻击的法西斯主义模式。

让我们对罗伯特的自由主义观点作一评价:我们之所以认为他的自由主义是伪装的,理由不只在于他的种族主义和权力主义态度,而且还在于他在访谈结束时的行为。罗伯特在访谈结束时问访谈者:“你认为我刚才陈述的观点正确吗?”他不断地拒绝访谈者的解释,认为那不是—个“对”或“错”的问题,而是对—个人的评价问题,并且坚持访谈者给他“答案”。这种过度追求“正确观点”的需要,既意味着被试缺乏内化的价值观念,也意味着被试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以迎合“正确的人们的正确观点”。这样一种价值判断使他无力抗击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 (四) 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的政治经济思想是反动的。不过,它与伪民主高分者的政治经济思想有所区别,或者说法西斯主义者的种族主义与伪民主主义者的种族主义是有区别的。法西斯主义者主张对劳工使用武力,而且具有强烈的地位焦虑。至于“精英”的概念,在伪民主囚犯的思想中颇为含蓄,但在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中却是清晰的。

弗洛伊德对工人的蔑视和对工会的想像表明了这种态度。他担心“我们将被许多小丑所统治,被工会所统治”。(你指的是什么意思?)“请你看看所有这些普通工人,他们除了懂得如何敲钉子之外,其他事情一概不懂……但是,他们却想干一番事业,他们有几万人抱成一团。”(对此,我们该做些什么?)“纠正他们,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地位……废除他们的章程……解雇罢工者,或者予以罚款。”弗洛伊德希望政府对其他国家采取“强硬态度”,因为“我们对那些国家太宽容了”。(哪些国家?)“噢,俄国。”安德里安对“贫穷的人”抱以蔑视的态度,这在前面已经论及。他公开宣称“我不相信民主。我认为权力应当掌握在少数

人手里。我不是民主党人”。他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理由是“我从未看到过一个共产党人是出身于适当的社会阶层的”。

安德里安支持权力主义的攻击不只限于赞同纳粹的和日本的侵略:“我想用布尔什维克对待俄国人(指沙皇分子)的办法来对待布尔什维克。”伯克的态度比较含糊,但是他关于精英的陈述却是清楚的:“我从来不把工会放在心上,因为我再干10年就能退休。只要我能搞到钱,我便可以购买一群牛羊,然后靠它们挣钱。”他的法西斯主义攻击性是显而易见的:“天哪!我们消灭了那些国家,现在倒要养活他们了……我认为我们应当让他们饿肚皮,尤其要让日本佬饿肚皮……幸亏我没有亲戚在这场战争中被杀,但是我却很想出去杀几个日本佬!”

由于被试渴望拥有一个“强大的”反民主政府,因此他们坚持法西斯主义的立场,并且主张用武力维持垄断的“自由企业”,以反对民主的平等主义的挑战。在其他一些高分者的伪民主的思想中,屈服于反民主的“力量”和“领导”的愿望是含蓄的。问卷表明,在条目30(参见表21-4)中,被试暗示,为了维持现状,“武力是必要的”。这个条目具有相当的区分度,尽管它的团体平均分比其他条目的团体平均分要低。不过,极少有低分者同意这种观点。另外两个条目间接地反映了相似的态度,它们是条目23和条目22(参见表21-4)。但是,同样这些想法,法西斯主义的囚犯却是直接地予以表达了。主张权力主义镇压的观点已在前面提及。此外,这些被试还阐释了希特勒的思想。

安德里安说:“我赞同政府的控制,因为如果我们知道有人在掌舵,我们就不会有革命了。”他还赞成倒退:“我相信旧秩序,我认为在胡佛的领导下我们是最幸福的。我反对任何新东西!我从来没有宽恕过法国大革命,或者墨西哥的革命。”伯克的权

力主义态度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复杂性。在谈到政府控制时,他说了这番话:“你必须有一个人来领头,以便把事情做好。”弗洛伊德赞同纳粹的“举措”,这在我们前面讨论种族主义问题时已经描述过了。

惟有通过分析,我们才能把这些被试的种族主义与他们的政治思想区分开来。在上面提及的种族主义态度中,思想上的机会主义例子同样可以用来证实政治经济的机会主义。这里补充几个例子,不过,它们并不直接涉及种族主义:

弗洛伊德对“强硬”、力量和“效率”的偏见(而非尊重人类的目的或目标)使他陷入引人注目的自相矛盾之中。他对商业力量的顺从导致他赞成政府对商业的控制:“我赞同那种修订形式,它令人信服。”可是,接下来他却表示要把“力量”与他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以便对物价管理局和物价实施控制(那是在1945年12月):“如果他们对物价控制实施强硬政策的话,那原本是没有困难的。问题是,他们对于一个赚了10万美元的家伙仅仅罚款100美元。”伯克在智力上要比弗洛伊德或安德里安迟钝一些,他的思想上的机会主义直接反映在民族中心主义态度上。他根据是否对当地的内团体(他的家乡所在的州)有利来评价公共政策:“见鬼,在那件事情上我坚决支持罗斯福总统。他为那个州做的一件事,也就是在那里搞了一个堤坝工程。我们不需要战争!”

### (五) 低分者

所有低分被试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方面都获得了高分,他们在接受访谈时全都表现出相当保守的态度。阿特和吉姆要比迪克和顿较少保守。后面两人把自己想像成在经济领域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这样的想法影响了他们的政治经济观点。不

过,我们暂且不去关注被试之间的这些差异,而是揭示4人之间的共同之处。他们的取向总的来说是保守主义的,尽管他们比高分者较少权力取向,而且经常把保守主义和民主价值调和起来。他们似乎都具有传统的信念,相信不断扩张的资本主义经济,主张自我管理的和个人主义的经济,而非垄断的经济。他们愿意贯彻“自由企业”的原则,希望对垄断企业进行控制,或者使之国有化,因为垄断阻碍了“经济自由”。

典型的是吉姆的观点:“我宁愿看到私有企业控制市场,而不希望看到政府控制市场。不过,对于垄断的大企业,我却认为政府应当对它们实施控制。”迪克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如果一个企业失去了控制,政府就应当把它接收过来。但是,如果一个企业经营得不错,政府就别去管它。”

这些被试的保守主义使他们的民主价值观念陷入困境。面对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他们在认同劳工和保守主义之间举步维艰。结果,导致了他们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以阿特关于“黑人问题”的观点为例,他说“我不喜欢把人分成阶级”。看来,他的意思是指,他不愿“看到”企业和劳工之间的冲突,因为这种冲突给他带来了一种压力(要知道像阿特那样的民主党人是支持竞争中的失败者的)。但是,这种压力确实引起了他对现存政权进行民主抗击的焦虑。为使自己免受这种焦虑,唯一的办法是否认经济冲突的存在。这种否认使他对现状表示含蓄的支持,并且对他认为的“捣乱分子”表示不满,因为他们抗拒现状的行为激起了他的焦虑。

阿特还反对全国产联政治行动委员会,因为“我不赞成他们把自己认做一个阶层”。关于当时要求增加30%工资的呼声,他认为“不管这些要求是对还是错,都是不必要的。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团结一致”。阿特对“团结一致”的事实感到不安,因为这

涉及到抗拒雇主的行为。于是,他的结论是:“就这些要求而言,或者就那些罢工而言,都有可能毁掉他们的事业。”顿也被当时的罢工搞得心烦意乱:“罢工问题应该尽快得到解决,不管采用何种方式。”面对雇主和雇员的冲突,顿努力保持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把雇主和雇员都描绘成巨人:“我认为不论雇主还是雇员,都有点忽视小人物。”具体地说,“我反对特殊利益和压迫集团”。问题是,这种不合逻辑的立场与他难以抉择的困难相结合,促使他对雇员实施攻击,并含蓄地支持雇主:“我对这种罢工感到辛酸……我认为劳工应当负有更大责任。”迪克对“罢工”的担心使他变得更加保守:“我钦佩工会,但是他们不应该进行煽动……他们也不应该围着钱转,他们应当在如何使物价下降方面多动脑筋。”对于当时的罢工,他坚决主张雇主应当满足增加工资的要求,但同时他又暗示说,他们大概“无法提供”。吉姆的观点表明他的自由取向基本上是保守的,他关心的问题是:“政治实际上不是由人民支配的。”此外,他关于理想社会的概念反映了他对人民经济需要的认同,他说:“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为一切身体健康的公民提供工作机会,而且照料那些不能工作的人和上了年纪的人。它还要为每个家庭提供住所、汽车和足够的薪水,以便他们享受我们所说的权利。”尽管他承认“许多人确实生活在贫困线下”,但是,他仍然为某些产联工会的好斗性感到不安。他说:“我十分赞成码头工人工会。至于产联,我是不赞成的,虽然接受它的人越来越多……产联工会从一开始就使用了相当高压的手段。”他的最终结论却暗示着接受产联对现存权力的抗争:“也许,结果将会证明产联的举动是正确的。”

上述例子表明,这些被试在面对权威和权力的问题时深受内部冲突之苦。这种冲突类似于高分者的权力冲突。他们与高分者的差别主要在于程度问题。低分者的民主认同更加强烈。

他们抗拒权力主义的决心更大一些,对非正义的权威的抨击也更接近于有意识的。相对来说,他们已经摆脱了民族中心主义,从而使他们不易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影响。

## 四、道德和宗教

### (一) 一般的问卷统计:法西斯主义量表

由于法西斯主义量表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应的访谈结果都在前面介绍过了,因此本节只是提供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一般统计结果。条目平均分和分辨力在表 21-4 中呈现。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每个条目的团体平均分为 4.73,这是参与研究的所有团体中获得最高平均分的团体。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统计结果也支持了这一发现,也就是说,监狱中的囚犯不仅对他人采取反民主的压抑态度,而且对自己也采取反民主的压抑态度。此外,被试中没有极端的低分者,只有一小部分中等程度的低分者(他们位于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低四位数区间内,按照每人每个条目的平均得分,范围从 2.0 至 4.1 不等,平均为 3.7)。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几乎所有囚犯的犯罪行为都是与那种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获得低分的人所反映的自由主义不一致的。

法西斯主义量表的信度系数为 0.87,这是令人满意的。它比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信度系数 0.65 要高得多。这一结果也许可以归因于这样的事实: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条目是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 3 倍,因此像减少分布的因素较少影响信度。

监狱组在民族中心主义—法西斯主义量表上的相关是 0.59,比其他被试组的相关稍低一些,这种情况也许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不适当信度有关(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二节已经讨论

过)。与此相似的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的相关为 0.23,也十分低,这可能与第三节讨论过的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削弱了监狱组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效度。

### (二) 高分者

在讨论持有偏见的囚犯的道德—宗教思想时,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道德制约上,尤其需要讨论的是他们对人民的不信任和受害感,以及对宗教权威的屈从。

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及,这些被试的思想受制于狭隘的个人化判断,并且由此判断来想像宽泛的社会问题,因而作出曲解。正如本章其余部分试图表明的那样,他们倾向于把原本应该个人化的关系(也就是说,与他人的个人关系和与自己的个人关系)却予以非个人化的解释。事实上,本书已经反复表明,不能认同与他人的关系和与自己的关系,是一个人接受权力主义思想的基本原因。这样的思想取代了对社会现实的客观评价,而以幻想的世界取而代之,其中的无意识冲动和恐惧以个人化的方式被投射。

把人类关系的非个人化倾向在反本能的道德中表现为一种有意识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对“道德的外团体”的权力主义敌对态度;(2)对个人自身予以情感的和冲动的道德压抑。道德主义在前面讨论反黑人思想时已有描述。本问卷的一些例子涉及下列条目:对“穿佐特服装者”予以道德谴责(条目 5);对那些具有“不礼貌、坏习惯和不良血统”的人予以拒绝(条目 12);对“性罪犯”予以权力主义攻击(条目 25);对“不道德的、丑恶的和意志薄弱的人”予以权力主义攻击(条目 34);以及对同性恋者予以攻击(条目 39)(参见表 21-4。本章余下部分所提到的所有问卷条目,均可参见表 21-4,除非另有专门说明)。

一个相关的条目是,被“如此众多的不同的人”所污染,因而产生恐惧(条目 18)。这里的“污染”,可能象征着本能传播的危险。上面所有这些条目都具有分辨力,除条目 12 外(该条目产生了法西斯主义量表的最高总平均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条目 12 反映了大多数囚犯希望为“理性的人们”所接受的迫切心情。

类似的道德主义也出现在持有偏见的囚犯的访谈之中。在这些被试中间,道德主义具有宗教的色彩。

例如,克拉伦斯断言,在“好的基督徒”和“不好的非基督徒”之间有着严格的区别:“基督徒试图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而不好的非基督徒则到外面去抢、去偷、去酗酒,或者到处游荡,什么都干。”克拉伦斯认为,他在服兵役期间意味着过一种“干净的生活”。威尔伯具有同样的道德主义概念:“成为一个基督徒意味着不用发誓、不说脏话,或者不试图算计别人。此外,还有行为举止正确,过一种干净的生活。”威尔伯认为无神论者是“相当坏的人”。罗伯特也强调对超人的绝对服从:“基督徒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努力行善,并且遵循上帝的话。”

不过,宗教的阐述对于道德主义者的生活态度来说还只是一种附带现象。这种思想方式在我们所讨论的各种人格话题中比比皆是。这里列举几例,以说明偏见者反对性欲的正义性。

克拉伦斯说“我不认为性问题是教育儿童的一个好题目,因为他们很快就会受到性的影响”。他以赞赏的口吻提及了下列事实:“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在街上遇见一个女孩,我会脸红。”同样,当威尔伯被问到什么事情最令他讨厌时,他说:“在小孩面前做你不该做的事情,或者对一个 9 岁女孩干出出格的事情。”罗纳德对于今天这个国家所出现的性泛滥感到惊讶:“真是糟糕透了。”罗伯特谈到了他对自己的性欲问题的态度:“我承认,有时我会让自己放任自流,让我的肉体离我而去。但是,总

的来说,我始终没有辜负母亲的训词‘妇女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

表 21-4 监狱组被试在法西斯主义量表上的得分结果

条目	高四分位数 平均/人	低四分位数 平均/人	分辨力	总分
1. (服从和尊重)	6.66	5.75	0.91	6.45
2. (意志力)	6.62	4.93	1.69	5.81
4. (科学)	6.00	3.64	2.36	4.93
6. (战争和冲突)	6.17	4.82	1.35	5.68
8. (超自然力量)	5.93	3.43	2.50	4.44
9. (愉快的事物)	5.38	2.79	2.59	3.92
12. (不礼貌)	6.14	5.68	0.46	5.85
13. (纪律和决心)	5.24	3.07	2.17	4.07
16. (生来的冲动)	5.24	3.07	2.17	4.07
18. (感染和疾病)	6.66	4.64	2.02	5.68
19. (荣誉)	5.52	2.46	3.06	3.91
21. (反叛思想)	6.52	6.39	1.13	6.07
22. (德国)	5.76	5.32	0.44	5.48
23. (奉献的领袖)	5.59	4.57	1.02	5.45
25. (性犯罪)	5.86	2.32	3.54	4.49
26. (弱和强)	6.28	2.64	3.64	4.24
27. (爱)	6.79	4.07	2.72	5.75
29. (占星术)	5.72	3.25	2.47	4.69
30. (保存的力量)	5.10	1.86	3.24	3.44
31. (打听)	6.07	4.21	1.86	5.31

条目	高四分位数 平均/人	低四分位数 平均/人	分辨力	总分
33. (地震)	4.00	2.25	1.75	3.07
34. (不道德的人)	4.83	2.64	2.19	3.37
35. (疯狂的性生活)	6.07	3.25	2.82	4.62
37. (少讲多做)	6.69	5.36	1.33	5.94
38. (阴谋)	5.97	2.82	3.15	4.45
39. (同性恋)	5.14	2.21	2.93	3.45
41. (艺术家)	4.38	2.36	2.02	3.08
42. (不正常, 正常)	6.41	4.11	2.30	5.42
43. (熟悉性)	5.17	3.93	1.24	4.34
44. (受苦)	4.79	2.04	2.75	2.95
总平均/人	174.15	110.31	63.84	141.86
平均/人/条目	5.80	3.68	2.13	4.73
区间	5.4~6.8	2.0~4.1		2.0~6.8
标准差:0.86				
信度:0.87				

非宗教的道德主义出现在非性欲的话题中。

尤金认为“好人是不吸烟、不喝酒的,或者是准备戒酒的”。他之所以对黑人抱有敌视的态度,是因为他们“好斗”和“惹是生非”(这一点在前面已有描述)。罗纳德为自己的鼻子、肌肉或皮肤“问题”而感到烦恼,例如“喷鼻息”、“扭动双肩”或者“习惯于用手指弹东西”。他还为“贪婪”而心烦:“我无法忍受那些只想索取不想付出的人。”他反复提到“礼貌问题”,抱怨说:“这个监狱发生了重大变化,那么年轻的小伙子关在这里,包括穿佐特

服装者,他们压根儿谈不上得体。”

所有5个高分者对金钱和工作都表示了道德化的态度。

他们中间有些人在金钱问题上提出了节制的观点:“有够用的钱过日子就可以了。超过这个限度,可能带来许多不快。”(尤金)“拥有的钱不多,反而会给你带来幸福。假如钱太多,不会给你带来幸福。对我来说,满足食物、衣服和住所等基本需要的钱就够了。”(罗伯特)为了“纪律”和“控制”的缘故而工作,被所有的被试所信奉,只有罗纳德除外。“我认为,当你为金钱而工作时,你是不会快乐的。”(罗伯特)“对一个人来说,存在一点残缺是特别有好处的,它会给你特别的动力。”(罗伯特)“工作有可能伤害人。我认为,童工劳工法要比其他法律制造更多的麻烦。最好的办法是阻止童工劳动来摆脱这种麻烦。”(克拉伦斯)当问被试他和他的妻子有何相似之处时,威尔伯宣称:“哦,她不喜欢到处乱跑,我也不喜欢。我们两人都喜欢干活。”尤金就他和他的母亲也补充了其他一些相似性:“她喜欢工作,我也喜欢。”这种回避娱乐而一味屈从于工作的态度也在问卷条目44中表现出来,该条目信奉“受苦”的价值观念,而且具有较高的分辨力。

上面描述的道德主义反映了这些被试的一种急切企图,也即压抑本能的冲动。他们对自己冲动的焦虑是由他们对下列投射问题的反应来表示的。该投射问题是:“你难以控制哪些欲望?”他们的回答反映了他们试图把冲动与有意识的自我分离开来的努力,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外部行为上来避免意识到自己内在的情感。于是,具体化了的三种“欲望”又得以重现:“喝酒”“斗殴”和“性交”。<sup>[19]</sup>

在描述偏见者的良心时,我们也无须依靠推论。类似的证据出现在他们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之中。

克拉伦斯关于性欲和酗酒的道德标准与他三次对幼女强奸

未遂形成对照。他坚持艰苦勤奋的美德,过度关心那些“抢和偷”的人们。狱医说他曾声称自己患有肺结核,借此“冒领补贴好几年”,而且以此逃避劳动。这样的对照是很有趣的。违背道德的现象也可在威尔伯的访谈中看到,他由于恐惧而试图杀死房东。我们暂且不管他对这个事件进行辩护时的偏执狂理由,他提供了证据说,他思想的另一个部分认为那是“不道德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不辜负教会的话,我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罗伯特在道德上表示对“女性的尊重”,因为“女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问题是,他一方面公然表示“爱”他的妻子,另一方面却随便与其他女人保持着暧昧的关系(与该女人的关系终于在一场争吵中破裂)。他坚持认为任何人都必须工作,因为“工作也是一种享受”,但是他之所以坐牢,也是为了“享受”数百美元价值的假支票。罗纳德也谴责“贪婪”,但是我们可以将此与他长期以来参与团伙偷窃或抢劫的记录作一比较。根据他自己的描述,偷窃或抢劫也是一种“生意”。他在谴责了“性泛滥”(尤其是同性恋)以后,承认自己偶然也在监狱中实施口交,但否认这是同性恋,因为他不承认其中涉及到任何情感因素。尤金的道德标准是反对“酗酒”“斗殴”和“制造麻烦”,而且声称自己“喜欢劳动”。这与他的长期犯罪史适成对照:他由于酗酒、斗殴和抢劫而8次进监狱服刑,目前则因伪造支票而服刑。

对这23个囚犯来说,相关的特征是他们性攻击(强奸、“诱奸”儿童等)。这些被试所得的民族中心主义分数很低,平均每个条目为3.4分。<sup>[20]</sup>而对所有非囚犯的性攻击者来说,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平均每个条目为5.1分。更有意义的是,这些被试中间有2/3的人(也即23人中有15人)赞同条目25(该条目声称“对性犯罪者不仅要予以拘禁,还必须施以公开的鞭打,或者更重的处罚”)。他们中间约有一半人(也即23人

中有12人)赞同条目39(该条目认为,对同性恋者应抱以惩罚性的敌视态度)。他们中间有3/4的人(也即23人中有17人)赞同条目35(该条目对盛行的性行为表示了投射的幻想和成见)。

除了这两个人以外,其他所有的性攻击者(也即23人中有21人)至少赞同这些条目中的一条;16人赞同其中的2个条目;7人赞同所有3个条目。这些结果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道德主义者试图将个人的压抑的冲动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有2个被试(克拉伦斯和这里未曾报道的一个中间分得者)否认他们具有性攻击,并且坚持说他们是“被陷害的”。当然,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存在记忆的歪曲,借此维持一种并不牢靠的自尊。监狱当局也报告说,大多数性攻击者否认他们具有攻击性,而且声称自己是“正义的”和“善良的”。

本书的证据表明,被试对他人实施的道德谴责象征着他们本人担惊受怕的冲动。另一方面,由于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被试对假想的“占统治地位的”外团体(例如犹太人)又抱有不信任、受迫害和愤世嫉俗等情绪。我们已经举过一些例子,例如威尔伯认为自己受到“希腊人”的迫害,罗纳德指责州长是一个“迫害者”,等等。与此相似的是,克拉伦斯想像自己受到“政界的陷害”,并且主张“在别人打倒你之前先打倒他”。他既不依赖别人又不信任别人:“拥有大量金钱的价值在于,一个人可以不必依赖任何人做任何事。”与此不信任相联系的是担心别人“打听消息”,对别人“不能自扫门前雪”表示不满(罗纳德),以及对“别人试图干预我的事务表示不满”(尤金)。罗伯特的生活目标是“拥有三家商店”,不被“寄生虫”所利用。

这种怀疑在若干条目中得到反映。例如,表示愤世嫉俗观点的战争和冲突(条目6),害怕“打探”(条目31),以及关于“控制”我们生活的阴谋计划的想像(条目38)。最后一个条目直接



反映了受迫害的主题,具有最高的分辨力。

高分者的道德和宗教思想还表现在被试对宗教和道德权威的依赖和顺从。这种顺从与他们担心自己会被外团体所统治的夸大想像形成明显的对照(这里所谓的外团体是指犹太人、黑人、劳工、“赤色分子”、俄国人,等等)。被试对道德和宗教的权力主义顺从有三种主要的表现方式。第一种表现方式是,在每个持有偏见的被试身上,对世俗化的道德主义似乎抱有一种屈从的自我否定的态度。对此表现,由于前面已有描述,这里不再详述。

第二种表现方式是,被试强调自己相信宗教权威。问卷条目8具有清晰的分辨力,它可以用来表明这种态度的中心思想:人人都应当“毫无疑问地服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人人都应当“完全忠于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访谈中,有3名最世俗化的高分被试属宗教领域的传统主义者。

罗伯特重申这样的观点:“我认为必须沿着《圣经》指引的方向前进。”克拉伦斯和威尔伯都声称他们从来没有对他们的父母(原教旨主义)提出过疑问。对于尤金来说,宗教似乎比较遥远。虽然他承认自己“并不了解”十戒或者基督的教导,但是他却声称宗教中最重要的事情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圣经》”。至于罗纳德,既诉说他不再“相信”宗教,也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思想者”(这种自由思想者不为外部“权威”所左右)。更加确切地说,他的愤世嫉俗是空洞的,而且渴望自己依赖于“上帝”。他声称,宗教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信仰”:“我认为我们应该信仰能使我们凝聚起来的東西。看来,我信仰至高无上的存在,但是我又试图压抑它。”这种冲突起因于后面要讨论的罗纳德与其父亲的关系。

第三种表现方式是,他们对上帝表示顺从,因为上帝被想像

成一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至高无上的力量”。

上帝“要比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都强得多”(罗伯特),他“统治一切事物”(克拉伦斯),他的“话”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该辜负的”(威尔伯)和“必须遵循的”(罗伯特)。罗纳德渴望这种服从,这已在前面提到过。有趣的是,尤金从未了解这位“父亲”,他是这些人中惟一的例外。他关于上帝的概念似乎一片空白,他说:“相信上帝,那就是一切。”

持偏见者对其自我的压制,在道德和宗教领域抱以理智和情感的服从,以及内部的反内感受作用的削弱,所有这些倾向削减了他们的理智力量。由于丧失了自我的有意识领悟,从而也就削弱了一个人对人类能力的理解,使之易于接受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尤其是对人类行为的神秘主义解释。这些倾向与问卷条目相一致,后者在高、低四分位数之间具有清晰的分辨性,包括强调人类理解限度的条目(条目4),相信占星术的条目(条目29),以及对某些人“渴望高位”的神秘主义和遗传论的解释(条目16)。我们对高分者的许多引语,揭示了他们的神秘主义倾向和丧失理智的倾向。

### (三) 法西斯主义者

我们在研究伪民主的高分者时所提及的某些态度,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得到了明显的印证。我们在研究道德主义时所提及的对他人的权力主义敌视态度,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表现为公开的对人的憎恨和蔑视,尤其是对外团体的憎恨和蔑视。被试还试图通过使自己以一名精英分子自居来支撑他的自尊。

当我们问弗洛伊德别人的哪些行为最令他恼火时,他以极端的方式表示了对人的嫉恨:“正是因为他们是人,所以我才恨他们!”(能否具体一些?)“噢,大多数人是无知的,他们跟动物差

不多。我指的是哑巴动物!”(你能作进一步说明吗?)“他们没有意识,看不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容易动摇、粗鲁、笨拙。他们像一群牲畜。给他们一个领袖,他们就会跟着他走。”伯克的权力主义憎恨尚未“系统化”,也不像弗洛伊德那样具有明确的思想,但是,他的访谈表明他对“贫民窟的女人”“愉快的白痴”“色情狂”和“同性恋”抱以憎恨和蔑视。此外,在他看来,“到处是行窃的人”,“就拿这里的监狱来说,见鬼,你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他们从背后戳你一刀。你对他们万万不能相信”。安德里安也使用了这些被试的语言,不过,他的反民主态度是十分清晰的。他对“一无所有的人”的蔑视前面已被提及。有趣的是,他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实施明显的两分法,并对两者均抱以权力主义的敌对态度。男人引起了他的深刻焦虑和憎恨:“许多男人使我恼火,他们对女人持以一种优越的态度。所有男人或多或少是目空一切的。”他还把自己认同于想像中的女人的顺从和依赖地位:“我把自己看做是依赖型的‘女人’。”他根据这种判断而对男人采取一种偏执的态度:“我认为男人很不尊重女人,不尊重女人人们的事情。其实,女人不比男人差,她们甚至更优越!”这里,平等的可能性是与他的思想不相容的。他所知道的惟一选择是服从或支配,优越或低劣。不过,在他所追求的贵族地位中,他对女人同样抱以沙文主义的态度。他不同意这样的观点:“比起男人来,女人也有可能成为杰出的商业女性。”他甚至“不赞同女人经商”。他在访谈时曾提到一件事,他由于对职业女性的“傲慢”态度而受到一位妇女的强烈抗议。

法西斯主义者也缺乏良心。一方面,他们对违背价值的行为不感到内疚,另一方面,没有一种伦理价值与其自我真正结合。超我的内容几乎完全限于对外团体的惩罚和遭社会排斥的恐惧。

伯克的陈述也暗示我们,他的超我限于一种外部的神秘“力量”:“肯定存在某种力量对我进行惩罚,让我下地狱。”这个“地狱”并非道德的折磨。相反,正如他所解释的那样,蹲监狱“既伤害了我的自尊,也影响了我的生意,尤其在我可以赚钱的时候”。他认为他的犯罪纯粹是外部造成的:“像我这样有智力的人竟让一些下贱的女人把我送进了监牢。”<sup>[21]</sup>弗洛伊德也对他的犯罪行为没有一丝的内疚。正如访谈者所描绘的那样:“他认为,比起他的所作所为来,现在的暴力抢劫简直不值一提。”他把自己的犯罪行为“仅仅看做是发生的某件事情”。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们听说有人被抓,但是我们不相信自己也会被抓。”安德里安把他的犯罪行为归因于酗酒:“那就是我的麻烦所在。”根据访谈报告,他认为自己除了在意志消沉时会喝得酩酊大醉外,并不感到还有其他严重的问题。安德里安良心主要是围绕着对自己受到排斥的担心而组织起来的。此外,他还担心惩罚的力量,因为该力量神秘地处于他的控制之外,“是某种说不清的东西”:“我相信因果报应。这在我的生活中已被证实”。至于排斥,“我始终关心别人对我怎么想”。正如后面将会阐明的那样,他尤其关心他被父亲所拒绝的事实,因为他的父亲“一直缠住他”,而他的行动受制于父亲的批准:“我是根据他的同意与否来行事的。”

法西斯主义者的超我之所以未能得到发展,也与他们的快乐原则有关。他们无法推迟满足,无法追求长期的目标,听任眼前需求的摆布。

伯克自夸他在牛羊交易中如何精明,但他又感叹自己的生意不怎么好:“对我来说,进展太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关于反犹太主义的投射,也即认为犹太人在榨取他的钱财。“应当承认,金钱是重要的……没有钱就不能买任何东西,譬如不能买威

士忌。”

这些态度是其自我中心的组成部分。以下是伯克在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所作的类似评论：“我一直关注收入问题。不考虑这个问题，我就失去了我所需要的一切。”与此相似的是，弗洛伊德声称，他在进监狱前每周得 59 美元的工资，“实在太少了”，因为“我是没有积蓄的人。我必须获得每样东西，诸如衣服、住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等等”。在具体谈到他因团伙抢劫和狂欢而坐牢时，他解释道：“我们必须有钱花。我们吃一顿饭就要花上 40 美元左右。”安德里安也承认自己从儿时起就“自行其是了”：“事实上，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吵着要我所需要的东西。”在寄宿学校里（父亲在他的母亲去世后把他送入寄宿学校，当时他才 5 岁），“我很放荡，随心所欲地离校外出，而且花费超支……”他对自我中心的界定相当明确：“当事情与我无关时，它们就是不存在的。”

在这些被试的脆弱的良知中蕴含着婴儿般的冲动，以及对世界的自我中心的看法。这是支配他们行为的一种特征。他们是极端的机会主义者，他们在行事时从不考虑原则，这与他们的思想上的机会主义是一致的。他们的机会主义常常得到表现，既服务于婴儿般的全能，也服务于否认个人软弱的试图。

伯克的病态性谎言已有提及。至于他的攻击性，表现在他谋取金钱的借口上。他说他的被捕是因为“骚扰”孩子（当时女孩 2 岁，男孩 4 岁）。但是，据报告这些指控又被撤消了，因为孩子的年龄太小，无法作证。弗洛伊德的犯罪则较少戏剧性，但同样是反复无常的。他被两次判刑，原因是妨碍治安，以及团伙抢劫（被试将其看做是一种容易的赚钱方式）。与此相关的是，弗洛伊德声称自己想娶一个“富婆”为妻，她应当具有“理想的身体吸引力”，但是她的人格应该是“随遇而安的”。安德里安的罪行

包括在寄宿学校里表现出“难以纠正的违纪行为”（逃学、反复透支等等）。他因酗酒和同性恋卖淫而被判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主要通过卖淫来维持生活，“凡是与人发生性关系都是为了金钱”。他承认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具吸引力，但是“我不会因此而不收钱……我感兴趣的惟一事情是获得多少钱”。

这些被试对待生活的态度提示了他们绝望的内心中空虚。这种空虚有可能为服从于“强大的政治领导提供基础”。此外，他们的宗教倾向表明了他们对权力主义顺从的渴望。不过，这种顺从与其他高分者在宗教方面的权力主义顺从有所不同：法西斯主义者对宗教的权力主义顺从是明确的而非含蓄的。此外，由于它们涉及到支配—服从的冲突，因此这种顺从还以思想上的机会主义表现出来。尽管伯克“对宗教问题考虑不多”，但是安德里安和弗洛伊德却十分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情况。其中，弗洛伊德的机会主义采取了对信仰的自我中心“标准”，并对判断真理—谬误不感兴趣。

弗洛伊德声称他在上次团伙抢劫时（几乎受到致命的枪伤）意欲信仰上帝（他从未受过宗教方面的教育，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自由思想者，而他也从不了解他的母亲），但是“我就是无法想像，一个人或一种智慧能够这样容易地被湮没”。由于他被上帝“搞了下去”（他的犯罪导致了他的坐牢），因此他便不再“相信”上帝了。安德里安说：“15 岁那年，我很严肃地到罗马教堂去，希望成为一名教士。不是出于任何特定的宗教信仰，而是我相信天主教会是惟一真正的教会。它是第一个教会，其他教会没有任何借口搞分裂了。”他的法西斯主义倾向得到公开陈述：“我把它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因此而尊敬它。”在他看来，最好是样样东西都由一个头来领导。不过，由于他的父亲强行干预，使他未能取得教士身份。

#### (四) 低分者

低分被试的道德和宗教思想与偏见者有很大不同。相对而言,他们不受道德主义的支配,有时还在言谈之中表示明确的反道德主义思想。

对阿特来说,宗教“与遵守法律没有任何关系,除了‘待人规则’(Golden Rule)外”。对于顿来说,他坚决反对把宗教作为“由某一规则来遵循”的思想。研究表明,在4个低分者中间,没有一人反映出拒绝无神论者或非基督徒的迹象。

他们主要根据道德价值观念来谈论宗教。宗教只是“你在自己身体内部拥有的一种精神品质”(阿特)。这种取向体现在他们对自己和别人的更加个人化的关系之中,与高分者的非个人化关系恰成对照。吉姆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人的养育—隶属的态度:

“我认为上帝倡导的是一切民族的善行……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贯彻宗教解释的原理,那么世界一定会变得很美好。”(你所说的“善行”是指什么?)“用你希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对待别人,帮助那些比你更不幸的人,使自己成为所处社区或社会的组成部分,积极参与社区或社会活动,对人仁慈和慷慨,对同伴予以高度的关心。”阿特还认为上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善行的力量……上帝是一种力量”。

另一方面,被试强调全面反映个人的人格和“世上的幸福”。

顿声称他关于来世的概念已由他的一位女友很好地予以了表达,她说:“我所谓的来世是指发展一个人尚未发展的才能。”至于吉姆,他认为:“我们实际上知道的惟一幸福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正因如此,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喜欢这个世界上的人和物呢?”

此外,丰富的内心生活也是他们所持的一种宗教价值观。

宗教“为你提供了通向你思想的捷径”(迪克)。祷告不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或者表明对上帝的恭敬。确切地说,祷告是为了“能够帮助别人”(迪克),而且它也“有助于你成为你所希望成为的人”(顿)。

被试在道德和宗教问题上与偏见者的权力主义顺从不同,低分者的信条是坚持个性。

“宗教是一个个人事件……对我来说,宗教如同我的指纹一样具有个人特征,或者像你的指纹一样具有个人特征”(阿特)。迪克解释说,他之所以从一个浸礼会教徒转变成为一个基督教科学学派人士,部分原因出自他反对一个海军牧师的教义,因为该牧师“迫使我去教堂……而我认为去不去教堂纯粹是个人的私事”。迪克“找到了一本基督教科学学派的,并且赞成其中的主张……因为他们对发生的每件事差不多都有解释”。与安德里安强调客观化的机会主义操作方法不同,迪克强调思想的内化。此外,迪克还补充了另一种价值观,它暗示了某种反软弱的内驱力(“软弱”是高分者所特有的):“另一种思想告诉我,如果你真想达到一个目标的话,那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止你。”

我们还记得,高分者顺从上帝,因为上帝处于统治地位,人们必须“遵循”他的“话”,上帝对那些违背其旨意的人将予以惩戒。另一方面,在低分者眼里,上帝被看做是仁慈的:上帝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可以求助的某种东西”(迪克),“是一个人在紧急关头可以依靠的人。虽说我不大了解上帝,但是,宗教告诉我们的最重要的道理是信仰和忠诚”(吉姆)。宗教涉及“一种信仰,一种你可以相信的力量,或者说一种你可以依赖的东西”(阿特)。

上面这些陈述所蕴含的乐观主义是与我们对低分者的研究

结果相符的。不过,被试仍然缺乏内在的自主,也就是说,他们与高分者的某些倾向很相似,都依赖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这一发现与下列事实相符,即没有一个低分者在问卷中真正得到极低分。

## 五、防御软弱

### (一) 高分者

在持有偏见的囚犯中,对软弱的防御尤为显著,所有高分被试都表现出对自身软弱的深刻恐惧。对这些被试来说,软弱的意义与他们对非男子气的恐惧有关。为了摆脱这些恐惧,他们试图运用各种反软弱的防御措施或者伪男子气来支撑他们自己。这些反软弱的防御措施可以归纳成四个主题,每个主题可以用一个公式来表示:(1)争取权力的努力:“我并非处在社会的底层,我是上层社会的一分子”,或者“我不会软弱地屈从别人,我有力量,我可以统治和支配别人”。(2)“强大和坚强”:“我不弱,我很强大”;“我不被动,我有男子气”。(3)陷入异性活动:“我不是同性恋者,我是异性恋者”;“我不爱他,我爱她”。(4)偏执狂反应:“我不爱他,我恨他,因为他迫害我”;“我没有顺从的同性恋欲望,我对男人的攻击性表示不满”。<sup>[22]</sup>

反映防御的男子气态度的问卷条目(尤其是“坚强”和“力量”),以及反映这种倾向的条目 26,定型地将世界分成“强者”(内团体)和“弱者”(外团体)。这个条目具有很高的分辨力。其他一些表示反软弱的条目如下:增强“意志力”(条目 2),“纪律”和“决心”(条目 13),夸大的荣誉概念(条目 19),以及其他研究中提到的条目,尤其是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条目 14,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条目 23、30 和 45。

由于被试之间在男子气与恐惧的关联方面存在个体差异,因此,我们将对每个囚犯逐一讨论软弱和反软弱的情结。

罗伯特努力为强迫定位的地位和力量而奋斗,以此“证明”他的“男子气”。他宣称从幼年期开始,“最大的愿望就是在一生中成为一个人物。我意欲在商界取得成功,有时,我担心是否会成功。就我已经确定的目标而言,至少拥有属于我自己的三家商店。在我被捕之前,我已经拥有第一家商铺”。对地位和权力的关注,使他产生焦虑的想像,也即焦虑地想像黑人“在生活中缺乏目标,只是满足于活着而已”。同样,对地位和权力的关注也使他对犹太人产生妒忌的想法,也即妒忌犹太人“无所不在的动力和雄心”。罗伯特将这种强制的力量投射到其他人身上,从而表明他没有能力在服从和支配之间作出选择:“人人都有他必须满足的某种自我。只要你是人,你就想居于社会的顶部,而非社会的底部。”

罗伯特在谋取力量时所表现出来的依赖性,也在他对待朋友和家庭的态度中表现出来。(朋友给你提供了些什么?)“对我来说,朋友给我提供了满足。我一直努力工作,满足了朋友的期望。”罗伯特之所以对其弟弟感到满足,是因为“他给了我自我的满足,因为他的生活风格模仿我的生活风格。而且,他也像我一样经商”。罗伯特进一步表示了他的自豪感,他说“我的同伴始终把我归入商界中的成功者一类”。前面提到,他在回答了访谈者的问题后问访谈者:“你认为我的回答正确吗?”这也是依赖性的一种表现。

罗伯特的力量内驱力未能阻止他对女性化的恐惧,对异性生活无能的恐惧,以及对潜在的同性恋的恐惧。他在回答问题时曾暗示,他以一个女性角色自居。他说“直到我离家之前,我

的母亲始终把我作为她的女儿来看待”。至于潜在的同性恋冲突,是由若干线索来提供的。例如,他坚持向一个男性访谈者提供他第一次性交的详情,他对放荡女人表示敌意,以及他与其他男人“间接接触”等。尤其是他对女性的敌意,终使他的婚姻遭致破裂。这表明,为了防御同性恋,他被强迫遁入非个人的和敌视的异性关系之中。

罗纳德的自我软弱要比罗伯特更加明显。前面提到过,他的未获满足的依赖性渴望宗教的权力主义信仰,因为宗教能使“我们团结起来”。类似的依赖性在他关于“朋友”的概念中也有表现。他的朋友概念是“你可以把你遇到的麻烦向他倾诉,反之亦如此。而且,如果你在某个时候需要帮助的话,你知道他在哪里”。像罗伯特一样,罗纳德在访谈结束时,要求访谈者向他保证他不是“太过激进”的人。这里的“太过激进”显然是一种委婉语言,也就是对外团体“太过攻击性”的一种投射。罗纳德患有严重的慢性糖尿病,直到12岁才自行痊愈。对于这种疾病,他除了把症状归因于“我的肾脏”外,无法再提供任何其他的解释。但是他不知道这种症状为什么在12岁时会突然消除。尿床行为可能部分地反映了他的性满足的被动形式,该现象是由他的同性恋冲突来提示的。前面提到的他对“性泛滥”的正义谴责,其中也包括“口交”。他否认自己有过“与同性恋有关的任何欲望”,不过,他也承认他与一个同狱犯有过若干次这样的关系。他含蓄地否认自己在这方面有过“真正”的同性恋行为(他借监狱的性剥夺而谴责了这种行为),并说他对这类经验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除了丧失对另一个男人的尊重以外。罗纳德对黑人男子所持的“强硬态度”,也许是对由他们激起的同性恋兴奋的一种防御措施。罗纳德充满色情的异性欲,包括若干次非个人化的异常婚礼,也可以被理解为他否认同性恋冲动的一种企图。

“我的婚姻始终引人注目。例如,在一辆出租车里举行婚礼,或者在一次马拉松比赛中举行婚礼。我没有恋爱,我的婚姻能使我从观众那儿得到钱。”这种既“软弱”又“强硬”的态度在罗伯特的团伙盗窃和抢劫中得到结合,并且作为“一种生意”而予以贯彻。

尤金的防御主要表现在强硬方面。他不断地卷入各种麻烦之中,尤其是酒后斗殴:“我好发脾气,喜欢打架,而且常在酒后打架。”此外,“我为我的人民感到自豪”。按照尤金的说法,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喜欢斗殴”。当访谈者指出,他的不满与黑人有关时,他加以区分地说:“黑人到处寻找打架的机会,而我只是喜欢打架而已。”至于他为什么喜欢打架,为什么“脾气很大”,其心理原因似乎主要是无意识的,“对此,我说不清楚”。不过,他也解释说,黑人“到处寻衅”,因为他们“具有低劣的情结”,“试图成为大亨”。其实,所有这些都是他本人低劣感的一种投射,也是他想使自己成为“大亨”的一种方式。促使尤金大发脾气的情境与同性恋冲动有关,他的冲动性攻击可能是对这种同性恋冲动的一种偏执的防御:“我在酒吧里遇到一个女孩,有个家伙出现了越轨的行为。他满口脏话,虽说不是针对她的,但他大声说话。”尤金把他的“麻烦”与害怕异性联系起来:“我就是有点儿野,所以不能结婚。我害怕结婚。”

克拉伦斯也显示出自我软弱的明显迹象,而且对其防御不大有效。他声称军队“能使你成为一个男子汉”,但是它并未满足克拉伦斯从一个普通的士兵成为军官的愿望,尽管“我很服从上级”。他由于患上肺结核而退役,领取政府补贴达17年之久,然后居住在“一个县城里”。根据狱医的意见,克拉伦斯“仍声称他患有结核病,但是,我们却未能找到他患有结核病的任何证据。我们认为,他冒领政府补贴有好多年”。这种逃避工作的态

度与他从道德主义角度美化艰苦工作的价值形成明显的对照。此外,在狱医面前,克拉伦斯显得“十分神经质,并对正常的疼痛予以夸大,因而缺乏男子气”。他在38岁时才结婚,对方比他大一岁。在妻子看来,他是十分顺从的。虽说“我们两人不很相似,但是我们的日子过得还不错”,因为“我让她走自己的路,以免发生争吵”。在妻子死后几个月他被捕了,原因是他“猥亵”4个8~10岁的幼女,她们作证说他摸弄她们的生殖器。这些行为可以用来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被试试图通过他具有男子气的办法来证明他没有同性恋冲动。克拉伦斯声称这些女孩编造故事来对他进行“报复”,因为他“没给她们糖吃”。3年后,他又被捕了,对他的指控是他把两个幼女灌醉,然后试图与其中一个进行性交。不过,这两次指控他都逃脱了。两年后,克拉伦斯在家里试图对上述两个女孩之一(那个12岁的女孩)进行强奸时被警方当场捉住,并以强奸罪判刑。他力图否认这个事件,于是发展了一系列迫害妄想:“因为我在政治方面为人们做了许多工作,所以受到迫害”;……这种偏执反应与下列解释是一致的:他的异性性犯罪是对同性恋恐惧的一种防御反应。

威尔伯也发展了一系列定型的偏执妄想,但是他要比克拉伦斯较少表现出明显的软弱迹象。像罗伯特和罗纳德一样,对威尔伯来说,朋友意味着依靠:“他们在你需要时、生病时和经济拮据时提供帮助。你的朋友能以任何方式来帮助你。”他指出,他顺从他的妻子:妻子管理财务,教养孩子,而且,当他与妻子意见分歧时,“我通常做她要我做的事情”。鉴于房东的反应,威尔伯可能会充分体验到他在男子气方面所受的威胁,以及被逐出的可能,于是他在绝望之余不得不被迫进行“反击”,也即给房东以致命的攻击。威尔伯的定型使这种关系非个人化,他把自己想像成是“希腊人”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喜欢惩罚穷人”。

这些被试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因为他们的软弱,而且也因为他们自身内部抵御软弱的特征:他们除了像其他被试组的偏见者那样具有伪男子气的态度外,还借犯罪行为来反映其反软弱的想法。这些犯罪行为涉及到未受压抑的基本冲动,它们具有强迫的性质,而且可以被理解为是否认软弱的一种防御试图。这种防御实际上隐瞒了被试反对异性性欲的思想,以及反对权威和父母式人物的攻击心态(正如本章其他地方已经揭示的那样)。看来,这些被试未经内化的良心与软弱的扰乱相结合所导致的犯罪行为,是一种反软弱的防御类型。它们在法西斯主义者的被试中间甚至更加不受约束。

## (二) 法西斯主义者

反软弱的防御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以更加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也即具有对内在软弱的更加不加隐瞒的焦虑。伯克担心自己可能成为一名“色情狂”,这在我们描述他对一个13岁的女孩实施异性犯罪时已经讨论过了。一种难以摆脱的对同性恋的恐惧,在他回答问卷条目时也提供了进一步的暗示。该条目询问哪些犯罪行为最为恶劣。伯克除了列举强奸和谋杀以外,还提到同性恋者的性交行为。访谈时,他报告了一些幻想,大多涉及“一个男人糟蹋另一个男人的身体(他用肮脏的语言提到了鸡奸和口交)”。伯克几乎不顾现实地表现出狂暴。他用抗议的形式反复干扰访谈者,比如说“我能够像那个家伙那样赚钱。你认为我能赚钱吗?”他对问卷条目所作的“担心”反应,也由下述的表白得到提示:他说“什么东西能使一个人发疯?哦,我正是这样担心的。不管我是否准备赚钱,我都在变老。哦,我不老,但是我无法在监狱中赚钱。”他宣称,他最大的野心是“购买更多的牛羊,更多的土地”。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伯克是用伪造支

票的方法来“赚钱”的。

弗洛伊德说“我看不起同性恋者”。同时,他也十分同意问卷条目所认为的“对同性恋者应当施以严惩”的说法。他的放荡的性生活前面已有描述。他对女性的兴趣是有意识的。当他回答他最钦佩哪些伟人时,他列举了“萨罗姆、杜巴里夫人、马塔·哈里”。访谈时,他表示他之所以认同她们,是因为她们从沉沦中崛起,从而最终获得权力。“对,她们做了她们应该做的事情。”(你的意思是指什么?)“我尤其喜欢女人……我喜欢有能力的女人……杜巴里从一个妓女变成国家的间接统治者。”弗洛伊德的“女性一顺从一同性恋者”的思想也出现在他对自己“犯罪搭档”的态度之中,他与那个搭档的关系相当密切,在他描述该搭档时,有关地位的考虑冒了出来:“他30岁。我猜想我们在智力上是相等的。”(他是哪种类型的人?)“哦,他身材矮小,肤色较淡;我身材高大,肤色较深。”弗洛伊德如此关注他对他人的依赖,致使深入的访谈未能引出他对后者人格的真正描述。(他属于哪种人?)“最好的人。”(你能提供一个例子吗?)“他说话算数。我最感动的是,有一天夜里,我们陷入警方的包围,其他家伙都逃走了,但是他却设法回来救我……他是忠诚的。”由此可见,弗洛伊德与其搭档的忠诚关系,一方面通过武装抢劫提高了他的男子气,另一方面通过“别人逃走而他却回来救我”而间接地满足了她的“顺从一同性恋”的渴望。

对于安德里安,“女性化一顺从一同性恋”的特征是无须推论的。自从离开学校以后,他一直过着一种同性恋的男妓生活:“我是根据女性的观点来观察事物的。”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同性恋是一种充满仇恨的力量冲突的行为,不只因为“人们用一种在我看来优越的态度激怒了我”,而且“我从未做过像同性恋那样的事情,实际上是肉体的需求驱使着我,现在仍旧如此”。

安德里安为某种内部的强迫所驱使,以使用顺从的女子气行为向男人证明他是顺从的、没有男子气的。他“可以整夜地进行拥抱和接吻”。但是,自从他“发现无法摆脱那种事情”以来,他“就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干”,进一步变得俯首帖耳了。安德里安对这种极端的顺从是不满的,这可从他对那些男人进行欺诈的态度中表现出来:“除了金钱,我对任何东西不感兴趣。”“我缺钱,我要走自己的路。”他想支配那些男人的潜在欲望是显而易见的:“我统治那些家伙。”(你指的是什么意思?)“我对他们随心所欲。”

安德里安的“女性观点”使他变得既无性欲,也无爱情。他的行为有助于我们对其他高分女性(参见第十一章)的区分:他在身体姿态上表现出夸大的女性特质,包括奉承、挑逗、过分注意服饰,以及弱不禁风等。在此背后隐藏的愤世嫉俗可以在他喜爱的小说主人公中得到佐证:“你问我最喜欢哪一位?我告诉你,我对包法利夫人和伊维·拉什顿都不喜欢。她们都是一些有心计的女人。”他之所以认同玛丽·贝克·埃迪,原因在于她有点“神经质”。“虽说我个人对她并不十分喜欢,但是我极其钦佩她,因为她是一个精明的商人”。

安德里安甚至具有自我阉割的同性恋顺从:“我在一部侦探小说中读到,在一家酒吧里,一个女孩在一群恶棍中间耍弄花招,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于是,我想,这样的女孩都能办到的事情,我也一定能够办到。”结果,他从酒吧的顾客中挑选出一个男人,这个男人“有着十分卑劣的相貌”,“我提议两人一起去进行抢劫”。“我不想扮演积极的角色。我原先认为他会干出肮脏的事情,但是他不会。于是,我只好亲自动手了。”这个男人给了安德里安一把玩具手枪,然后站在外边,让安德里安进入一家商店去抢劫“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然后带着现金逃之夭夭。在讨



论希特勒问题时,安德里安阐述了他对法西斯的理解:“我不是领袖,但是我能够听从……尽管我有枪时我也是领袖,你说是不是?……当你让别人来领导你时,意义是一样的,你说不是吗?”

在伪民主的高分者中间表现出来的“道德—不道德”和“软弱—反软弱”的情结,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变得清晰起来,并以具体化的自我蔑视表现出来。我们之所以把它称之为“具体化”,是因为被试所蔑视的东西并非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而是与自我分离的,或者说被试不愿为之承担责任的东西。弗洛伊德的自我蔑视在下列评论中反映出来:“失业的惟一原因是他们像我一样懒惰。”“我不勤劳……像一匹野马。”他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好像那是一种孤立的特征,与他的整体人格没有关联,它们只是“来自家庭另一方(母亲一方)的遗传性偶发事件”。弗洛伊德说他在童年时期是“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孩子……我没有长大,我做每件事情时都是冲动的”。伯克宣称“我是一个可耻的人,是家里惟一的败家子”。他也关心这样一些问题:“你认为我是不是一个色情狂?”“你认为我能赚钱吗?”这类焦虑,加上他的性攻击,他的财务管理不当,以及错综复杂的经济诈骗,都提示着他的具体化的自我蔑视。安德里安是所有被试中最自我蔑视的。他把自己描绘成是“宠坏了的、自私的、神经质的人”。此外,“我与那些老处女们相处得很好。我想,在我的心里,我有着老处女的情结”。至于同性恋,“现在,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是颇为令人讨厌的。我要忘记我曾经有过的那种生活”。最后这一陈述是在他获得缓刑之前作出的。出狱后,他很快堕入酗酒和同性恋卖淫的行列。

### (三) 低分者

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那样,低分被试也表现出某些“软弱”

的冲突迹象。但是,低分者与高分者之间存在这样的区别:前者的冲突为自我所接受,而不是作为偏见的借口。低分者面对这些情感问题所具有的勇气使他们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他们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来满足成就的内部标准,而非仅仅乞求外部的力量。与此情况相联系的是他们的生活态度:发展自我表达的兴趣,以超越获取地位的方式。同样,与偏见者相比,低分被试并不过分追求男子气,而是允许发展软弱的、被动的和女子气的特质,并将爱情取向予以升华,没有偏见者那种自我分离的、敌意—顺从的同性恋冲突。

阿特的“软弱”主要表现在他试图寻找一个可以依靠的母亲式人物。当他在这方面遭受挫折时,他就伪造支票,并且因此而入狱。他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来避免自己被捕,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他的依赖需要: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他把监狱当做“母亲”了。他还公开表示他有“自卑感”。他的补偿在他努力满足内部价值的过程中表现出来,以示他的内部“能力”。他似乎有点神经质地坚持:“我不喜欢对我的能力加以限制”。他对其母亲的“能力”表示羡慕,而且在学校里读书“十分用功”:“当我有一次得了个‘B’而非‘A’时,我感到十分沮丧。”由于他的母亲向他“灌输这样的思想:身体是宝贵的财产,因此我应当注意保护它”。他试图将自己训练成“一名运动员”,并且在中学时代就意欲创造一个世界纪录。正在这个时候,他的一条腿受伤,他的运动员生涯随之中断。他躺在床上,腿上绑有石膏达9个月。很显然,在此期间他被迫完全依赖他的母亲(也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他的一个姐姐)。阿特说,“正是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抽烟和喝酒”,并且“中止了体育训练”。由于无法接受这种依赖性,加上他被剥夺了作为一名“运动员”的身份,因此他需要证明他的独立性,证明他是一个“大人物”。阿特要比他的父亲更喜欢“美

术”。“美术”在他身上唤起了新的热情：“我对这类工作十分向往……极感兴趣。”他的主要兴趣显然基于理智的和美学的。

吉姆则具有无组织的背景。他的父亲一直没有很好地关心过家庭,当吉姆 13 岁时,父亲离他们而去,养家糊口的重任便落到了吉姆身上。尽管他的学业不错,甚至跳了级,但只学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了。母亲报告说,当医生敦促她为了健康的缘故而多吃水果时,吉姆则往往为了帮她买水果而饿肚皮。正是在这段时期,他开始从事若干轻微的偷窃活动。他曾被捕过,但是案件最终被撤诉。他父亲失踪 8 年后归家,吉姆开始为他干活。但是,据他的母亲说,父亲“经常骂他”。这一经历可能有助于解释吉姆为什么会抗拒他遇到过的两个雇主:其中有一位私营雇主说,吉姆具有不合作的工作态度。与这种抗拒父亲式人物(权威)形成对照的是,他意欲追求一位“好父亲”,一位值得他爱的“好父亲”。有一位政府救济金调查员提到吉姆时说:“他有着一一种与老年男子呆在一起的倾向。这种男子是吉姆感兴趣的,并且能够随时向他提供各种帮助的……这种男子可能会酗酒,但是在吉姆看来,只要他与这个男子呆在一起,后者就会停止酗酒。可见,这种生活被认为是互利的。”在狱中,吉姆被赋予一定的责任,他的工作适应性据称是“极好的”。我们见到他时,他正在担任顾问之职,也即为那些到监狱精神病诊所就治的囚犯提供咨询。他声称,大多数来咨询的人一旦将他们的情感向一个同情者(例如他本人)诉说以后,他们的感觉就会好得多。他的自我洞察能力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他早些时候表示的希望成为一名“商业经理”的愿望,现在已经让位于在他假释后从事某种人事工作的愿望。

这种“成功的内驱力”在顿和迪克的思想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顿从其父母离婚之日起(当时他才 12 岁),就一直独立谋

生。在整个中学期间,他与一群伙伴一起生活。他们一起干活,或者在学校的军乐队里演奏,或者组建球队。与此同时,由于获得了进大学所必需的学分,他省下了 4000 美元,并且意欲通过边工作边学习来得到医学学位。但是,由于他患上了脑膜炎,致使这一目标未能实现。他说,他随后的工作史是“或多或少偶然性的”。他曾去他继父的企业上班,成了一名销售员。销售成了他的主要职业。经过 3 年的磨练,他成了经理,“非常成功”。他的主要目标是“安全”。但是,当他大量地借钱给他的母亲时,他丧失了那种“安全”,最终落得为母亲而去偷窃(此事后面还会描述)。在坐牢时,他认真地发展了自己的摄影爱好。目前,他打算与他的女婿合作,正式进入这一职业。作为一个囚犯,他的摄影工作甚至涉及到具有某种监督功能的性质。摄影代表着“一种身份——会见人们,并对他们进行分析”。顿的其他兴趣还包括各种运动和大量阅读。他被监狱精神病医生描绘成“最喜欢讲话的囚犯之一”,“具有真正的好奇心”,并且不断地“打断访谈者提出的关于监狱生活、囚犯和各种官员的特征等问题”。

迪克的陈述给我们所谓的“随和”感觉,同样也提示了他的抑郁性防御的被动性。他“不喜欢与人发生争执”(这种情况可能与他害怕“煽动者”有关,与他认为工会“不应当进行煽动”的焦虑有关)。迪克从孩提时代起就试图回避与“任何人发生争执”,即便当他的父母反对他与一个他所喜欢的女孩交往时(因为该女孩的一条腿有残疾),他也“不作争辩,而只是倾听,并且告诉他们我的立场。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由于顶不住父母的压力,他终于在服役时娶了另一个女孩为妻。尽管夫妻双方不断发生冲突,两人还是一起呆了 7 年,后来分手了。自那以后,迪克开始“违背”他的某些禁律,并且“有点儿疯狂,大量饮酒”,最终导致被监禁(具体细节将在后面提供)。如果迪克早先

想当医生的愿望未被经济上的困难所阻碍的话,他本可以使他的攻击性得以升华:“我常梦见我是一个医生,正在为产妇接生,或为病人开刀。”服刑期间,他对钟表制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将其作为一种职业,又将其作为一种业余爱好。我们推测,他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类工作上面,目的在于借此压抑某些攻击性的情感。有趣的是,迪克在空闲时间里从“一个挚友”那里学会了钟表制作,而这位“挚友”却是一个性骚扰者。他对这位“挚友”的接受态度与偏见者对这类问题的敌视态度恰成对照。我们也许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两人的友谊是否涉及到对潜在的同性恋冲动的某种间接满足,正如我们在吉姆与老人的亲密关系中所发现的情况那样。迪克在孩提时代与一名残疾女孩的友谊也为我们提供了某些线索(该女孩是迪克后来想与之结婚的)。迪克曾说:“她常到我这儿来听取意见……当别的男孩向她约会时,她就会跑到我这儿来征询意见,譬如她是否应该跟他一起出去,等等。”

## 六、异性爱

### (一) 高分者

正如我们从高分被试的反性欲的道德主义那里所期望的那样,他们对黑人的焦虑性想像,以及他们对黑人接近“白种女人”的担心,既显示了他们对女人的温柔,也表现了他们对女人的潜在的不尊重。这些男性被试对“可尊敬的”女人既持保护的态度又持敌意的态度。他们通过在两种模式之间作出严格的区分来平衡这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将所有的女人分成“好女人”(非性欲的女人)和“坏女人”(性欲的女人)。他们对前者抱以表面尊敬

的态度,这种态度提示我们,它是以防御为基础的(这种防御将性欲和攻击等感觉压抑下去)。这样的推论可由他们对待“坏女人”的敌意态度和非个人化的性态度来予以确认。即便对于“好女人”,他们采取的模式仍是一种支配—顺从的关系(参见第三节和第四节)。

上述模式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在每个高分被试身上。罗伯特阐述了两种女人的概念。他声称,他的母亲给了他“终生受益的教诲,也即女人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东西”。他在这种貌似尊重的背后却隐匿着两种女人的概念,譬如,他补充道:“我说的是好女人。”他称他的性冷淡妻子为“世界上最好的妻子”,代表着“完美的事物”。罗伯特对她最为佩服的是,她对他十分顺从:“她愿意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他在描述中也提到,两人有时出现相互埋怨,她因妒忌他而离家出走,以及为了“一件小事”而跑到她母亲那儿不回来,等等。当她发现他跟一个女招待有着某种暧昧关系时,她提出了离婚诉讼。这个女招待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女人,具有敌视、贪婪和不尊重人等特点。她在与罗伯特相好的同时,还与其他男人有染。此外,“她常常喝醉酒,喜欢斗殴、争吵……一次,她翻墙跃窗进入我的房子,另一次她把威士忌从窗外扔到我的床上”。当她发现他有过犯罪记录时(伪造罪),她便开始敲诈他。在一次激烈的争吵中,他终于向她开了枪。

比起罗伯特来,克拉伦斯和威尔伯描述的两性关系较为空洞。惟一的差异在于,罗伯特的妻子顺从罗伯特,而克拉伦斯和威尔伯却十分听命于各自的妻子。克拉伦斯在嫖妓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他直到38岁才结婚。他说,他之所以会被吸引,是因为妻子的外部特征:“她的容貌和体态。”“其实,我们两人不很相似”,“我们在对事物的品味上有点不同。甚至在每件事情上都

有分歧!”尽管如此,克拉伦斯与其妻子仍“相处得很好”,原因在于他的顺从:“我让她自行其是……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让她自行其是。”在他妻子死后不久,这个在年轻时候看到女孩会脸红的人,竟开始“玩”起幼女来了。他将她们灌醉,然后试图强奸她们。威尔伯对其妻子也属顺从性质。他让他的妻子掌管财务,作出决策。当两人的意见发生分歧时(譬如,“她在星期天喜欢留在家里而我则不愿意”),威尔伯便会“做她要我做的任何事情”。不过,随着访谈的深入,当我们问他与妻子有何相似之处时,他说:“哦,她不喜欢到处乱跑,我也不喜欢。”看来,两者的“共同性”在于:“我们两人都喜欢干活。”

罗纳德的两性史更加丰富多彩。他除了经常干些“一夜销魂”的勾当外,还曾结过三次婚,而且每次为时很短。他声称他与第一个妻子的“性关系相当融洽”,“因为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他与第二个妻子结合后一星期就分手了,因为“我讨厌她”,尽管“过了7个月他又回到了她的身边”,并且和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直到警方因他抢劫而抓住他为止。第三位妻子是个“好女人”。她是一个商人,“不太了解生活的细节……我们的性生活过得并不好,她属于那种性冷淡的人”。由于罗纳德对于“性感”的女人不感兴趣,因此这种性冷淡反而令他着迷。他说:“我不仅过去爱着她,现在仍旧爱着她,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否爱我……对我来说,没有比回到她的身边更能令我兴奋的事了。”

尤金的两性关系只持续了6个月,而且因“意见不合”而分手:“她总是设法让我戒酒,而我就是不愿意。”此外,他还妒忌她,例如,“在夜总会里,她会一直用眼瞟着另一个家伙”。有时,“我会找个借口离开家,看她有没有约会”。对女人的压抑性尊重也在下面的话中表现出来:“当我喝醉酒时,我的脾气很坏,但

对女人我不会发脾气。”他还报告说他的某些斗殴是由女人引起的。例如,在酒吧与一群陌生人打架,因为当他与一个女孩在一起时,那群陌生人在他耳边“讲了脏话”。

## (二) 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也反映出一种异性爱的取向,它甚至比其他类型的高分者更加具体,更加强调二分法。伯克仅仅把女人当做肉体的对象来利用,他几乎毫不隐瞒这一观点。在描述了自己放荡的性生活以后,他声称“我对妓女和荡妇有着丰富的经验”。他对第一任妻子经常向他要钱深表不满。他咒骂第二任妻子在他们结婚以后极为放荡。他承认他强奸过邻居的一个13岁的女孩,因为他“不得不搞点性活动,而且在那个女孩身上可以获得性满足”。然而,对于“好女人”,伯克则表现出有节制的尊敬。他“没想过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婚前发生性关系”,因为“她出身于很好的家庭”。他在再婚之前也没有与第二任妻子进行过性交,因为她“值得尊重”。伯克用一句话概述了“好女人”和“坏女人”之间的区分:“真是巧合,我娶到了一个好妻子,我的兄弟也都搞到了好女人。”

弗洛伊德在21岁时体验异性关系,只不过那是一个“已婚的女人”。他举了一个例子:“有一个女人约22岁,已婚,美丽,但是一个哑巴。”像苏迪和罗伯特一样,弗洛伊德也希望他所喜欢的女人是性冷淡的。根据监狱档案,“他的主要兴趣是对没有性欲的女性表示热情”。他爱过一名已婚女子,只要她与其丈夫离婚,他就会娶她。可是,那个女人后来回心转意了,弗洛伊德“对她的愚蠢感到十分厌恶”。现在,他希望结交一个“富裕的女人……不论她住在什么地方,只要年龄在28~30岁之间便可……而且,最好身体要有吸引力”。他“期望”娶一个犹太女演员

为妻,并声称在好莱坞的一次聚会上遇见过这个女演员。据称,他对他的吸引力仅仅是“肉体上的”。(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别的吸引力吗?)“我不知道,她就是一切。”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他提及的犹太女人“实际上是很在行的。但是,由于我没有接触过她,因此也就无法知道她对我的感觉如何”。

安德里安的两性关系主要涉及“一些比我年纪大的女人,而她们除了肉体之外,再也没有其他什么东西了。我对这些女人从未有过浪漫的感情。而且,我的所有两性关系都是与金钱联系在一起的”。他18岁时与一个年约30岁的女商人结婚,但是婚姻只维持了几个星期。他说:“我之所以与她结婚,是因为她有钱而我没有钱。”正如其他偏见者依恋性冷淡的“好女人”一样,他欣赏那个女人“在性欲上冷得像一只蛤蜊”。两人虽然离婚,但他继续与她保持联系达10年之久(正像他仍然与其儿时的女友保持联系一样)，“直到她去年结婚为止”。在继续保持联系期间,“她待我像对待一个2岁的孩子一样”。安德里安对性欲的压抑在他回答他是否具有性欲幻想的问题时反映了出来:“我对性欲不抱幻想……我的感情要胜过我的性欲。”

### (三) 低分者

所有4个低分囚犯在其异性关系中似乎深受冲突之苦,这些冲突是以他们对母亲式人物的依赖—情爱为基础的。然而,不像高分者那样,这种矛盾心理差不多是被压抑的,而不是分裂的或二分法的。此外,这种矛盾心理主要来自情爱—依赖的挫折而非来自恐惧—憎恨或支配—顺从的冲突。与高分者蔑视女性形成对照的是,低分者对女性抱以尊重,而且平等相处。他们与女人的关系强调共同的价值和兴趣。

阿特对他的“依赖情结”作了偏袒的解释(他在服刑期间进

行了“自主精神分析”,于是在访谈一开始就自发地提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所有那些与他保持亲密关系的女人,年龄都比他大,“既有女商人,也有工薪阶层,还有供应商”。“我把对母亲的依赖转移到了我妻子身上”,现在,又转移到了监狱看守身上。在他被解雇以后,他并没有努力去找工作,直到他的第一任妻子“对我忍无可忍为止”。于是,他开始酗酒,并且伪造支票,以此作为“转移依赖性的一种方法”。在坐了6个月的牢之后,她把他领了回来。他表示“忏悔,但不久又故态复萌,重操旧业了”。最终,她与他离了婚,尽管两人属于好聚好散。阿特报告说,他对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只知道她比他大12岁,而且他靠她供养。他与她生活的时间不长,因为他因再次伪造支票罪而被投入监狱。他不像伯克(伯克在伪造支票罪被捕之前,曾与警方“捉了一阵子迷藏”),他知道自己会被捕,因此事先“作了安排”,并且准备“将我的依赖性转移到‘监狱母亲’那儿去”。虽然阿特在“依赖性”方面存在冲突,但是他在描述他的第一次婚姻时,还是强调了他与其妻子的良好关系,并且表示对妻子的尊敬:她是“一位艺术家,既在理智方面表现出色,又在人际关系方面表现出色……我喜欢她的兴趣和她的理智”。他对自己在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抱以批判的态度:“我没有很好地爱她……尽管我有时不承认这一点……但是,由于我太关注自己,致使我无法与任何人谈恋爱……我确实钦佩她、尊重她、喜欢她……今天,我认为我已能很好地处理这个问题了,因为我已经长大了。”阿特的第二任妻子仍与他保持通信,他对她的“忠诚”深表感激。他说,她的来信尽是一些强调“社会功能”的话,“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帮助”。在谈到复婚问题时,他说,如果两人的兴趣和态度互不投机的话,他是不会与她生活在一起的。

阿特记不起他的第二任妻子,这一事实表明,他解决不了他

的“依赖性情结”的矛盾。吉姆的攻击性则直接说明了这种矛盾。他的性爱史包括读中学时与一个比他大一岁的女孩发生性关系。后来,由于他要供养他的母亲,女方主动提出中断两人的关系。为此,他变得十分沮丧,据他母亲报告,他甚至想开煤气自杀,因母亲发现而得以制止。这种转向内部的攻击表明被试对那个女孩抱以压抑的敌意态度,因为女孩拒绝了他,使他的情爱一依赖需要受到挫折。情感的依赖和受压的敌意在吉姆的报告中都有反映。他在报告中谈到了“生活目标”：“无论她需要什么,我都设法满足她……我努力为她提供爱,用爱来照顾她,并且了解她可能有的缺点。其实,我们都有缺点。好人和坏人的区别在于,好人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他们身上的不良思想。当我认为我确实遇到了我所需要的女孩时,我会把我的过去向她倾诉,因为我不相信幸福可以建立在谎言之上。”有趣的是,正如监狱的卷宗所记载的那样,吉姆 20 岁时偷了一辆汽车,“与一个年长的妇女一起外出喝酒”。此事导致他被教养一年。他对母亲式人物的敌意态度表现在直接的攻击行为上:据监狱卷宗记载,他 21 岁时“攻击了一个完全不认识的 50 岁的妇人。当时后者正外出散步,他用一根棍子敲击她的头,造成两处颅骨骨折,受害者当场死亡。法医发现被害者的乳房有被啃咬的痕迹……”当时他已烂醉如泥,显然处于一种茫然的和神游的状态,也就是说,他的防御被直接的近乎有意识的冲动所取代。随后,他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个事件。

顿也显示他对被爱的和被尊重的女人有着强烈的情感依赖。他的第一个妻子之死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从未得到恢复,直到我被监禁为止”。他与第二任妻子“相处甚好,直到我为了母亲去抢劫,两人的婚姻关系才告中断(顿在这里提到他之所以抢劫银行,是为了找钱给母亲治病。这个问题我们将

在讨论父母一节时详加描述)。“此事发生后,我对我的妻子感到内疚,尽管我很幸运,我与妻子在性生活方面配合得很好”。

迪克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伙伴关系而非父子关系”。他在谈及他的前妻时,用言语表示了性压抑:“她很热情,我正好相反……一个月一次的性交对我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了。”父母的压力使他不能与少年时代的意中人结婚,因为她的腿有残疾。结果,迪克“娶了一个白种女人”。两人仅仅认识 3 个星期就结婚了,原因是他感到“孤独”。婚后他们常为“如何抚育孩子而争执,起因是她常对孩子动武”。最终,两人分手,迪克参加了“海军陆战队”,并在那里养成了酗酒的习惯。一次,他“偷了一辆汽车”(像吉姆一样),带着女友去了雷诺,在那里“边喝酒边结婚”。然后,卖掉了汽车。迪克为这次偷窃作了民事赔偿,同时也废除了两人的婚姻。“当那位腿疾的女孩发现我已经结婚时,她也开始寻找精神安慰,做起同样的事情,嫁给了她所遇到的第一个男人。结局也是很糟糕的,并以离婚而告终。”现在,她和迪克又恢复了联系,计划等他释放后便结婚,但是至少也得征求父母的意见。他说她是有教养的:“她常到我这里来征求意见。在舞会上,她也只与我跳舞。而且,我们一起学习。”迪克说她代表着某种具有世俗道德价值观念的母亲形象,他可以依赖她,借此来“稳住”自己:“她是干练的、稳重的、安静的,不是疯疯癫癫的……”

#### (四) 小结

偏见者和无偏见者具有可以对照的性欲取向,这意味着两者之间存在关键的人格差异。无偏见者既寻找爱,也有能力提供爱。不论有否挫折和冲突,他们的生活态度受到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尊重的影响。这种情况有助于他们民主地认同别人,

认同竞争的失败者。另一方面,偏见者常感到自己被拒绝,而且放弃了体验爱情的希望。他们的陈述表明他们既不喜欢别人和害怕别人,又不喜欢自己和害怕自己。他们的主要能量是通过努力争取外在地位和力量,以及“男子气”来保护他们自己,以反对任何软弱感。这种以力量为取向的人格结构,驱使他们对外团体实施攻击,作为自己受压的象征。

## 七、反内感受作用和童年经历

### (一) 高分者

迄今为止,我们所提供的材料都支持了前面的陈述:高分者力图避免自由思考和感受,尤其是回避对心理问题进行分析。原因在于,这些内部探索会使他们“看到”他们自身所害怕的东西。结果,他们把他们害怕的冲动、软弱和冲突投射到外在的情境、事件和替罪羊身上去。这些人能让他们感受到他们自己的真实情感和冲动。他们常常让这些情感和冲动保持在未分化的状态,并且把它们体验成是异己的,或者说是他们的自我所无法控制的。其中,最为深层的冲突来源于童年时期他们与父母的关系。

罗伯特宣称:“就家庭环境而言,我一直处于优越状态。在16岁之前,我是一个好孩子,而且也是一个好男孩。”他认为,他那“世俗的”自我使他在18岁时犯了伪造罪和偷窃罪,后来又参与了危害治安的活动,结果导致他进监狱。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相当“偶然的”,与他的生活史没有关联。

威尔伯甚至更加清楚地否认自己的人格和行为有其童年时期的根源。(哪个人对你的影响更大,是你的叔叔还是婶婶?)

“哦,我今天的所作所为是我本人造成的。”当被问到他的童年时代怎么样时,他的回答从道德角度上讲是空洞的:“我只是一个干活的男孩……不会没有麻烦的。”

像罗伯特一样,尤金“在17岁之前仍是一个好孩子,从来没有有什么麻烦,既不吸烟也不喝酒”。他看不到他在童年时期对自我的压抑与他后来的麻烦史之间有什么联系。他“无法解释”他的狂暴“脾气”或酗酒。至于赌博,他声称“在我的血液中没有那东西”。

克拉伦斯也把自己的童年描绘为“一个好男孩”,而且从很小起就“开始工作”。他否认童年时期的自我压抑和他后来逃避工作以及对幼女实施性攻击之间有何因果关系。他的恐惧也使他借助偏执狂的手段来否认他曾经有过这种行为。

在罗纳德的例子中,童年时期的问题表述得相当含糊。例如,他批判了其父亲在他童年时期实施的棍棒教育:“他们说‘棒子底下出孝子’,但是我认为它在我身上行不通。”不过,正如我们后面要说明的那样,罗纳德无法以一种原则的方式将此批判贯彻始终,而是将此作为一种受害的背景,并且通过一种任性的背叛方法予以对付。

### (二) 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者也否认成年时期的人格与其童年时期的关系。安德里安试图表明他已经摆脱童年时期的冲突,听起来好像有点顿悟了,但是,这种“顿悟”马上又被他那缺乏情感的现实和不愿对自己人格负责的态度所否定了。他是愤世嫉俗的、自我分离的、蔑视自己的,而且对于改变自己不感兴趣。安德里安还说:“我的自私就是我要责备父亲的东西。他的态度和整个家庭的态度使我认为我就是整个世界。”在后来的讨论中,这种表

面的“顿悟”而实际的愤世嫉俗表现得更加清楚：“我想知道的是，如何获得最佳的生活。但是，我应当把‘最佳’去掉，因为我太自私。”安德里安对其父母的“影响”所作的“解释”是遗传论的：“如果说我确实做了什么错事的话，那是我身上的拉丁血统决定的。我的拉丁血统是母亲给的，我看起来很像她。”

弗洛伊德也避免把自己的人格作为一种生活经历的反映，相反，他采用了遗传论的解释：“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的遗传来自家族中的男性一方。我的懒惰也是家族遗传的。”

当伯克被问到其孩提时代像什么样子时，他说“不知道”。当他被问到其父母中哪一位对他的人格影响最大时，他采取了守势，错误地假设访谈者想把他的犯罪行为道德化。他拒绝访谈者的解释，坚持自己固执的道德主义。例如，他说他的父母“始终设法教导我为人正直。我之所以坐牢，与我父母无关”。

### （三）低分者

低分者的特征是，他们接受这样的现实，即他们目前的情感问题与他们童年时期和父母的情感冲突之间存在因果连续性。这种情况在阿特关于婚姻问题和犯罪问题的解释中得到佐证（前面已经说过，他的婚姻问题和犯罪问题与其母亲有关）。与此相似的是，顿说：“自从我入狱以来，我第一次没被各种情绪问题所纠缠。这些情绪问题涉及我的母亲和父亲。”至于吉姆和迪克，则提供不出这类引人注目的引语，尽管他们在涉及“因果连续性”方面也含蓄地提到父母的影响。

## 八、对待父母的态度

### （一）高分者

持偏见囚犯的思想（种族的、政治—经济的和道德—宗教的思想）有一显著特征，那就是企图否认个人的责任，并且把它投射到外部事物上去。他们的思想表明他们对权威和力量的屈从，以及对想像的权力人物的憎恨（例如，对犹太人的憎恨）。他们一方面对自己的冲动感到恐惧，另一方面又对“受尊敬的白种女人”实施性攻击。这些囚犯的离婚焦虑有其深刻的根源，其源头就是对父母的充满恐惧的态度。<sup>[23]</sup>首先，他们的内部完整性已经丧失，因而常常通过自我否定来对父母权威作出“恐惧的顺从”。这种顺从尤其表现在对待父亲的态度上，因为父亲是“比母亲更强的人”。这种顺从起因于被试无力批判自己的父母，起因于他们被父母的粗暴所压抑，起因于他们接受父母强加的价值，起因于他们对父母的过度理想化。最后一个原因（对父母的过度理想化）常借空洞的陈腐思想反映出来，主要涉及外部的模式，例如父母的地位，他们为家庭作出“牺牲”等等。被试的积极情感不是指向父母的个人特质，而是指向父母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或者父母为他们提供的东西。也就是说，被试的陈述反映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对外部事物的依赖性”。自我否定的顺从和对父母的依赖是他们“软弱”的真正根源，而这两个因素恰恰是被试试图予以否认的。恐惧使得他们不敢进行真正的自我断言，以及摆脱父母的支配。尽管他们也表示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不满，但是这些情感是被过度地个人化了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敢真正地批判反民主的行为，相反，他们仅仅把自己看做受害者而



已。他们对父母和其他权威的不满只能在虚假的背叛中表现出来,而且其行为常常是犯法的或法西斯性质的。他们借偏见来反对诸如犹太人的“统治”,因为后者象征着可恨的父母的力量和价值观念。当然,也有迹象表明,为了克服他们软弱的男子气,他们也会设法认同父母的权力、地位和力量,尤其是父亲的权力、地位和力量。这种自恋的认同实际上是一种对父母的控制采取受虐狂的顺从形式。

持偏见囚犯对父母顺从的另一个结果是,他们对母亲式人物进行区分。“好女人”被想像成是无性欲的。通过强调母亲的“纯洁”,她们在被试的幻想中被剥夺了性欲。这种曲解有助于这些被试不受他们性冲动的危害,并为他们后来无力将爱情和性欲结合起来提供依据。他们害怕黑人去接近“白种女人”,则可能与他们压抑自己的冲动,生怕危及母亲式的人物有关。

有些问卷条目直接反映了被试对父母权威的顺从,以否认自己对家庭成员抱有任何敌意。这些条目涉及:过分强调“对权威的服从和尊敬”(条目 1),拒绝“反抗思想”(条目 21),谴责那些对父母“不爱、不感激和不尊敬的”人(条目 27),以及不敢对“挚友或亲戚”表示异议(条目 42)。由于这些条目是分化的,因此它们的低四分位数也是相当高的。

罗伯特反复强调他“是父母完美的儿子,兄弟姐妹中完美的一员”,以此表示他的顺从。母亲“对我来说是世上最可怕的人”。不过,他对她的概念是空洞的,提不出任何明确的缺点。罗伯特除了提到她的反性欲的道德主义(那是“好女人”的象征)和她的“自我牺牲”的依赖性外,我们仍然不清楚他的母亲究竟是何等样子的。例如,他说:“我认为她把她的一生献给了她的配偶和她的孩子,她使他们感到快乐。她对外面的社会事务从来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家庭。”然而,这种“奉献”是以复杂的

情感来考虑的:“我实际上不认为她有什么缺点,除了她过于恋家,对社会事务不感兴趣外。”罗伯特同样以空洞的方式把他的父亲过分理想化:“他很好,没有比他更好的父亲了。虽说他有时有点严格,但我并不从他那里要求每样东西。我喜欢一个有地位的家庭。”他的潜在的顺从迫使他作了“道歉”:“也许,当时我并不理解受罚的原因。无论怎么说,我能成为他的儿子是十分幸运的。”有趣的是,罗伯特对其父亲的经济地位也作了评论:“他不是个成功的商人……他不想改变自己,结果走了下坡路……自从我毕业以来,他一直在为工资而干活。”鉴于家庭多次搬家,罗伯特“在最近几年试图分析父亲的漫游癖”。他说,如此经常地迁移,原因在于父亲“意欲寻找商业上的成功机会”。根据罗伯特的意见,他的母亲从不批评他的父亲为地位所迷恋的现实,她所反对的仅仅是他没有“成功”。这种态度为罗伯特提供了一种反对父亲的依据:“现在回想一下,他不是我要模仿的人。”罗伯特的自相矛盾有助于解释他的反犹太主义特征:他在反对犹太人时只提到了“他们意欲达到彼岸的驱力和野心”,而没有具体的例证和过激的言论。他对犹太人的不满还不及他对父亲的压抑。但是,鉴于母亲的道德主义,父亲式的理想对他来说是难以违抗的,即使将不满情绪转移到犹太人身上也不行。看来,他屈服于这种理想本身就意味着他不愿受到父亲价值观的支配。

罗纳德的成见是公开的。他3岁时父母就离了婚,他跟祖母一起生活。“祖母告诉我,我的母亲抛弃了我的父亲,抛弃了我的兄弟和我。”由于父亲再婚,罗纳德7岁时便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了。从一开始“我和我的兄弟就达成一种共识,即我们不喜欢她”。他说:“我的继母对任何事都没有兴趣,况且她对我们也不满,好像我们是她的绊脚石一样。”对于父亲的批评由下

述妒忌性话语来表示：“父亲对她的兴趣超过了我和我兄弟的兴趣。”罗纳德还表示了对父亲的许多沮丧之情，甚至产生一种被害感。他说：“虽然父亲是可以依赖的，但是他的变化太大了。工作使他奋进，而喝酒又使他沉沦。他始终抱有希望别人来帮助他的想法，尤其是经济上的帮助。我知道他用我祖母的钱去购买房产。我也知道他失败了，但这并没有使他罢手。”他一星期只给罗纳德 15 美分的零用钱，罗纳德对此耿耿于怀：“我决不会忘记那件事。”不过，一般说来，他责备继母胜过父亲：“她永不满足，贪婪无比。”即便这样，他的内疚也使他的用词有所保留：“她的贪婪可能出于其他原因，譬如节约一些钱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他把由于父亲的严酷纪律而引起的仇恨转移到了继母身上：“当我或弟弟干了坏事时，她就会告诉父亲。父亲不让我们有解释的机会。为此，我出走过两次。但是，我不恨他，我恨的是她。”（就像罗纳德“主要反对”那些地位弱小的人一样，他并不反对那些具有实力的人。）

威尔伯还在婴儿时期父母就去世了，他从小由叔叔和婶婶抚养长大。他说，只要有饭吃，有衣穿，有床睡就行。婶婶是个“好女人”。她满足于威尔伯的“依赖性”。她“对孩子们都很好。我们有穿有吃，生病时她还照料我们”。“我想像不出她有什么缺点”，除了“她不想到外面去，一直呆在家里”之外。他对婶婶的“理想化”缺乏更有意义的语言：“她就是一个好女人，对我好。”但是，他“从不”向她吐露秘密。威尔伯对访谈者的询问所作的回答表明，他的童年受到叔叔严厉的管教。他对这种统治过于驯服，以至于不想提出任何疑问。他说叔叔一个月要鞭打他几次。（你有没有问过他这样做是否正确？）“不，叔叔待我不错。但是，他在我很小起就让我做相当艰苦的工作，从日出做到日落。”（你怎么会接受的？）“我们要听长辈的话。”（你有否对此

提出过疑问？）“哦，从未提出过疑问。”威尔伯只有一次不同意，那就是叔叔要他干的活超过了要他自己孩子干的活。威尔伯用离家出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那时他才 15 岁。即便如此，他仍不想批判叔叔的权力主义。相反，他却描述叔叔“相当容易相处”。有时，“他整夜在外喝酒，回家时烂醉如泥。我婶婶躲到屋角里”。威尔伯表示他不敢认真思考对叔叔的批评，以及保护婶婶等问题。（对此，你的反应如何？）“我没有考虑过。”

克拉伦斯也把他的父亲描绘成“容易相处的”。他最钦佩父亲的是“他对待我的方式。他从不打我或骂我”。克拉伦斯为了表示对父亲权威的顺从，把父亲说成是没有纪律要求的人：“尽管父亲告诉我们应当做什么，而且希望我们做什么，但是他却没有许多纪律要求。原因是我们已经按他所说的去做了。”随着访谈的深入，克拉伦斯反映出父母是如何以威吓的方式迫使他服从的。他羡慕今天孩子的独立性，并且声称，如果那个时候他采用今天孩子的行事方式对父母顶嘴，那么“我就不能坐下来了”！克拉伦斯用同样的权威主义哲学来证明父母对他的威吓是有道理的：“以前的孩子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疯狂……如果父母必须惩罚孩子的话，我认为是对的，尽管我并不赞成‘棒子底下出孝子’的理论。”这种对父母权力的顺从有助于我们解释克拉伦斯为什么不能客观地评价其父亲：“我不知道父亲有何弱点。”他对母亲的描述同样是肤浅的和道德主义的：“她是一个随和的女人，一个好妈妈。”他说，他对她最为钦佩的是“她对待我的方式。也就是说，她总是说我有那么地好。母亲超过父亲”。（表现在哪些方面？）“哦，表现在气质上。”（她的人格特征怎样？）“我说不清楚。”

当尤金 2 岁时，他父亲“出走了”，“母亲找了一份女招待的工作，挣钱养活我”。因此，对尤金来说，母亲既是爹又是妈。他

对她的评论涉及到他对她的依赖：“她是一个好女人。换句话说，她为我干她所能干的每件事情。现在，她也一直给我写信。”（你对她最为钦佩的是什么？）“我样样都钦佩。哦，我认为她对大家都友好，尤其对我。”（请举个例子？）“哦，她始终设法为我干每件事情。每次去镇上，她都为我带点东西回来。”（还有别的什么吗？）“当父亲出走以后，母亲一直照料我，和我患难与共。”这种依赖导致他为母亲去抢劫。母亲教导他的不是价值观，而是绝对主义的道德准则：“她经常告诉我正确和错误之间的区别，以及我应当做和不应当做的事情。”她的道德主义掩盖了被试对她的敌意：“说实话，我认为她对我不够严格。她对我深更半夜回家毫无异议。”在说完这句话后，被试没有意识到其中的矛盾，接着又说：“她在我准时回家的问题上相当严格！”尤金服从他母亲的道德标准，“在17岁之前，我一直表现得很好”。他后来的问题（赌博、酗酒、斗殴和性放荡）可以看做是反对这种顺从的反应。“违背”她的道德主义使他感到内疚，从而认为应该为她“做些事情”。当被问到他与母亲的关系使他获得了哪些满足时，这种内疚引起了不恰当的回答：“我想我没有使她快活。但是，当我正直地做人时，我会照顾我母亲的……我觉得我从未很好地对待她。”

## （二）法西斯主义者

3个法西斯主义者以更加极端的形式表达了他们对父母式人物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父亲的害怕和顺从，其中还具有同性恋的成分。

伯克相当直接地谈到了他与母亲的关系，以及他对性的恐惧：“如果母亲提到像性这类话题时，我会感到尴尬。”他对她的概念围绕着“做事情”：“她是一个辛勤工作的女人，此外，还关心

我们这群孩子。”事实上，当问起他在与父母的关系中获得哪些满足时，他的回答只限于外部的事实：“他们给了我所需要的东西。”关于父母的人格，伯克也指向外部的因素：“你是指他们与人交往的情况吗？”他无法超越外部的作用，总是说一些诸如满足他的需要、“努力工作”、“成为商人”、“酗酒”、“发布命令”等话语。回避个人关系的这种抑制是与绝对的顺从相一致的（这种绝对的顺从是他的父亲强加到他头上去的）。伯克“在父亲身上从未看到过任何软弱”。他盲目地接受父亲，认为他的所有解释都是正确的，而且，“他也始终向我们表明他对事物的正确看法”。“父亲只需看我们一眼，我们就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了”。伯克的恐惧导致他说“父母之间从不争辩，即便当父亲喝醉时也是这样”。过了一会儿，他又天真地表示为什么没有争辩的原因：“母亲实际上不发表任何意见。如果他们确有分歧的话，那也不会让我们孩子知道。”接着，他又描述道“父亲有时会大发雷霆，然后出走……而母亲则走进房间大哭一场。但是，她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特别有趣的是，与伯克的幻想相联系的是，“大多数犹太人主要谈论性问题，譬如今晚进行口交等等”。伯克声称，他得到的惟一关于性的教育是父亲对母亲说的话：“注意这些孩子，不要被人利用。”过后，他又谈到父亲在他15岁时给他钱去嫖妓。无论这是事实还是幻想，它们都是具有高度提示性的：不难想像，伯克在性方面可能受到了过度的压抑，而且是相当粗暴的压抑。

弗洛伊德在婴儿时期父母便分手了，后来，他很少看到他们。他被一位养母所领养，直到7岁。从7岁到14岁，他跟着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直到他被送到一所寄宿学校就读为止。弗洛伊德说他不被养母所重视：“他们从早到晚干活，而作为孩子，我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可说。”他与其他孩子“相处得不太好”。

他对继母也表示不满,因为她拒绝他,“好像我是别人家的孩子一样”。他的妒忌使他把继母与父亲进行比较:“两人在各方面均不同,不论在智力上还是在其他方面,两人不可同日而语。”有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对父亲抱以矛盾的、同性恋式的固恋。他把父亲描绘成是一个“十分好的人,有理智,能理解人。无论从哪方面说,他都是一个好父亲……是社区里的楷模”。当问到他对父亲最钦佩父亲什么时,他说:“说不清楚。他就是一切。”他能想到的关于父亲的惟一缺点是:“哦,他太直率了……如果他认为你不好或做错了事,他会直率地向你指出。”确实,弗洛伊德没有足够的力量对父亲进行批评,甚至对他生命的头7年父亲离他而去的事实也不作批评:“他就是经常出走。”他否认父亲曾经不公正地惩罚过他。弗洛伊德对待父亲正如尤金对待母亲一样,他们都害怕被抛弃。这种害怕已由弗洛伊德对父亲和继母之间的争吵的描述予以提示:“争吵是十分激烈的,双方的语言都很辛辣,例如,‘我们根本不该把他带回家’。于是,父亲束手无策了……接着他就会惩罚我,而且十分厉害。过后,他会与我交谈,直到我入睡为止。”这种依赖性,以及其中的同性依恋迹象,也在下列评语中反映出来:“我只得到父亲的帮助。尽管他不大接近我,但是他总是站在我一边……我们两人的关系比以往更亲密了。此外,他还给我写信。”

安德里安的例子表明,被试因为恐惧父亲而驱使他作出同性恋的服从,同时把母亲作为附属角色。他的母亲在安德里安5岁时就去世了,死时只有20来岁。在安德里安的眼里,母亲是一个很幼稚的人,“没有什么幽默感”。除了在安德里安面前炫耀她的性感以外,对他漠不关心,而且经常用惩罚的方式来恫吓他。不过,她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就社会活动而言,她的一生大部分都花在赴宴上,就是对我并不重视。她在外出赴宴

之前常问我她打扮得如何……除了我的保姆说得清我的情况外,她似乎不了解我的情况”。她“通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惩罚我:把我锁进漆黑的小屋里,吓得我半死。或者,威胁说要把我送给邻居的一个女人,据说她是一个巫婆。这些做法深深地刺伤了我”。不过,依赖使得安德里安压抑了憎恨。(当你母亲惩罚你时,你的感觉如何?)“我爱我母亲。我几乎为她而发疯。”(你母亲对你的惩罚是否公正?)“很公正。虽说她曾经不公正地发过脾气,而且情绪波动厉害,一忽儿高一忽儿低,我不知道她下一步会干什么,于是不得不离她远一点。”当被问到母亲的缺点或弱点时,安德里安声称:“在我的记忆中,她没有任何缺点。”母亲的威吓削弱了安德里安的异性依恋,加上对父亲的害怕,促使他完全同性恋般地服从父亲。父亲在若干年前去世,生前是一名军官。他“不赞成任何类型的情绪表示”。安德里安对他的“执拗”感到害怕:“他的规定谁也不能违背……我认为他有点像暴君。”尽管他“对其他人硬得像钉子,但是他对我还是十分随和的。如果父亲惩罚我的话,母亲会十分恼怒,所以他就不再继续惩罚我了”。安德里安描述了一件事情,以证明为什么他要对父亲采取一种恐惧的“女性”态度:“顺便说一句,每当她哭,我也哭……她发脾气的时候,父亲就戴上帽子出去了,这会是她更加疯狂。我常常和她一起哭……有时,我认为,表面看来父亲是在骂她,但实际上他是在骂我。”安德里安表示,从幼年时起他就采用母亲的策略来操纵父亲。在提到他对父亲的固恋时,他说:“当我还在寄宿学校就读时,我十分相信他……每当我生病时,我常梦见他来看我……我给他写信……他也十分戏剧性地给我回信,就像一对恋人那样。我十分爱我的父亲。”由于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安德里安将其不满用犯罪的反叛形式表现出来:“我常令父亲担心……因为我随心所欲地离开学校,因为我乱花

钱,于是他病了。”接下来便是连续的犯罪行为。不过,“当他死时,我意识到我再也见不到他了”。安德里安开始对他的犯罪行为深感耻辱,并表示对父亲的更深的顺从。他说:“现在,我把他放在一个受人尊敬的位置上……他的形象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做一件事情时,我就会想他是否同意……他的判断始终是正确的……我用他的意见来取舍别人的意见。”安德里安还曾经作过努力,以赶上他父亲的男子气。在他被假释以前,他断言他已经放弃了那种“强迫的”同性恋,尽管他意识到他应该过“男人的生活,因为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正如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他的“断言”仅仅维持了大约两个星期。

### (三) 低分者

与高分者的顺从相比,低分者表现出潜在的独立性,包括对父母进行客观的评价,以及拒绝父母的权威等。低分者比较偏爱母亲,敬爱和尊重母亲。与此同时,被试还反映出对母亲的矛盾心理,不过,这种矛盾心理是被压抑的,而非过度理想化的和伪装的。这种矛盾心理围绕着受挫的情爱—依赖的渴望。正是这种基本的情爱取向,构成了他们对人类的喜欢和对民主的认同。以此为基础,被试对竞争的失败者予以认同,对不公正的现象予以抗拒。

阿特通过“自主精神分析法”使他的“恋母情结”回到了意识领域。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的“依赖情结”转移到了母亲的替代物上去。当阿特9岁时,父亲去世了。他的妹妹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去跟亲戚一起生活了,只有阿特单独在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而母亲从事广告工作”。这些因素的结合强化了上述情结。他表示,他们的关系是相当亲密的,只不过他扮演了依赖的角色:“我守在家里烧饭和干家务活。”两人世界刺激了他的性幻

想,他不得不克服对母亲的固恋,办法是美化她的躯体,称它为“宝贵的财产”。当他大约14岁时,母亲以“十分冷血的方式向我提出生儿育女的事和母亲的概念”,包括安排他观看孩子出生的手术。阿特对她的意象上升到心理的层面:“她是一个理智的和有教养的人。她具有感知的天赋,具有音乐家(钢琴家)的特质。”她的意志有点薄弱,包括“像我一样有着心理上的烦乱。幸运的是,我没有给她造成很多麻烦。但是,可以肯定,她是十分痛苦的”。母亲的情感支持帮助阿特断言他是不受父亲支配的,例如,他明确地拒绝父亲的反犹太主义,用某种批判的态度对他进行评价,包括他“作为独生子被富裕的父母宠坏了”。他批评父亲的纪律要求“没有连续性”,拒绝他的不公正措施,因为在此情况下,“除了争辩,你得不到任何东西”。母亲是一个典范:“她的纪律要求虽然也剥夺了我的特权,但是,由于她的坚持性和连续性,这些纪律要求产生了很好的效果。要知道,她是说话算数的。”若将父亲的变幻莫测作为认同的男性楷模,势必会混淆阿特关于自我特征的概念。例如,他原本不想成为一名艺术家,但是,出于父亲的意见,他不得不作出妥协,转而模仿父亲。“十分奇怪的是,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特殊的艺术能力,我只是一个平庸之辈”。相反,“我倒像母亲一样,有可能成为音乐家或钢琴家,尽管我根本不会弹钢琴”。阿特甚至在内化父亲的男性楷模时也出现了冲突:“虽说父亲也支持我的事业……但是,我并不喜欢父亲的鼓励,而是喜欢母亲的鼓励。”阿特承认他的父亲“容易冲动”,“因为喝酒和赌博而耗费了许多金钱,导致了不必要的争吵”。不过,由于他自己也“开始喝酒和赌博,加上我竭力反对艺术的‘商业化’,因此我被解雇了。后来,由于伪造支票,我的依赖性转移到了监狱”。阿特说他“也许遗传了父亲的某些奢侈特质”。

顿的生活也受到过分依恋母亲的支配。不过,他的潜在的情爱—依赖已被伪装起来,被他对母亲的抚育作用伪装起来。还在童年时期,他就积极参与与父母之间的争吵(这些争吵涉及父亲和其他女人出去的事)。他站在母亲一边,激烈地批评父亲。“当然,我也设法让他们重归于好,因为他们仍旧是相互关心的”。但是,他的调解未获成功。当他12岁时,父母离婚了。自那以后,他开始独立谋生,与其他几个男孩生活在一起(我们猜想,他在两个巨人之间被挤压的体验,也许决定了他的观点:“劳工和商界都忽视小人物”)。几年以后,他的母亲第三次结婚,那个男人之所以娶她,是因为她有许多钱,而这些钱在他的一系列非法商业活动中亏光了。最终,她债台高筑,将农场抵押了出去。顿也曾试图劝说母亲与那个男人离婚,但是未获成功。此外,他也曾产生过杀死他的想法,不过没有实施。后来,他选择了这样一种方法,即抢劫银行,以便偿还这些债务,同时也为母亲提供金钱。在最后一次抢劫中,一位银行经理对他紧追不放,他虽有枪,但没有向这位手无寸铁的男人开枪,结果被抓。顿认为他的母亲易受“情感偏见的支配,而且过于相信别人……又能容忍别人的缺点……”他尊敬她,说她“像一个人”。“她每年都学一点东西……最近学会了拉手风琴。”如同阿特的自我身份一样,顿的自我身份也在母亲—父亲的身份选择上产生了困难:他由于不希望“像母亲那样为情感偏见所支配”而模仿他的父亲。这种情况与他的下列陈述产生了尖锐的矛盾:“进监狱后,我第一次被各种情感问题所包围。”

吉姆与其母亲的关系较为深刻,即涉及情爱—依赖的感觉,又涉及近乎强烈的敌意态度。他与其父的冲突也很激烈。他接近母亲,像对待亲密的情人一样:“我与母亲无话不谈,没有任何尴尬的情形。我们两人在气质上都有点敏感,也都喜欢安静。

我认为我们两人都喜欢独处。我喜欢陪她外出,我们常去戏院。”在经济萧条时期,他承担起供养母亲的责任,她说他是“一个王子,自己饿着肚子为我买水果”。吉姆也批评她“社交能力不强……而且有点脾气”。不过,他又谈到了矛盾心理:“在母亲身上找弱点是有难度的……我们常常会忽视母亲的弱点……我发现我难以找出她在意志薄弱方面的弱点。”当然,他对母亲也有不满的地方,例如,有一次母亲不仅错怪了他,而且打了他。他声称:“那时,我没有足够的洞察力,所以深表不满。今天,我不会这样了。我知道她是为我好。”至于父亲(他曾抛弃家庭达8年之久),吉姆说:“他常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打我的母亲……他有点粗暴。他逍遥自在,喜欢钓鱼。他以自我为中心,很执拗。但是,他也有自卑情结,当然他是不会承认的。”母亲也持有这样的观点。吉姆“因父亲的严峻和残忍,已经对他不再抱有希望”。但是,注意一下吉姆的情感取向,我们发现他与其父的关系仍保持一种“友好的关系。他相当于一个玩伴。我们一起外出、钓鱼、打牌等。我们玩得很开心”。

迪克与其母亲的关系要比与其父亲的关系更加密切:“我喜欢跟着母亲在房子周围转悠。我与母亲的关系是一种玩伴关系,与父亲的关系则不同……我信任我的母亲。”(能否举个例子?)“哦,以性问题为例,母亲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要比父亲开放。”不过,迪克关于母亲的概念要比其他低分者的概念更加“道德化”,更加接近传统的标准,而且反映了他的某种依赖。他把母亲描绘成“一个管家,始终关心孩子的安危冷暖”。他对她最感钦佩的是“她尽其可能照料孩子,治家有方,井井有条。而且,既不吸烟也不喝酒”。(她有弱点吗?)“哦,我不知道。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弱点。”迪克对母亲也有意见,主要意见是她太严格。“母亲像父亲一样,也设法实施纪律,但是他们都容易相处……

他们从不打我。如果我回家不按时,母亲会剥夺我的特权。在我服役之前,我有6个月的时间处于着魔状态。例如每晚开了一辆汽车到外野餐,结果放松了学业。”他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抗议母亲的严格要求。至于父亲,他“始终很容易相处”。迪克认为父亲的主要弱点是违反母亲的要求:“他过于同情别人,对孩子相当宽容……允许我们玩曲棍球,允许我们用汽车,而且也从不过问孩子花钱的事情。相比之下,母亲在我们的花钱问题上稍稍谨慎一点。”

## 九、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犯罪行为”

### (一) 一般情况

在犯罪行为和反民主倾向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对此,可供利用的数据有两种:一是由合法地界定的攻击类目所组成的量表平均分;二是某些访谈材料。表21-5提出了合法界定的攻击类目,包括杀人犯、抢劫犯等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平均分。不同攻击组的平均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至于相关的访谈材料,攻击的异质性会影响我们的结论。但是,只要我们找到一种适当的概括水平,则这些访谈材料就能获得所需的解释。

### (二) 高分者(包括法西斯主义者)

我们无法详细提供有关每个被试攻击行为的确切情况,以及他们对这些攻击行为的态度。不过,就现已获得的材料而言,它们是具有高度提示性的。

表 21-5 根据攻击而分类的囚犯的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量表的分

攻击组	案件数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平均/人/条目	法西斯主义量表 平均/人/条目
伪造支票	44	4.45	4.76
抢劫、偷窃	31	4.63	4.39
谋杀	12	4.31	4.33
性攻击	23	5.02	5.33
合计	110	4.61	4.73

罗伯特杀害了被他敌视和蔑视的情妇,该行为被解释成是为了克服非男子气的恐惧。这种非男子气由其妻子的性冷淡而得到强化。罗纳德把团伙抢劫视做“一种生意”,以此作为获得金钱的一种方法。尤金的犯罪行为构成了他的“长期麻烦史”,他通过伪造支票、赌博、酗酒,尤其是斗殴来获得金钱。对此行为,他既感到自豪(因为它们体现了男子气),又感到羞耻(因为它们有点“野”)。威尔伯不仅杀死了房东,而且还滋长了偏执的反希腊人的妄想。他蔑视无男子气的父亲式人物,以便恢复他那受到威胁的男子气。克拉伦斯对儿童实施性攻击,同时伴随着“受政界人士迫害”的偏执性妄想,借此证明他的男子气,以及对压抑的同性恋的恐惧。伯克强奸幼女也具有同样的含义。他醉后伪造支票,与一个妓女狂欢,都是意欲通过异性乱交和成为“大亨”来支持他的男子气。弗洛伊德的团伙抢劫是为了证明他那获取力量的企图。安德里安用玩具手枪实施抢劫,用他的话来说,是为了证明他具有“领导能力”。而且,他把这种行为归因于他的腺体治疗,因为该治疗使他“更具男子气”。

所有这些攻击行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被试试图证明某种东西。他们谋求证明的东西是顽强、力量和权力,而这些都意味着“男子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试图否认自己心理上的“软弱”和“非男子气”等东西(包括非异性的情爱、缺乏能力、同性恋冲动、屈从、依赖或被动)。总之,高分者的犯罪表明了一种情结,一种支配他们生活的情结,那就是他们害怕自己的“软弱”,并用男子气来予以否认。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些被试表面看来不受抑制的冲动,实际上是对其压抑和恐惧的掩饰。

### (三) 低分者

阿特解释了他伪造支票的前因后果,他准备被抓,试图把他的依赖性从妻子转向“监狱母亲”。他将这种情结的根源归因于他对母亲的依恋,在此依恋中,他的情爱—依赖是与他为母亲提供金钱密切相关的。吉姆用棍子击倒一个中年妇女,然后又亲吻和啃咬其乳房,这些都是酒后的迷糊状态中实施的。接着,他发生了部分的记忆缺失现象。所有这些都提示了他的母亲取向的矛盾心理(他早些时候偷了一辆汽车,与一个年长的妇女外出兜风,也与同样的冲突有关)。迪克偷了一辆汽车,与一个女孩去雷诺结婚,似乎是对他未能与一个残疾女孩结婚的补偿。

这些被试的攻击行为也提示了支配他们生活的一个共同特征:渴望被一位母亲式人物所爱,并且反过来爱这位母亲式人物。这位母亲式人物既为他们提供“爱”,又希望他们“爱”她。这里,反映了被试对女性的矛盾心理。

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犯罪行为表明他们具有不同的生活主题:一种生活主题是反软弱的防御,另一种生活主题是对爱的追求。看来,同样的攻击行为和同样的暴力表现可能起源于不同的人格结构。低分者要比高分者更能兑现生活的诺言,因为前

者有能力与他人建立真正的关系,就像他们的犯罪行为主要是因为爱的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引起的一样。这里,新关系的建立为行为改变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高分者的人际关系不是以爱为基础的,因此,即便为他们提供新的关系,他们仍然会以支配—屈从的模式利用这种关系。

### 注 释

- [1] 本章为威廉·莫罗(William R. Morrow)所撰。
- [2] 本研究得到了戴维·施密特(David Schmidt)医生的广泛合作和帮助。施密特医生是加利福尼亚州圣·昆丁监狱的首席精神病医生。
- [3] 样本中不同攻击组的比例如下:“支票伪造”40%;“抢劫”“盗窃”和“偷窃”28%;“杀人”11%;“性攻击”21%。监狱总人口的相应比例如下(1945年):“支票伪造”14%;“抢劫”“盗窃”和“偷窃”54%;“杀人”7%;“性攻击”11%。样本和监狱总人数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的“支票伪造”少26%,但“抢劫”、“盗窃”和“偷窃”多26%。样本中的两个攻击组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没有显著差异(参见表21-5),需要注意的是,本注释提供的所有比例均指“当前的”攻击,因为有许多囚犯以前也有过不同类型的攻击。
- [4] 样本中有个被试与此条件不符,他在韦克斯勒智力测验中得分为48。
- [5] 实际上,本量表中有16名被试(包括曾经提到过的意志薄弱的被试)与此条件不符。
- [6] 由于要在访谈中跟踪某些囚犯,从而破坏了这种无记名方式。不过,我们这里分别给被试取了名字,至于如何把给予被试的名字与第四部分运用的数据联系起来,可以参阅表21-1底部的答案。
- [7] 这种情况发生在我们获得监狱智商测验数据之前。
- [8] 本章所考虑的12名被试是整个样本的一部分,它为第九至十三章提出的量化分析提供了基础。这一事实既为这里报告的临床结果提示了原因,也为我们在临床材料分析中发现的那些结果提示了原因。
- [9] 参见表4-17。



- [10] 4个最低分(按照每个条目的平均)分别为1.6、1.8、1.9和2.0。
- [11] 参见表4-17。
- [12] 参见表4-17。
- [13] 本章所提供的引文不止一个,以说明每个论点。这样做的目的不只在说明问题,还在于每个被试是作为个案研究而被跟踪的,所以每一节都提出了与个案研究有关的某些材料。
- [14] 请参阅第十六章关于反犹主义功能性特征的讨论。
- [15] 这里省掉了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用语。
- [16] 参见表5-8。
- [17] 坎特里尔(Cantril)已经讨论过缺乏信息和合适的参考构架与反动思想的可接受性两者之间的关系。
- [18] 尤金曾在地方资源养护队呆过一年。
- [19] 与此相对照的是,有7个囚犯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位于低四分位数(每个条目在2.6以下),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供了这种回答。相反,他们都反映了内在的冲突,尤其是对被动性的反应。例如,当面临困难时,有的被试说“见鬼去吧!”
- [20] 这种情况涉及一个性攻击者,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每个条目平均得2.7分。但是,在一次访谈中(这里没有报道),我们发现他在回答问卷时相当粗心。例如,在一次询问中,他在3个民族中心主义条目上漫不经心地填上了“-3”,而他的本意却是“+3”。
- [21] 伯克在韦克斯勒-贝勒夫的量表上智商为83。
- [22] 公式(3)和(4)改编自弗洛伊德(S. Freud)的研究。
- [23] 关于高分者和低分者的统计比较,以及他们对待父母的态度,我在第十章已经描述过了。

## 第二十二章 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 有关的心理障碍:对精神病 诊所患者的研究<sup>[1]</sup>

如果说思想的差异与人格的差异有关的话,那么我们也或许能够期望思想偏差与各种心理障碍有关。现代精神病学的研究发现,心理障碍者的经验和行为与心理正常者的经验和行为在程度上有所不同,而且特定个体产生的障碍很大程度上与其人格结构有关。现代心理学关于人格的概念最初就是以心理障碍者的材料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样做的原因与我们在精神病患者中间研究思想与人格的原因相似。下面就让我们来阐述这种原因。

首先,一般说来,描述和解释病理化的人格模式要比描述和解释健康的人格模式来得容易。诚然,“健康者”也有问题,或者说他们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压力的适应并非完全是顺利的。问题是,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能够成功地升华或成功地控制他们的原始冲动,而且,即便在内部问题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也能够顺应有助于减弱他们冲突和焦虑的生活情境。另一方面,那些需要治疗的“障碍者”,不论是否意识到这种需要,都难以达到适当的平衡,其失衡的性质和程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原始冲动以或多或少不经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对其防御的斗争常常能被清晰地观察到,而且与环境的冲突时

有发生。在这个意义上说,患者的人格要素和适应机制要比健康者的人格要素和适应机制表现得更加清楚。

其次,用精神病诊所作为实验室,其好处基于下列事实:它要比常见的研究性访谈更好,因为被试可以敞开心扉谈论他们生活中的细节。由于治疗者能激励患者讲出自身的情况,因此我们也可以借此证实这种方法能否用于对其他团体的研究。

再次,本研究寻求的是思想和健康—障碍之间的关系。譬如,具有心理障碍的人(严重到需要求医的程度)是否比其他人更具偏见?神经症与精神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神经症和精神病与思想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特定的思想是否与一般的精神病有关?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通过问卷和其他方式对 121 个精神病患者进行了研究。与智力水平、抱怨类型和精神病诊断等有关的数据可从诊所记录中获得。此外,对其中的 16 个案例施以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由诊所员工收集的材料也可供我们参考。许多被试参加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Minnesota Multiphasic Personality Inventory)。在分析和解释这些数据时,也充分利用了其他研究领域的概念和研究结果。

## 一、样本的性质

被试中有 71 个女子,50 个男子,他们都是旧金山兰利·波特诊所(Langley Porter Clinic)的患者,该诊所是专司精神病诊断与治疗的。凡暴力性个案和拘禁性个案是不容许入院的。在本研究进行期间,住院部有 3 个病房,约 45 个床位,供暂时住院的患者之用。其中,许多个案可以归入严重的神经症或轻度的精神病。患者大多数在门诊部就治。

诊所设施对每个患者开放,不因收入不同而有所区别。每次门诊的收费不超过 2 美元。根据患者的收入、职业和住房条件,他们基本上属于城市中下水平的阶层,尽管也有社会下层或中层的患者。对那些中上层或上层社会的患者来说,在接受精神病治疗时,也可请私人医生。

有人可能要问,不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如何,那些意欲寻求精神病院治疗的患者与那些不寻求这种治疗的患者有何不同?区分这两个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接受精神病院治疗的患者与不接受这种治疗的患者有着不同的心理原因。我们可从那些主动来到诊所就诊的人,或者在亲朋好友的怂恿下前来求诊的人身上觅得其中的原因。有些患者鉴于精神病引发的躯体症状而转向内科医生,他们很少或根本不知道精神病为何物。也有一些人经过几次门诊咨询便退了出来,并且声称自己是没有心理问题的。

我们依据诊所的住院政策而进行抽样。门诊患者至少每人安排一次访谈(视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精神病诊所的治疗而定)。至于住院部,由于其规模不大,因此只有部分申请者能够入住。凡被允许入院的患者都是那些需要立即加以关注的人,那些反映了特殊问题的人,以及那些可从住院中获得最大收益的人。至于预后的判断,既与年龄有关,也与障碍的性质有关。除此之外,还与下列因素有关,诸如患者的合作程度、接受治疗的愿望、理解问题的能力,以及智力和教育等。诊所员工对于患者的态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会根据患者的社会阶层、职业档次、教育水平、言谈举止等来对患者留下个人的印象。兰利·波特的患者来自各个领域,既有来自企业的,也有来自军队的,还有一些患者本身就是医生。申请者中有 20% 是自荐的,其中包括许多大学毕业生和年轻人,他们认为他们需要接受帮助,以便

作出更好的生活选择。而且,他们对心理治疗也能接受。

鉴于上述这些综合因素,兰利·波特诊所的患者大多是比较年轻的,受过一定教育的,而且比其他人更易接受心理治疗的。

在选择被试时,虽说我们是随机抽样的,但却有意将 20 岁以下的犹太人、非白人或出生在国外的人排除在外。<sup>[2]</sup>把问卷发放给能够进行合作的所有住院患者,其中有 7 个被试还附带接受胃溃疡的治疗。至于门诊患者,大多是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选择的。办法是让诊所员工按随机原则向进入候诊室的患者发放问卷。大多数被试被要求在现场填写问卷。

约不到 5% 的患者拒绝接受调查。也有一些人将问卷带回家去填写,其中半数以上的人交回了填好的问卷。由于问卷采取无记名方式进行,因此它增强了患者合作的意愿。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确切地统计问卷发放和回收的比例,据估计回收率为 85% ~ 90%。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合作的程度对抽样起着某种作用,但是其作用并不比接受研究的其他被试组更大。样本总体上代表了兰利·波特诊所的总人口,也即上述范围之内的人口。

现将接受研究的 50 个男性和 71 个女性的特征归纳如下:

(1) 年龄。大多在 20 ~ 40 岁之间,少数人不到 20 岁。

(2) 性别。女性多于男性,原因是诊所女性患者较多。许多调查结果是男女分开计算的。

(3) 婚姻状况。男性中 58% 已婚,36% 未婚,6% 离婚。女性中 62% 已婚,31% 未婚,7% 离婚。在已婚和离婚男性中 56% 有孩子,44% 没有孩子;在已婚和离婚女性中 33% 没有孩子。

(4) 教育。能够提供教育方面记录的有 46 个男性和 66 个女性。这些记录也许并不完全正确,因为有些受教育很少的人隐瞒事实。不过,总的来说,这些数字可就患者的职业来确认。

被试中大多数人完成了中学教育,有些人受过大学教育。在计算平均数时,如果被试受过附加的职业训练的话(例如,护理、商业、音乐等),则在已经完成的年数上补加一年。于是,男性的平均教育年数为 12.2 年,女性为 12.5 年。

(5) 智力。可资利用的测验量表是韦克斯勒—贝勒夫成人智力测验(Wechsler-Bellevue Test of Adult Intelligence)。其他一些测验是那些被认为不受暂时性障碍影响的测验(这些暂时性障碍是因神经症或精神病引起的)。尽管被试之间在这两类测验中存在广泛的差异,但是所获得的平均智商却为 115(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数,人数 = 37),似乎高得不合逻辑。其实,被试的真实平均数约接近 110,这是与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利斯博士(Dr. Robert E. Harris)关于兰利·波特精神病诊所的估计相一致的,也即它比一般人口的平均分 100 略高一些。

(6) 父母的出生地。被试中有许多父母出生在国外。男性中 70% 的人说他们的父母出生在美国,12% 的人说他们的父母出生在国外,16% 的人说父母之一出生在国外,2% 的人未提供任何答案。女性中 65% 的人说她们的父母出生在美国,18% 的人说她们的父母出生在国外,13% 的人说父母之一出生在国外,4% 的人未提供任何答案。

(7) 收入。从问卷中获得的这些数据是很不完整的,因为许多被试对问题未予答复,或者填写“无”(原因与隐私有关,或者与他们生病而暂时失业有关)。女性的数据比男性的数据更不完整,因为问卷的填空部分未列有关丈夫收入的问题。男性中有 33 人填写了他们的收入,数字统计如下:①年收入 2000 美元以下的占 18%;②年收入 2000 ~ 2900 美元的占 42%;③年收入 3000 ~ 3900 美元的占 28%;④年收入 4000 美元以上的占 12%。

女性中只有 19 人报告了她们的收入,还有 29 人提供了丈夫的收入。没有一个女性的年收入在 4000 美元或超过 4000 美元;只有 5 个女性的丈夫达到这种收入水平。大多数人的收入在 2000 ~ 3900 美元之间。

(8) 职业。50 个男性中 22% 的人称自己为失业者,41% 的人把自己归属于熟练工人,21% 的人属于白领,10% 的人为专业工作者。还有一个非熟练工人和两名海员。在填写职业一栏的 60 个女性中,58% 是家庭妇女,23% 是销售人员,8% 从事其他非专业工作,5% 从事专业工作,6% 是学生。

(9) 宗教。被试涉及诸多宗教。正如第六章已描述的那样,它们可与政治和社会思想联系起来讨论。约一半人是新教徒,1/5 ~ 1/4 是天主教徒,其余人则是不可知论者,或者拒绝陈述自己的倾向。

(10) 政治。男性的政治观点如下:空白占 16%;共和党人占 24%;民主党人占 54%;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占 6%。女性的情况如下:空白占 25%;共和党人占 17%;民主党人占 54%;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占 4%。

这个被试组的社会经济特征总体上与其他被试组相似。然而,我们未能把精神病患者的社会经济特征与其他临床患者的社会经济特征进行比较,因为这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由于兰利·波特诊所的患者来源广泛,因此,我们从该人口中抽取的样本,对美国大城市的其他精神病诊所来说,也许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 二、问卷的统计结果

我们所使用的量表包括民族中心主义量表(问卷 60 的 10

个条目)、法西斯主义量表(28 个条目)和两个不同的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一个为 5 个条目,另一个为 12 个条目)。随着修订过的问卷 45 得以实施,约 1/3 的问卷被回收。研究发现,新的问卷是可取的,因为它具有较好的统计特性,还可在兰利·波特组和其他非精神病组之间进行比较。

本章主要考虑的是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高分和得分低的特征。对兰利·波特组的男子和女子来说,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统计特性如表 22-1 所示。

表 22-1 精神病诊所男性和女性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信度数据

	男性(人数 = 50)	女性(人数 = 71)
信度	0.75	0.84
总平均	3.67	3.65
平均(A 部分)	3.92	4.23
平均(B 部分)	3.42	3.06
总体标准差	1.59	1.60
标准差(A 部分)	1.78	1.81
标准差(B 部分)	1.70	1.64
平均分辨力	4.11	4.21
区间	1.00 ~ 6.20	1.00 ~ 7.00

该被试组的量表信度与其他被试组一样高,而平均分辨力则较高(平均分表明,比起其他被试组的平均分来,精神病诊所的男女被试较少偏见。当然,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平均分(男性:3.67;女性:3.65)接近所有参与研究的被试组的平均分(参见第四章)。男女平均分相同。

在量表的 A 部分(非反犹主义部分),男女得分比 B 部分更高,这种情况与其他被试组的结果相符。一般说来,兰利·波特被试组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回答与其他被试组的回答只有很小部分存在差异。<sup>[3]</sup>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那样,精神病样本的选择是根据年龄、智力、教育和合作程度来进行的。所有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与民族中心主义相关。因此,可以预期,精神病患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或“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会高一些。<sup>[4]</sup>

### 三、民族中心主义与各类精神病的关系

我们首先着手调查的问题有:(1)民族中心主义与两类主要精神病(“神经症”和“精神病”)有何关系?(2)民族中心主义与其他类别的精神病有何关系?明确了这两个问题后,我们便可把民族中心主义的得分与精神病医生所作的诊断进行比较。在我们的 121 个被试中,被诊断为精神病的有 114 个。在余下的 7 个中,2 个尚未作出诊断,5 个虽已发给问卷,但是没有身份编码,因此无法查阅所需的卷宗。

表 22-2 显示了被归入各种精神病类别的被试比例。这些分类取决于正式的诊断,由诊所员工归入被试的病例记录。精神病类别的界定及其处理方式将在下一节讨论。

被试中有 24% 被归入精神病,62% 被归入神经症,余下的 14% 被认为具有其他“障碍”(例如,变态人格、酗酒,等等)。鉴于我们的研究目的,只有以一定频率出现的类别才被包括进去。因此,在精神病范畴,我们包括了精神分裂症和狂郁症。其他如“尚未确诊的精神病”等,都纳入“其他精神病”的类目之下。

表 22-2 患者样本中各种精神病诊断的发生率<sup>a</sup>

	人数	百分率	OPD 人口 (百分率) <sup>b</sup>
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15	13.2	9.2
狂郁症	10	8.8	5.2
其他精神病	2	1.8	
精神病合计	27	23.7	
神经症			
混合型神经症	34	29.8	
反应性抑郁症	2	1.8	
焦虑状态	20	17.5	
焦虑性癔症	3	2.6	
癔症	6	5.3	
疑病症	1	0.9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3	2.6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沉思状态)	2	1.8	
神经症合计	71	62.3	43.6
其他障碍			
变态人格	3	2.6	
酗酒	2	1.8	
溃疡	7	6.1	
杂项	4	3.5	
其他障碍合计	16	14.0	

a. 人数为 114 人;其中 29% 是住院患者,65% 是门诊患者,6% (溃疡病例) 是来自自身疾病医疗计划的患者。

b. OPD 指门诊部。

出现在“其他障碍”一栏中的病例包括:(1)7个患溃疡的患者(男性),他们之所以来诊所,不是治疗精神病,而是充当心身疾病研究计划的被试。这些病例被归入“混合神经症”。但是,由于这种归类与这里归入神经症的“混合型神经症”不同,因此为了研究的目的,它们被另外考虑;(2)若干病例被归入“变态人格”和“无精神病的酗酒者”;(3)有4个病例被归入“杂项”。其中包括两例“精神分裂样人格”:一例为“初级行为障碍”,另一例为“后创伤性人格障碍”。

我们列举的诊断类别只包括用于精神病分类的主要标题或障碍名称,而不对这些类别的特定症状进行描述,也就是不对混合型神经症、焦虑和抑郁、精神分裂症等特定症状进行描述。至于每一类别中的亚类,由于样本数太少,这里不予考虑。

我们获得的数字无法与诊所总人口进行比较。在表 22-2 中,我们提及的数字只涉及门诊的部分患者(主要是精神病和神经症患者),因此,这些数字比起门诊总人口所包含的患者来,涉及更多的精神病和神经症患者,而较少涉及“其他障碍”的患者。这种情况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们的被试 29%来自住院部,其中许多病例已被诊断为精神病或神经症。

在进行正式诊断时,医生应当遵循心理障碍的规定标准来行事(该标准由美国精神病协会创制,并于 1933 年 12 月 27 日经理事会批准实施)。

本表格中的分类是以症状学为基础的,而非以人格动力学为基础的。因此,“神经症”属于心理障碍,其主要症状是癔病的、强迫的或焦虑的。凡不具这些症状,即便有其他许多行为特点,例如性变态、酗酒等,也不应当归入“神经症”,而应当归入“初级行为障碍”“酗酒”或“变态人格”。

对这些被试,先由精神病医生初步作出诊断,然后在门诊部

或住院部主任会议上根据医生递交的病史作出正式诊断。我们无法测量精神病诊断的信度。不过,据我们推测,其中存在明显的不可靠性。其原因也许与类别有关,因为它们的界定是相当广义的。一个病例是否应当归入“混合型神经症”,或者一种症状表现是否充分到可以作出“癔症”或“疑病症”的诊断,往往是很不清楚的。还有,哪种症状居于主导地位,也是存在问题的。

因此,归类问题留下了很多余地,供医生进行主观判断,而医生也有可能根据他们的理论取向进行归类。此外,归类的不可靠性也会因为下列事实而得以增加:兰利·波特诊所所有许多治疗师,他们之间在培训、经验和理论观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就专业培训而言,既有实习的医科学生,也有颇具经验的精神病医生;就理论取向而言,既有坚持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观点的,也有坚持荣格动力学观点的,还有坚持非动力学观点的。

由于这些不可靠性,因此,我们认为,精神病的诊断类别与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不会十分显著。此外,就理论基础而言,我们也无法期望医生会完全依据症状学而非人格动力学进行分类,结果这些类别与民族中心主义的变量(它们与某些动力因素有关)之间就不可能存在显著的相关。最后,由于我们把整个被试组按照性别和诊断分成若干小组,这也会影响民族中心主义的统计。

根据性别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四分位数,整个被试组被分为 8 个小组,这样一来,我们便可获得被诊断为特定精神病的每个小组的比例(见表 22-3)。正因如此,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低四分位数的女性百分率就可以与其他四分位数的精神分裂症的比例进行比较。

表 22-3 归入各种精神病类别的每个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

	男子					女子					男子和 女子
	低	低中	高中	高	总计	低	低中	高中	高	总计	总计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12	13	11	11	48	16	16	14	18	66	144
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8.3	8.3	15.4	9.1	10.4	6.3	22.2	35.7	-	15.2	13.2
狂郁症	8.3	-	15.4	-	6.2	-	16.7	7.1	16.7	10.6	8.8
其他	-	8.3	-	-	2.1	-	-	-	5.6	1.5	1.8
合计	16.6	16.6	30.8	9.1	18.7	6.3	38.9	42.8	22.3	27.3	23.8
神经症											
混合型神经症	25.0	33.3	15.4	9.1	20.8	68.8	33.3	28.6	16.7	36.4	29.8
反应性抑郁症	-	-	7.7	-	2.1	6.3	-	-	-	1.5	1.8
焦虑状态	33.3	33.3	15.4	27.3	27.1	-	5.6	7.1	27.8	10.6	17.5
焦虑性癔症	-	-	-	-	-	-	5.6	-	11.1	4.5	2.6
癔症	8.0	-	7.7	-	4.2	-	5.6	7.1	11.1	6.0	5.3
疑病症	-	-	-	-	-	-	5.6	-	-	1.5	1.9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	-	7.7	-	2.1	12.5	-	-	-	3.0	2.6
强迫性神经症 (沉思状态)	-	-	-	-	-	-	-	-	11.1	3.0	1.8
合计	66.3	66.7	53.9	36.4	56.3	87.6	55.7	42.8	77.8	66.5	63.3

	男子					女子					男子和 女子
	低	低中	高中	高	总计	低	低中	高中	高	总计	总计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人数 
	12	13	11	11	48	16	16	14	18	66	144
其他障碍											
变态人格	-	-	-	18.2	4.2	-	-	7.1	-	1.5	2.6
酗酒	8.3	-	-	-	2.1	-	5.6	-	-	1.5	1.8
胃溃疡	-	8.3	15.4	36.4	14.6	-	-	-	-	-	6.1
杂项	8.3	8.3	-	-	4.2	6.3	-	7.1	-	3.0	3.5
合计	16.6	16.6	15.4	54.6	25.1	6.3	5.6	14.2	-	6.0	14.0
总计	100.1	100.1	100.0	100.0	99.9	100.1	100.1	100.1	100.1	100.0	100.0

此外,同样的百分比在民族中心主义分布上是裂半计算的(见表 22-4)。这种计算是通过一方面将低和低中的四分位数,另一方面将高和高中的四分位数相结合而得以完成的。这样做增加了每个小组的病例数,从而使我们可以根据从高分组和低分组的诊断中获得的高分组与低分组之间的差异,对病例的类别与民族中心主义进行比较。

按理,对于病例,除了分类之外,还应根据细分原则对亚类进行深入的描述。但是,由于病例数太少,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大类补充特征,譬如,对神经症予以列表显示。

表 22-4 归入各种精神病类别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裂半分布的百分比

	男子		女子	
	下半 人数 = 24	上半 人数 = 24	下半 人数 = 34	上半 人数 = 32
精神病				
精神分裂症	8.3	12.5	14.6	15.7
狂郁症	4.2	8.3	8.9	12.2
其他精神病	-	-	-	3.1
精神病合计	12.5	20.8	23.5	31.0
神经症				
混合型神经症 <sup>a</sup>	29.2	12.5	50.0	22.0
反应性抑郁症	-	4.2	2.9	-
焦虑状态 <sup>a</sup>	33.3	20.8	2.9	18.8
焦虑性癔症	-	-	2.9	6.3
癔症	4.2	4.2	2.9	9.4
疑病症	-	-	2.9	-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	4.2	5.9	-
强迫性神经症(沉思状态)	-	-	-	6.3
神经症合计	66.7	45.9	70.4	62.8
其他障碍				
变态人格	-	8.3	-	3.1
酗酒	4.2	-	2.9	-
胃溃疡	4.2	25.0	-	-
其他	12.5	-	2.9	3.1
其他障碍合计	20.9	33.3	5.8	6.2

a. 只有在两个病例中出现高一半和低一半之间的差异,其统计才有意义。对“混合型神经症”来说,低分女性比高分女性多(C.R. = 2.4; 2%的水平),而其中的“焦虑状态”,高分女性比低分女性多(C.R. = 2.1; 5%水平)。

表 22-5 显示了每个四分位数中神经症的百分比。同时列出的还有它们的各种补充特征。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百分比并非以每个四分位数的总病例数为基础的,而是以每个四分位数的神经症病例数为基础的。此外,不是所有的病例都有这样详细的描述,而且,许多病例的特征远远超出这里所提及的内容。正因如此,把表 22-5 的纵列相加并不达到 100。表 22-6 提供了与表 22-5 同样的结果,只不过它显示的是民族中心主义分布的裂半现象,而非四分位数。

表 22-5 在表明各种神经症特征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四分位数中神经症患者的百分比

	男子				女子			
	低	低中	高中	高	低	低中	高中	高
	人数 = 8	人数 = 8	人数 = 7	人数 = 4	人数 = 14	人数 = 10	人数 = 6	人数 = 14
抑郁症	50.0	12.5	28.5	-	50.0	10.0	33.3	7.1
焦虑和恐惧	25.0	-	28.5	50.0	64.3	30.0	50.0	7.1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	-	-	50.0	-	10.0	-	-
神经衰弱	-	-	-	-	14.2	-	-	-
转变性癔症	-	-	-	-	7.1	20.0	16.6	-
疑病症	-	-	-	25.0	-	10.0	-	7.1
精神错乱	-	12.5	-	-	7.1	-	-	7.1
精神分裂样	25.0	-	-	-	-	-	33.3	14.2
偏执狂	-	12.5	-	-	-	-	16.6	-
同性恋(或性变态)	25.0	25.0	-	50.0	7.1	-	16.6	7.1



表 22-6 在表明各种神经症特征的民族中心主义量表  
分布中高一半和低一半神经症患者的百分比

	男子		女子	
	下半 人数 = 16	上半 人数 = 11	下半 人数 = 24	上半 人数 = 20
抑郁症	31.3	18.1	33.3	20.0
焦虑和恐惧	12.5	36.2	50.0	20.0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	18.1	4.2	5.0
转变性癔症	-	-	12.5	5.0
疑病症	-	9.1	4.2	5.0
精神错乱	6.3	-	-	5.0
精神分裂样	12.5	-	-	20.0
偏执狂	6.3	-	-	5.0
神经衰弱	-	-	8.4	-
同性恋(或性变态)	25.0	18.2	4.2	10.0

正如表 22-6 所概述的那样,民族中心主义与精神病诊断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两个主题来阐述:(1)与神经症和精神病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2)与特定的诊断类别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 (一) 与神经症和精神病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在我们的整个被试组中,神经症患者要多于精神病患者,比例为 62:24。表 22-4 表明,该比例在民族中心主义分布中,低的一半要比高的一半略大一些。这种倾向在表 22-3 中似乎更为显著,尤其是在女性的数字方面。实际上,在低四分位数中,几乎没有一个精神病患者,相对来说倒有许多神经症患者。神

经症患者的比例随着精神病患者比例的上升而下降,这就是低中和高中四分位数的情况。许多精神病患者位于高中四分位数中,只有极少数患者位于高四分位数中。同样的倾向既出现在男性组中,也出现在女性组中。

为了解释精神病被试从高中四分位数到高四分位数比例下降的原因,我们可以提供若干假设。第一种假设是,这种下降完全因样本采集因素造成的。我们发现,如果不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把许多得分极高的患者从被试组里剔除出去的话,那么在高四分位数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实际上等于或高于高中四分位数中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许多得分极高的患者之所以被剔除出去,是因为他们不愿合作,而且他们相对来说持有严重的怀疑态度,害怕我们侵犯他们的隐私。因此,他们在问卷上留下许多空白,例如,对自己的收入、父亲的收入和其他一些“私人”问题不作回答。即便我们向他们保证问卷是无记名的,他们还是心存疑虑,对有些问题避而不谈。他们通过这些手段回避了一些可能使他们想起的正在设法压抑的问题,或者会使他们的弱点暴露出来的问题。

第二种假设是,一些抱以偏见的患者未去精神病诊所求诊。也许,在这些具有精神病或近乎精神病的患者中有不少人属民族中心主义者。如果这一假设成立的话(即在严重的精神病患者中间有许多潜在的高分者),那么在高四分位中相对较低的精神病发生率可能是由下列因素引起的:一些精神病患者未去精神病诊所求诊。

第三种假设是,一些住院患者由于情绪紊乱而无法正确地填写问卷,甚至拒绝填表。但是,我们尚缺乏足够的案例来解释从高中四分位数到高四分位数精神病患者人数的下降。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将在后面予以研究),偏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

自我防御的反映。被试会投入很大的能量来实施自我防御,因为一旦丧失它们,他们就会精神崩溃。也许,高分者与高中四分位数者十分相似,只不过前者具有更大的自我防御强度。

第四种假设是,从高中四分位数到高四分位数,精神病比例的下降是一种真实现象,它可以用精神病本身的某些特点来予以解释。也就是说,精神病的性质决定了它倾向于产生中间分而非极端高分。为了支持这一假设,我们需要提及我们在患者身上所看到的某些现象。

我们发现,在接受访谈的一些精神病患者中间,只有一个人对当前的事件和社会问题稍有了解。看来,这些精神病被试(哪怕第一次发病的轻度病例)在情感上远离社会现实,既无法关注它,也难以形成与之相一致的思想。诚然,这一现象虽不导致量表信度的降低,但它足以使被试作出异常的回答模式,导致“中间”分。

与此相关的假设是,在我们的被试组中,之所以出现民族中心主义中间分的倾向,主要与某些特定的因素有关,也即这些患者大多处于急性精神病发作状态,或者刚从急性发作状态中恢复过来。对此,我们有一些支持性的观察。例如,患者仅仅根据+1和-1作出回答。正如一个患者在事后的访谈中所说,当他出院时,也即当他的病状有了很大的改进时,他认为他当时的回答是极端缺乏自信造成的,从而妨碍他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反映自己。如果现在再让他填表,答案也许就不同了。

另一被试当时正患偏执狂妄想症,他对诊所环境抱以严重的敌意,并对测验过程表示不满。因此,他只按照+3和-3来作答。这样一种回答模式也导致了他的态度更接近于平均分的分数。

疾病本身的特征对有些患者来说可能是重要的,但是,我们

的印象是,它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多数被试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况且,在填写问卷时,脱离现实的被试会作出许多无效的回答。这些无效的回答表现为省略、异乎寻常的评论,或者无法恰当地遵循指示填写。

如果从目前的小样本中获得的数据有效的話,那么它们表明精神病与极端的偏见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而与适度的偏见之间却存在一种显著的相关。此外,在极端的高分者中间,精神病发生率相对较低。

为了解释这种倾向,我们赞同下列的假设(它既符合前面各章讨论过的研究结果,也得到后面将要讨论的临床研究结果的支持):正如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测量结果所表明的那样,适度的偏见似乎与某些人格结构有关,它们在特定的情境里有可能导致神经症而非精神病。对此假设,我们将在本章予以详尽讨论。

## (二) 与诊断类别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由于我们的样本尚缺足够的病例,因此我们的结论基本上取自上述各表所列的诊断类别。一般说来,民族中心主义与特定的精神病症状相关不高,这已由兰利·波特诊所的研究所证明。在精神分裂症、狂郁症、焦虑状态、癔症、强迫性神经官能症,以及混合型神经症中,既有高分者又有低分者。不过,我们发现,在民族中心主义和精神病诊断之间存在某种量化关系。而且,同样的诊断类别,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存在质的差异。

先让我们考虑量化关系:(1)低分者,尤其是低四分位数中的低分者,大多集中于混合型神经症类别,而且可由抑郁症和焦虑予以区分,有时则可由神经衰弱特征予以区分。这种情况对女性来说尤为普遍。归入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布中高一半和低

一半的混合型神经症女性,其百分率之间的差异在2%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意义(参见表22-4)。(2)与低分女性相比,有更多的高分女性归入“焦虑状态”。该差异在5%的水平上,亦具统计意义(参见表22-4)。这种倾向在男性中并不明显,相反,倒有许多低分男性被认为具有“焦虑状态”。正如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在具有焦虑状态的高分男性和低分男性之间,存在重要的质的差异。(3)被试中有7个男子患胃溃疡,他们依据研究计划服用心身疾病药物。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人得低分,有一人得低中间分(他被证明对黑人持有强烈的偏见),有2人得高中间分,有4人属高四分位数。看来,尽管由于案例数太少而难以断论,但其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有趣的是,关于胃溃疡病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偏见者的人格结构的动力阐述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它们都强调潜在的依赖性、抗拒的防御机制、男子气,以及活动的内驱力等。再让我们考虑在同样的精神病类别中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存在的质的差异。

### 1. 混合型神经症

该类型在低四分位数女性中较为常见。它也发生在约1/3的“低中间分”的女性中。有11个低分女性和3个高分女性被诊断为“混合型神经症”。在低分者中间,有8个女性报告说存在抑郁感和自卑感,出现情绪波动、哭泣等现象。其余的女性诉说疲劳、痛经,以及社交关系发生困难等。还有一个病例有其他躯体症状(也许与癔症有关)。在3个高分女性中,没有一人报告说存在抑郁的感觉,有2人不承认自己有任何心理问题。有一人属精神错乱者,由丈夫陪同前来就诊。丈夫诉说她酗酒、大把地花钱、在酒吧里和其他男人乱搞,还有月经不调等。但她本人却感到无须治疗。有2人属于心身疾病:一人是极度紧张的青年女子,患有甲状腺病,不承认自己有心理障碍;另一人则患

有慢性皮疹,并承认患有长期的性障碍。

如果把胃溃疡患者排除在外的话,那么被诊断为混合型神经症的男子就很少了。但是,男性倾向与女性倾向十分相似,在两个低分组中,百分比分别为25%和33%;在两个高四分位数中,百分比仅为15%和9%。在低四分位数中,有3个混合型神经症病例;在高四分位数中,仅有一个混合型神经症病例。3个低分者中有2人报告说患有神经性抑郁症。3人几乎全都具有依赖性,其问题随着被恋爱的对象所拒绝而加重。上述情况均为被试所承认,并在第一次访谈时就提了出来。在此类别中,有一个高分者是抑郁的,但也反映出强迫性神经症和焦虑症状。焦虑集中在这样的念头上:他可能伤害自己和他的孩子。这种念头会突然出现,并反复发作。

### 2. 焦虑状态

以女性为例,在所有类别中,该类别包含百分比最高的高分者(28%),没有低分者,而且中间四分位数个案极少。有5个高分者被归入“焦虑状态”,2个高分者被归入“焦虑性癔症”。这7人中有5人诉说具有紧张性发作、发怒、头晕和晕厥。此外,还有典型的疑病症,譬如恐惧死亡、惧怕心脏病发作等。有2个女性担心发病时会伤害她们的孩子;有一人实际上差一点将自己的孩子闷死。在2个尚未确诊的个案中,一例具有躯体症状的疑病症偏见,并与某种抑郁相联系;另一例具有精神分裂样的反应症状。这个类别中没有低分者。

以男性为例,在低和低中四分位数中,病例的比例稍大一些。共有4个低分者和3个高分者。低分者中有一人因与其粗暴的父亲发生磨擦而出现晕厥症状。其他3人则与归入“混合型神经症”的低四分位数病例颇为相似,除了临床上更具焦虑、自我不满、抑郁、社交和性障碍,以及某种精神分裂样退缩迹象

之外。

3个高分者表现出躯体焦虑症状。有一例伴有疑病症,另一例伴有偏执狂倾向(包括焦虑性梦想和担心遭人袭击)。3人中有2人把症状归因于偶发事件。

### 3. 精神分裂症

在女性中,既有高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也有低分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高四分位数女性中,没有人归入这一类别。被归入精神分裂症的高分者并不归入精神分裂样的类别。他们表现出偏执、紧张、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其他特征。高分和低分之间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来说是相似的。高分者表现为幼稚、退缩、狭隘等,而在高中间分的女性中,从其精神分裂样或强迫+精神分裂样人格中可以发现突然的产后退缩性精神病。低分精神分裂症患者高度敏感和内倾,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生活较有兴趣,而且对他们自己的疾病也具有相对来说较多的顿悟。

关于偏执狂,我们作了下列观察。我们的被试组并不包括“真正的偏执狂”病例,而是涉及若干具有偏执狂思想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这些中间既有高分者,也有低分者,还有中间分者。不过,低分者的偏执狂症状在质的方面与高分者的症状有所不同,不同之处在于低分者常将受迫害感与严重的自卑感结合起来。譬如,“有人因我的症状或我的自卑而正在威胁我、拒绝我或取笑我”。“魔鬼”不仅是来自外部的威胁,而且主要来自个人内部。另一方面,高分者倾向于投射型幻想,有时还伴随着吹牛、自我夸大和自我正义感。不过,高分者的“魔鬼”只来自外部威胁。

### 4. 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在这个类别里只有1个男性和4个女性。男性属于民族中心主义的高四分位数。4个女性中2个低分,1个高分,1

个高分。对2个强迫性神经症病例来说,一个出现在低分组中,但位于低分组和低中分组之间的交界之处,其法西斯主义得分稍高于平均分。另一例是个低分者,并不表现出典型的强迫性神经症症状,但具有恐惧倾向和许多有意识的焦虑。2个高分女子(1个高分,1个高分)都被归入“强迫性神经症(沉思状态)”,其特征是刻板的成见,以及精神分裂样性质的沉思状态。那个高分个案为此提供了数据,她是一个15岁的女孩,具有性成见。她常为性交和怀孕等幻想而忧心忡忡。在她住院期间,她的大多数有意识焦虑和沉思都集中在她的生理功能上,尤其集中在便秘和想像的躯体变化(肚子变大等)上。

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到,有些心理倾向将民族中心主义父母与非民族中心主义父母区分开来。我们将研究这些倾向,并且将它们与我们的理论联系起来进行解释。

## 四、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有关的民族中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与精神病诊断之间的关系,也可以通过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来予以研究(下面,我们在有些地方会用MMPI来表示“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这里所述的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是伯恩路特型(Bernreuter Type)的修订版,用以对精神病医生的诊断进行验证。它包括若干量表,每个量表由若干条目组成,条目在具有临床症状的患者和总人口之间作出统计上的区分(所谓的临床症状,包括转变性癔症、偏执状态和精神分裂症)。据认为,该测验分数比起医生对患者所作的诊断,更能提供有效和可靠的标准,因为医生在对患者进行诊断时,受到他们的理论基础、专业训练和经验积累等许多因素的

影响。

该测试用于 34 个男性和 48 个女性,他们占了整个被试组的 68%。由于男性和女性需要予以分别的处理,因此被试数目就会变少,我们也就很难得出结论性的说法。

把四种民族中心主义四分位数与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上的平均分进行比较,以及对个人测验和团体测验予以初步观察,未能表明民族中心主义与 MMPI 测得的精神病症状之间存在一致的关系。这些结果表明,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深入研究可能是很有价值的。

以下是量表名称及其测量的主要心理问题。心理问题的描述取自测验手册所提供的內容,只不过用词较为简洁而已。

(1) 疑病症:量表 I(Hch)和 II(Hs)。两者都测量人体功能的失常程度。许多提到的症状是含糊的,或者属于一般的焦虑性躯体表现。量表 I 更为有效,因为它与精神分裂症相关不高,而且还包含了与年龄有关的说明。

(2) 癔症(Hy)。一种备用量表,测量被试(s)和患者之间相似的程度(这里的患者已经出现转变性癔症症状)。

(3) 抑郁症(D)。测量临床抑郁性综合症状。高分表明士气很差(情绪型),附带有无用感和对未来失去正常的乐观程度。

(4) 轻度躁狂症(Ma)。测量某些人的人格因素,因为他们明显地产生过度思想和行动。

(5) 精神衰弱(Pt)。测量被试与精神病患者的相似性,因为前者为恐惧或强迫行为所困扰。这种倾向的轻度表现是“过度抑郁、过度忧虑、缺乏信心或不能集中注意力等”。

(6) 偏执狂(Pa)。一种备用量表,它有助于把正常者与患者区分开来。患者的特征是多疑、过度敏感、受迫害妄想,以及夸大的自我中心。他们通常被诊断为具有偏执狂、偏执状态或

偏执狂精神分裂症。

(7) 精神分裂症(Sc)。一种备用量表,测量被试的回答与患者的回答的相似性,而患者的特征是异想天开,以及不寻常的思想和行为。

(8) 精神错乱:量表 I(Pd)。测量那些缺乏深刻情感的答案,包括无法从经验中获益,不考虑社会规范等。修订过的量表 II(Pdr)包括一组附加的条目,以测量远离自我和他人的感觉。比起量表 I(Pd)来,它与精神分裂症的相关更高。

(9) Mfr。测量男性或女性的兴趣特征。

量表以下述方式来处理:平均分为 50,标准差为 10。从 0 到 50 的偏差通常不予考虑。70 被认为具有边缘意义,80 以上是高分。当个体方面的大多数分数从 50 上升到 60 时,被认为具有临床意义。

前来寻求精神病诊治的并且具有明显障碍的个体,通常在一个以上的量表上获得高分(平均分以上 2 标准差)。采用 MMPI 进行测试的临床数据表明,其分数模式比我们所采用的单一分数更具诊断意义。一般说来,归入神经症的病例在疑病症量表 I 和 II、癔症、抑郁症和精神衰弱等量表上获得最高分,而精神病患者在抑郁症、精神分裂症、轻度躁狂、偏执狂、精神错乱和精神错乱修订量表上获得最高分。

被试在精神病量表上出现略有提升的现象,在各种没有临床证据的精神病表现中也常可见到。目前,它们的意义不是十分清楚。哈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森(Harris & Christiansen),在研究短期心理治疗的效果时发现,那些在精神病量表和精神错乱量表上显著提高,但却没有临床证据表明其精神病倾向的患者,比其他没有这些分数的人,其对心理治疗的反应要不好一些。

每个 MMPI 平均分用于计算每个民族中心主义四分位数,

而且男女分开处理。这些平均分在表 22-7 和表 22-8 中予以显示。由于每个小组的病例数太小,所以没法计算测量的信度。不过,个体概况可从高低四分位数中提取。它们在分数大小等方面表现出很大的多样性。这就意味着:(1)平均分之间的差异必须达到一定程度,以便在统计上具有意义。(2)如果有人持有这样的观点,即只有个体概况而非单个量表值才具有心理学的意义,那么我们就难以解释单个量表的平均分之间的差异。(3)总的说来,低分者较少出现异常分数。(4)在疑病症量表 I、II 和抑郁症量表上,这种情况对男性来说尤为明显,而在精神衰弱、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量表上,这种情况对男女两性均较明显。低分女性在癔症量表上得分稍高;低分男性则表现为兴趣的女性化上。

对于上面提到的差异性质,我们认为,必须确定这些倾向中的有些倾向是否因小组中存在精神病患者而引起,尤其在高分中的一半(“高中间分”)中是否存在较多的精神病患者。当非精神病被试的平均分被分开计算时,平均模式和差异仍保持相同。由于病例数随着这一过程而减少,由于高分者和高中分者的模式与低分者和低中分者的模式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因此两个低四分位数的数字和两个高四分数的数字被分别地结合起来了(参见图 22-1)。

高分者的平均分(尤其是男性的平均分)类似于哈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森在阐释短暂心理治疗的效果时所描述的“重度神经症”模式,而低分者的平均分也与轻度的神经症模式相似。“重度神经症”模式(疑病症量表 I 和 II、癔症和抑郁症量表在其中作为一种模式而突显出来)在精神错乱量表上有明显提高,而在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量表上接近统计意义,并且位于前四个量表的平均分之下。据发现,比起短暂的心理治疗,它的预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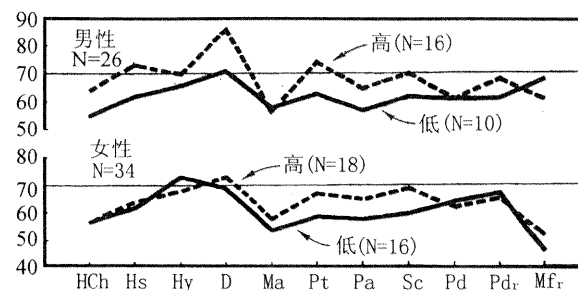


图 22-1 当非精神病被试的平均分被分开计算时,平均模式和差异仍保持相同

较差。

高分者的平均模式与哈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森的不良预后模式之间存在差异,该差异在精神错乱量表 I、II 的分数提高中变得格外显著。然而,在高分女性和低分女性之间,这些量表极少差异,而且,对男性来说,只有在精神错乱量表 II 中的高分者才超过了低分者。

哈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森的研究给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被试在不具有临床上清晰的精神病倾向的情况下,却在轻度躁狂症、偏执狂和精神分裂症等量表上获得了上升的分数。因此,需要把每个量表的条目分成若干亚量表,每个亚量表用来测量某种共同的态度。对于所谓的神经症量表(疑病症量表 I、II,以及抑郁症量表和癔症量表),亚量表无法在预后不良组和预后良好组之间作出区分。但是,对于精神错乱量表 I、轻度躁狂症、精神分裂症和偏执狂量表,这些亚量表确能起到区分作用。它们的内容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受害感”,一种“从外部寻找个人问题的倾向”。

表 22-7 归入每个四分位数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布每一半的被试在若干“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量表上的平均分(非精神病男性患者)

四分位数	量 表													总平均
	Hch	Hs	Hy	D	Ma	Pt	Pa	Sc	Pd	Mfr	平均 (hch, hs, hy, D)	平均 (ma, pa, sc)		
低(人数=3)	54	66	65	67	65	70	58	67	59	63	63	63	64	
低中(人数=7)	56	60	66	73	55	60	56	60	62	61	64	57	61	
高中(人数=7)	59	71	69	90	61	76	69	75	63	70	63	68	70	
高(人数=9)	68	74	71	84	54	73	61	67	60	66	59	61	67	
半														
低半(人数=10)	55	62	66	71	58	63	5	62	61	61	68	59	62	
高半(人数=16)	64	73	70	86	57	74	65	70	61	68	61	64	68	

注: Hch 疑病症 1; Hs 疑病症 2; H4 癔症; D 抑郁症; Pt 精神衰弱; Pa 偏执狂; Sc 精神分裂症; Pd 精神分裂 I; Pdr 精神分裂 II; Mfr 测量兴趣模式的男性化或女性化。

表 22-8 归入每个四分位数和民族中心主义量表分布每一半的被试在若干“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量表上的平均分(非精神病女性患者)

四分位数	量 表													总平均
	Hch	Hs	Hy	D	Ma	Pt	Pa	Sc	Pd	Pdr	Mfr	平均 (hch, hs, hy, D)	平均 (ma, pa, sc)	
低(人数=10)	53	59	72	71	52	58	59	58	60	65	47	64	56	59
低中(人数=6)	64	67	74	66	58	60	58	62	70	71	46	68	59	63
高中(人数=7)	54	55	67	71	62	65	62	65	61	62	49	62	63	61
高(人数=11)	59	70	69	75	56	68	67	71	63	67	5	68	65	65
半														
低半(人数=16)	57	62	73	69	54	59	58	60	64	67	46	65	57	61
高半(人数=18)	57	64	68	73	58	67	65	69	62	65	52	66	64	64

神经症和精神病量表之间的区别(除了专司某些症状的条目之外),表现在自我与世界和自我与躯体等关系方面。

高分者在精神病量表上得分稍高一些,对此,也许可以用同样的方式予以解释。它也符合本书前面描述过的倾向,例如,具体化,以及投射不可接受的冲动和思想等。不过,为了检验这种解释,我们必须根据哈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森的亚量表对我们的数据进行分析。

问题是,这样做并不值得,因为我们的样本数太少。但是,沿着这条思路进行深入的研究,应当说是有益的。

一个出乎意料的结果是,高分男性在抑郁症量表上获得极高的分数,而从临床角度上讲,低分者(尤其是低分女性)则在神经症的抑郁症状方面表现明显。同样在 MMPI 上,低分女性却并未得到极高的抑郁症分数(请参见本章第七节关于临床材料的讨论)。

这些矛盾的结果表明,抑郁症量表未能测得我们在低分者身上观察到的那些倾向。低分者的主要特征是主观上的抑郁感、自卑感和失败感。因此,需要对抑郁症量表的条目进行修订。在 60 个条目中,只有 23 个条目显然涉及到低分被试报告的那种感觉,这些条目是:(1) 自卑感,易受伤害,不愉快,自我批判;(2) 反对残忍和攻击,缺乏外惩罚性;(3) 社交中的顺从反应;(4) 社交中的不安全感;(5) 缺乏能量,工作压抑;(6) 拒绝宗教思想。

其他 37 个条目涉及:心理功能和躯体功能的损害,沉思和“担忧”,对具有威胁或虐待的环境力量的感知,以及“感到不舒服”,“对任何事情都不关心”等表现。许多条目涉及模糊的和非专门的思想,从临床上讲,比起神经性抑郁症来,它们与强迫性神经症的焦虑和沉思比较一致。于是导致了这样的假设:这些

量表测量的“抑郁症”并非是单一的抑郁症,也有可能存在性质上不同的抑郁症,它们可能发生在具有不同人格结构的个体身上。

## 五、患者在精神病访谈中所反映的人格倾向

若将民族中心主义与心理障碍的类型联系起来,仅仅利用常规的精神病分类,虽说也能产生一些统计数据,但它本身并不允许我们在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作出人格动力学的推论。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似乎要求广泛的临床材料。因此,比之整体研究中的其他被试,我们需要对来自临床组的被试进行访谈和主题统觉测验。不过,由于时间的限制,我们不可能研究高四分位数和低四分位数的全部被试。我们研究的个案(包括主题统觉测验,以及涉及个体思想和个体历史的访谈)是 21 个男性和 10 个女性。这些被试代表了各种临床背景。有些病例,例如高分强迫性神经症、高分偏执狂或患胃溃疡的低分男性,都没有予以反映。由于接受访谈的病例数有限,也由于取样的方式,从我们的病例材料中不可能作出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与人格结构、障碍类型和遗传因素等关系的量化陈述。不过,在诊所中收集到的大部分访谈材料,都已纳入访谈的整个样本之中,该样本在第九至十三章的量化分析中已经提及。

我们在缺乏充分的精神病患者的病史的情况下,对诊所员工收集的材料进行审查。这些材料不论在量上还是质上都是十分多样的。其中只有极少数个案材料允许我们对病例进行相对来说完整的动态描述。

医生之间在记录的长度、完整性、数量和解释方面均有所不同。此外,有关患者和医生之间接触的材料,显然受到无法控制



的医一患关系、研究方式(提问的数量和种类),以及治疗过程等影响。

第一次精神病访谈的病例记录相对来说较少多样性,因为它基本上涉及患者就诊的原因。这里,患者遇到了不认识的但是友好的诊所工作者,通过十分一般的问题来陈述他的病情。患者的回答用原话记录,并且包括诊所员工对患者情感状况的观察。我们认为,这些材料不仅适合于高分者和低分者的比较,而且有助于揭示他们对心理障碍及其原因所抱的观点和态度。

### (一) 材料的选择

第一次进入诊所的患者先由一名专司精神病的社会工作者进行访谈,然后由医生进行访谈。社会工作者的访谈以近似标题的顺序加以记录,包括患者的社会地位和简历,以及他们对诊所服务的理解和态度等。如果患者是转院而来的,那么由于已经具有原来医院对患者情况的记录,因此无须再安排这样的访谈。患者在被同意入院后,他便会见医生,后者通常要求患者陈述他就诊的情况、病情存在的时间,以及是否具有伴发问题等。之后,便作常规病史的记录。

在提问之前,关于历史部分,冠以“主诉”的标题,包括患者的简历、行为、主要症状的列举等。

就我们的访谈而言,我们对接受访谈的被试,先向他们宣读上面提到的两部分材料(社会工作者关于“患者简历”的记录和医生关于“主诉”的记录)。不管两者是否相似,这些记录连同患者的性别、问卷分数和正式诊所一起被逐字逐句记载下来。<sup>[5]</sup>

这些访谈样本取自所有归入高低民族中心主义四分位数的被试。

对数据的分析表明,高分者和低分者在主诉类型和一般态

度方面存在惊人的差异。为了描述这些差异,许多类目(与第九章描述的某些类目十分相似)被作了界定。评价者对这些类目进行评价(他们只了解被试的性别和访谈样本,并不了解诊断结果或问卷分数)。

下面描述能对高分者和低分者的访谈作出区分的类目。这些类目存在于一本为评价者使用的手册之中。对于每个类目来说,均与高分者和低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得分有关。当然,评价者的手册中隐去了这些得分。

### (二) 评分手册:类目的描述

评分手册中有7个类目,有些类目比其他类目更为广泛,而且也更可解释。所有类目都可根据被试的行为来进行解释,从中揭示他们潜在的动力倾向。不过,类目之间在内容上有一定程度的重叠。

#### 1. 强调躯体症状

正如前面的研究结果所提示的那样(见第十二章),高分者比低分者更易把注意力集中在躯体症状上。许多具有神经症症状的患者往往诉说心理引发的躯体痛苦。患者之间在这些躯体症状的数量和程度上各不相同,而且对这些症状的主观理解也不相同。虽然许多低分者也诉说躯体问题,但是他们大多根据错误的适应或情感来陈述他们的问题。另一方面,高分者则表示了对躯体问题的强烈偏见,以及对躯体和神经功能的焦虑。在有些个案中,这种强调躯体症状的倾向与他们对“心理问题”心存恐惧有关(这里所谓的“心理问题”,具有“疯了”的内涵)。在有些个案中,被试将症状归因于某种物质的原因,既非出自对躯体本身的担忧,也非出自摆脱威胁的自我转移。不过,这两种动机通常会发生在同一批被试身上,也即发生在那些具有强迫

性神经官能症的患者身上,或者发生在那些具有强烈阉割焦虑的男性身上。

评价者用下列标准来决定这种特征存在还是不存在。

存在:患者可能陈述众多问题,包括躯体的和心理的问题。主要强调躯体症状:(1)它们被作为主要问题提出;(2)最先提到;(3)以某种方式加以强调,例如,在访谈者提出与之无关的问题时,患者却反复强调这个问题。

不存在:患者主要强调心理障碍:(1)情绪障碍;(2)人际障碍;(3)工作适应性受损;(4)其他一些问题(酗酒、同性恋、遗尿等);(5)许多专门的恐惧;(6)强迫性行为。

## 2. 内感受作用

这一特征早在前面几章已经讨论过(见第七、十二、十四、十五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低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共同特征:被试根据心理体验来进行思考的倾向。它涉及到访谈者的问题与被试内部生活的某种相似性,以及被试根据相同的条件(顿悟、理解)来察觉他人的准备状态。

存在:患者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即他的问题属于心理问题,而非纯粹是躯体问题。此外,他在陈述这些问题时带有对它们的心理内容的理解。正因如此,患者会诉说特殊的困难:某种恐惧、某种冲突、某种环境问题等(例如,性冲动或攻击性冲动的冲突、人际关系的冲突等)。有时,被试的陈述还包括某些与症状有关的情境的描述。这时,他们不会过分地把情境作为原因来强调,而是对情境的心理意义进行探讨。

不存在:(1)否认任何心理问题;(2)不强调问题的内容(与家庭成员的冲突,与某些冲动作斗争等),而是强调“障碍”本身(缺乏心理能量、不能集中注意等)。被试的诉说往往含糊其辞:“我不能与人相处”;“我感觉到不舒服”;“我有点紧张”;等等。

陈述常含有这样的意思:“机器的零件坏了”(这里的机器有时指身体,有时指“心理”“头脑”“神经”。此外,它还含有“疯了”的意思)。

有时,问题的陈述显得更加专门化。例如,“我无法从事这样的工作”。这里,主要的问题在于这样的想法:“我无法尽责”(由于这种倒霉的疾病,我无法尽一个好妻子或好母亲的责任)。关注的问题与任务本身关系不大,而是与目前不能贯彻任务所引起的失败感有关,或者说与违背习俗和道德有关。但是,被试很少意识到特定的冲突、恐惧、受挫的欲望或生活的失败。

## 3. “自我异己”

存在(高分者):症状和患者对症状的态度表明,被试有着特别强烈的压抑。压抑的问题还包括被试对有些症状持有明显的自我异己性质。某些冲动、问题甚或症状被体验为是外部原因造成的。它们无法为个人的意志所转移,或者它们完全属于“身体的原因”,或者它们是遗传的。被试“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使我作出那样的事情”,而且担心某种“邪恶的”东西控制了正常的可以接受的自我。被试还害怕“失去控制”,例如,“我担心我在发病时会杀死某个人”,“我害怕我会失去理智”。

有时,当某些冲动得以突破,并且在行为中反映出来以后,这种自我异己会以道德主义的陈述和自我谴责表示出来(“我不知道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种特征是对访谈者的顺从性,它源自患者压抑了社会上不能接受的冲动,或者源自患者对访谈者的恐惧。

不存在:症状被体验为“属于个人的人格史和生活史”。对于某些冲动,容许其进入意识,将其作为自我的组成部分和生活经验的组成部分,而且判断标准摆脱了“道德主义”。

在强迫症、妄想和其他精神病的表现中,被试通常具有某种

自我异己的性质,对此,评价不得以被试对自我异己的强调为基础(“某种东西促使我这样做”,“有人影响我”,“我无法控制”,等等),或者以患者把症状内容与自己过去的或现在的内在生活相脱离为基础。

#### 4. 疾病的因果关系:客观化

存在(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也获高分):被试试图用下列办法来使症状客观化:(1)否认任何一种突发性因素。紧张、抑郁等表现似乎“没有任何原因地出现了”。(2)将病因回溯至一个十分明确的事件或时间,例如一次手术、一次“毛病发作”、一个死亡事故、一个特定的日子。“在此之前,我实际上很好,很幸福”。(3)不将病因与个人的往事相联系,尤其不与个人的儿时经历相联系。除非在第一次访谈时被专门问起,否则不会自发地提到童年经历。

不存在:当被试被问到疾病的起始时间时,自发地叙述毛病已经存在“一段时期”了,或者说有好几年了,或者说从儿时就有了。

#### 5. 自发提到不愉快的童年或家庭关系

存在(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也获低分):患者自发地提及其不悦的童年,常常详尽地阐述其受挫史(持一种受虐的态度)。既诉说父母目前和以往的态度,又对他们持批判态度。

不存在:不能自发地提到童年经历。童年时期被描述成“愉快的和正常的”。对家庭成员不作批评,亦无其他敌意迹象(除了在“发病时”)。有时,对家庭成员及其福利有着清晰的补偿性关注。

#### 6. 患者人格结构的线索

显然,光是访谈材料还不能用来推测被试人格结构的完整图景。不过,它们却包含与此结构有关的某些重要线索。下面

列举的类目是由一些概念引导的,它们在区分高分者和低分者方面十分有用。要求评价者根据表 A 或表 B 的线索确定被试在哪方面居主导地位,或者在哪方面居“中性”地位。

表 A(同时参考高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1)“反移情”的防御。男性:被动性的反应形成;女性:肛欲的反应形成。不涉及爱的对象或关系(除了配偶以外)。

(2)外惩罚或避免惩罚。<sup>[6]</sup>如果出现自我批判的话,那也是以道德主义术语来表示的:“我坏,我做了错事”;“上帝会惩罚我”。或者,歇斯底里地将某些躯体症状、疾病戏剧化;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弱关于心理本质的诉说。

(3)客观化的超我。宗教:上帝被视做个体行为的外在审判官。一个人之所以生病,是因为上帝的惩罚。或者,把宗教标准作为习俗思想的组成部分,用宗教理由来避免离婚或自杀。

表 B(同时参考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4)不存在“反移情”的防御。

口欲的直率表示:依赖的性格特征;吃、喝、毒品。依赖性问题的关注。公开承认男性的虚弱性、被动性和女性化。寻觅爱的态度。对被拒绝的关注。

升华:形成自我的重要部分;提到成就。当症状影响工作时,患者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予以陈述,以表明对其正在从事的特定工作的关注。强调理想。关心和帮助别人。具有艺术爱好和兴趣。

(5)外惩罚的受虐性:“我在孩提时代曾被虐待。”认同苦难;自我批判(“我是一个失败者”)。

(6)内化的超我:把内疚感作为个体内部生活的组成部分,真实的抑郁和宗教思想。

## 7. 居支配地位的症状类型

表 A(同时参考高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 (1) 躯体的焦虑症状和其他情感表现：“气急综合征”、头晕、流汗、震颤感、麻痹、心动过速、呼吸急促、晕厥。无意识内容的焦虑。
- (2) 见于女性的情绪冲动，发脾气和“歇斯底里”。
- (3) 疑病症恐惧，对死亡和心脏病发作的恐惧。
- (4) 癔症转变<sup>[7]</sup>。
- (5) 严重的强迫性沉思：重复诉苦、自我谴责、不断的自我保证等。
- (6) 非个人化倾向，强调自己没有任何胆怯和退缩的倾向。
- (7) 怀疑，用客观化的措辞来陈述对人的恐惧或厌恶：“他们使我愤怒”；“我对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使我紧张”。当被试以内感受方式描述时，应与高度敏感和退缩相区别。
- (8) 精神错乱倾向，不只表现为非惯例的行为，而且缺乏充分内化的超我。
- (9) 男性的胃溃疡，尤其表现在强调男子气的被试身上。

表 B(同时参考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 (10) 抑郁的心境，丧失希望，缺乏自信，不适当感，自杀的想法，内疚。虽然常有患者诉说“抑郁症”，但是，正如上面描述的那样，“真正的”抑郁症必须与精神分裂样的情绪障碍相区分。
- (11) 疲劳；“神经衰弱”。
- (12) 无月经。
- (13) 女性有意识地拒绝女性角色。
- (14) 男性表现出与文化上强调的男性模式相反的特征：退缩、胆怯、害羞等。有时，还伴有不现实感，或躯体的焦虑症状，或转变性癔症。患者对所有这些象征“软弱”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接受的。
- (15) 有意识的焦虑的冲突。

## (三) 量化方式

我们对被试的诉说进行了考察，结果给我们的印象是，高四分位数组和低四分位数组可以根据上述的类目予以清晰的划分。为了证实这一印象，我们使用了“双盲评价法”，这与我们在访谈、主题统觉测验和投射测验中使用的方法很相似。至少有两名评价者不熟悉被试（也即不了解哪些人是高分者，哪些人是低分者），他们根据被试的反应对被试进行独立评价，然后将这些评价与被试的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关于双盲评价问题，我们在其他几章讨论访谈评分和投射问题时已经提到过。如果这些评价被证明与被试的某些特征高度相关（在此例子中是与民族中心主义高度相关），而评价者对此又毫不知情，那么其评价结果便是可信的。但是，任何一种评价方式都有其可能的局限性。导致这种局限性的原因在于：调查材料未能充分揭示被试的某个特点，评价者对评价结果的界定和描述，评价者将指导语用于被试的能力，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因此，运用一种评价技术，不仅需要确定评价与数据之间的关系，还须仔细考虑各种因素，它们既有可能以积极的方式也有可能以消极的方式对结果产生影响。

### 1. 评价者

两个初级评价者称做评价者 A 和评价者 B，他们除了受过临床训练和具有临床经验以外，还有从事精神分析的能力。两人对整个研究的概念、假设、数据和结果都很熟悉。他们通过对高分被试和低分被试的访谈，以了解被试的行为并获得所需的材料。

每个评价者对所有 7 个类目的每项记录进行独立评价，借以获得对“高分者”或“低分者”的直觉评价。

在初级评价完成以后,另有7个独立的评价者(他们被称做控制性评价者,因为他们的评价属于控制性评价)开始分别评价一个类目。其中6个控制性评价者是临床心理医生(1个是高级临床医生,5个是处于实习水平的初级临床医生,他们都在兰利·波特诊所工作),他们并不熟悉整个研究的概念和数据。这样做对于我们后面即将要讨论的问题来说是重要的。另一个控制性评价者是我们办公室的秘书,他的任务是对狭隘界定的类目进行评价(所谓狭隘地界定的类目是指被试用具体化的客观术语来解释其疾病的开始时间和原因),他拥有良好的心理洞察能力,而且能对研究材料进行假设。7个评价者在年龄、训练和理论取向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

## 2. 评价技术

对控制性评价者的指令如下:

进行评价的材料由“主诉陈述”组成,也即兰利·波特诊所患者第一次入院时的访谈,它包括“患者简史”或“主诉”。这里,访谈的记录是按患者的原话记下的,尽管有些内容被访谈者作了必要的压缩。每个编号指一个病例,共有26个男性和33个女性。

每个病例按一个类目(或一组症状)进行评价。每个评价者只评价一个类目,按此类目对被试逐一进行评价。也就是说,每个被试要经过7名评价者的评价。

评价按照存在(√)还是不存在(-)某种特征而予以标记。有些变量可作“混合”(M)评价。当然,应该尽量避免“混合”评价。有时,由于材料不充分而难以作出评价,在这种情况下用(O)标记。

每个初级评价者(A和B)首先按照所有7个类目来评价每次记录。由于他们知道哪个类目被期望与高的或低的民族中心

主义相联系,因此他们就设法为每项记录安排每个类目的“高”或“低”的评价。有些记录尚未包含足够的材料,以允许评价者在特定的类目上作出决定。例如,某个特定的问题没有加以讨论,或者有用的线索太少,难以对人格结构进行推论,等等。在此情况下,就不安排任何评价。当线索在指向“高”和“低”方面达到相等的数量时,便采取“混合”评价。接着,控制性评价者再度检查记录,他们根据类目的评价结果,设法推测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获得高分还是低分。从这种评价中可以获得两类数据:(1)评价者之间对每个类目及其评价的打分一致性;(2)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得分与其评价之间的关系。下面,就让我们讨论这些问题。

## (四) 测量的信度

当评价者中间有一半以上的人认为某个被试确实具有某种特定的特征时,这样的评价性结论便可得到确认。这些评价者了解他们应当寻找的东西,而且他们也拥有类似的特征概念,依此概念在访谈数据中辨认某种特征。至于评价者之间的人格、训练和其他差异,对评价的影响已降至最低限度。

所有评价的标志(高、低、存在、不存在、省略、混合等)都被置换成“高分”“低分”和“中间分”。例如,对于类目1的评价(被试对躯体状况的诉说),若“存在”,便评以“高分”;若“不存在”,便评以“低分”;若“混合”,便评以“中间分”。

评价信度可以通过计算两个评价者将同样分数安排给同样记录的次数百分比来获得。不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两个评价者将同样的分数(高分、低分或中间分)安排给同样的记录,这种打分就被认为是“一致性打分”。当一个评价者给了一个高分(或一个低分),而另一个评价者给了一个中间分时,这种打分就

表 22-9 根据被试的入院访谈,评价者之间对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一致性打分(精神病新患者,男性和女性相结合)  
(高分者 28 人,低分者 31 人,总数 59 人)

	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对高分或低分的全面评价		主的事实立场		得高分(H)的编号		得中间分(N)的编号		得低分(L)的编号		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			
	(1) 高	(2) 低	(1) 高	(2) 低	(1) 高	(2) 低	(3) 高	(4) 低	(5) 高	(6) 低	(7) 高或低	(8) 高或低	(9) 高或低	(10) 高或低
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对高分或低分的全面评价	21	4	-	-	5	3	24	2	23	51	82.1	86.4	82.1	86.4
单个类目: (1) 主要强调身体不适	15	3	5	1	-	2	2	2	23	45	82.1	76.3	82.1	76.3
(2) 内感受作用	15	1	7	2	1	9	1	3	22	48	78.6	83.1	71.0	83.1
(3) 自我异己	14	3	11	1	-	10	2	21.5	20	41.5	76.8	70.3	76.8	70.3
(4) 疾病开始的时间和原因的客观化解释	13	4	8	3	2	2	2	21	21	45	75.0	76.3	75.0	76.3
(5) 自发提到不愉快的童年和家庭关系	23	1	2	6	2	9	1	25	24	53.5	89.3	90.7	89.3	90.7
(6) 关于性格结构的线索	15	10	-	-	2	13	1	28.5	1	28.5	91.9	78.0	91.9	78.0
(7) 占支配地位的症候类型	18	3	7	2	2	20	4	26	20	46	71.4	81.4	71.4	81.4
类目的平均一致性	15.4	4.8	6.3	1.7	1.4	1.9	1.4	0.9	2.6	22.2	79.3	79.5	79.3	79.5

被认为是“一致性达半的打分”。当一个评价者给了一个高分,另一个评价者给了一个低分时,这种打分就被认为是“不一致的打分”。把一致性打分数除以评价记录的总数,便可获得两个评价者之间“一致性”的百分比。需要指出的是,两个评价者提供中间分的例子是极少的。

表 22-9 显示了评价者 A 和 B 之间一致性的百分比,以及这些数字所依据的分数。所有一致性的百分比(除了类目 3 为“低分”外)都在 70 以上。从统计上讲,它要比偶然获得的 1% 水平高一些。

评价者 A 和 B 在类目 5(被试自发地提到不幸福的童年和家庭关系)上取得最佳的一致性打分。该结果是可以期待的,因为这个类目并不模棱两可,无须较多的主观评价。此外,许多被试在被问到他们的症状时,并没有提起这个题目。

居一致性打分第二位的是关于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立场,接下来的是内感受作用、症状类型和性格特征,其一致性达 80%。

所有 7 个类目的平均一致性为 80%。

全面评价之所以具有这样高的信度,是有若干原因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指令尽量防止了评价者作出“中间分”的评价。另一个原因是,所有的高一低类目是一个广义的类目,评价者可以利用各种明晰的或不明晰的线索,况且评价者 A 和 B 均具有对高分者和低分者访谈的经验,对“高”或“低”的人格因素是有“体验”的。

我们对两个评价者提供的评价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评价者 B 相对来说具有较大数目的省略(他常说“我无法从提供的数据中标记什么”),而评价者 A 则努力尝试作出决断,甚至当提供的数据只是一些微妙的线索时也是如此。正如我们从表

22-9中看到的那样,导致A和B之间一致性降低的因素在于:其中一个评价者给了中间分,或者对个别被试一个评价者给了高分,另一个评价者则给了低分。

由于评价者B在不少类目上给了中间分,结果降低了信度数字。因此,我们只能将评价者A的评价与7个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进行比较。

表22-10显示了由评价者A所作的评价和由7个控制性评价者所作的评价之间的一致性(这里,7个控制性评价者只分别评价一个类目)。由于控制性评价者对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高分或低分不作推测,因此在这方面他们没法与评价者A的评价达成一致性。相反,每个被试的“高分”或“低分”是从单个类目的7个控制性评价中产生的。在一个特定的类目上给予“高分”的评价,作1分计算;“低分”的评价作0分计算;“中间分”评价作1/2计算。每个被试的分数相加,得分区间从0~7分不等。如果所有被试得到的复合分数为4分或4分以上,就归入“高分”类;4分以下归入“低分”类。评价者A的全面评价与这些复合评价之间的一致性在表22-10底部显示。

评价者A对高分或低分的全面估计与复合的高分和低分相一致,达85%。实际上,当我们比较评价者A和B的全面估计时,也得到同样的数字。

评价者A与控制性评价者在单个类目上的平均一致性(77%)稍低于A和B之间的平均一致性(88%)。但是,总的来说,获得的信度是可以接受的。

当我们将评价者A和B的评价进行比较时,两人获得最高信度的那些类目,在评价者A与控制性评价者之间也具有相对来说较高的百分比一致性,而两人获得最低信度的那些类目,在评价者A与控制性评价者之间也具有相对来说较低的百分比

一致性。与此相反的两个类目是类目1(强调躯体症状)和类目2(内感受作用)。前者的信度在评价者A和控制性评价者的例子中排行第二,在评价者A和B的例子中排行第五;后者的信度在评价者A和控制性评价者的例子中排行第六,在评价者A和B的例子中排行第二。

评价者A和B在类目1上相对较低的一致性不是因不一致性造成的,而是因评价者B的大比例的“中间分”造成的(参见表22-9)。当控制性评价者和评价者A认为能够判断记录中是否存在某些线索时,评价者B却常常感到被试对其症状的陈述还不足以使他作出定论。

控制性评价者和评价者A之间相对来说较低的一致性(在内感受作用方面),主要是由于不一致造成的。控制性评价者对A的评价不满,认为他既没有充分掌握内感受作用的概念,也没有充分熟悉用来辨认特征的线索。而在评价者A和B的评价中,内感受作用的概念和表现成了他们专门研究的目标,并且在他们的思想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评价者A认为,他对高分和低分的评价,以及对所有类目的评价,受到他对被试内感受作用印象的影响,而不受到任何线索的影响。我们有理由认为,评价者之间所受训练的差异是两组评价者之间信度差异的原因。当我们将评价者的评价与实际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进行比较时,这种情况也出现了。这里,评价者A和B对内感受作用的存在和不存在的评价与高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达80%~83%,而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只达65%(参见表22-12)。

最高信度(91%和95%)为类目5所获得。显然,这里没有什么不一致地方。

最低信度为类目3(自我异己)所获得。这里,评价者A和

表 22-10 评价者 A 与 7 个控制性评价者在入院访谈中对评价类项目进行评价的一致性  
(精神科门诊患者,男女结合,总人数=59)

类目	在主的 民族实际 中表立 心上场	两评 人高 分	一分评 人男 评一 高入分	两中 人回 都分 评	一分评 人男 评一 高入分	两评 人低 都分	一分评 人男 评一 低入分	一致性		百分 比性 的	总 百 分 比
								分别高 分和低分	高和低结合		
(1) 主要强调躯体症状	高	12	4	-	2	6	4	18+4=22	48	78.6	81.4
	低	4	1	1	4	20	1	25+1=26		83.9	
(2) 内感受作用	高	18	1	2	6	-	1	20+1=21	42.5	75.0	72.0
	低	4	2	1	8	15	1	20+1.5=21.5		69.4	
(3) 自我异己	高	9	4	1	10	2	2	12+3=15	38.5	53.6	65.3
	低	4	2	2	5	15	3	21+2.5=23.5		75.8	
(4) 疾病开始的时间和原因的客观化解释	高	14	6	1	4	1	2	16+4=20	43.5	71.4	73.7
	低	4	4	4	2	10	7	18+5.5=23.5		75.8	
(5) 自发提到不愉快的童年和家庭关系	高	26	-	-	1	1	-	27	56	96.4	94.9
	低	17	1	-	1	11	1	29		93.5	
(6) 关于性格结构的线索	高	11	5	1	4	2	5	14+5=19	43.5	67.9	73.7
	低	3	2	1	2	16	7	20+4.5=24.5		79.0	
(7) 占支配地位的症类型	高	22	-	-	3	1	2	24	47	85.7	79.7
	低	4	1	-	7	18	1	23		74.2	
评价者 A 的高-低评价和 7 名控制性评价者(每人只评价一个类目)的复合评分之间的一致性	高	21			5	2	23	23	50	82.1	84.7
	低	5			4	22	27			87.1	
平 均	高	16.0	2.9	0.7	?	1.9	2.3	21.1	45.5	75.5	77.2
	低	5.7	1.9	1.3	?	5.0	3.0	24.5		78.8	

控制性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仅为 65%，而评价者 A 和 B 之间的一致性为 70%。前者的数字几乎不能符合可以接受的测量信度的标准。评价者 A 和控制性评价者对高分者的估计，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只有 54% 的一致性。这个数字是两类评价者之间不一致的结果。控制性评价者说评价者 A 对自己的评价没有十分把握，因为他觉得访谈材料更多地反映了医生而非患者对症状的态度。还有，他把“自我异己”看做是某种不利的东西，从而倾向于评价为“不存在”的特征而不是“存在”的特征。也许，导致两类评价者信度降低的最为重要的因素是：该类目被广义地界定，缺乏明确的行为标准，评价者只能凭直觉进行判断。

除了类目 3 以外，其他所有类目的评价，以及全面估计，都证明是可靠的。

### (五) 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关系

我们对上述评价方式的基本假设是：如果评价者对一种特定特征的“双盲”评价与被试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对此，评价者是毫不知晓的)存在显著相关时，那么我们就可以将这两种特征联系起来进行考虑。下面描述的关系是可信的，因为我们已经排除了评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无关因素。

不过，这些无关因素仍有可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双盲”评价，致使两种特征的统计关系被人为地上升或下降。这种人为的相关性是有可能的，尤其当若干特征在同一时间里被评价时，这时，对一种特征的评价可能会影响对另一种特征的评价。其实，它已经影响了评价者 A 和 B 的评价。正是鉴于这一原因，我们使用了控制性评价者，他们的任务是分别关注和辨认 7 个特征中的一个特征。





表 22-12 控制性评价者根据单个变量的评价而作出的民族中心主义估计, 以及他们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测得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 (精神病患者: 男女结合, 人数 = 59)

类目	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实际立场	评为高分的数目	评为低分的数目	评为中间分的数目	一致性的数目	一致性结合的数目	百分比的一致性	总的百分比的一致性
复合评价 a	高	22	6	0	22.0	44.0	71.0	74.6
	低	9	22	0	22.0		78.6	
(1) 主要强调躯体症状	高	15	12	1	15.5	38.0	55.4	64.0
	低	8	22	1	22.5		72.6	
(2) 内感受作用	高	19	5	4	21.0	38.5	75.0	65.3
	低	13	17	1	17.5		56.5	
(3) 自我异己	高	9	14	5	11.5	33.0	41.1	55.9
	低	6	18	7	21.5		69.4	
(4) 疾病开始时间和原因的客观化解释	高	21	4	3	22.5	42.0	80.4	71.2
	低	7	15	9	19.5		62.9	
(5) 自发提及不愉快的童年和家庭成员关系	高	26	2	0	26.0	37.5	92.9	63.6
	低	19	11	1	11.5		37.1	
(6) 性格结构的线索	高	12	11	5	14.5	36.5	51.8	61.9
	低	5	18	8	22.0		71.0	
(7) 占支配地位的症状类型	高	22	6	0	22.0	43.0	78.6	72.9
	低	10	21	0	21.0		67.7	
平均	高	17.71	7.7	2.6	19.0	38.4	67.9	65.0
	低	9.71	17.4	3.9	19.4		62.5	

a. 根据 7 个控制性评价者对单个类目进行评价后得出的复合评价。“高”评价得 1 分,“中间”评价得 1/2 分,“低”评价得 0 分。4 分以上构成复合的“高分”,4 分以下构成复合的“低分”。

只了解每个病例的单项类目,因此这个 75%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评价者得到更多的培训,而且熟悉访谈材料的概念和线索,那么他们就能根据临床材料更加正确地作出关于民族中心主义高低得分的预测(也即作出与评价者 A 的 86%相一致的预测)。

## 2. 单项类目

为了便于讨论,我们在表 22-13 中对每个单项类目的结果予以了概述。该表显示了:(1)评价者 A 和每个控制性评价者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2)评价者 A 和 B 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3)评价者 A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4)每个控制性评价者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

下面,让我们来分别描述这 7 个类目。

### 类目 1: 强调躯体症状

该类目主要强调躯体症状而非心理问题。评价者 A 和控制性评价者之间在此类目上的信度排位第二,百分比为 81%。评价者 A 和 B 之间在此类目上的信度排位第五,百分比为 76%。这个数字相对来说较低,它不是由 A 和 B 之间的不一致性造成的,而是由 B 的大量“中间分”造成的。

类目 1 和民族中心主义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根据评价者 A 的评价,66%的高分者强调他们的躯体症状,而约 79%的低分者却未能这样做。控制性评价者的数字较低:高分者为 55%,低分者为 73%。此外,个案研究表明,这个类目对于区分被试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高分和低分是很重要的。

尽管有些低分被试具有转变性症状倾向或其他一些心身障碍,但是,可以肯定,这些症状加上对躯体完整性的焦虑,则是高分者的特点。这种焦虑有可能扩展至神经系统或“心理”功能,

表 22-13 对入院访谈评价数据的概述(精神病诊断患者:男女结合,人数=59)

类 目	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的实际立场		百分比的一致:评价者 A 和控制性评价者		百分比的一致:评价者 A 和 B		百分比的一致:评价者 A 和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百分比的一致:评价者和民族中心主义得分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1) 强调躯体症状	高	78.6	84.4	82.1	76.3	66.1	72.9	55.4	64.0	
	低	89.9	71.0	79.0	72.6	83.1	83.1	75.0	65.3	
(2) 内感受作用	高	75.0	72.0	78.6	83.9	77.4	77.1	56.5		
	低	69.4	65.3	76.8	70.3	87.5	77.1	41.1	55.9	
(3) 自我异己	高	53.6	73.7	64.5	67.7	67.7	69.4			
	低	75.8	71.4	75.6	76.3	73.2	66.9	80.4	71.2	
(4) 疾病的开始时间和原因的客观化解释	高	75.8	77.4	77.4	89.36	90.7	68.6	92.9	63.6	
	低	96.4	93.5	91.9	71.4	78.0	43.5	37.1		
(5) 自发提到不愉快的童年和家庭关系	高	67.9	73.7	83.9	80.3	81.4	84.7	78.6	72.9	
	低	79.0	79.7	82.3	79.3	79.5	76.1	67.7		
(6) 性格结构的线索	高	85.7	74.2	75.5	77.2	83.7	69.3	62.5		
	低	74.2	78.8	82.1*	79.7	86.4	89.3	71.0 <sup>b</sup>	74.6	
平 均	高	82.1*	84.7*	82.1	82.1	86.4	86.4	86.4		
	低	87.1 <sup>b</sup>	87.1 <sup>b</sup>	90.3	90.3	83.9	83.9	78.6 <sup>b</sup>		
全面评价	高	87.1 <sup>b</sup>	87.1 <sup>b</sup>	90.3	90.3	83.9	83.9	78.6 <sup>b</sup>		
	低	87.1 <sup>b</sup>	87.1 <sup>b</sup>	90.3	90.3	83.9	83.9	78.6 <sup>b</sup>		

a. 评价者 A 的“全面评价”与 7 个控制性评价者作出的复合分数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

b. 民族中心主义得分和复合评价之间的百分比一致性。

\* A——信度;评价者对 7 个类目的百分比一致性; B——效度;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评价和得分之间百分比的一致性。

正因如此,高分被试常常诉说头痛、各种感官障碍、失去记忆、紧张和“发疯”。此外,在高分者身上还有一种发展躯体症状而非心理症状的倾向。只要我们予以密切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躯体症状是压抑情感的反映。看来,关注躯体症状的倾向是高分者的一种狭隘的自我防御活动,借此排除对个人内部生活的考察,拒绝任何一种以心理的因果关系为条件的思想,而强调以躯体的因果关系为条件的思想。该类目可能成为类目 2 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也是所有其他类目的基础。

### 类目 2: 内感受作用

评价者 A 和 B 在此类目上的信度为 83%。评价者 A 和控制性评价者在此类目上的信度为 72%,排位第六。正如上面已经提到过的那样,造成这一排位的原因,与两类评价者对被试的熟悉程度和自身的训练水平有关。A 和 B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的一致性为 83%,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的一致性为 65%。造成这一事实的原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进行解释。

这些数据告诉我们:(1)受过适当训练的评价者对内感受作用可以获得十分可靠的评价;(2)内感受作用与缺乏民族中心主义高度相关。后一假设已经获得本书提供的其他证据的支持,这些证据取自法西斯主义量表、投射问题、主题统觉测验和访谈等研究。当我们将这些被试进行心理治疗时,高分者和低分者在内感受作用方面的差异就会变得十分显著。有些高分被试几乎难以接受有关他们障碍的心理原因的概念,而且,我们要花大量时间才能使他们看到他们症状之间的某些联系,以及他们现在的境况与其过去事件的关系。许多低分者在前来就诊之前就已经知道这些关系,而且能够迅速理解医生的解释。他们是心理治疗的理想被试,因为他们愿意合作,既有见地又能提供自己的

历史。问题是,他们的防御会影响他们症状的改善:由于他们能够了解他们的内部生活,因此他们的自我容易冲动。

### 类目 3: 自我异己

该类目的信度最低。评价者 A 和控制性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为 65%,而评价者 A 和 B 之间的一致性则为 70%。如上所述,控制性评价者对评价者 A 的评价存有异议,而且对他界定该类目的方式也表示担忧。确实,类目界定的广义性和缺乏与之匹配的行为标准会降低两组评价的信度。控制性评价者主要是从被试接受还是拒绝症状的程度来判断自我异己的,评价者 A 和 B 的判断只是参照症状本身的性质,而不考虑患者对它们所持的态度。因此,他们容易把心身症状或没有内容的焦虑视做自我异己,而不是把它们视做有意识的冲突或失败感。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较低,为 56%;而评价者 A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则较高,为 77%。对这些数据的考察表明,有些低分患者(他们在该类目上被评价为民族中心主义的)却表现出精神病的症状,这些症状要比我们的被试组里占支配地位的神经症症状更具自我异己的性质。看来,该类目对高分组而非低分组更为有效。

### 类目 4: 疾病的开始时间和原因的客观化解释

这一类目的信度较高,评价者 A 与控制性评价者之间的一致性为 74%,评价者 A 和 B 之间的一致性为 76%。评价者 A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的一致性较低,为 67%;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的一致性较高,为 71%。一般说来,该类目似乎适合于高分者的运作。这种情况与下列事实有关:它在低分组里要比其他类目得到更多的“中间分”。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中间分评价,是因为在访谈时并非所有的被试都

提及了他们疾病的开始时间,他们的话题大多集中在目前所感觉到的不适上。相比之下,高分者则经常提到他们症状的起始时间和原因,因为他们觉得这些症状好像是在某一天“突然降临的”,或者说是“神秘地出现的”,而在此之前他们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高分者不熟悉他们内部生活的一个例证。他们努力使可以接受的冲动和情绪完全保持在意识之外。当这些冲动最终以症状形式出现时,它们是作为自我异己的入侵者被感知的。它们非但是“突然出现的”,而且常常是“没有原因的”。

### 类目 5: 自发提及不愉快的童年或家庭关系

这是一个十分清晰的类目,也是获得最高一致性的类目(91%~95%)。这里,评价者只须根据被试是否自发地提及不愉快的童年或家庭关系便可进行评价。据发现,两组评价者对此类目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在高分者中为 93%和 96%;在低分者中则为 44%和 37%。低分者的结果与下述事实有关:一些低分被试在入院访谈时就提及他们童年的情况,而入院访谈的主要任务是探讨患者的症状。相比之下,高分者中却没有人这样做。无论怎样,这个数字对于那些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低分的被试来说,是不合逻辑地低。

不过,该结果与整个研究的一般发现是相符的,即低分者承认他们与其家庭有磨擦,或对自己家庭抱有消极情绪,而且意识到他们与其家庭的冲突。相比之下,高分者则提供一帆风顺的历史,并对家庭作出理想化的描述。他们极少承认童年时期的不幸和孤独,例如,对兄弟姐妹的妒忌,或者来自父母的压力等。低分者在访谈时常提到这类情感。

### 类目 6: 关于性格结构的线索

评价者 A 与控制性评价者在该类目上的信度为 74%,评价

者 A 和 B 在该类目上的信度为 78%。这些一致性数据从统计上讲是可以接受的。评价者 A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为 80%，而控制性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为 62%。控制性评价者对低分者的评价为 71%，评价者 A 对高分者的评价为 52%，前者的评价比后者高出许多。评价者 A 的信度对高分组来说也较低。这种情况可能与下列事实有关：与“高分者”的特征相比，手册为“低分者”的特征提供了更加详尽和具体的指令与例子，致使评价者 A 要比控制性评价者更少受到无关因素的影响，因为评价者 A 要比控制性评价者更加熟悉访谈材料的概念和运用。看来，如果控制性评价者获得更多训练的话，则两组的评价数据将会更加接近。

类目 6 所包含的一组特征在前面提及评分手册时已经讨论过。它们涉及：

高分者特征	低分者特征
(1) 反移情的防御：反应形成，投射；尤其是女性的肛欲反应形成，男性被动性的反应形成	(1) 其他防御：尤其是升华，关注艺术的、理智的、人道主义的兴趣和活动
(2) 对恋爱对象缺乏关心	(2) 口欲—依赖—爱情—寻觅的态度；抚育，对被拒绝的关注
(3) 外惩罚和避免惩罚	(3) 内惩罚；受虐待
(4) 客观化的超我	(4) 内在化的超我

这些变量与用于人格研究的那些变量相似(本书前面部分已经描述过这种人格研究，它是借助问卷和临床技术来进行的)。对诊所患者所实施的个案研究，不论是投射问题还是症状

陈述，都表明这些变量对于区分高分被试和低分被试是有价值的。当然，我们不能单凭症状陈述就作出关于患者人格的描述，因为这种描述并未包括所有这些特征。正因如此，读者在下一节看了这些陈述的例子和经过选择的个案以后，可能还是不会信服的，因为它只提供病例的简况，以说明症状、遗传因素和其他一些特征(这些特征对于高低四分位数中的被试来说是共同的)。在那里，关于被试对他人和自己关系的许多详情被省略了。尽管如此，读者仍能发现高分者和低分者之间存在惊人的差异。只要他们注意上述提到的那些线索，他们就能够发现这些差异。

也许，第一组变量(防御的性质)，就其用于访谈的材料而言，并不是十分明白的，但它可以通过下一节的个案分析来加以说明。完整的材料，正如提供给评价者的那样，确实提供了许多线索。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低分被试谈到了他们的症状对他们工作的影响，我们可以由此推断患者对其工作的参与程度。此外，低分者在艺术或兴趣方面所占的比例也是引人注目的。

在我们例子中，最常见的另一个特征是第二组变量，低分者以某种方式经常提到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对被拒绝的关注，以及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的不足。所有这些与高分者形成对照。

涉及性格特征的变量是第三和第四组变量。其中，内惩罚、受虐待、内在化的超我等，由若干低分者的例子来说明，既由神经性抑郁症和自卑感的例子来说明，也由自我批判的态度来说明(低分者常用这一态度来报告他们的困难)。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在提及他们的软弱或童年的苦难时所表现出来的坦诚，也可看做是他们意欲接受来自访谈者的同情的一种愿望，或者是原谅他们超我的一种愿望(“如果我现在承认了一切，那么你以后

再提及此事时,我就不会觉得内疚了”)。

#### 类目 7: 占支配地位的症状类型

本节在讨论评分手册的类目描述时,已经提到过两份症状表,这里不再详述。该类目的信度从统计上讲是可以接受的(约为 80%),而评价者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也较高(73%~85%)。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说,表 A 中的症状具有高分组的特征,表 B 中的症状则具有低分组的特征。至于高分组和低分组的症状,将在下一节提出,以供详细讨论(它将讨论被试的临床表现和人格)。该研究将利用通过各种技术收集到的材料,而讨论则由一些个案予以说明。

#### (六) 小结

在转向临床表现和人格问题之前,我们先要小结一下评价技术的结果。

(1) 根据被试的第一次访谈(专门探讨被试的症状),我们可以预测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的立场。这一结果表明,民族中心主义与人格动力密切相关。

(2) 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可以通过上述的类目来描述高分组和低分组之间的差异。7 个控制性评价者每人只评价一个类目。遗憾的是,这些评价者对精神分析的概念、意义和应用不够熟悉。尽管如此,评价者 A 与控制性评价者之间仍达到了 77% 的信度。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个数字在统计上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它也表明,评价者 A 和 B 的评价并非仅以访谈比较为基础,而且还以这里描述的类目为基础。对于评价者 A 来说,单项类目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约为 77%;对于控制性评价者来说,单项类目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仅为 65%。不过,当我们计算高和低的复合

分时,它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已达到 75%。由此可见,这些类目与民族中心主义显著相关,尽管我们不能根据单项类目来充分地预言民族中心主义。评价者 A 的评价与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之间的一致性,可能会随着他对低分被试比较熟悉(或者说“光环效应”)而有所提高。控制性评价者由于缺乏这样的条件,所以其评价不如评价者 A 的评价那样好。从理论上说,民族中心主义与单项类目得分之间的相关不如民族中心主义与类目复合得分之间的相关,在这个意义上说,前者的相关没有多大意义。此外,类目之间是相交的。它们代表了基本的人格因素的各个方面。

## 六、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临床描述与人格

### (一) 高分者

出现在高分被试身上的一些症状,诸如躯体焦虑症状、疑病症恐惧、胃溃疡等,在低分被试身上也能找到;而出现在低分被试身上的一些症状,诸如抑郁、疲劳、意识冲突等,在高分被试身上也能找到。不过,第六节提到的一些特征(见类目描述中的表 A 和 B),则在高低两个被试组之间作了清晰的区分。每组症状的表现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即便在精神分析或动力理论等方面缺乏训练的控制性评价者也意识到了这种相关性。而对评价者 A 来说,这些共同特征有助于他的评价,因为他对被试形成了“总体印象”,可以利用各种单一的症状来作为选择的线索。

当我们把一个表格中提到的症状与另一个表格中提到的症状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自我无法操纵那些不能接受的人格部分。对高分者来说,障碍的根源(攻击

性冲动)被视做是非自我所能控制的,而且它们被用来否认真正的心理活动。焦虑从心理冲突被置换到躯体冲突,或者反移情的防御机制得以启动,从而产生强迫特征或心身效应,例如胃溃疡。当冲动突破防御时,它以“发病”的形式出现,或者引向“不能自己”的感觉。

看来,这种对个人冲动的否认,以及试图把不可接受的东西视做自我以外的东西,是表 A 内容的共同特征。于是,在高分者身上出现了“自我异己”的倾向。同样的共同特征也在外惩罚中得到反映(本书在其他几章已经描述过这种外惩罚的倾向)。有关诊所患者的研究结果再次证实了我们在整个研究样本中所发现的真实情况。

### 1. 高分男性

为了说明高分男性的临床表现,我们这里略举数例。

第一个患者是一个中年商人。他在最初的访谈时陈述说:“我一直在与精神崩溃作斗争。”他诉说自己常有震颤、流汗、疲乏、肠子胀气、惊慌和号啕大哭等症状。他说他的症状首次出现在他听到他必须付出一大笔赡养费时。于是,“我的头脑似乎被某种东西卡住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似乎有了好转。但是,由于他的营业执照被吊销(因为某些违规行为),他又旧病复发。

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患者表面上合作,准时来诊所,并对治疗师特别客气,但就是不能进入治疗关系的状态之中。他数次提出要把那位女治疗师带出去吃饭。当他谈到他自己时,他仅仅以疑病症的方式诉说他的躯体症状,并一再强调他的病因源自生理现象。在治疗师的要求下,患者谈到了他的生活经历,其目的是想利用他在商业上的成功和他结交的颇具影响力的朋友等故事去打动治疗师。问题是,他对任何人都没有真正的依恋。

几个月后,患者和治疗师都感到治疗毫无进展而不该再继续下去。

该患者的性格和历史指向肛欲(保持)问题。阉割焦虑表现为对“失去某物”或“不得不放弃某物”的恐惧。他的强烈的焦虑和潜在的软弱为一种男性的表面现象(“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所掩盖。他对人际关系的处理方式是脆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他的客观化超我并没有阻止他为了成功而尝试一些非法手段。当他的自我由于某种“丧失”而受到威胁时,他的焦虑有增无减。在此情况下,他开始意识到没有内容的焦虑。他的注意力也由此转向对生理症状的焦虑上,于是他开始寻求治疗。

这种类型的高分男子在诊所被试组内并不多见,但在一般的门诊中却较为多见。不过,被男子气所掩盖的潜在的软弱和阉割的焦虑在许多其他高分男子中也可找到,其中有些人具有较多的强迫特征,而有些人则具有较少的强迫特征。在有些个体身上,无意识的同性恋冲突是特别明显的,而偏执狂倾向也有一定的表现。有些高分患者很少具有甚或没有强迫特征,但却具有明显的恐惧倾向。这些患者也有许多“模糊的或没有内容的焦虑”,他们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对躯体症状(例如震颤)的焦虑上,并且显示某种疑病症的迹象。

这种类型的一个病例是一位年轻的退伍军人,他患有“战争神经症”,不论何时,只要他参与哪怕是最不费力的活动,也会产生严重的震颤和模糊的焦虑。该患者的船被鱼雷击中,他由于不会游泳而不得被困在漏水的筏子上约一小时。当时,他并没有恐惧的感觉。一个月后,当他住进一家旅馆时,症状突然爆发,显然没有任何突发的原因。患者患有轻微的恐惧症:惧怕枪炮、野蜂、蛇,偶尔也怕陌生人。不过,在其人格中出现的却是“不能自己”的特征。他不断地作“发疯的梦”,有严重的梦魔现

象。在最近一次噩梦中,他说他梦见4个全副武装的男子对他进行验血。他们动作粗野,血从他的臂上淌下。

这个梦令人怀疑。战争本身并未导致急性的焦虑状态,而筏子上的危险情境也只能引起一种“同性恋”的向往(那是由求助情境激发的),暂时降低了自我对付其他冲突的能力。

如同其他高分被试一样,该患者的父母在他幼年时期就已亡故。他从12岁起就和他的哥哥一起由两个姐姐抚养。治疗师未能记录到他儿时的历史材料。在家庭关系方面,我们也只知道患者在治疗期间对他的哥哥怀有深切的感情,但是他说小时候他也曾欺侮他。患者在谈到两个姐姐时不满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她们“控制”他,而他对她们的管教不满。

经过6次访谈,患者的症状消失了。这些访谈既讨论了他的家庭关系,也为他提供了关于恐惧的心理机制和生理机制的一些解释,以及部分精神卫生的文献。他说,所有这些对他都有帮助,因为他逐渐明白“我们的心理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

另一个病例涉及一种十分幼稚的人格,患者在服役期间曾患过精神分裂症,并被诊断为“单一型精神分裂症”。他在症状陈述中说,他来到诊所,“目的是想回归自然”。他认为几年前他还具有“良好的人格,但是,现在却丧失了”。他诉说他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而且不能集中注意力。他诉说“紧张”“不安”和“抑郁”。他无法“交友”,很难做完一项工作。

该患者是一个26岁的男子,与父亲一起居住,没有朋友,没有女友,也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他感到胆怯、沮丧、空虚和孤独。他与家庭的关系是浅薄的和令人沮丧的。患者有1个哥哥,4个妹妹。在患者10岁时,母亲进了精神病院。孩子们在不同的孤儿院里长大,彼此很少接触。他因此而感到孤独和不快。当接受访谈时,他甚至讲不出妹妹们的确切年龄,而仅仅说

“我想家”。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很令人忧虑的,但他不愿承认这一现实。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的天主教徒,而且脾气坏,好惩罚人,他对这个儿子并不了解。他对儿子说,如果他无法保持目前的工作,那么他将把他赶出去。他还劝说儿子不要去找精神病医生,而应该去找神父。患者在许多方面似乎屈服于父亲,但对他抱有许多潜在的敌意。

这个男子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量表上得高分,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访谈表明,患者对当前的许多问题一无所知。正如问卷所示,他的偏见既与他毫不批判地接受各种关于外团体的陈词滥调有关,也与他的潜在的敌意和面对压力的混乱感有关。他的主导思想是将各种少数民族团体隔离开来,以免“战争”。他感到“国家将有麻烦”,因为它“正在走向堕落”。他惟一谴责的外团体是黑人,因为他们是劣等的,并且具有攻击性。

除了上述的个案之外,下面再举几个高分男子关于症状的陈述,它们可能会对前面讨论过的人格倾向给予进一步的说明。

一个患者来到诊所,目的是想参与心身疾病治疗计划关于胃溃疡的研究。他说他患胃溃疡已有15年,经常感到“紧张和抑郁”。他对他的胃病甚感忧虑。自从他的妻子接受甲状腺手术后,他的情绪明显变坏。此外,他与姻亲们住在一起也觉得不舒服。

另一个患者被诊断为“精神错乱,并伴有同性恋和心身疾病”。在初次访谈时,他诉说紧张、头痛、“有奇特感觉”等,并害怕受到攻击。这些症状自一年前接受阑尾切除手术后便开始了。从那时起,他便担心某人会对他造成身体伤害。“此后不久,我就出了车祸,我推测就是那个家伙想伤害我。我感到虚弱,无法保护自己。”



第三个病例被诊断为“精神错乱,并伴有性变态和神经症倾向”。他被怀疑患有胃溃疡,但尚未最后确诊。由于他向一个女孩暴露自己的性器官,法庭判他入院治疗。他的最初访谈记录如下:

患者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的哥哥曾因他的手淫和对女孩抱有非分之想而警告过他,自那以后,他便形成性成见。当他觉得有人在取笑他时,他便会动手打架。他沉默寡言,既不喜欢求助别人,也不愿对帮助他的人表示感激。3年前,他发现他的注意力和思考能力受损。他是一名钻油工,需要敏锐的协调能力,但却因为他的反应迟钝而造成了地勤人员的几次工伤事故。为此,他常谴责自己:如果他谨慎一点的话,本来是可以避免这些工伤事故的。他决定放弃钻油工作,去做一名电焊工。患者承认他对暴露性器官一事感到内疚。事情发生在一天下午,他驱车经过一个街角,在拐角处他将下身暴露在一个女孩面前,随后给了她一枚硬币,要她用手玩他的生殖器。他对此事感到极度的心烦意乱,况且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沉重的压力令他喘不过气来,于是他便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第四个例子是由一个被诊断为“焦虑性神经症”的高分男子提供的,他诉说的病情如下:

呼吸急促、疼痛、焦虑、紧张。患者说他不知道病程从何开始,但自从5年前那次车祸以后,他就一直感到不舒服。当时,他因车祸折断了两根肋骨,并撞破了头。之后,每当他担心时,他就会感到头痛。他的工作,尤其是他管辖的工会工作使他大为光火。厂里的生产又使他呼吸急促、呕吐、腹泻、头痛,以及噩梦不断。现在,只要他一开始工作,他的症状就会重现。

最后一个病例被诊断为“混合型神经症,伴有强迫、焦虑、酗酒等症状”。以下是患者对其症状的陈述:

心情紧张,饮酒过度。“我担心自己疯了”。患者说4年前他还十分正常。一次球赛以后,他独自在家照看孩子,突然感到恐惧、出虚汗和颤抖不止。他担心这样会伤及自己和孩子。医生告诉他这不过是紧张而已,便给了他一些镇静剂。从那时起,他虽发作过几次,但都不太严重。大约一年前,他发现喝威士忌能使他“恢复正常”。于是,他便开始每天喝一品脱威士忌。不久,他便完全告别了镇静剂。他说他从未喝醉过,但是不喝便无法过日子。他也知道自己喝得越来越多,而且很费钱。他想急于戒酒并解决他的问题。他声称他的家庭关系没有问题。

## 2. 高分女性

高分女性表现出与高分男性同样的焦虑和疑病症状。有时,这些症状以强迫症形式出现,有时以恐惧症形式出现,有时则表现为精神分裂样人格。她们中间有许多人诉说“突然发病”,行为表现是焦虑、过度换气、失去意识、紧张或勃然大怒。有些患者同时具有这几种症状。

以下是一个女性患者关于其症状的陈述,它颇为典型:

紧张发作,容易烦乱。这种情况已有3年。出现混乱、激动、震颤已有18个月。神经质发作,包括头部一阵眩晕,几乎失去知觉,出现麻木感和震颤感。发病时呼吸和心跳加速。症状出现在丈夫出海远航之后。丈夫被描绘成在个性、性生活等方面都是比较和谐的人。不过,由于他对孩子关心不够,因此夫妻俩有过小磨擦。

患者担心自己在发病时会因心力衰竭而死。她变得十分紧张,迁怒于孩子,甚至会卡他们的喉咙,直到自己恢复镇静为止。由于她对这些行为惊恐不已,故而寻求医生帮助。

患者会突然出现惊慌和叫喊,对性生活不感兴趣,并且妒忌丈夫。病情始于3年半以前,当时她突然感到“一股电流从脚底

通到头部”。于是出现第一次“发病”。自那以后,一天发作2~3次。患者害怕发病时会死去,或伴发心脏病、癌症,或“失去理智”,或伤及她的孩子等。

以下病例的主角是一个年轻的主妇,她有两个孩子。她的丈夫是一个准熟练工人,自从他俩10年前结婚以来,丈夫一直上夜班。患者像小孩一样害怕黑暗,而且不喜欢晚上单独躺在家里。数月前,她的焦虑变得严重起来。她在晚上要将所有的门窗都上锁,害怕有人会闯进来攻击她和孩子。2个月前,当她晚上入睡时,被突如其来的焦虑惊醒,接着便失去了知觉。自那以后,她每天都很紧张,而且感到颈椎疼痛。她既感到热又感到冷,有一种奇怪的下坠感。偶尔,还有颤抖和晕厥发作。每次当她失去知觉之前,她总会叫人帮助,同时发出尖叫。之后,她对部分事件丧失记忆。

患者诉说症状起因于她对婚姻的不满。这种不满与早先时候她的家庭关系有关,尤其与她和她兄弟的关系有关。

患者和她的两个哥哥都在一个与外界相当隔绝的农庄里长大。他们几乎没有朋友,甚至在青年期,她仍不被允许外出,不准约会,不准观看男孩们的体育比赛。父母都是瑞士天主教移民,严格坚持他们的处世标准。母亲在如厕和清洁方面尤其严格,而且完全禁止孩子们的吵闹和公开的敌视。性的戒律得到严格遵守。孩子们被训练成极度谦虚,而且对性知识一无所知。这种训练在患者身上产生了一系列反应形成,包括过分注意整洁、准时、服从和谦虚等。除了这些事实以外,患者还难以对自己的人格和家庭关系予以具体的现实主义的描述,相反,她把她的家庭极度理想化。她说她的父亲是一个老派的温文尔雅的男人,母亲是一个勤劳、大方和仁慈的贤妻良母,兄弟之间的关系甚好,而且脾气也好。患者声称她的童年“是开心的”,“从未与

两个哥哥打过架”。与此相似,她坚持认为她与丈夫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除了他经常上夜班外。对此,她认为也是无可指责的。她说她的性生活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她声称自己偶尔达不到高潮),但通常是令人满意的。

不过,梦的解析和主题统觉测验表明,患者对其丈夫有着大量无意识的敌意,而且把她的母亲、哥哥和其他男人都视做是攻击性的和性变态的。她对男人的这种意象,在她关于某些外团体(例如黑人和墨西哥人)的想法中有意识地反映了出来。梦的解析也提示我们,她的梦境大多是针对男人的攻击和口欲冲动。攻击和口欲冲动得以展现的情境(例如,把蛇剁成几段、啃鸡腿等),暗示了啃、咬、捏碎男性生殖器的幼稚愿望。梦中还出现养鸡场的围栏,它由通电的电网构成(就像她父母农场里的养鸡场),患者不明智地爬上电网,结果遭到“电击”。除非将电流切断,否则她就有生命危险。这里,满足幼稚的愿望和伴随着的恐惧被结合起来了。这可能就是患者颤抖和晕厥的原因。

对该被试来说,敌意的表现反映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她不愿承认她对丈夫或家庭的不满,并且压抑了隐藏于顺从和强颜欢笑背后的许多愤怒。在治疗过程中,据医生反映,她的颤抖和晕厥常常发生在下列事件之后:当一个男人以命令的方式对她提出要求时,她就会“发病”,而在此之前她还保持着镇静和幽默的态度。譬如,在一场牌戏中,她的丈夫叫她注意她曾忽视的“A”,之后,她便发病了。对此,她还申辩说,平时她会对丈夫十分恼火,但是这次她仅仅“一笑了之”。其他几次发病发生在别人要她付出比她想像的更多的钱时。在上述情境中,她当时不感到愤怒,但随后就“发病”了。

这类表现与焦虑性癔症有关,其中强迫倾向起着很大的作用,而敌意性冲动的矛盾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具有焦虑性发病

和紧张性发病的其他病例,就其动力因素而言,也与上述患者颇为相似。有一个病例属于右臂和脸部的心因性瘫痪。患者有着刻板的性格和强迫的特征。她对男人抱有无意识的敌意,尤其对她的前夫。她对她的哥哥有着一种模棱两可的色情式依恋。在她打了她的哥哥以后,症状便出现了。

在民族中心主义被试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人格模型,称做“退缩的幼稚的精神分裂样”人格。这里,强迫特征也成了重要的组成部分。患者在受到干扰时,会出现非个人化和冷漠感。以下是该症状的一个例子:

患者是一个27岁的大学毕业生,结婚才一年,并且刚刚生了孩子。她看上去很年轻,像个天真的“小女孩”。她很拘谨,不论在表示性欲方面还是在表示进取心方面都很拘谨。她的自我在很大程度上被所谓的秩序、整洁、控制和体面所占据。她通过限制她的兴趣,把注意力集中在宗教和任务方面。她觉得这样做很有效,并且给了她一种满足感。在她结婚之前,她是通过秘书工作来获得这种满足的。此外,她对家务颇感兴趣。

患者把她父亲描绘成一个“严格的纪律实施者”,并对他始终十分惧怕。她对父亲对待她丈夫的态度感到不满,但她又不愿承认这种不满。她以理想化的措辞来描绘其母亲:“我始终尊敬她。”她有几个兄弟,她与他们为获取父母之爱而竞争。然而,像许多高分女性一样,她也接受(尽管是表面上的接受)女性的顺从角色,从而结束了这种竞争。

她的丈夫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现在仍在服役,因此在孩子出生后仍不能与妻子呆在一起。就在这段日子里,患者开始感到自己“如坠雾里云中”,似乎“不能自己”了。她在社会问题和时间概念等方面还有意识,但却无法处理某些简单的任务。测试表明,她有十分高超的心理能力,尚未受到疾病的影响。医生认

为最好尽早让她与丈夫团聚。一次,她抱着婴儿外出旅行,由于某种原因,她在旅途中不得不改变计划。于是,她就抱着孩子坐在机场的候机室里,一脸茫然,无法作出相应的安排。即便她和她的丈夫团聚,病情也没有多大好转。例如,在购物时,她会站在货架前,无法想起要买的东西。患者对自己的情况十分惊慌和抑郁。在诊所里,她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她的病情,并担心自己会发疯,从而无法予以治疗。

她的丈夫报告说,患者在其他方面也有变化。譬如,她在生产前性欲相当冷淡,现在却又变得富有激情。

由于住院和心理治疗对她没有多大帮助,因此诊所就让患者出院,由其丈夫定期带她来门诊部进行电击治疗。仅仅经过几次电疗,患者便感到自己正常了,丈夫也认为她现在较少抑制,变得热情起来,而且能够照顾自己了。

目前,关于电疗的心理意义和实际效果还不十分明了。对它的评价因下列事实而变得困难起来:患者在接受电疗的同时也在进行心理治疗。医生认为,患者的丈夫若能接受她觉醒的性欲,可能有助于患者发现自己,而发现自己是使患者病情得以好转的重要因素。

另外一个与此相同的例子是一位24岁的母亲。她有两个孩子。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她曾有过丧失个人自我感觉或健忘的情况。该女性被人视做“天真的中学生。十分顺从,遵循习俗,偶尔会发怒和蔑视别人”。她是一个十分依赖的人,对自己没有什么想法和看法,对家庭以外的任何事情均不感兴趣。当她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她的丈夫突然生病,无法再供养她,于是,她就出现了偏执狂精神分裂症症状。她害怕有人会加害于她和她的孩子,或者她的丈夫或亲戚会带走她的女儿,而她也从此失去了女儿。

还有一个例子涉及一个女孩,一个特别认真的工人,完全屈从于她那严格的没有同情心的父母和带有挑衅性的姐姐,而且从来没有意识到什么不满。随着这个女孩被提拔到具有相当地位的领导岗位时,她出现了剧烈的头痛,并进入一种抑郁和焦虑的状态。在此状态中,她常谴责自己没有做好工作,认为别人都在注视着她,并且担心自己会失去理智。

这个女孩和其他几个高分女性在疾病发作期间都出现一种心境障碍,它被描述成是“焦虑性抑郁症”,并且伴有自杀念头。不过,这种抑郁症不同于我们在周期性神经型抑郁症患者身上看到的那种情况。她们还伴有异乎寻常的思想,表现出精神分裂样的行为。鉴于这一原因,该疾病有时被称做“精神分裂样心境障碍”。

这些个案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她们对现实的问题没有想法,不感兴趣,而且对她们表露的思想无法把握。与那些非精神病患者的高分被试相比,她们关于外团体的思想是贫乏的、抽象的,甚至是天真的和定型的。她们强烈拒绝外团体,导致极高的偏见分数,而且在访谈时借有关问题发泄情绪(“难道你想生个黑孩子吗?”)。所有这些表明,她们的自我非但脆弱,而且还努力维持反移情的心态。

## (二) 低分者

在第六节展示的表 B 中,症状模式与表 A 不同。不可接受的冲动是为自我所认同的,而且被视做是自我的组成部分。低分患者来门诊看病,往往带着他们想要解决的心理问题。他们能够明确诉说某些思想的矛盾或焦虑,或者有意识地对自己的性别角色表示不满。这些患者中间有许多人是神经症患者。他们的“邪恶之源”不在自我的外部而在自我的内部。我们在本书

的其他地方已经指出,高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是典型的外惩罚者,而低分者则是内惩罚者。内惩罚性象征着一种严格的内化的超我,其人格结构具有一种受虐的性质。具有心理障碍的低分者以某种夸大的形式表示了这种倾向:神经性抑郁、自杀念头、自卑感和内疚感。

患者接受他们本能的和幻想的生活,而且相对来说不受习俗观念的制约,个性方面有点异想天开。

这些患者中有许多人表现出与其性别文化不同的行为。例如,有些男人羞涩、胆怯、被动和依赖,而且具有在女人中可以找到的兴趣;有些女人则具有进取性,对工作成就的兴趣大于对家庭事务的兴趣。此外,他们承认自己具有同性恋和性反常的倾向,而且,对这些冲动的矛盾的认识是有意识的、没有伪装的。

### 1. 低分男性

低分者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了形形色色的病情诉说和临床描述,致使我们无法将他们归类。有些患者患有精神病或神经症,并伴有焦虑性癔症等症状,而且许多病例表现出性格障碍。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个十分依赖的男人,他娶了一个颇具进取性的女人,于是就十分依恋她。但是,自妻子生了一个她本人不欢迎的第二个孩子后,俩人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如今已经变得彼此难以容忍。诊所建议他们把孩子送进育儿所,患者不同意。

广义地说,低分男性不思进取,在社交方面颇为抑制。他们来到诊所就诊,是为了解决抑郁和焦虑问题(这些问题与性、工作或适应有关)。与高分男性不同的是,低分男性叙述的问题直接指向人际关系。战争期间,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应征问题上产生了冲突,甚至借自残行为来逃避入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不在于害怕受伤或死亡,而在于一种思想上的担心,

即担心自己会去杀人。

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被关押在反对应征的营地里。他身材矮小,言谈之中暴露出许多紧张和本能反应。他对自己没有把握,患有强迫性怀疑和犹豫不决。他对有些问题很有见解,例如,对少数民族问题、和平主义问题等。但是,在做决定方面,他常犹豫不决,一会儿提出一个想法,一会儿又撤回。当访谈者予以追问时,他说:“我实际上对这个问题还不十分了解,让我再想一想。”他对政治颇感兴趣,而且关心社会进步。他意识到自己的职业选择,知道它是自己内部斗争的结果。

患者由于躁动、焦虑、抑郁,以及难以集中注意力而主动前来就诊。此外,他还有强烈的不适应感、阶段性恐惧、社交性焦虑和害怕(怕黑暗、怕身体受伤、怕墓地、怕精神病诊所等)。

患者的父亲出身于下层阶级,只受过初等教育,开始时从事木工工作,然后种田,最后成为牧师。他是一个好支配人和好惩罚人的男人,具有狭隘的原教旨主义思想,他用严惩的方法使孩子安心于农场劳动。患者的母亲是一个教堂歌手,她希望自己的丈夫在牧师地位上爬得更高。她对丈夫狂热的布道颇为欣赏,为自己所具有的邪恶感到羞耻。她通过遵奉丈夫的要求来树立他的权威,同时也要求孩子像她那样去做。由于父母之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和,患者深感痛苦。虽然他与母亲的关系十分密切,但在访谈时却对母亲进行了批判。

患者是孪生子,此外还有一个哥哥。哥哥比他大几岁。他与哥哥的关系并不密切,但却喜欢他、尊敬他。他对自己的孪生兄弟十分亲近,后者比患者长得更高大、更强壮,而且也更有进取心。患者钦佩他的沉着、自信和学习成绩。在足球场上,患者让其兄弟冲在前面,自己则留守后方。患者的兄弟对父亲十分

顺从,即便肉体惩罚,也是逆来顺受,因此是一个典型的遵奉主义者。然而,患者则在某种程度上抗拒父亲的惩罚,尽管这种抗拒大多表现在想像中而非行动上。他认为父亲对待他的方式是错误的,因此常违反父亲立下的规矩。最终,他在宗教、习俗和政治等方面与父亲的思想彻底决裂。这一做法使他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和冲突。他的神经症问题无疑产生于他对父亲的敌意。

下面的内容摘自该低分男性的第一次精神病访谈:

患者说,在童年时期,他一直抱有畏缩心态,极少参与社会交往,有时一连几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户。除了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他应该找一份好工作并成为社会上受人尊敬的人以外,不再其他的兴趣或理想。但是,“当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时,我同时对该工作失去了兴趣,而且感到厌烦”。他曾从事过许多工作,从工人到人事部门的接待员。随着他对工作不能容忍,他的焦虑感和挫折感也随之上升。他既对工作十分不满,也对自己十分不满。他曾削去自己的一只手指,“用歇斯底里的办法来逃避征兵”。他认为心理治疗是他争取康复的“最后机会”。

患者诉说自己具有强烈的焦虑、抑郁和自杀念头,无法工作,难以决断。他说困扰他的问题是,他怀疑自己是一个同性恋者。“如果是的话,我该如何作出调整?”服役期间,他对一个与其同龄的同性恋男子形成了强烈的依恋,因为后者一会儿挑逗他,一会儿又拒绝他。随着这种关系的日益紧张,患者变得十分恼怒,意欲杀死这个朋友。结果,朋友没有被杀,而他却想到了自杀:开枪打伤了自己。

患者自诉有抑郁的症状,起因于女友来信说她已经跟另一个男人结婚了。他们是在纯精神的基础上建立起友谊、共识和兴趣的。此外,他对自己被从公共服务营转移到一个由政府管辖的营地感到痛苦和失望,因为那里没有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机

会。他认为该营地应该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不只是被禁闭。

除了上述病例外,还有两例属于癔症病状的患者:一个是钢琴师,在服役期间有过各种轻度的转变性癔症,常诉说右手食指功能丧失。另一个是学生,有着焦虑性梦魇和晕厥发作,尤其在考试期间。首次晕厥发作出现在他遭到父亲的暴打以后。

最后,我们发现,有些低分男性有着轻度的精神分裂症状。实际上,他们的民族中心主义得分位于低中四分位数的一端。但是,访谈表明,有个患者因为胆怯而拒绝填写问卷。他爱隐居,有点强迫症,属于精神分裂样患者,强烈地反对偏见。尽管他的人际关系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他仍然提供了亲近母亲而非父亲的一段往事。他把父亲描绘成一个严格的清教徒,表示了对父亲的仇恨。但是,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情感实际上反映了他对父亲同性恋的顺从和有意识的幻想。当他在陆军里成为一个军官时,他对妻子产生了妒忌,觉得自己没有希望和不安,最终导致了精神分裂症的发作。发病期间,他想像他的一些部下正在激烈地批评他的工作,甚至私下打听他的消息,并在背后议论他。他十分光火,想杀了这些人。暂且不管这些投射倾向,他对父母的评论还是内惩罚的。

位于低中四分位数的另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是一个年轻的海员。他声称只有当他故意把屎拉在裤裆里时才感到性满足,而且,他具有各种异想天开的幻想,这些幻想大多指向针对女性的施虐行为。他想像他的同事知道他的秘密(指性行为),从而蔑视他,不欢迎他。他是主动前来就诊的。

在这个病例和上面列举的几个病例中,低分者的内惩罚不同于高分者的外惩罚,低分者的自我是向内的,而高分者的自我是向外的。此外,低分者的超我投射于心理,感到自己应对疾病负责,而高分者的超我投射于环境,感到他人应对自己的疾病

负责。

## 2. 低分女性

前面,我们曾提到,许多低分女性属于“混合型神经症”。这是因为在我们的分类计划中,没有专门的类别可供神经性抑郁症归类,而神经性抑郁症则是低分被试的主诉之一。此外,混合型神经症的诊断通常归入性格障碍的范畴,在此范畴中,低分女性也较常见。

下列摘要在低四分位数的女性中是比较典型的。抑郁感作为低分女性的主诉被提出,并伴有其他问题。甚至在低四分位数中,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诉说也具有抑郁的成分。

一个患者关注的问题是:“为什么我做不好每件事情?”她诉说她对自己的能力和工作缺乏自信,声称“我对自己十分不满,我担心我会自杀”。

这些女性中有些人患有抑郁症,而且感到她们的症状与其母亲有关。一个年轻的患者说,她对母亲“抱有许多仇恨”,每当母亲在她身旁时,她总感到昏昏欲睡,而且容易激怒。

她很抑郁,食欲不振,抱有自杀的想法,而且老想躺下来长时间睡觉(“睡它十五六个小时”)。

另一个患者声称,她感到“做任何事都太难了”。她宁可去睡觉,否则就会觉得抑郁、虚弱和易怒。

在上述两个女性中,核心问题是她们有意识地与同性恋的冲动进行斗争。那个年轻的患者有着广泛的理智兴趣,她在少年时期曾与一个女教师发生激烈的冲突,后来又与男人发生冲突。

她意识到自己身上的同性恋倾向。她渴望友谊和恋爱关系。由于这种需要时而满足时而受挫,她便处于周期性的兴奋与抑郁之中。

另一个女性则有好哭的毛病,除了一直想睡觉外,还有想呕吐和痉挛的感觉。

有些女性诉说,她们因神经症行为而有可能伤及自己的孩子。所有这些女性都是相当活跃的女性,她们的兴趣不在家庭之内,而且具有强烈的成就动机和发挥男性作用的欲望。

有一位女性嫁给了一个伤残男子,因为“我崇拜他的才能”。她喜欢自己挣钱来养活丈夫和孩子,并在家里周到地服侍他。由于拼命工作,她感到紧张,睡不好,而且常常自责自己“不是一个贤妻良母”。于是,她开始暴饮暴食,随之而来的是抑郁和酗酒。

另一个再婚女性 30 岁,与前夫生有一个孩子。自从她发现自己又怀孕后,便感到十分抑郁,无法工作。她不要这个孩子,因为孩子的出生意味着她将辞去她颇感满意的工作,但是她又不想将孩子送人,因为丈夫很想要这个孩子。于是,她来到诊所寻求帮助,以便最终决定接受还是放弃这个孩子。她说,“我对自己身为女性感到不满”。她的童年历史表明,她老想与男孩争个高低。当她还在幼儿园里时,就与其他男孩打过架。她结过两次婚,每次都与成功的男性结合,并与之进行激烈的竞争。这样的婚姻是不幸的。在她接受治疗期间,她举行了第三次婚礼,嫁给了一个被动的男人,因为他钦佩她的雄心壮志。该患者是一个严肃、敏感、紧张的女人,在团体生活中感到不适和羞涩,偏爱独处或单干。当问起她的童年生活时,她把自己描绘成一个不守纪律和不听话的孩子,尽管很聪明,但是学业成绩不佳,因为她讨厌学习,拒绝干她不喜欢的事情。她不愿与其他孩子相处,喜欢从事艺术工作。在童年时期,她曾想成为一个女牛仔;在青少年时期,她十分反叛,成了一个激进分子。她有天赋,在艺术领域取得了一些成就。她对现代实验艺术颇感兴趣,意

欲反映人物的心理层面。她在政治上持左翼观点,但认为自己不擅长政治运动,因为她在与人相处时常感羞涩。她以坦率和顿悟的方式描述她的历史。问题是,由于她对每件事情都抱以理智化的处理方式,因此进行心理治疗是有困难的。她对那些不适合自己的情感,通常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而对所处环境和经历,则精心选择词语来加以描述。

患者以前有过抑郁发作史,每次都是在有人阻碍她的抱负实现时发生。最近一次发作十分严重。她害怕病房里有人会伤害她,并且想像自己的皮肤是由鱼鳞片组成的。

她的父母都是神经症患者,在她童年期间,他们给了她充分的自由。当她 5 岁时,父母分手了,患者认为母亲给她亲爱的父亲带来了许多痛苦,从而觉得母亲应该对父母的分手负主要责任。她开始对母亲抱有厌恶和敌意,母亲在她的心目中成了一个“浅薄、漂亮、剥削的女人”。患者的职业兴趣既以其成功的父亲为榜样,也以其成功的继母为榜样。

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我们不想详细讨论该女性的人格和发展动力。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个病例,目的是想对低分者的一种女性类型进行描述。尽管这个患者的表现有点极端,但是她在整个低分女性组中仍具代表性。这些低分女性的共同特征是:政治上的激进分子和自由主义者,好与男性竞争,意欲在职业上获得成就,拒绝女子气,难以接受母性角色,等等。后两种特征在这里特别显著。然而,许多低分女性也有强烈的女性意识,这与她们的“男子气”追求是相矛盾的。与高分女性不同的是,她们没有强迫性,较少压抑和幻想,注意生活的丰富性(反映在艺术和其他专业领域),性格内向,注重内部体验。患者试图用理性解释和升华的办法来处理她们的冲突。

在一些低分女性中,焦虑症状比较明显,不适应感相当突

出,而且,在有些社会情境里表现羞涩。有个女性患者每逢团体交往就会冒汗。她还妒忌丈夫对别的女人感兴趣,并且担心自己会以牙还牙。另外一个患者是一个未婚女性,她在社交场合颇感尴尬,每当她举起一只杯子时,总会情不自禁地颤抖。在一次聚会上,她从楼梯上跌下,自那以后,她开始害怕上下楼梯。还有一个患者认为她始终被不合适的男人所吸引,因为他们十分神经质。一个年轻的姑娘来到诊所求治,诉说她害怕以前的尿床习惯会复发。她认为该问题使她回避社交。她对自己在少年时的性兴趣感到内疚。她在入睡后往往有一个多小时处于恐惧状态,有时会遇到一张网或一群臭虫落到她身上,甚至看到一个男人爬到她床上,每逢此时,她就会尖叫起来。还有一个属于恐惧症的例子。患者处于一种“混乱的焦虑状态”,害怕进入学校,尤其害怕去见她的导师。她不能与人讨论工作,觉得自己没有作出成绩,甚至担心对别人不热情,因为她觉得自己对母亲相当敌视,这种敌视会波及到他人。

有一个病例具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症状,患者以前曾有过抑郁症发作史。在治疗期间,她无法填写任何表格,因为她害怕自己会写下令别人尴尬的某些内容。她的问题从她17岁时就出现了,当时她害怕写下“该死”二字。几年以后,她在一份报纸上读到了有关强奸的报道,于是害怕“强奸”二字了。现在,她害怕她的老板会强奸她或攻击她,担心自己会把这些想法写下来,无意中塞进公文夹里去。最近,她发现镇静剂和酒精会减轻她的症状。

有个低分女性具有偏执狂精神分裂症。不过,除了一些异想天开的思想以外,她的症状与其他患有抑郁症的低分女性颇为相似。患者以顿悟的方式描述了她对别人的敏感反应,关注自己是否会遭人拒绝。她说她的毛病以紧张、犹豫不决为开端,

接着是担心自己“不能保全工作,可能伤害别人,或者死于脑溢血(因为她的母亲死于此病)。甚至担心自己死后无人知道”。当第一次接受访谈时,她诉说心情抑郁,无法集中注意力于自己的工作。她害怕别人“怀疑她的动机”,觉得她的家庭对她的态度有了改变。她一直感到自己十分虚弱和疲劳,并将原因归之于一种药物,认为诊所把这种药物搅拌在食物中让她服用。她说“我与他人之间存在障碍。从上个星期开始,我觉得我接近他们了”。

最后,医生还提到两个病例,患者由于躯体症状而前来就诊。一个病例主诉头痛,“对光高度敏感,因此常需戴上墨镜”。另一个病例主诉闭经、恶心和关节炎。两个病例都把她们的症状归因于意外事故。尽管患者主诉不多,但是,可以肯定她们属于转变性癔症。

### (三) 中间分者

上面提及的患者大多属于高四分位数或低四分位数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此外,我们还收集到了“中间分者”的一些材料。首先是问卷数据,包括对投射问题的回答;其次是精神病诊断和“明尼苏达多相人格调查”的数据。这些材料总体上表明,“低中间分者”更近似于低分者,而“高中间分者”更近似于高分者。

我们的有些临床个案是由中间分者组成的。在这些个案中间,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高分”和“低分”的人格倾向,以及两者在思想和行为等方面的不一致。在我们的被试中,不少精神病患者得中间分(有些属于“低中间分者”,但是大多属于“高中间分者”)。看来,患者的倾向与其自我虚弱和摆脱社会现实有关。当然,也有一些中间分者很少受到扰乱。问题是,我们关于他们的资料极少。



在我们的诊所被试样本中,有 27 人被诊断为精神病患者。其中,有 70%(19 例)的得分位于中四分位数之内。这个百分比是有统计意义的。然而,由于病例数太少,因此代表性仍嫌不够。

个案研究表明,许多颇具障碍的患者得中间分而非极端分。这些病例表明,他们的基本人格不是偏高就是偏低,但其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性质却使他们表现出某些矛盾的观点,或者相反的态度。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个精神分裂症男子。他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内惩罚的人,反对任何偏见,声称自己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人道主义信仰者。但是,有时他却表达了针对少数民族的沙文主义思想。另一个病例是一个具有强烈偏执性格的男子。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该男子的性格结构,以及他在法西斯主义量表和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上的得分,表明他在许多方面很像我们的高分被试。他对他的父亲抱有严重的敌意和恐惧,与此同时,他又努力以某种方式试图向人们证明他比他的父亲更有力量、更加能干、更具理智和更讲道德。该男子的许多表现告诉我们,他是精神错乱的。可是,他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却获得一个低中间分。访谈表明,这种情况与其反对父亲的偏见思想有关,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持有十分世俗的价值观。此外,他在反对偏见的同时,还对受排斥的团体抱有认同的态度。例如,他认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异主要在于教育差异,只要两个团体接受教育的机会均等,它们之间的差异就会缩小。他还认为,他之所以一再失败,原因在于自己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因为当他该上大学时,他的父亲破产了。然而,不管怎么说,该被试的思想与低中间分被试的思想有着质的不同,因为后者的人格具有低分者的特征。

## 七、小 结

这里,我们将按照上面描述的结果来讨论一下民族中心主义与心理障碍的关系。从兰利·波特诊所获得的资料是可以概括的。我们在描述样本时(见第二节),已经把兰利·波特诊所的人口界定为来自城市低中阶层的团体,他们不仅比整个研究样本稍为年轻一些,而且受过较多教育,因此比较愿意合作。应该说,兰利·波特诊所的患者与美国其他城市的精神病诊所的患者是相似的。就我们取样的范围而言,样本是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是具有统计意义的。这一研究结果也适用于整个精神病诊所的人口。问题是,患者的表现能否代表整个心理障碍的人群(神经症患者和精神病患者),对此,我们还不能肯定。因为有许多患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尚未来诊所就诊,他们的情况怎样,我们不知道。

此外,就研究结果的统计数据而言,仍有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由于我们的调查范围限于 120 个被试的规模,加上该被试组又被分成若干小组。这样的统计,使得许多数字不具统计意义。然而,不论怎么说,这一研究的价值在于,诊所的数据与我们的整个研究结果是相一致的。

现在,我们来探讨我们的研究结果是否揭示了民族中心主义与心理障碍之间的若干问题。下面提及的问题可与本书报道的其他研究结果联系起来考虑:(1)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是否比正常的人更具偏见?(2)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趋于极端的人(高分者或低分者),是否在心理健康或心理障碍方面也趋于极端?(3)高分者或低分者是否会发展成某些特殊类型的心理障碍?(4)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是否使我们形成了有

关人格结构的新假设？(5)有没有证据表明处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一端的人比另一端的人更具严重的障碍？

### 1. 具有严重心理障碍的人是否比正常的人更具偏见？

当我们把兰利·波特诊所的男女患者的民族中心主义平均分与所有其他被试组的平均分进行比较时,我们发现,诊所组比其他组较少偏见,尽管不很明显。诊所组的得分区间呈散布状,说明该组被试具有各种人格。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诊所组的被试比较年轻,所受教育较多,而且比其他组的被试更愿合作。我们推测,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了被试的反应与民族中心主义呈并不显著的负相关。鉴于这一发现,我们有理由假设,从普通人口中随机抽取的障碍者的偏见分,类似于从普通人口中随机抽取的非障碍者的偏见分。

### 2. 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趋于极端的人(高分者或低分者),是否在心理健康或心理障碍方面也趋于极端？

本书关于人格动力学的阐述,大多取自高/低四分位数的被试的比较。对此阐述,人们也许会持反对意见,也就是说,在他们看来,高分者和低分者都是不正常的人,或者说都是具有“边缘性和神经症”的人,因为真正正常的人是应该得中间分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对心理障碍的程度给予一种信度测量。不过,有迹象表明,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上得中间分的被试也是有障碍的,只不过没有高分患者或低分患者那般极端而已。这种说法的依据取自我们对神经症和精神病中间分得者的临床研究,以及以下的发现:精神病被试约70%位于中四分位数。

### 3. 高分者或低分者是否会发展成某些特殊类型的心理障碍？

我们的数据表明,在高四分位数中,被试的临床表现是相似的,而低四分位数的患者表现却有不同。对此问题,不能完全根

据常规的精神病分类来予以解释。在低分女性中,我们可以用“混合型神经症伴有抑郁和焦虑”这一特征来予以表述;而在高分女性中,我们可以用“焦虑状态”这一特征来予以表述。男性中的情况不大明显。不过,在高分病例中所界定的相似性和在低分病例中所界定的相似性均超过了由分类学所划定的界限。例如,在精神病类别中(精神分裂症、狂郁症精神病、焦虑状态、癔症、强迫性神经官能症和混合型神经症等),既有高分者又有低分者。我们难以确定这种情况是由于分类系统的非动力性质造成的,还是由于医生应用的分类方法造成的。也许,与这两种因素都有关。对患者在第一次精神病访谈时描述的病情进行研究,表明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临床表现有着如下差异:

在民族中心主义问题上得高分的被试,通常意识不到他们自己的情感和心理问题。他们对自己的问题往往拒绝作出心理的解释,而且试图压抑情感。他们对病情的诉说缺乏心理内容。男性和女性的共同症状是模糊的焦虑和愤怒的迹象。障碍严重的患者深受非人格化、缺乏兴趣和精神分裂样抑郁之苦。许多高分男女来到诊所,诉说躯体上的痛楚,其中有些人的心身疾病可被看做是压抑的情感表现,例如,恐惧或愤怒的表现。他们详细讲述这些症状,借以淡化其他问题。有些人则表现出对疾病、伤害或死亡的病理性恐惧。

在我们的被试组里,高分男性最常见的躯体病情是胃溃疡和痛楚表现,例如,紧张和焦虑引起颤抖和出汗。有些病例具有明显的强迫性质,有些病例表现出恐惧症症状(患者最害怕被伤害或受攻击),有些病例则持有偏执倾向。其他类型的病例主要涉及精神错乱(其中有一被试承认他对女孩施以性暴露)。还有一些人具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除了一例精神分裂症外,所有被试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不能自己”。其中,男性伴有阉割

焦虑和潜在的被动性迹象;女性诉说易怒、焦虑或气急症状。此外,还伴有发脾气、震颤、尖叫、晕厥,以及害怕发病时死亡等表现。当我们对其中一个女性病例进行研究时,我们发现,她的惊慌、震颤、晕厥和尖叫均表明了一种极端的愤怒。我们在一个女性身上发现了一个转变性癔症的例子,她具有十分刻板的性格。我们还发现了若干幼稚的精神分裂样病例,她们具有不同的特征,例如,焦虑、抑郁、非人格化和偏执性恐惧。不过,所有这些女性具有如下共同之处:她们的主要问题与她们无法对家庭成员表示强烈的敌意有关,她们的人格是刻板的和压抑的,她们中有许多人具有明显的强迫特征。此外,人格的刻板性和反移情的防御倾向,似乎既是高分男性的特征,又是高分女性的特征。

我们发现,低分者显示出各种临床症状。他们熟悉自己,既意识到自己的情感体验和问题,也能承认这些情感体验和问题。低分患者的病情诉说不是由模糊性焦虑或躯体症状组成的。即便出现没有内容的焦虑,患者也借特定的冲动、恐惧或适应困难来诉说他们的问题。低分男女的普遍症状是以不适应感为标志的神经性抑郁。患者中许多人在性、工作、社交等领域受到压抑,并且对团体情境感到不自在。

概述了这些研究结果后,我们可以说,在女性方面,高民族中心主义与“焦虑状态”这一类别相关,低民族中心主义与混合型神经症这一类别相关(这种混合型神经症亦可称为神经性抑郁症)。此外,民族中心主义与某些十分普遍的人格倾向(这些人格倾向已经超出了由精神病分类所划定的界限)显著相关。因此,我们在谈到症状或障碍类型时,不可能不提及它们得以发生的人格的综合特征。

4. 对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的研究是否使我们形成了有关人格结构的新假设?

使高分患者和低分患者表现出差异的那些类别,与我们区分高分正常者和低分正常者的那些类别是一致的。不过,在患者人群中,这些特征以更加夸张的形式表现出来。弗兰克尔—布伦斯威克和桑福德(Frankel-Brunswik & Sanford)在用问卷和临床技术所进行的研究中发现,高分女性常提到健康问题,而不顾她们的健康史与低分者的健康史十分相似的事实。有些被试在接受主题统觉测验时,也谈及健康问题。根据这些数据,我们的假设是,高分女性之所以特别关注她们的健康,原因在于她们害怕受到伤害,也就是说,害怕她们的敌意冲动会带来惩罚。该假设已为临床组的数据所证实。在兰利·波特诊所的女性患者中,谈论躯体症状已经成为患者病情主诉的主要组成部分。有关若干病例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假设(见第七章),即那些将注意力集中在躯体问题上的人,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无意识焦虑,而且也反映了一种自我封闭的防御,以免意识到自己的真正的情感生活。

低分患者的数据表明,在情感抑郁的问题上,他们所承认的自卑感、内疚感和抑郁感,是与他们的人格结构相一致的。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均为紧张的状态之中。不过,在诊所患者中,有些不为这种倾向所伤害,有些却为这种倾向所伤害。

诊所被试的材料支持了我们在第九章和第十三章所阐述的动力假设。这些数据证明了我们的假设:民族中心主义与人格类别之间的关系对心理正常者和心理障碍者来说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障碍者的这种人格倾向以病理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根据障碍组的证据和前面几章提供的结论,我们可以对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人格结构作如下概述:

高分者具有刻板的、压抑的人格,表现为定型思想和行

动。此外,他们对那些能使他们想起受压抑冲动的东西,都加以激烈的拒绝。他们的自我不仅压抑,而且缺乏分化。他们的经验范围,不论从情感上讲还是从理智上讲,都是十分狭隘的。好像他们只能体验特定情境里的习俗态度一样,至于其他态度,均被压抑或否认,或者被体验成与自我概念不能共存的某种东西。这种自我异己状态产生于这样的事实,被压抑的冲动是原始的。以女性为例,这种原始的冲动表现为敌意。让我们比较一下两个高分女性和一个低分女性对待她们孩子的矛盾心理。两个高分女性具有兴奋、颤抖和各种躯体表现,但是她们不承认这是一种愤怒的反应。其中,一个女性在症状发作时想掐死她的孩子,另一个女性虽有此冲动,但尚能加以控制。两人都试图使访谈者相信,她们实际上是爱孩子的。那个低分女性清楚地意识到她对孩子的拒绝,她承认自己没有耐心,无法给孩子充分的爱。她认识到她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设法进行弥补,而且希望经过治疗后能够成为一个好母亲。高分母亲不愿承认任何偏离世俗思想的行为,在她们看来,一个好母亲应该温柔地对待孩子,为他们奉献一切,除此之外,她不应该再有其他念头。所有高分者的例子都表明,被试的自我将不能接受的冲动完全保持在意识之外,从而阻碍了他们对冲动的修正或升华。高分者的主题统觉测验尤其显示了自我的压抑和分化的缺乏。即便是智商较高的被试,也只能讲一些陈旧的、没有想像力的故事。压抑的冲动以十分原始的形式出现,由此组成犯罪和惩罚的故事(见第十四章)。相比之下,低分者的故事在内容上更为丰富,而且较少原始性,证明他们体验到了范围广泛的情感,找到了表示冲动的成熟方式。此外,升华形式在低分者中也起着重要作用,既反映在他们的理智操作方面,也反映在他们的艺术兴趣方面。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表明,他们试图运用理智分析来解决他们的神经

症问题。

我们的印象是,高分者受焦虑的支配超过了低分者,而且他们更易表现出敌意的拒绝,以及强烈的受压抑的被依赖性。由于低分者能够直面人际关系,既接受爱,也希望被爱,而且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表示自己对被拒绝的害怕,因此,高分男性的被动性和依赖性也许与他们的焦虑反应有关。高分男性常在一个母亲式的女性身上寻求保护,但对这个母亲式的女性却赋予非个性化的人际关系。

上述问题促使我们考虑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人际关系。相关的信息来自详尽的个案研究(包括主题统觉测验),以及最初的访谈。低分者经常论及他们的人际关系,尽管存在人际障碍,但是他们仍然倾向于以一种个人的方式与他人保持联系。此外,正如在低分者的生活中和他们的幻想中所反映的那样,他们的人际关系属于抚育和依赖的结合。同样的倾向也表现在他们的职业兴趣之中。高分者的人际关系要脆弱得多,他们缺乏个性化,为习俗所左右,而且经常用支配—顺从的形式表现出来。

**5. 有没有证据表明处于民族中心主义量表一端的人比另一端的人更具严重的障碍?**

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与心理障碍之间的关系,人们提出的一个假设是:持有偏见的人(通常是那些高分者),由于压抑和自欺,从心理健康的角度来看是有害无益的。相比之下,低分被试却不具有这样的特征。鉴于此,我们得出结论说,高度偏见的人是有心理障碍的,而反对偏见的人是心理正常的。思想上的差异便可由此假设予以解释:高分者的思想建立在非理性的态度之上,而低分者的思想则建立在适应现实的理性态度之上。

不过,也有人提出另一种假设:由于低分者偏离他们的文化,因此他们在社会上是顺应不良的。正因如此,他们就可能具

有更多的抑郁、焦虑和不适应感(这是神经症模式的主要特征)。按此假设,持有偏见的人是正常的,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顺应的,也即适应他们所处的文化。至于低分者,既背叛他们的父母,又背叛他们所处的文化惯例,因此是有心理障碍的。

上述两种假设的共同之处在于,在民族中心主义量表的两个极端得分之间,有一端属正常,另一端属不正常。我们的研究表明,我们在获得高分、低分和中间分的被试中都发现了心理有障碍的人,尽管我们无法说明它们的比例。这一发现提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也许能在中四分位数中找到最具障碍的人。

此外,我们有若干理由反对上述第二种假设。第一个理由是,有人提出,与“非理性”的行为相比,“理性”的行为是不受深层的人格动力支配的。由于他们在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中发现了明显的非理性性质,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偏见者是感情用事的,而非理性思考的,也就是说,偏见者的偏见不受他们需要和情感的影响。然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思想方法或多或少受其情绪倾向的影响。理性的作用是自我的组成部分。由于自我的强度在低分者中间要比在高分者中间更大,因此,即便非理性在两者身上均可发现,但是两者的表现是有质的区别的。

第二个理由是,我们不能把心理健康与遵奉等同起来,把心理障碍与非遵奉等同起来。确实,正如我们的研究结果所显示的那样,民族中心主义者通常是更加遵奉的,或者说更加适应于我们的文化压力和思想的。从顺应文化的行为要求和思想要求这一意义上说,这些个体是“正常的”。如果良好的环境调适属于心理健康的话,那么一个人应该能对各种环境作出反应,或者充分地适应各种环境,包括正视自己的内部环境(严重的压制和自我的否定)。与此相似的是,非遵奉的行为也必须与外部力量和内部要求联系起来进行理解。这种非遵奉的行为既可能发生

在民主人格中,也可能发生在权力人格中,并显示程度不同的障碍。这种情况已由圣·昆丁监狱组(见第二十一章)的数据予以说明。

那么,我们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与心理障碍的关系可以说些什么呢?尽管作出结论性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仍可根据精神病诊所组在民族中心主义四分位数上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发生率,以及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人格特征,尝试作出某些假设。

正如我们在本章第四节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发现,精神病的比例从低四分位数到高中四分位数呈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从高中四分位数到高四分位数呈下降趋势。有关这方面的数字,可以参见表 22-3 和表 22-4。由于每个四分位数上的病例数太少,因此这种倾向没有统计意义。如果该研究结果确实有效的话,如果精神病比神经症更严重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精神病与民族中心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至于为什么在高四分位数上精神病患者较少,其中的原因我们已经讨论过了。

那么,在民族中心主义与精神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在反民族中心主义与神经症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以下的讨论仅仅是对我们研究结果的两种推测,借此促进讨论和研究的深入。在讨论了高分者和低分者的人格结构以后,我们发现,高分者的一些人格倾向会使他们发展精神病的症状,低分者的一些人格倾向会使他们发展神经症的症状。

我们发现,尽管某些低分者具有十分软弱的自我(他们中间存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但是,与高分者相比,他们给人的印象是,他们相对来说具有较强的自我,能够成功地处理他们的冲动,较少抑制和反移情,并具有较强的升华和修正能力。此外,低分者能与人保持真正的关系。就患者而言,这些人格倾向与

神经症特征的形成相一致,而不是与精神病特征的形成相一致。就病理形式而言,这些人格倾向不受外力制约,也对自我较少压抑。那么,这些倾向的深层动力是什么?它们与遗传有否关系?对此,我们说不清楚。也许,在低分者中间发现的那种类型,与他们早期对攻击的抑制有关,或者说与他们早期对父母的认同有关,或者说与他们早期形成的内化的良知有关。

在高分者中间,广泛的抑制和反移情阻碍了他们自我的发展。自我为原始的冲动所左右,尚未分化,而且与深层的东西完全隔离和孤立。当未曾解决的无意识冲突得到强化并接近意识时,自我尚未作好充分的准备,于是感到震惊和压抑。不管有否躯体症状,这种遭遇都有可能导致强烈的焦虑,并以极端的形式导致退缩、否认、投射,以及其他各种精神病的表现。如果为他们提供支持的环境,他们有可能获得一种“舒适感”和“适应感”。但是,由于他们缺乏爱的寻觅能力,缺乏在紧张时刻控制现实的能力,他们很容易形成权力主义的特征。

## 注 释

- [1] 本章为玛丽亚·汉兹·莱文森(Maria Hertz Levinson)所撰。作者感谢兰利·波特诊所的负责人卡尔·鲍曼博士(Dr. Karl Bowman)为本研究所提供的诊所设施,感谢著名心理学家罗伯特·哈利斯博士(Dr. Robert E. Hanis)给我们的慷慨支持和有益建议,感谢诊所员工对我们的帮助和合作。
- [2] 也有一些低于20岁的被试最终未被排除。
- [3] 在政治经济保守主义量表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采用投射方法从兰利·波特精神病诊所获得的结果可参阅第五、七、十五章。
- [4] 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与智力的关系,可参阅第八章;关于民族中心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可参阅第四章;关于高分者压抑的心理和解释,可参阅第一、七、十五章。下列事实也为本研究提供了支持:一家退伍军人诊

所中的精神病患者(主要是非自荐的患者,以及强调自己患有器质性疾病的患者)在民族中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量表上获得的平均分接近5.0[见莱文森(D. J. Levinson)未发表的材料]。

- [5] 来自胃溃疡组的研究材料并未包括正常的接纳性访谈,而是施以集中的研究性访谈,包括询问患者某些突发性的因素。我们从这些访谈记录中得到的陈述,与我们的得分类别有关。
- [6] 关于避免惩罚的深入研究表明,尽管它在第十一章被归入“低分”类别,但这里则倾向于把它归入“高分”类别。
- [7] 这个条目包括在评价者所使用的手册之内,但是,后来对病例材料的分析表明,低分者更有可能经常发生转变性癔症。对此倾向,我们尚不清楚。这里,也许还有一种性别差异,因为有转变性症状的是两位低四分位数的男子。

## 第二十三章 结 论

在我们看来,本研究最重要的结果是,它阐释了研究方法的类型,以及被试在各种领域可能具有的观点之间的一致性。这里所谓的各种领域,其范围从家庭到性爱,到人际关系,到宗教,到社会的和政治的哲学等。也就是说,从父母—孩子的关系过渡到以力量为取向的伴侣关系,过渡到对他人和上帝的依赖,最后过渡到社会态度和政治思想等领域。在这一过渡中,存在着一种戏剧化的模式,例如,从父母—孩子的二分法派生出性别角色和道德价值的二分法,派生出拒绝和接受内团体或外团体等社会关系的二分法。世俗、定型、刻板、抑制,以及随后发生的恐惧和依赖等,都是该模式基本人格的具体表现,它们既可在个体对待生活问题的态度中观察到,也可在个体对待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态度中观察到。

与上述戏剧化模式不同的是,另一种模式是以承认和接受内部冲突,建立平等和顺从的人际关系为特征的。这种模式涉及一个人对待家庭、异性和宗教的态度,以及社会价值的内化。灵活性和满足是作为这种态度的结果而出现的。

不过,这两种类型决非绝对。它们只是一种统计分析的结果,应被视做相关的和动态的一组特征。<sup>[1]</sup>它们存在于业已发现的症状之中,但又留有充分的余地供其变化。此外,两种模式中的每一种模式都具有不同的亚类。例如,在民族问题上,同样是

偏见者,却可分为两个亚类:世俗的偏见者和变态的偏见者。此外,还有许多亚类可以根据赋予少数民族团体的特征来加以区分。不过,持有偏见的被试要比不持有偏见的被试彼此之间更加相似,而后者则涉及各种各样的人格。与莫名其妙的敌意态度相比,人格的变式很少具有共同的成分。

研究表明,就主要类型而言,核心部分要比表面现象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情况尤其适用于高度偏见的被试(他们持有大量理性化的偏见表现)。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的研究限于偏见的心理层面,因此,存在于我们社会的对促进或消除民族偏见具有重要作用的历史因素或经济因素,显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尽管我们在讨论父母—孩子的关系时也提到了历史因素或经济因素,但是我们没有将它们作为主题进行分析,只是用以说明它们与独特的家庭模式的关系而已。

此外,本研究探讨的是动态的潜力而非公开的行为。我们也许会对一个人可能采取的暴力行为提供预测,但是对于这一暴力行为得以发生的必要条件却是茫然不知。换句话说,关于行为发生的心理动因,是有许多课题可做的。实际上,这种研究对实践来说也是必要的。行为发生既有其内部的原因,又有其外部的原因。如果不对个体内部的因素进行分析,则任何行为研究都是不完整的。本书的任务在于揭示行为的内部原因,借以推测人们在特定的情境里会以何种方式行事。

当然,所有这一切均得服从于我们的被试样本。我们认为,若要研究这样一个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问题,样本必须满足统计的要求(这个统计要求可以与全国民意测验的统计要求相比较)。目前的研究是一种针对特定问题的研究,而不是泛泛其谈的研究。事实上,这一研究所涉的被试数目超过 2000 人。暂且

不考虑被试的数量,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被试的潜在因素,而非描述被试的人口。我们的问卷条目和调查技术基于我们意欲了解的事实。惟有在一种真正具有代表性的研究中,我们才有可能定量地评价我们文化中的偏见,或者说对我们业已描述的两种模式进行评价。

尽管我们的任务不是制定反偏见的纲领,但是我们仍想对我们研究的一般含义作些评论。

我们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如下的启迪:反对偏见的举措应当考虑偏见的整个结构。我们需要关注的不应是人们对少数民族团体有否歧视,而是人们是否具有这样一些现象,例如,定型的思维模式,情感冷漠,追求权力,以及潜在的破坏意向。当一个人采择了这种思想方法以后,我们就不难推测为什么反对社会歧视的措施未能当即见效的原因了。如果这种现象的本质是非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指望理性观点会对此现象产生深刻的或持久的影响。同样,当人们的恐惧与他们的软弱或苦难联系起来时,对他们抱以同情既有益也有害。指望这些人与少数民族团体成员搞好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无法形成经验,不能剖析自己,难以对特定的团体或个人产生喜爱。如果我们要使他们把对一个团体的敌意态度转移开去的话,那么我们更应注意他们有可能把对一个团体的敌意态度转移到另一个团体上去。

就应对措施而言,我们认为,不应把注意力集中在疾病本身,而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对付症状或特定的表现上。要知道,有些症状比其他症状更加有害,因此,即便我们无法治愈一种疾病,也要想方设法控制这种疾病。你也许希望了解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是什么样子的,本书为你提供他们的“肖像”。在你了解了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样子以后,你会发

现对他们进行系统治疗是十分重要的。例如,我们无法借助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理性或同情来解决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他的传统特性或他对权威的顺从来解决他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治疗不会减弱他的传统特性或权力主义心态)。

与此相似的是,我们发现,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会因为不断深入的反偏见运动而有所收敛,或者,随着少数民族团体得到保护而变得强大,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也会有所节制。我们知道,这是与我们所了解的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人格相符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法西斯主义者的惯用伎俩是给他的反民主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此外,偏见观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一个人很容易接受与自己相像的东西,并拒绝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因此,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少数民族团体成员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会尽其所能从表面上与统治集团盛行的方法保持一致,借以保护自己。不过,我们是用谨慎的态度来表述这一观点的,因为人们必须意识到另一种可能性:同样的遵奉倾向在内团体里得到赞扬,在外团体里就有可能受到谴责。我们从本研究中得出的结论是,少数民族团体的终极命运并不取决于该团体能够做些什么。一旦少数民族团体成员以此方式进行了遵奉,那么他们会不会用盛行的内团体的态度来对待那些不能进行遵奉的人呢?

看来,当我们提及一些症状时,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事实:一种症状在此领域“痊愈”,很可能随之而在彼领域“发作”。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上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法西斯主义的潜力如此巨大,致使被歧视的团体不这样做就很难争取到它们的权利。

那么,关于疾病本身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探讨的是一个人的人格结构,那么我们首



先应该考虑的是改变人格的技术。我们能不能“治愈”我们的高分者呢？答案是可以的。只要我们沿着我们在临床和遗传等章节中指出的路线前进，我们就可以做到。但是，当我们认真分析一下治疗的时间、需要付出的代价、可以利用的治疗师，以及患者把接受某种治疗看做是一种冒险时（民族中心主义者最易如此），我们发现，个体心理治疗是很难作出应有贡献的。

面对民族中心主义者的刻板性，我们自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在个体生活的童年时期就施以适当影响的话，则人格结构的前景就不会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看来，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童年训练上。以本书描述的临床和遗传研究为基础，去制定一个童年训练的计划，那么，即便在目前的文化氛围中也能产生非民族中心主义的人格。实际上，根本问题在于儿童应该得到真正的爱，被作为人来对待。当然，对于这样一种童年训练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为什么这样说呢？以民族中心主义的父母为例，期望他们自行改变是不可能的。我们在本书中多次指出，他们不仅在与孩子的关系中表现出道德主义的惩罚态度（就像他们对待少数民族团体的那种态度一样），而且他们在对待自己的冲动方面也表现出同样的道德主义惩罚态度。因此，对儿童来说（正如对成年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来说一样），我们不能单凭心理学来实施这样的童年训练计划。我们太熟悉年轻的父母了，他们实际上是了解现代教育理论的，但是他们头脑中的“做人标准”却严重阻碍了现代教育理论的实施。随着“做人标准”的广泛传播，严肃认真成了为人父母者的教育目标。尽管他们拥有良好的意愿和真挚的情感，但是他们却在塑造儿童方面不断受阻。要知道，塑造儿童的目的是为他们将来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问题是，在如今的父母中间，极少有人会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未来社会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看来，单凭心理学的措施是无法实现对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矫治的，因为矫治潜在的法西斯主义者，如同我们根除神经症、青少年犯罪、大国沙文主义一样困难。这些东西均是社会的产物，只有当社会得以变革时，它们才会改变。至于社会如何变革，不是由心理学家说了算的。这个问题有赖于所有社会科学家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要求是，当社会科学家在圆桌会议上讨论社会变革的问题和规划时，应当听听心理学家的意见。这是因为：第一，在心理学家看来，我们若要了解社会科学，首先必须了解社会对人干了些什么。第二，心理学家认为，尽管推行社会变革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这种变革不一定改变得了偏见人格的结构。要想改变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甚或制止这种倾向，就必须让人们真正看到他们的能力，毫无抑制地运用他们的能力。用操纵人的办法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现代心理学已经揭示了这种操纵手段得以存在的基础，而且我们的研究也为现代心理学的发现提供了支持。我们的研究结论是：最先得到权力的人也是最后放弃权力的人。我们有把握提出这样的假设：法西斯主义是强加于人民的，它的出现实际上侵犯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只有当人民充分意识到他们的处境时，他们才会抱现实主义的态度。问题是，人民无法看到他们的社会作用，或者说无法看到他们已经对社会起了哪些作用，这不仅由于不讲真话的社会控制所致，而且也由于民众心理的盲目性所致。尽管我们不能说心理顿悟是洞察社会的保证，但是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们在对待自己方面最大的困难在于，他们对自我顿悟的抗拒和对社会事实的抗拒，而所有这些抗拒是有其共同的心理根源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心理学可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克服抗拒的技术起始于个体心理治疗，经改进后，现已用于团体治疗。我们应该承认，这种技术对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效果不

大。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大多数民族中心主义者不是极端的,相反,他们属于我们研究中的“中间分得者”。

由于潜在的法西斯主义倾向是以一种伪民主的形式强加于人们头上的,因此不知内情的人们还满怀希望带着它走向未来。可以预测,如果现存的经济模式仍然得到维持的话,人们会继续受此模式的影响。我们希望读者不要低估本书所关注的法西斯主义的潜在力量,忽视这样的事实是不明智的。同样,我们也希望读者注意,我们的大多数被试并没有表现出极端的民族中心主义模式,而且我们提出了各种方法来避免这种极端模式,忽视这样的事实同样是不明智的。尽管存在这样的误区,也即就外部提供的价值而言,偏见者在我们的社会里会得到有利于他们的回报,但是这不等于说宽容者就只能在到达天堂以后才能得到他们的回报。实际上,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就内部提供的价值而言,宽容者得到了基本的满足。由于他们反对盛行的社会准则,因此他们不得不以其内疚为这种满足付出代价。我们的研究表明,他们要比偏见者更少压抑,更多快乐。最后,我们要指出的是,法西斯主义者常常求助于情感来进行煽动,而民主主义者常常求助于理智来进行宣传。如果说恐惧和破坏是法西斯主义者的主要情感源泉的话,那么爱心就成了民主主义者的主要理智源泉。

#### 注 释

[1] 在我们称之为权力主义人格和反犹主义意象的特征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当我们将所有的研究数据汇总起来,并且予以分析以后,萨特(Sartre)关于反犹主义意象的论文就可供我们引用了。他的现象学描述与我们定量分析所揭示的一组特征如此相似,以致我们不得不对他抱以敬佩之情。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主义人格/(美)阿道诺(Adorno, T. W.)著;  
李维译.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2. 12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书名原文: 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ISBN 7-5338-4367-3

I. 权... II. ①阿...②李... III. 社会心理学  
IV. C9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17869号

责任编辑 王晴波

封面设计 池长尧

责任出版 温劲风

20世纪心理学通览

权力主义人格(全三卷)

[美]西奥多·W·阿道诺等 著

李 维 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激光照排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0.875 插页 12 字数 930000

2002年12月第1版

2002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8-4367-3/B·42 定价:5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